

张士海
程恩富◎主编

马克思主义 文化研究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AMI核心集刊
主办单位：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4年第1期
总第13期

RESEARCH ON MARXIST CULTURE

张士海 程恩富◎主编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

二〇二四年第一期 总第十三期

山东大学出版社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本期焦点：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实图景
——访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项久雨教授
杨婷

讲好中国故事需要遵循唯物史观
余斌

中华文化生命体的四重向度研究
王苏琪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价值
杨晓娟 姜红明

《论语》“‘正名’以‘正政’”思想及其对党的自我革命的启示
朱夫夫 黄志高

迷信西方的历史浮沉与认知剖析
刘海涛 杨威

数字资本主义视域下电子游戏问题研究
刘皓琰

山东大学出版社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学术顾问：王忍之 中共中央宣传部原部长

滕文生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主任

王伟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

编委会主任：李慎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

尹作升 山东大学（威海）党工委书记、教授

编委会成员：（第二届）

陈众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

党圣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会长

张政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长

林建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

李正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

张国祚 中国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

刘润为 《求是》杂志原副总编、全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

孙熙国 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戴木才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秦 宣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

李 冉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尚庆飞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

庞立生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原副部长

王韶兴 山东大学世界政党研究中心主任

何中华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导师

吴文新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

孙绍勇 西北工业大学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

东方毅 世界文化论坛联袂主席、东方毅文化协会会长

李 明 东方毅文化协会董事局主席

娜·根·奥西波娃 莫斯科国立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谢·奥·叶利谢夫 《莫斯科国立大学学报》政治学与社会学卷编委会第一副主席

主 编：张士海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程恩富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首席教授

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世界文化论坛联袂主席

常务副主编：郝书翠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常务副院长

编辑部主任：马秋丽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副院长

编辑部成员：焦 佩 鲁法芹 闫惠惠 于少青 李谷悦 陈 旭（英文）

主 办 单 位：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指 导 单 位：世界文化论坛学术委员会

马克思主义 文化研究



RESEARCH ON MARXIST CULTURE

2024年第1期

总第13期

张士海 程恩富◎主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 济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 2024 年, 第 1 期 : 总第 13 期 /
张士海, 程恩富主编. — 济南 :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24.5
ISBN 978-7-5607-8210-2

I. ①马… II. ①张… ②程… III. ①马克思主义—
文化理论—研究 IV. ①A811.67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4)第 073379 号

责任编辑 肖世伟
封面设计 王秋忆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24 年第 1 期, 总第 13 期)
MAKESI ZHUYI WENHUA YANJIU (2024 NIAN DI 1 QI, ZONG DI 13 QI)

出版发行 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政编码 250100
发行热线 (0531)8836300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济南华林彩印有限公司
规 格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19.5 印张 415 千字
版 次 202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访 谈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实图景 ——访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项久雨教授	杨 婷/3
--	-------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化理论研究

讲好中国故事需要遵循唯物史观	余 斌/17
碰撞与新生：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文明向度	贾德钦 吴文新/27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观的出场语境、基本内涵与当代发展	宋凯晴/40
《资本论》的唯物史观运用及其当代意义	王广良 刘玉武/50
《矛盾论》对“两个结合”的运用及其当代启示	徐 聪/61

“两个结合”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相关研究

中华文化生命体的四重向度研究	王苏琪/75
中华文明和平性：理论意蕴、历史演证和时代价值	李汶桦 唐垠箫/88
论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思维	张晓周/102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价值	杨晓娟 姜红明/114
论新时代推动我国文化高质量发展的五重意蕴	李侑峰 王 员/128
《论语》“‘正名’以‘正政’”思想及其对党的自我革命的启示	朱夫夫 黄志高/144

文化治理的理论渊源、鲜明特征和基本原则	郭晨娟 施惠玲/161
---------------------------	-------------

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研究

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成就百年伟业的文化密码	查建友/173
艰苦奋斗精神的时代内涵、价值意蕴及弘扬路径	迟成勇/184
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来意识形态工作的发展历程及成功经验	冯文燕 刁秋华/201
湖南苏区及湖南苏区政法文化的概念阐释	谢时研/213

“大思政课” 相关研究

迷信西方的历史浮沉与认知剖析	刘海涛 杨 威/229
“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对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挑战及其应对.....	秦 芬/244
数字资本主义视域下电子游戏问题研究	刘皓琰/254
历史虚无主义如何“优雅地”掩盖资本扩张的罪行 ——基于“冲绳审判”的分析	何万成 谢年华/268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西方司法伦理的融贯 ——以中西方传统司法伦理的形成为视角	黄千琢/281

动 态

论点摘编	/299
------------	------



访 谈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实图景

——访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项久雨教授

杨 婷*

【项久雨简介】项久雨，法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武汉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负责人兼学术带头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价 A 刊主编、东亚人文学会副会长、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学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3 项。长期致力于思想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论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国内外期刊发表系列学术论文，分别荣获中宣部第四届、第六届和第七届“期刊主题宣传好文章”，“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社会科学》的理论视野”专栏好文章，《中国社会科学》首届年度好文章，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在人民出版社等出版著作多部，咨询报告获中央领导重要批示、被中央办公厅等部门采纳多篇。科研成果获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湖北省第十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武汉大学 2022 年学术成果特等奖等多项奖励。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就“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①的理论问题进行了阐释，深化了对中华文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将文明研究引向深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行走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大道上，是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文明形态的历史延续与展开，蕴含着中华文明的独特规定性。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

* 杨婷，法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榜样教育等。

①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 年第 17 期。

态，开显了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意义世界。百年来，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契合中国实际、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现代化道路，深度赋予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文化底色。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相辅相成、同生共进，生动反映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图景。针对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武汉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院执行院长、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项久雨教授。

一、科学把握文明的内涵及内在结构

访问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①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深度展开，需要科学把握文明的内涵及内在结构，您能先谈谈这个问题吗？

项久雨：好的。文明是极富魅力的概念，也是歧义丛生的概念。文明在概念界定上的理论困难，反映出文明本身的多元维度与复杂面向。一般而言，文明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创造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与制度成果的总称，文明形态是对文明发展状态及其本质特征的概括。文明不是静止的、固定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与自然界的生命有机体类似，文明是由人的实践推动创造的生命有机体。对文明内涵的把握，我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谈。

首先，何以“文明”？我基于唯物史观的视角进行分析。文明是人类把握历史的基本单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应“以文明为单位而不是以国家为单位来观看历史，将国家视为文明生命中一些从属和短暂的政治现象，因为国家会在文明之中出现又消失”^②。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不可能用其他任何思路来思考人类的发展”^③。文明作为一个历史命题，其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以宏大的历史叙事、广阔的历史尺度、总体的历史视角、清晰的历史意识来研判世界历史的。正因如此，文明从本质上契合人类探索历史规律、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需要。

唯物史观最为彻底地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深入世界历史的本质维度把握人类文明。唯心史观抽象地发展了文明的精神面向，往往以假设代替文明发展的史实，无法正确认识文明发展的深层原因，具有历史认识上的不彻底性。恩格斯对此作出批评，指出在唯心主义历史观看来，“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的发展和活动；人们已经习惯于用他们的思维而不是用他们的需

①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② [英]阿诺德·汤因比：《文明经受考验》，王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5页。

③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要解释他们的行为（当然，这些需要是反映在头脑中，是进入意识的）”^①。超越唯心史观对文明认识的不彻底性，唯物史观回到历史发生的“现场”，内在地把握文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条件，对文明发展的实质与趋势作出深刻阐释。对此，我们可以立足于“实践的事情”与“社会的素质”这两个命题深化对文明的理性认识。恩格斯指出：“如果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那么英国人确实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②一方面，文明是“实践的事情”，表明文明是人类实践的结晶。文明是无数“现实的个人”在实践中、在历史中创造的，是无数生命智慧的历史汇聚与有机加总，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最高成果。另一方面，文明是“社会的素质”，表明文明反映着社会发展的状态，构成了社会进步的标志。文明与野蛮相对立，作为评价历史发展的积极尺度，是对历史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

其次，我想谈一下文明的内在结构。作为生命有机体，文明的内在结构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文明的物质形态，即与生命体“肉身”类似的结构，是文明存在的基础形态；第二，文明的制度形态是文明的“骨骼”，文明的有序运转与良性发展需要有坚硬的骨骼作为支撑；第三，文明的精神形态是文明的“灵魂”，标志着文明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

物质形态是文明的“肉身”。物质形态是有形的，是文明发展状态的直接体现。唯物史观认为，把握“现实的个人”必须考察“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③。差异化的自然地理条件、物质生产条件对生产力发展起着约束作用，也为文明的发展划定了基本的边界。任何一个文明的存在与发展，都必须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为支撑。雄厚的物质基础为文明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条件，厚植了文明发展的经济结构基础；脆弱的物质基础与自然条件使文明陷入发展停滞或发展缓慢的历史局面。新技术革命带来物质生产与文明形态的飞跃，纵览人类文明史，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智能革命的发生与发展，都为文明的物质形态变革创造了根本性的条件。人类更高文明形态的变革，从根本上要依托于更高层次的物质生产变革，智能革命是推动新一轮文明形态变革的决定性力量。

制度形态是文明的“骨骼”。文明的制度形态具有多样性、层次性，既包括经济制度、行政制度、政党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等由国家主导推行的制度，又包括宗教制度、教阶制度等在精神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制度，还包括人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凝结而成的制度（如民间信贷制度、饮食制度等）。制度形态为文明运转提供了根本性条件，构成了文明在结构层面的丰富面向。文明的制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页。

度形态具有历史性，一些落后的制度在文明发展演化的过程中会被淘汰，例如奴隶制度、等级制度、种姓制度等。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探讨了法国大革命的特有功绩，他认为大革命“并不像另一些人所想的那样，要改变我们的文明迄今具有的特点，阻止文明的进步，也没有从实质上改变我们西方人类社会赖以依存的根本法律……这场革命的效果就是摧毁若干世纪以来绝对统治欧洲大部分人民的、通常被称为封建制的那些政治制度，代之以更一致、更简单、以人人地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①。法国大革命推动着文明制度形态的变革，塑造出更符合资本主义文明发展要求的制度形式。

精神形态是文明的“灵魂”。文明的精神形态是无形的、内在的，但又有现实的表现。在福泽谕吉看来，文明的精神就是人民的“风气”，“这个风气，既不能出售也不能购买，更不是人力所能一下子制造出来的，它虽然普遍渗透于全国人民之间、广泛表现于各种事物之上，但是既不能以目窥其形状，也就很难察知其所在”^②。文明的精神形态具有渗透性，它渗透于文明共同体成员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在人的文化创造与精神生产之上，体现在人的行动方式与人生选择中。生活在文明中的人们，对文明精神产物是“日用而不知”的。因而，文明的精神形态对人们的影响具有潜移默化的性质。文明的精神形态具有超越性，它标志着一个文明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与历史高度，反映出一个文明与其他文明相区别的异质性。如果说一个文明引领着人类文明发展之潮流，那么这一文明必定在精神形态上有所突破，必定会创造出贡献于全人类的思想观念与价值观念。

二、准确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性”与“现代性”

访问者：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走自己的路”，需要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铸就独特的“现代性”。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解，不能停留在现代文明的一般性层面。您如何看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性”与“现代性”？

项久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仅是一种现代文明形态，更是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声相应的文明形态，是伟大复兴的文明表达与文明诠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规定性赋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内在特性，支撑其成为独特的文明形态。“现代”是一个历史范畴、时间范畴，现代文明具有历史性、时间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从中华文明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是历史的文明，又是现代文明。

先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性”展开为历史连续性、历史继承性、历史创造性的有机统一，具有丰富的历史意涵。马

① [法]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60页。

② [日]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3页。

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强调了历史继承性与历史创造性的关系：“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将历史视作一段连续的整体，是一种历史认识论的要求。如同毛泽东所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造，是历史文明发展演进的产物，是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化。所谓的“断裂论”是无法解释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同时，还应当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体历史视野，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产生、形成、发展所蕴含的历史逻辑，从中把握一般性的规律，为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未来发展提供历史智慧与历史参照。

再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代性”。“现代性”指的是现代文明的核心特征，反映出其区别于传统文明的规定性之所在。“现代性”的概念及其探讨肇始于西方，但并不意味着能将西方的“现代性”上升为所谓普世的“现代性”。亨廷顿就提出“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③。这种文明扩张的趋向根源于资本逻辑，根源于资本对利润的无限追求。与之不同的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展现出的“现代性”，是以民族复兴为基底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实践理性的统一。首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牵引着文明发展的方向，体现出深层的价值理性。其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实践理性推动创造的文明。实践理性，就是关切具体实际，坚持实践思维，把握实践规定，内化实践自觉，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致力于发展出更高水平的物质、精神、社会成果，亦有其工具理性的面向。其工具理性维度是与夯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基础相联系的，也是与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逻辑相联系的。

三、辩证分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访问者：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仅致力于实现自身的伟大复兴，还具有“胸怀天下”的世界情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于“世界之问”与“时代之问”的回答，也可以为其他文明探索与解决相似问题提供一定的理论参照与实践经验，彰显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意蕴。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辩证看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民族性”与人类文明发展的“世界性”的关系？您可以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0～47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③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谈谈这个问题吗?

项久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民族性”与人类文明发展的“世界性”之间具有内在不可分割的统一关系。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①民族性与世界性具有辩证关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丰富和发展,就是对人类文明的丰富和发展。

先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民族性”。中华民族有自身独特的民族精神、民族历史、民族文化,积淀出深厚悠久的文明传统。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经历了从“自在”走向“自觉”的过程。根据费孝通先生的观点,中华民族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②。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得以深入推进,更丰富的民族精神标识、文化标识得以打造与塑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民族性”特质将进一步显现。谈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民族性”,实际上还应当深入思考“本土性”或“中国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个“以中国为方法”的研究范畴,从文明史的整体尺度对“中国”予以文明发展程度的历史性审视与诠释。在“中国”发现文明,是21世纪的重要历史课题,意指对近代以来将西方文明奉若神明的文明观的历史纠偏,强调不同民族、国家文明形态的多样性以及文明发展的可能性。应当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知识论意涵,是以其“民族性”与“中国性”为底色的知识探索,深层次指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建构。

再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诞生及其发展,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所谓“世界历史意义”,是置于世界历史的宏观尺度中所展现出的积极性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展现出的世界历史意义,不能仅从其自身来理解,还需要进一步从文明的实质层面切入,认识到其深层展现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历史意义。

第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伟大复兴的文明表达,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展开的文明探索,描绘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历史图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双重历史方位与历史尺度下的发展。除了要关注内部的全局视角外,还应当从宏观的世界历史背景予以全面分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蕴含着文明形态变革的历史叙事,构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基座。

第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伟大复兴的文明表达,展现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旺盛生命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两个结合”的文明产物,有其根本的指导思想,不仅反映出文明自身的生命力,而且也反映出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80页。

^②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文明指导思想的生命力与影响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其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历史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概念范畴，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性视野，从文明论、复兴论的视角对中国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了原创性、历史性的探索与思考，形成了深刻的文明主张，尤其是从胸怀天下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同其他民族文明形态共同发展的，是共生性的文明，是具有世界视野的文明，是既实现自身复兴又推动共同发展的文明。

第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伟大复兴的文明表达，展现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伟力。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表明，文明不可能只有一种形态、一种形式、一种风格、一种叙事，那些试图将某种文明普世化的做法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那是非历史的。从文明创造的角度来看，“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①，文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产物，其形态的呈现具有“美”的形式。对此，应当秉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明认识论。从文明的客观呈现来看，“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②。所谓“完美的”文明，是不可能存在的。文明总是在解决一定矛盾的基础上使自身不断发展。所以，文明既不可能存在高低之别，也不存在优劣之分。

四、世界变局中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中国的创生

访问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命题，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③。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中国的创生是一个接续探索的历史过程，您认为其特质与优越性如何在世界变局中体现？

项久雨：这里所指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个专有概念，指代生成于现代中国的文明形态，其世界变局中得以最终成型。从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看，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是社会主义文明的当代中国形态。从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从人类现代化历程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历程中创造出的文明形态，是具有社会主义与中华文化双重底蕴的现代文明。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69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29页。

^③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14期。

第一,文明的活的灵魂:21世纪马克思主义催生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文明的活的灵魂,是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的指导思想。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批判性发展,始终沿着人类文明史的历史逻辑来推动自身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塑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内核、思想内核、精神内核。从价值内核上看,以人民为中心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主张。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有着两个层面的基本诉求:一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体现出社会主义文明的本质规定性。二是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物质、精神、交往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从思想内核上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的根本思想指南,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划时代变革在思想层面上的基本体现。从精神内核上看,在现代中国,政党精神引领着文明精神的历史性建构。进一步说,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国精神内在的精神资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确立起独特的精神传统,聚合起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人民的价值追求,共同凝结为中华文明在21世纪世界历史维度上的精神诉求。

第二,文明的内生动力:顺应世界历史潮流的发展方式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马克思深刻揭示出资本所具有的“伟大的文明作用”,但这种“伟大的文明作用”有其发挥的历史限度,资本逻辑主导的文明具有结构性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难以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一步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文明形态变革,只有找到代表世界历史潮流的生产方式、发展方式,才能从根本上破解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动力之问。

中国之所以能够历史性地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因为把握了世界变局的历史性机遇,开启并推进了发展方式的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通过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在把握世界变局中推动文明发展,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寻求内生性的发展动力。新发展阶段是世界变局下中国所处的发展方位,是仍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发展阶段,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阶段,实际上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从基本定型转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历史阶段。

第三,文明的微观基础:美好生活与美好社会的实践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文明不仅包含宏大的历史叙事,更包含微观的生活叙事。“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显著标志便在于人之生活的基本境遇”^①,一个文明所具有的特质集中体现在生活于文明之中的个体身上,集中体现在文明所展现出的社会面貌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微观基础体现在新时代中国所致力于创造的美好生活与美好社会上。美好生活与美好社会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有着本质关联的命题,二者有着不同的侧

^① 项久雨:《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样态变革及价值引领》,《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

重，也有着统一性的基础。美好生活主要关涉个体的生活状态，美好社会主要关涉社会有机体的面貌与状态，二者的共同基础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化。从世界变局的历史视角来看，美好生活与美好社会实质上展现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生活方式与社会有机体面貌上的历史性变革。

美好生活的历史性实践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活方式变革，塑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独特生活状态。新时代的美好生活体现人类文明新形态历史变革的生活状态，是美好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绿色生活的有机统一体。美好社会的历史性实践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社会图景变革，塑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独特社会有机体状态。美好社会的内在规定性体现在四个层面，分别是人民社会、共同富裕社会、德法共治社会与友好型社会，彰显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社会创造。这四个维度的社会图景对应着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不同社会领域的变革，具有整体性，共同展现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意蕴。

五、用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之“矢”，去射人类文明新形态之“的”

访问者：习近平总书记曾讲道：“更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① 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统筹推进“五个文明”建设中构建了文明发展的崭新格局，代表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既往文明的超越。其中，精神文明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存在方式，以其自身的内在特质证明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尺度。您是如何理解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同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间“有的放矢”的相互关系的？

项久雨：实际上，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同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间亦构成了“有的放矢”的相互关系，即用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之“矢”去射人类文明新形态之“的”，这表现为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以其自身特有的精神标识和属性特质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存在的价值依据和精神支柱。

第一，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树立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精神标识。精神标识蕴含着事物的价值特征，展现着事物发展的精神面貌。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来看，每一种文明形态都有其独特的精神标识。而文明作为对人类实践活动抽象的概括总结，其自身的属人特质决定了人类文明的精神标识要想得以表现，就必须借助创造文明形态的人的精神观念。精神文明是文明在人精神层面的具体表现，人类文明只有通过精神文明才能充分表现自身的价值特征，由此，精神文明也就构成了反映人类文明的精神标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② 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这两种不同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3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4页。

劳动属性的分工与对立,产生了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体力劳动者从事物质劳动,生产物质产品,创造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脑力劳动者从事精神劳动,生产精神产品,创造人类社会的精神文明。精神文明也得以从人类文明整体的熔炉中分离出来,从同物质文明混为一谈的早期文明形式中分离出来,演化为相对独立的文明形态存在,拥有了自己的发展逻辑和脉络,并且成为反映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标识。

马克思把劳动分工看作阶级与阶级对抗出现的历史根源,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精神文明诉求,不同类型的精神文明形态有着不同的精神标识。在西方现代化文明突出展现的精神标识之下,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成为西方社会普遍认同的精神共识。然而,历史已经证明,国家发展仅通过走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道路违背了历史的客观必然性规律,终究是难以站稳脚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逻辑,并且创造出蕴含于道路内部的精神财富。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而言,只有真正掌握道路进程中的精神财富,才能真正走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才能真正把握现代化发展的机遇与脉搏。可以说,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成为回应“共产主义失败论”“意识形态自由民主终点论”的力量源泉,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标志性价值元素和价值符号,为其他国家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与智慧。

第二,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精神力量。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智慧。中国式现代化孕育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强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需要通过内在的精神力量来维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① 精神文明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身的丰富内涵蕴含着强大的精神力量,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精神动力。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开创的。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所彰显的精神力量不仅对人类文明新形态产生巨大影响,也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通过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和引领方向,在凝聚中国人民精神力量的基础上推动精神力量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力量。首先,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可以统一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主体的思想观念,培育正确的思想意识。其次,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凝聚人类文明新形态主体的精神力量,并将精神力量转化为推动现代化的物质力量。最后,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方向,确保其应然与实然的高度统一。

第三,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涵养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追求。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蕴含着正确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导向,表现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追

^①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求。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牢牢把握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的思想魅力和价值意蕴，既能在顺应世界形势发展和历史变革中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又能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局势和发展大势中掌握历史主动，秉持正确的价值追求，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全社会共同认可和遵循的核心价值观是最深刻、最持久的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①

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实现了高度的有机统一。这首先表现在人民是社会主义的价值主体，社会主义的价值通过价值观而凝聚，价值观亦是守正创新的精神文明的精髓要义。因此，二者的价值主体具有相通性。其次，守正是价值实现的原则，亦是精神文明发展的原则。由此，二者的发展原则具有一致性。最后，创新是价值实现的途径和形态，亦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精神文明的实践进路和基本样态。可见，二者的实践路径和样态表现具有共同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②应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主动深入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精神世界，全力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意义，在不断延续民族文化命脉中推动精神文明开拓前行、推陈出新，创造性地形成既有中国气派、中国风度又有人类意义的精神文明新形态，切实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六、文化自信自强助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访问者：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度发展，不容忽视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更持久的力量支撑——文化自信自强。您是如何从文化自信自强的角度理解“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论断的？

项久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自主性、主体性、内生性文明，而不是依附性、移植性文明，展现出民族复兴的独立品格。全面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更持久的力量支撑。

首先，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统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求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新时代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5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5页。

以来,党全面加强宣传文化工作,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高度彰显的哲学社会科学;深入开展网上舆论斗争,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和网络空间治理,健全互联网领导和管理体制,加快网络空间法治化进程,推动主流舆论、主流价值、主流文化不断壮大,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全局性变化。

其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新时代有力应对世界思想文化激荡和我国社会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党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加强党的理论武装,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开展抗疫精神宣传,推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高质量发展,颁布实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等系列文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德,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领域发生全面、深刻和根本性变化。

再次,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力量,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优势。在“两个大局”时代景观下,这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一方面,党用中华民族创造的精神财富增进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作为固本铸魂的基础工程,统筹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扩大内需等国家重大战略,全面加强历史遗迹保护利用和历史研究传承,深入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另一方面,党立足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故事,赋予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中国形象新的时代内涵和表达方式,深化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搭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文化桥梁,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的人文基础更加坚实。

最后,坚定文化自信,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为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自信和历史主动提供了文化支撑。文化自信事关国运兴衰、文化安全和民族精神独立性,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精神动力。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党推动改进文化发展方式,将新发展理念贯穿文化发展全过程各领域,坚持人民至上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统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扎实推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持续繁荣,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责任编辑:杨鹏]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化理论研究

讲好中国故事需要遵循唯物史观^{*}

余 斌^{**}

【摘 要】唯物史观不仅揭示了讲好中国故事的困难，而且也提供了讲好中国故事的思路 and 办法。既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改变人们的社会存在或者让人们注意到其他的社会存在，就能调整或补充人们的意识。今天讲好中国故事的可能性主要就在于世界市场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扩大，尤其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积极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等各方面对外交往”。讲好中国故事，要勇于承认自己的优秀，在国际交往中适当强势起来，着力讲好新时代中国的故事，讲好社会主义的故事。

【关键词】讲好中国故事；唯物史观；社会存在；国际交往；社会主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① 这表明，讲好中国故事一是要使用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二是要展现能够让外国人欢迎和接受的中国形象。

一、讲好中国故事的困难所在

庄子认为，夏虫不可以语冰。唯物史观也告诉我们，“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②。中国故事就是反映中国社会存在的一种中国意识，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让世界其他国家的人理解中国故事中所表现的中国意识。这就意味着，讲好中国故事相当于要给“夏虫”讲好冰的故事。因而，这里面存在巨大的困难。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特殊交办项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实践中不断推进和丰富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23001）阶段性成果。

^{**} 余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我国历史上具有深刻的民族根基性的民间故事、文学创作和历史典故层出不穷，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宝贵素材来源。在国际传播中回顾历史，挖掘‘中国故事’所蕴含的文化精髓，有助于受众读懂过去的中国、认识现在的中国、照见未来的中国。”^①

但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社会存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存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由此决定了其他国家的社会意识与中国的社会意识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讲好中国故事就必须克服这个差别所造成的隔阂。更重要的是，其他国家的人甚至连读懂自己的过去、认识自己的现在、展望自己的未来都很难做到，又怎么会花大量时间精力去“读懂过去的中国、认识现在的中国、照见未来的中国”，他们对中国故事的需求又从哪里来呢？

《共产党宣言》指出，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②。“马克思已经预见了一种‘放弃了个性’的‘世界文学’的形成……在资本主义市场化席卷全球的时代，一切国家的、地方的、民族的文学都……丧失了个性和特质，为资本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所改写和同化，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文学’的一部分”^③。但是，即便资产阶级能够成功地“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④。从而，即便一切民族的生产方式都相同，进而都有相同的社会意识，这个存在着阶级对立的社会中的意识也是分裂的，如同鲁迅先生所说的香汗与臭汗之分。这也意味着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必须选择是讲好“香汗”故事还是讲好“臭汗”故事。

更重要的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候，中国还没有采取或普遍采取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即便在今天，中国所采取的生产方式也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不同。因此，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都很难向其他国家讲好中国故事，尽管中国的精神产品（如《孙子兵法》）早就在世界上传播开来，成为“世界文学”的养料和组成部分。

在这个“世界文学”中，不同民族和地方的文学有着不同的地位。毕竟《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世界文学”还是资本主义“世界文学”，当时还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因而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占据先导地位的发达国家的文学在这个“世界文学”中占有优势地位。所以，在发达国家学者的眼里，“第三世界的文

① 陈功、韩佳秀：《“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命题及理论阐释》，《江西社会科学》2022年第12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③ 曹成竹：《“讲好中国故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山东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6页。

学作品带有某种寓言性和特殊性”^①，只是他们猎奇的对象。这些“民族寓言”也许在一些猎奇者的眼里有那么一点可爱，或有一些被视为愚蠢的可信，从而赢得一些掌声，但无论如何是谈不上可敬的。甚至一些中国人也贬低自己的文学，20世纪80年代的大型电视政论片《河殇》，就以贬低黄河所代表的黄色文明和赞美西方海盗的蓝色文明的方式，企图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学来同化和抹杀中华民族文学。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时，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那时的中国故事也只能讲成“民族寓言”，是无论如何都讲不好“世界文学”的。但是，从那以后，经过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今天的中国已经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就绝不能再把中国故事讲成一种供人猎奇的“民族寓言”，哪怕它是一些人所认为的“表征中国国家形象和世界格局新秩序的‘民族寓言’”^②。然而，不少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例如，“《我不是药神》为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那就是要讲中国故事，更要艺术地讲好中国故事”^③。《我不是药神》的确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但它并不能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相反，它所表现的是西方药企的知识产权与人的健康权和生命权的冲突，展现的是中国在医药研发方面和维护人民健康权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因此，它讲的是中国故事，但谈不上“讲好”了中国故事。

事实上，要讲好中国故事必须让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至少承认今天的中国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先进性，进而能够“在世界的发展中融入中国的当代价值观，打破西方价值观的主流地位”^④。这无疑存在着很大困难，其主要问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今天还没有把自己定位为世人仰慕的发达国家。二是中国的当代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它与西方主流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天然冲突。西方媒体对中国主要采取诋毁态度，不能容忍讲好中国故事。

这也意味着中国故事无论怎么讲，都不会或很难受到国外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对方的一致欢迎。恩格斯晚年在给倍倍尔的信中曾经写道：“每遇到问题，往往听见你们拿敌人的话作论据，我不由地要说，对我们来说，敌人是不值一提的。其实，我和马克思早在1848年就说过：我们作了什么样的蠢事，以致敌人称赞我们？”^⑤因此，讲好中国故事，不等于我们就不会挨骂了，关键是要看骂我们的是哪些人。对此，我们必须明确，我们不在乎谁骂我们，我们在乎谁不要骂我们。

① 曹成竹：《“讲好中国故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山东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

② 曹成竹：《“讲好中国故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山东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

③ 封寿炎：《〈我不是药神〉爆红，解锁“现实主义”的正确打开方式》，《光明日报》2018年7月6日。

④ 方毅华、郝赫：《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0页。

中国故事最准确的表达载体是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但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故事在国外一直是由西方话语和西方叙事体系来表达的，是有损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如今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要让其他国家的人民群众理解中国意识，还要让他们转换话语和叙事体系，难度进一步增加。毋庸置疑，外国人中能够较好掌握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是来华留学生，但是，中国教育部印发的《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中在谈到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时，只规定“来华留学生应当熟悉中国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等中国国情和文化基本知识，了解中国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理解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公共道德观念，形成良好的法治观念和道德意识”，完全没有涉及掌握或了解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甚至也不要求来华留学生了解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又如何能够做到让来华留学生认识和理解新时代的中国呢？

二、讲好中国故事的可能性

唯物史观不仅揭示了讲好中国故事的困难所在，而且也提供了讲好中国故事的思路 and 办法。既然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那么改变人们的社会存在或者让人们注意到其他的社会存在，就能调整或补充人们的意识。

夏虫之所以不可以语冰，是因为夏虫没有经历过冬天，没有见到过冰。但这并不意味着，冰只能在冬天存在，在夏天就不可能见到冰。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制冷技术在夏天制作出冰就能够把它拿到夏虫面前，就可以对夏虫语冰。事实上，庄子也认为，可以给作为河神的河伯讲海之大的故事，只要河伯能够顺着河流来到大海之边，也就能直接感受到海的存在。因此，讲好不同社会存在的不同意识的故事，可以通过加强彼此往来，通过见识不同的社会存在来实现。

今天讲好中国故事的可能性主要就在于世界市场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扩大，尤其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积极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等各方面对外交往”^①。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②。恩格斯就是因为家庭的生意到了英国，看到了英国工人的社会存在，进而写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一个德国人的身份讲好了英国故事。这之后，马克思来到英国，也以英国的社会存在为基础，创作了《资本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8页。

论》，更好地向德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讲起了英国故事。

“共情可以超越国家与民族的界限，且不会因为地域和文化差异而被抹除，‘讲好中国故事’也应从共情传播视角探索实践路径。”^①但是，与英国工人共情的德国经理人和哲学博士只有恩格斯和马克思，其他的德国经理和博士并不与他们共情。鲁迅先生也早就指出香汗与臭汗是不能共情的，《红楼梦》中的焦大与林黛玉也是不能共情的。

一般而言，共情要以相同或相似的社会存在状况为前提。只有像马克思恩格斯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会稍稍撇开自己的社会存在而与底层的人民群众共情。所以，我们即便要讲共情，也要找好共情的对象，而这样的对象是有的。列宁指出：“每个人都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大家都想过好日子，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正是社会主义。”^②这种社会主义的意识以贫困（包括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存在为根基。即便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但那里的（空想）社会主义传统仍然十分强大。这个传统是能够与基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共情的，毕竟无论是美国梦还是中国梦，最根本的都是要过上好日子。只不过，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无法实现，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事业蒸蒸日上。因此，想过好日子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中下层民众都是比较好的共情对象。对他们，我们是能够讲好中国故事的。

此外，虽然中国的社会存在与其他国家的社会存在不同，但只要这两个社会存在之间存在历史发展的关联性，中国故事也是可以讲好的。要知道，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英国的社会存在与德国的社会存在也是不同的。但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③“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④这意味着，他在《资本论》中所讲的英国故事，同时也是未来德国的故事。因此，如果中国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故事也是其他国家和地区未来形态的故事，那么中国故事就能够讲好，就不再只是猎奇的对象。其他国家的民众，无论他们是否愿意花精力去“读懂过去的中国、照见未来的中国”，他们至少愿意去“认识现在的中国”，以便从中照见他们自己的未来。

即便其他国家的民众不认为中国的社会存在代表他们未来社会存在的景象，我们也可以通过阐释唯物史观来说明不同国家的不同社会存在会导致社会意识的差异，进而让其他国家的人们承认中国可以有与他们不同的社会意识，他们不能

① 胡晓娟、井波：《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域下“讲好中国故事”的共情维度与实践路径》，《新疆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

②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6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把自己的意识强加给中国，尽管这意味着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也要讲好他国故事。例如，尽管我们公开表明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但一些国家的人们仍然不相信中国发达之后不会称霸，因为他们本国的故事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发达之后走上帝国主义道路称霸的故事。对此，我们必须表明，称霸这种社会意识是一切剥削阶级社会的产物，因为剥削本身就是依靠霸权进行的。相反，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剥削，消除了产生霸权意识的社会存在，从而只会产生维护自身劳动果实的反对霸权的意识，而不会产生称霸的意识和行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宣扬中国威胁论，不是因为中国对它们产生了威胁，而是中国妨碍它们威胁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

恩格斯曾经提到由于德国的竞争，英国失去自己的顾客的两个重要原因：“（1）你们（英国工厂主）不学你们的顾客的语言，却要求他们说你们的语言；（2）你们不但不设法适应你们的顾客的需要、习惯和爱好，反而要他们迁就你们英国式的那一套。”^① 过去，在改革开放时，我们学习西方顾客的语言，适应西方顾客的需要、习惯和爱好，甚至在中国讲西方故事。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成为国外企业的大顾客，从他们的生意出发，他们也需要学习我们的语言，适应我们的需要、习惯和爱好。这是我们能够用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来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经济基础。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过去我们举办出口博览会，如今我们同时还举办了进口博览会。

有人指出：“中国故事的议程设置仍然受制于西方媒体。西方媒体不仅决定着受众想什么，还决定着受众如何想。”^② 但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体的出现，传统媒体的垄断地位受到冲击，受众开始在新媒体上自主表达自己想什么、如何想。尽管国外新媒体对此也会有所控制，例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新媒体上的账号也遭遇封闭，但我们多少可以利用新媒体来讲好中国故事。当然，也要应对好对立的一面利用新媒体来抹黑中国的做法。

马克思指出：“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各个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这个危机又要临头了，虽然它还处于预备阶段；由于它的舞台的广阔和它的作用的强烈，它甚至会把辩证法灌进新的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暴发户们的头脑里去。”^③ 经济中充满矛盾的运动必然导致政治上冲突不断和人民群众生活上经常困顿，从而必然使虚伪的西方故事难以长久维系。只要我们的媒体不去帮着修饰西方故事，中国故事在对比下是能够讲好的。事实上，只要西方国家人民的头脑中被现实灌进了辩证法，他们自然能够理解充满辩证法的中国故事。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页。

② 陈功、韩佳秀：《“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命题及理论阐释》，《江西社会科学》2022年第12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如今，中国的故事已经不是纯粹的中国故事，中国故事是在世界市场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的故事，民族的片面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消除了；但不是倒向了资本主义世界文学，而是实现了“两个结合”。因而，中国故事不仅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故事，也是世界性的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故事，它必将从中国走向世界。

三、讲好中国故事的对策建议

第一，勇于承认自己的优秀。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必然要求我们展现中国先进的一面。在中国不愿意定位自己是发达国家的情况下，建议在舆论上把发展中国家分成两类，一类是高发展中国家，另一类是低发展中国家，并把我国定位为高发展中国家，这样方便体现我们的自信，进而讲好中国故事。当然，为了避免中国成为孤家寡人，可以考虑把金砖国家和出席二十国集团会议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都定位到高发展中国家之中。有人也许会认为，这会造成发展中国家分裂，不利于团结，但是二十国集团会议等一些国际会议本身就把不同国家在世界活动中的重要性进行了区分，我们只是承认了这种区分的客观存在。

我们把自己定位为高发展中国家，并不是在主观上拔高自己，也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前列，而是在客观的现实生活中，我们的确具有西方发达国家所不具有的先进的一面。最典型的就智能手机在现实生活中的普遍运用，国产智能手机在一些功能上遥遥领先于世界。西方一些国家的地铁里没有智能手机信号，只能买一份报纸或看书来打发无聊的时间，却被一些人鼓吹成不看手机是文化素质高。但实际上，手机的信息量远超一份薄薄的报纸和一本厚厚的书。有人会说，承认别国的优秀很难吗？那就让他先承认中国的优秀吧。我们应当而且可以通过表现中国人的数字生活让其他国家人民羡慕，就像我们过去羡慕“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样来讲好中国故事。这样还能促进中国的手机产品更好地走向世界，拉动中国经济。

对于西方国家主流媒体和新媒体的垄断问题，建议采取类似农村包围城市那样的策略，以发展中国家包围发达国家。我们要利用自身的经济和技术优势，多到其他国家建设和参与建设各类媒体，通过在这些媒体上发声，迂回地向西方国家讲好中国故事。当然，能够争取在西方国家主流媒体和新媒体上发声时，我们也要积极争取。

第二，在国际交往中适当强势起来。讲好中国故事，意味着我们不能继续韬光养晦。这是因为韬光养晦需要隐藏自己的社会存在，或者让别人注意不到自己的社会存在，从而要么不讲自己的故事，要么把故事往不好的方向去讲，表现出大智若愚的一面。要讲好中国故事，就必须有所作为，用行动去塑造自己的形

象,尤其是要塑造可敬的形象,就必须敢于打抱不平,敢于维护公平正义。此外,当前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饱受西方大国的霸权霸道霸凌。中国过去反对“三霸”的故事,如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的故事,对这些具有不同社会存在的国家和地区也是有启迪作用的。讲好这些过去的故事,也同样是讲好中国故事,同样能够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建议向饱受霸权霸道霸凌的国家和地区大力输出相关书籍和影片。

要充分利用出口博览会和进口博览会讲好中国故事。在出口方面,鼓励中国企业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产品,展现中国可爱的形象;在进口方面,引导外商开发具有中国元素的产品以吸引中国民众,进而激励外商为亲近他们的顾客主动寻求中国故事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国。

对来华留学生,可以安排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如果中国人到美国去留学,会学习美国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著名讲话,那么外国人到中国来留学,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并不是强迫他们认同我们的社会意识,只是引导他们了解而已,而这恰恰是让他们理解中国故事的关键所在。要举行基于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中文考试和外语考试。国内招募归国留学人员进入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必须通过其中的中文考试,而公派出国留学人员或访问学者,则必须通过外语考试。如果我们自己的对外交流人员都讲不了中国故事,又如何在对外交流中讲好中国故事呢?

第三,着力讲好新时代中国的故事。恩格斯在谈到德国民间故事书时曾经指出:“如果我们正当地要求民间故事书内容应富有诗意、饶有谐趣和道德的纯洁,要求德国民间故事书具有健康的、正直的德意志精神,即具有一切时代所共有的特点,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求民间故事书适应自己的时代,否则就不要称其为民间故事书……不言而喻,民间故事书决不能叙述那些在今天看来毫无意义或者甚至是错误的旧时代的习俗。”^① 外国人也许会对中国传统的王侯将相和公子小姐的故事有猎奇心,但这并不能有助于在他们心中形成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要讲好中国故事,就要讲好“两个结合”的故事。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样板戏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用中国传统戏曲形式和西方芭蕾舞剧形式表现中国时代精神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当然,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时代精神是有区别的,这要求我们在各种艺术形式上创作更多表现新时代中国精神的作品,并且主要演出这些作品。

在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的时候,要坚持胸怀天下,这样就能找准与国外利益的契合点,传播好中国声音。事实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些国际倡议,如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都找准了中外利益的契合点。讲好这些倡议,讲好中国为落实这些倡议而做出的努力,也就是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4~85页。

第四，讲好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必须讲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我们“不被理解”或“被误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国家以资本主义的小人之心度社会主义中国之腹。只有纠正西方主流舆论对社会主义的歪曲，才能纠正中国人在西方人心中的扭曲观念。

恩格斯晚年曾经担心中国像西欧国家那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导致大量人口失去生产资料而不得不向外大量移民，从而给欧美的劳动力市场带来灾难。他在给俄国人丹尼尔逊的信中写道：“最后一个新的市场是中国，这一市场的开辟可以使英国的贸易暂时恢复繁荣。因此，英国资本极力要修建中国的铁路。但是，中国的铁路意味着中国小农经济和家庭工业的整个基础的破坏；由于那里甚至没有中国的大工业来予以平衡，亿万居民将陷于无法生存的境地。其后果将是出现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移民，可憎的中国人将充斥美洲、亚洲和欧洲，并将在劳动市场上以中国的生活水准即世界上最低的生活水准，同美洲、澳洲和欧洲的工人展开竞争；如果在那之前欧洲的整个生产体系还没有发生改变，到那时也必定要发生改变。”^①正是新中国的建立，正是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广大中国人民拥有生产资料，从而没有像西欧刚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之时那样，向外大量移民和发动殖民战争，避免了恩格斯所担心的世界性灾难。但是，对新中国的这个“贡献”，许多中外民众是不清楚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存在能够给世界带来什么，是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人们很难理解的，这正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难度所在，也是讲好中国故事应当加以突破的地方。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Well Should Follow Materialist Historical View

Yu Bin

Abstract: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well is to let people in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understand the Chinese consciousness expressed in Chinese stories. Materialist historical view not only reveals the difficulties of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well, but also provides ideas and methods for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well. Since people's social existence determines people's consciousness, changing people's social existence or letting people notice other social existence can adjust or supplement people's consciousness. The possibility of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well today mainly lies in the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36页。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market and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To tell Chinese stories well, we should have the courage to admit our excellence, be appropriately strong in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focus on telling the stories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and telling the stories of socialism.

Keywords: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Well; Materialist Historical View; Social Existence;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Socialism

[责任编辑：杨鹏]

碰撞与新生：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文明向度^{*}

贾德钦 吴文新^{**}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中国的文章和论述中蕴含着丰富的文明思想，同时也是从世界现代文明角度分析中国文明问题的典型例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文明的基本意涵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积极成果，反映社会发展的秩序和形态，当时世界的文明格局就是东方文明从属于西方文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进行的一系列侵略行为，使中华民族遭受了巨大的劫难，暴露出其文明的野蛮性。中华文明在当时资本主义文明全球扩张的激烈碰撞下陷入了发展困境，马克思恩格斯洞察了中华传统文明，认为在社会上表现为“停滞的社会生活”，剖析了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文明基础，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给当时中国带来“奇异的对联式悲歌”的深刻影响，寄予了中华文明终将迎来“亚洲新纪元的曙光”的殷切期望。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团结带领人民群众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促进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而且推动了人类文明进程的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资本逻辑；文明困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指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马克思撰写了十几篇关于中国的通讯，向世界揭露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真相，为中国人民伸张正义。”^① 这些文章涉及鸦片贸易、鸦片战争、资本主义文明和中华文明等多个方面的内容，深入研读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清晰的文明逻辑。马克思恩格斯不仅高度肯定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发展进步所作出的贡献，而且用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视野来审视中国社会以及中华文明的未来走向。为此，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公道民本：中华文明与 21 世纪中国社会主义”（项目编号：21FKSB045）阶段性成果。

^{**} 贾德钦，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吴文新，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与中华文化的关系。

^①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2 页。

学术界围绕这些文章,从历史、理论和实践等维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为我们深入分析和探讨其文明向度这一重要维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掠夺,中华文明在当时陷入了文明困境,在世界现代文明发展进程中呈现出蒙尘镜像。他们对中国人民的遭遇以及顽强抗争表示深切的同情,并预言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华文明的未来将迎来社会主义的曙光。所以,我们在今天深入挖掘和阐发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文明意蕴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视域下的近代中国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观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蕴于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形态更替规律,这是我们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恩格斯视野中近代中国文明发展境遇的理论前提。

(一) 文明的意涵: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积极成果

文明是不同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中人类实践所取得的各种成果的总和,是一个标志社会进步程度的历史性范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①也就是说,文明不仅反映人类通过实践活动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而且是衡量社会形态变化的重要尺度。

第一,文明在人类实践中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实践的作用,认为实践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的活动,而文明作为人类实践活动所取得的积极成果,是伴随着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而产生和发展变革的。文明承载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所有积极成果,包括生产力的成果、思想文化的成果等,对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表现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不同文明。所以,文明的发展和人类的实践活动是内在一致的,不是静止的、永恒的,具有过程性。可以说,文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代表着人的发展,文明的本质就是“人明”,意味着人类的发展程度。正如有学者指出:“文明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创造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与制度成果的总称,文明形态是对文明发展状态及其本质特征的概括。文明不是静止的、固定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与自然界的生命有机体类似,文明是由人的实践推动创造的生命有机体。”^②

第二,文明反映社会内在的秩序。文明作为实践活动的积极成果,既然体现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

② 项久雨:《世界变局中的文明形态变革及其未来图景》,《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

社会的素质，那么就会反映社会内在的秩序，标志着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社会内在的秩序就是社会运行过程中各种社会制度设计安排的秩序，即各种社会关系的良性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文明就是对这种社会制度设计安排的秩序的一种认同，是文明社会属性的开显。文明表现为社会发展的状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资本主义文明就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状况。有学者也认同这一点，“恩格斯以‘社会的素质’代指文明内部的秩序，凸显了文明的社会属性，他将‘社会的素质’置于工业革命的背景之下加以阐释，凸显了生产关系对文明秩序的内在规定”^①。

第三，社会形态的变化就是文明形态的变化。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本质表现为社会形态的更替，随着生产力不断获得解放，社会形态总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内嵌于社会形态中的文明形态也是伴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发展的。因为文明形态的变化归根到底总是取决于生产方式的变化，“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②，作为社会形态的文明结晶的文明形态当然也是如此。文明形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文明在社会中的存在形式呈现样态，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有着不同的表现，也就是说，在封建社会中呈现为封建主义文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呈现为资本主义文明，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则呈现为社会主义文明。所以，从社会形态的变更观测文明形态的变更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所蕴含的重要观点。

（二）文明的格局：东方（中国）文明从属于西方文明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当时人类的文明格局就是东方文明从属于西方文明。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就曾指出，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武力打开近代中国的大门，把中国裹挟到世界现代文明的进程之中，这是近代中国在世界文明格局中的现实写照。

第一，“文明世界”打破与旧中国的隔绝状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旧中国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不与当时所谓的“文明世界”也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广泛交往。而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获得了巨大发展，其所生产的产品急需海外市场，以缓解国内生产过剩的危机，西方国家抢占海外市场，用大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古老中国当时封闭保守自给自足的状态被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坚船利炮打破，马克思曾指出：“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

① 刘同舫：《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依据：生产方式的创新性发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①在马克思看来,英国的入侵使古老中国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状态被打破,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西方列强的产品倾销市场,被迫卷入世界现代文明的进程中,由此开启了近代中国“文明蒙尘”状态的屈辱历史。所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形态对与世隔绝的中国农业文明形态的冲击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中国问题的重要时代背景。

第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与封建社会形态对垒。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就对古老中国十分关注,他们在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问题时,分析了近代中国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就是“社会基础停滞不动,而夺得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却不断更迭”^②。也就是说,古老中国尽管朝代更替,统治者不断变化,但是其经济基础始终是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因此并没有走出封建社会形态这一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生产过剩,引发了经济危机。为了缓解生产过剩这一状况,资本主义国家必然要转嫁危机,寻找新的商品倾销市场,对外进行殖民侵略扩张。而且,当时的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在对外贸易中经常处于出超地位,白银不断流入中国。这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重要经济动因。所以,面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当时的清王朝根本无力抵抗,以至于被动挨打。

第三,欧洲革命和中国革命相互影响。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引发了当时中国的社会危机,引发了中国的起义和革命,中国的革命又引发欧洲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认为中国革命是由资本主义国家的野蛮侵略所引起的,“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了约十年之久,现在汇合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③;另一方面,认为中国革命将对资本主义的“文明世界”产生影响。马克思曾写道:“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却是这个原则的一个明显例证。”^④马克思恩格斯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洞察了欧洲革命和中国革命相互影响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中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所以,根源于不同社会形态的不同文明不是没有联系的,而是相互影响的,只是文明要通过具体的民族和国家甚至地区,以革命或者起义的形式来表征。

(三)“文明”的野蛮:“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中国问题的过程中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世界”的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2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文明，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野蛮面孔在近代中国展现得淋漓尽致，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的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透露其野蛮本性，这也就映射出资产阶级文明并不是马克思笔下真正意义上的文明。

第一，鸦片贸易毒害中国人民。鸦片贸易的盛行，使中国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向印度，中国银源面临着枯竭的危险，更为严重的是“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①。马克思对鸦片贸易毒害中国人民的野蛮行径深深厌恶并进行强烈指责，也对这种为追逐利润而不顾一切的资产阶级的极端伪善进行猛烈批判。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高尚的品格和无私的情怀，以及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英国自诩为“文明人”，这种文明在一定意义上只在本国展现出来，对其他国家以及殖民地则暴露出野蛮的面孔，为了获得高额利润而用鸦片来毒害中国人，可见其野蛮本质。

第二，鸦片战争掠夺中华民族。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关注就是以鸦片战争为着眼点，深入分析了鸦片战争对中华民族的掠夺和蹂躏，揭露了资产阶级文明的野蛮本性。帝国主义的一系列对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们“把炽热的炮弹射向毫无防御的城市、杀人又强奸妇女的文明贩子们，尽可以把中国人的这种抵抗方法叫做卑劣的、野蛮的、凶残的方法”^②。这一系列的非正义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得近代中国社会和中华文明的发展在资本逻辑主导的资本主义文明的碰撞下走向衰落，陷入被动挨打的落后局面。

第三，资产阶级文明本性野蛮。资本主义国家在侵略中国的同时，用所谓的文明来为其卑鄙无耻的行为开脱，提供合法依据。然而，这样的霸权行为恰恰暴露出资产阶级文明的野蛮本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分析当时的鸦片贸易和战争时指出：“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抗衡。”^③“半野蛮人”应该是指当时的中国人，而“文明人”则是指英国人。我们中国人虽然处于一种半野蛮状态，但是我们始终坚持道义的立场。如果清王朝的统治者使鸦片贸易合法化，那么将能征收大量税款，但是我们知道鸦片贸易毒害人民的身体和精神，立刻明令禁止。而当时英国人为了获得高额利润，不惜损害他国人民的生命，这种自私自利的行为将资本主义文明的不文明展现得淋漓尽致。

二、西方文明对中华传统文明的碰撞：近代中华文明困境

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当时中华传统文明的激烈碰撞导致中华传统文明在近代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0页。

的发展陷入困境，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中华文明问题的切入点。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洞察了中华传统文明在近代的表现，剖析其经济基础，指出文明发展陷入困境的影响，对奋起斗争的中国人民深表同情，并预言中华文明的未来走向。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世界现代文明进程中的近代中华文明蒙尘镜像的逻辑框架，而且对我们审视当下的文明发展问题具有重要启示。

（一）中华传统文明的表现：“停滞的社会生活”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这也就意味着中华传统文明在近代的发展陷入了困境。这种文明困境是在资本主义文明的碰撞下产生的，从社会形态发展的规律来看，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形态相较于古老封建的中国而言确实是一种进步的社会形态，而中华文明深深植根于古老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态，在当时具体表现为社会生活的封闭保守。中国社会生活也就呈现为一种“停滞的社会生活”状态，这也使中华传统文明的社会表现得以彰显。但是，随着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资本主义文明对中华传统文明的碰撞，中国也由此被迫卷入当时所谓的现代文明进程之中。在恩格斯看来，“中国这个一千多年来一直抗拒任何发展和历史运动的国家现在怎样被英国人、被机器翻转过来，卷入文明之中”^①。而在世界现代文明进程中，古老中国的中华文明在和资本逻辑主导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激烈碰撞中陷入了落后挨打的困境。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当时中华传统文明陷入发展的困境主要还是由于当时的中国社会相较于资本主义社会确实是落后的社会形态。

中华传统文明是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文明形态，相对封闭和保守；西方国家所追求的现代文明是资本逻辑主导的文明形态，以追求利润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具有扩张性。鸦片战争就是西方国家为打开中国市场获取高额利润而发动的极端不正义的战争，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端。当然，不能否认这是一种被动的现代化，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把中国裹挟到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正是在这种与“停滞的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反差的大炮的“惊醒”作用下，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华文明何去何从也成为当时的燃眉之急。正如有学者指出：“资本逻辑的扩张过程不只表现为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还在此基础上引发了其他国家在经济形态、政治制度、文化观念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变革。”^②由此，中国停滞的社会生活不再停滞，开启了屈辱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1～132页

^② 陈培永、喻春曦：《重思马克思恩格斯对近代中国开端的唯物史观洞察》，《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

近代历史，中华文明也处于蒙尘境地。

（二）中华传统文化的经济基础：“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

文明的发展是建立在社会发展状况之上的，而社会的发展状况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中华文明的发展当然也不例外。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当时中华文明是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为基础的文明形态，经济基础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以家庭为单位。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导致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倾销的商品需求量很小，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在中国没有市场，并且这种生产方式在中国持续数千年，一定意义上来说也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封闭性和稳定性特征。马克思曾写道：“妨碍对华出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因素，是那个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①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文明得以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交往，交往促进了资本主义文明在世界范围内扩张，而当时的中国人按照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维持生活，不需要和其他国家进行交往。所以，这种延续几千年的生产生活方式造就的中华文明，在西方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坚船利炮的侵略下，怎能不处于西方人眼中的落后甚至是野蛮状态呢？马克思恩格斯也清晰地指出了这一点。

但是，从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古老的中华文明相较于当时的资本主义文明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落后的文明形态，这一点不能否认。当然，这只是一种基于文明发展客观状况的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评价。因为按照今天的观点来看，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一律平等，这是一种价值判断。有学者也指出了这一点：“这种对文明和野蛮的评价，针对的是一个国家的生产方式、社会制度而非针对某个国家的文化，它是基于历史事实而非价值评价。”^②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也未必就是完美的或者发展到极致的文明形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带来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社会矛盾和政治分化、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困境。所以，我们也要认识到，从经济基础角度来看，尽管近代中华文明的发展落后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华文明的经济基础没有积极作用，其所塑造的人与人之间那种淳朴的交往方式也是我们今天的社会所需要传承的。

（三）中华传统文化困境的灾难性影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近代中华文明的发展陷入了困境，这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带来了极大的苦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页。

^② 陈培永：《深入思考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明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年第6期。

难，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则沦落为被压迫的民族。在鸦片战争中，“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①。马克思客观描述了当时中国人民的真实处境，以及这些“文明贩子们”在中国的罪恶行径。他不仅对当时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对西方文明的虚伪性进行了讽刺：“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②

这一文明困境的影响十分深远，近代以来，山河破碎、内忧外患的深重灾难就是这种影响的历史表征。“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③从那时起，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发展到近代就处于一种文明蒙尘境地。可以说，我们今天所追求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就是走出近代以来的文明困境。所以，我们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不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而努力。

（四）中华传统文明的未来走向：“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遭遇深表同情的同时，也对中华民族及其文明的发展寄予了殷切期望。也正如恩格斯曾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本身，似乎表明他们已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④。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当时中国的起义或者革命对古老中国的封建社会形态的解体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封建社会形态的解体必然产生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马克思恩格斯为当时的中国未来发展想好了一个名称，那就是“中国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视野中，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野蛮侵略也表明了资本主义文明的野蛮本性，这种文明形态并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终结，而是资本主义的特定文明形态，不具有普遍意义，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应该是一种新的文明。福山曾主张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⑤换言之，福山认为资本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1页。

③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7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6页。

⑤ [美]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主义文明就是人类的终结文明形态，代表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其实，马克思恩格斯早就对资本主义文明未来的发展做出了揭示，资本主义文明并不是文明发展的终点，并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十分看好，认为未来的中国必将迎来社会主义新文明的曙光。“马克思恩格斯还预见到，中国将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新的重大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期望中国革命和建设能够促成世界性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崩溃和社会主义新文明的诞生”。^① 所以，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终将走出近代文明困境，中华民族将迎来“亚洲新纪元的曙光”是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问题所作的分析的，同时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期待的对资本主义文明范式、西方文明话语的理论突破。

三、文明新生：从“亚洲新纪元的曙光”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近代中国社会作为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的重要场域，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审视，内在地就包含着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未来的殷切期望。在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经过前赴后继的斗争，各种救国力量竞相出场，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中，文明新生得以实现并不断发展，这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为文明新生而浴血抗争：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艰辛探索

自鸦片战争以来，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各种救国力量竞相出场，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各种救国运动接连兴起，但都以失败告终。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也关注到了太平天国运动，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的革命，并对太平天国运动满怀期待，指出“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却是这个原则的一个明显例证”^②。但是，随着事件的发展，他们对太平天国运动改变了看法，认为这只是一场起义。因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统治者们“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不知道自己负有什么使命。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对民众说来比对老统治者们说来还要可怕”^③。当然，马克思恩格斯也并没有否定太平天国运动在打击西方列强和加速清王朝灭亡方面的历史进步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太平天国运动相较于封闭保守的社会状态已经是一种历史进步。

随后，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接续发生，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继续抗争。尤其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有力地助推

^① 杨金海：《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国观及其当代意义——兼论新版〈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版本由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6年第2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22页。

了中国社会形态的转型，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还是没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中华民族以及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中华文明依然处于蒙尘的境地。文明将走向何方？文明的未来依然不明确。所以，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尽管仁人志士为社会发展和文明发展进行的一系列有益斗争都以失败告终，但是这一系列有益斗争从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都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努力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而走出文明困境、赓续文明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

（二）为文明新生创造根本条件：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彻底结束了近代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这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华文明走出近代文明困境、获得新生创造了根本的社会条件。因为文明的发展不是自然的，而是有条件的，是以社会的发展状况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所关注的古老中国，是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中华文明表现为一种“停滞的社会生活”，鸦片贸易严重毒害着中国人的身体和精神，甚至可以说严重毒害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给中华民族和文明的发展带来了沉痛的灾难。新中国成立，我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文明的社会土壤也得以转换。当然，遭受巨大苦难的中华民族和刚走出困境的中华文明还需要不断努力，才能实现发展。

追求民族的复兴，向往文明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毛泽东曾提到，要建立“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①。这里的文明作为修饰语来形容未来的中国，包含毛泽东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文明的期待，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殷切期望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华文明的发展就是和马克思主义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具有内在融通性。所以，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取得的所有成就，尤其是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华文明走出近代文明困境并实现新生创造了根本的社会条件。

（三）社会主义文明的创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曲折辉煌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华文明走出文明困境后得以新生并巩固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更是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最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为深刻而厚重的社会变革。我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之后，中华文明的发展建立在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之上，这为中华文明的巩固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同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植根于社会发展实际的中华文明也因此具有了社会主义性质，赋予了中华文明发展以社会主义内涵，亦即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文明，简称“中华社会主义文明”。这是从社会性质的角度对文明的性质加以界定，因为文明作为社会发展的实践成果，其性质是由社会性质决定的，所以中华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是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而定性的，并随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断丰富发展。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如何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就由此进一步探索现代化道路。毛泽东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①由此，“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正式形成，中国人民朝着现代化发展的目标而努力，中华文明的社会基础的现代化构成也得以进一步拓展，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因素也就得以进一步增强。当然，相较于资本主义国家，底子薄、起步晚也是当时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实际情况，所以这一时期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因素既不能忽视，也不能夸大，我们要辩证看待其现代化因素。

（四）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创新发展：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伟大贡献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会议，标志着党和国家的工作实现了伟大转折，由此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华文明在新时期的接续发展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障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成为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创新和实践的主题，使中国社会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中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也由此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文明发展的动力得到了进一步激发。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的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这为中华民族以及文明的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文明发展的要求得以进一步提高。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②这为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的社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页。

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内容提供了根本的指引和遵循。我们不仅要注重生产力的发展，来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而且也要注重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和社会文明程度，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文明的内容呈现出多维构成，其实质内涵也更为明确。

（五）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新时代彰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障、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现代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的普照，也是中华文明内在基因的滋养，更是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新时代彰显。中国共产党尤为注重传承中华文明的内在基因，凸显中华民族的历史主动精神，这是我们对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也就是“通过 21 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文明实践，世界文明史上唯一绵延五千年而不绝的中华文明，其思想精髓和形上精神能够超越时空局限而转化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从而使当今时代的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再次为人类作出伟大的贡献——不仅再造一个中华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形态，而且创造一种不同于当今西方文明主导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即社会主义的中华文明新形态，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亦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②。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人类文明美好画卷中国样态的具体表现，不仅是民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文明是在交流互鉴中得以发展的，而不是西方学者所主张的“文明冲突论”。这一点早已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所证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与不同民族的文明交流互鉴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使其内在基因和中华民族的文明根脉得以传承，世界意义进一步彰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

① 吴文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通及其方法论探析》，《理论学刊》2023 年第 5 期。

②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1 页。

形态。”^① 总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嘱托，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审视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的发展，这不仅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传承，也是我们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的中国方案，对于我们当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Collision and Rebirth: Marx and Engels on the Dimens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Jia Deqin Wu Wenxin

Abstract: Marx and Engels' articles and dissertations about China contain rich civilization thoughts, and they are also typical examples of analyzing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ld modern civilization. In the view of Marx and Engels, the basic meaning of civilization is the positive results of human practical activities, reflecting the order and form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civilization pattern of the world at that time was the subordination of Eastern civilization to Western civilization. The series of acts of aggression carried out by the western capitalist countries in China have inflicted great sufferings on the Chinese nation and exposed the barbaric face of its civilization.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fell into a development dilemma under the fierce collision of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at that time. Marx and Engels saw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ivilization as a “stagnant social life” in society, analyzed the civilization basis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handicraft industry, pointed out the profound impact of the “strange antithetical lament” brought by capitalist countries to China at that time, and placed on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s final “dawn of a new era in Asia”. Since its found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united and led the people in making great achievements through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which has not only promoted the life renewal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but also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words: Marx and Engels on China; Capital Logic; Civilization Dilemma;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责任编辑：李谷悦]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0页。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观的出场语境、 基本内涵与当代发展^{*}

宋凯晴^{**}

【摘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观萌芽于对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伴随着历史唯物主义产生而生成，并不断发展于对资本主义文明悖论的批判中。在唯物史观的理论框架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永恒性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彻底揭露了其虚伪性与局限性，指出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资本主义只是一个历史阶段，终将被人类文明的更高阶形态——社会主义文明所替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对人类文明研究视野、人类文明发展根本动力、实现目标以及发展道路等多个问题的科学解答。在当今中国，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观得以进一步创新发展，成功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新境界、创新了社会主义文明的形态、提供了有助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思想指南，为世界文明增添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色彩。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观；马克思；人类文明新形态

社会交往与社会生产的变化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对文明话题的关注。持有西方文明中心论观点的人认为，别的国家与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不过就是向资本主义靠拢并融入。不过，马克思以科学的视角解读人类文明，并认为资本主义文明不过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环，并非最高阶的文明形态。中国通过实践的经验告诉世界，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方化，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观才是具备科学性与真理性的文明观。目前学界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观在理论逻辑、现实意

^{*} 本文系山东省社科基金项目“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华文化叙事研究”（项目编号：22CZTJ04）、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重大培育项目“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华文化叙事研究”（项目编号：22RWZD02）阶段性成果。

^{**} 宋凯晴，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义等方面有了一定的关注与研究^①，本文则在学界已有研究基础之上进一步剖析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观的出场语境、基本内涵与当代发展。

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观的出场语境

马克思恩格斯关注到了现代化的两面性，在肯定现代化有社会进步一面的同时，也对现代化的实现方式进行了反思，关于文明的论述也不断产生。其中，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必要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观的出场语境进行细致梳理。

（一）萌芽：对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资本主义迅速发展、逐步蔓延到全世界的时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成长过程有深邃的见解，这成为马克思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观的现实土壤。在马克思之前，现代的资产阶级学者一直在粉饰资本主义文明，普遍把西方作为“一个向外界传递‘文明’的旗手”^②来看待。尽管当时马克思还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来批判资本主义文明，但他通过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的思考，这种批判成为他日后思想体系和理论发展的基础。比如，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时，理性与利益的斗争问题摆在了他的眼前，这一难题彼时无法用传统理性主义解决，让马克思开始质疑西方传统理性主义文明观。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在国家普遍理性与个人利益上充其量只是“提出了一个没有解决的二律背反”^③，只不过“中世纪是现实的二元论，现代是抽象的二元论”^④。“抽象的二元论”的含义是黑格尔只是“把现象的矛盾理解为观念中、本质中的统一”^⑤。因为黑格尔看到了政府与人民之间包含了敌对反抗的可能性，故而，他尝试去构想一种不仅具有“反抗的不可能性”的特性，而且也具有“谐和一致的现实性”的特性。但是，马克思并不认同黑格尔的二元论与政治庸俗论，指出需要将利益内化到理性之中，并且拨开资本主义社会传统理性主义的迷雾，探寻到真正的利益主体才是应有之义。只有如此，人民利益才能慢慢地从传统理性主义的神秘光环中真正走出来。

此后，马克思大量阅读书籍，深刻反思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的不平等和剥

① 参见彭双贞：《“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的历史唯物主义释义》，《思想理论教育》2023年第7期；吴英：《马克思对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人民论坛》2019年第21期；刘日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哲学研究》2023年第2期。

② [德] 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第1卷，王佩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页。

削现象。马克思指出,个人意志与现实需求才是普遍理性成长的土壤,而且国家亦是“从作为家庭的成员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种群体中产生的”^①。那么,“人民是否有权为自己制定新的国家制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②。因为真正的国家本质上是需要展现人民意志的,这样才不会使得国家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空壳。从马克思提到的这个观点可以看出,他把抽象理性改造成了人民群众利益与人民理性,使理性不再是虚无缥缈且神秘的存在,而是具有了现实载体与实质内容。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首先认识到国家的基础是市民社会,其次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使马克思看到了私有财产在市民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进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对私有财产如何进行批判。在这之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资本主义制度是“包容在需要的粗陋野蛮之中的文明”^③,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中的工人阶级“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④。此时,马克思开始逐步从劳动的视角探索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并指明了在人类发展道路的进程之中私有制度终将被无产阶级推翻,人类社会终将走向共产主义文明,实现“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⑤。在1844年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通过对鲍威尔等人的批判,揭示了这些哲学家的自我意识的真实本质。马克思认为,他们的自我意识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物质基础上的,并且这一意识具有阶级性和局限性。鲍威尔等人所持有的抽象的、超越社会关系的自我意识,实际上是由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所塑造的。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基础。他认为,人类通过劳动来改变自然界,并从中获得生活必需品。^⑥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力。

(二) 成型: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现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观成型的重要标志。马克思在思想理论上逐渐摒弃了过去的哲学信条,与唯心主义和古老的唯物主义形成了清晰的分割线。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由此也就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⑥ 参见牛子牛:《资本逻辑下劳动主体性的再生产——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理论的一个当代面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年第6期。

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① 要真正意义上地消灭这些“词句”，从人们意识中彻底拔除这些观念，仅靠语言上的批判与理论上的演绎是远远不够的。简单来说，消灭一种意识形态，就必须消灭其存在的现实土壤，所依仗的实现方式则是暴力革命。从此以后，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将自身的文明观扎根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之后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蒲鲁东脱离历史、脱离实际的错误思想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批判。马克思承认并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一面，即它促进生产力、推动社会关系的发展等，同时又披露了资本野蛮的一面，比如异化问题、私有垄断问题、贫穷问题等。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解读了客观存在的资本主义现实问题的历史由来，并且从这一本身创造着解决资本主义文明现实问题的“物质手段和萌芽”^② 的历史活动之中得出资本主义必将走向灭亡的结论。

（三）发展：对资本主义文明悖论的批判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观与时俱进地不断丰富和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了具体的解读，在充分肯定其在人类历史文明长河之中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局限性及其引发的文明悖论，即“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③。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阐明了尽管资本主义文明中充满着矛盾与悖论，但是这些矛盾之间的斗争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助推剂。^④ 由此可见，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把握之后的科学洞见。在此后的诸多著作之中，马克思继续深入对资本主义文明悖论的批判。^⑤ 比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⑥ 由此可见，马克思不仅向我们揭露了“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真正本质，而且也为我们揭示了正是资本主义文明追求“以资为本”，才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历史局限性。“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⑦ 其中，“普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④ 参见付文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兰州学刊》2023年第11期。

⑤ 参见周文：《再论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求索》2023年第5期。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8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0～391页。

遍性”是指资本为了实现自身增殖进而对剩余价值无限攫取^①，进而把自由、民主和博爱的文明展示给了资产阶级，而把奴役、专制和剥夺的文化磨难给到了被统治阶级；“这些限制”则是意指工人们在一天以内可以连续工作的时间限度、可供资本家奴役的雇佣工人数量越来越少但社会贫困人口越来越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导致了可变资本变少、生产领域的所有资料集中使得垄断资本主义越来越壮大等等。

总而言之，由生产资料私有制造成的上述各类“限制”同劳动生产社会化之间的根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故而，“资本”自身就是一个不断自我批判的悖论的存在。^②正是资本的“矛盾”与“悖论”使其“必然自己排斥自己”^③，最后的结果便是培育出一个代表新生产方式与新文明的无产阶级，并将其看成是真正的历史同一性主客体。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所建构的文明立场、文明逻辑和文明研究方法对摩尔根所提供的史前的社会材料进行了透彻的分析，最终确认历史唯物主义文明不仅是关于文明时代的真理说明，更是放眼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之中的科学道路指南。恩格斯圆满完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文明的验证阐释。^④在此基础上，恩格斯还填补了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空白，提出了一些相互支撑的观点，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在工人运动之中帮助分析与清理各种错误产生了很大的历史影响，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的与时俱进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助力。

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观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提供了对人类文明研究视野、人类文明发展根本动力、实现目标以及发展道路多个问题的科学解答，在揭示了文明本质的同时，也明确表示了生产力是推动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人类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成为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以及人类文明道路的进展不仅是多样化的，而且具有选择性。

（一）人类文明研究视野：历史唯物主义

“文明”一词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在马克思的研究中，“文明”一词常与

^① 参见卢江、黄旭：《对当代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逻辑批判——基于〈资本论〉的视角》，《经济纵横》2023年第10期。

^② 参见李双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观念论言说的批判与人类文明新形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年第3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5页。

^④ 参见胡博成、朱忆天：《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幻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指向和价值旨归》，《经济学家》2022年第8期。

进步密切联系，并同野蛮相对应。^①首先，文明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明专指人与动物是有区别的，“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②，即劳动覆盖了人类的全部历史。狭义的文明则是特指阶级分化以后的人类文明史，彼时人类通过财富的创造与积累展开历史活动，并逐步跨入更高阶的文明社会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提出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必定是由低级走向高级、由落后走向先进、由民族走向世界的演变逻辑，这是由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历史规律决定的。故而，人类文明演变史本质就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其次，文明也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所展现的方方面面都被文明覆盖，包括但不限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生态进步等诸多方面。最后，马克思时常通过反讽来批判那些应该体现出较高修养的所谓的文明民族与文明阶级为了自身利益的野蛮行径。^③

（二）人类文明发展根本动力：生产力

动力是研究文明起源与发展动力中的重要问题之一。不少西方思想家吹捧传统理性主义是发展不竭之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框架之下，不仅毫不留情地批判了传统理性主义文明观，而且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④。恩格斯也曾指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⑤因此，无论何种文明实质上都是人类实践的产物。换句话说，文明的起源和发展都由生产力所决定，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决定了社会生产关系。这便从根本上瓦解了传统理性主义的文明根基，撕毁了资本主义文明观的伪装，也使马克思恩格斯将文明观构筑于科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毋庸置疑，资本主义的崛起过程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基础，但并未给人类社会带来普遍繁荣，反而造成了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等问题。这使得无产阶级幡然醒悟：为了实现真正的普遍文明，无产阶级必须团结一致，通过与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开启并最终实现人类文明的最高形态——共产主义文明。

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将经济决定论作为影响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虽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经济因素对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恩格斯也曾多次指出，唯物史观并不意味着等同于经济决定论。因为生产力的作用归根到底表现的是这种作用的根本性与最高性，并非唯一性，不能简单地用经济因素来解释社会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明

① 参见李艳艳：《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及其当代价值》，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页。

③ 参见黄建军：《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0期。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是否可以延续,“完全取决于交往范围扩展的情况”,这指明了世界范围内的文明交流与传播对人类文明延续性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不同地域诞生的文明虽然不尽相同,但究其根本、求同存异,他们的文明其实有着共同的价值诉求,比如人权、和平、可持续发展等都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共同追求的目标。这些都是不同的国家与地区在进行文明交流与传播中的“共鸣”之一,共同推进世界文明的繁荣发展。^①

(三) 人类文明实现目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对文明观的研究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即全人类的解放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尽管马克思早期的探索主题不尽相同,但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所讨论的精神自由到《莱茵报》时期所关注到的政治自由,再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聚焦的经济自由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人的全面自由,马克思理论研究的主线始终未变。^② 马克思曾指出:“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③ 这种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有目的的实践活动。人的自由发展已经不再局限于认识层面上对必然性的认识与驾驭,也包括人作为主体的情况下的行动自由与政治自由,更包括人突破了分工限制,即“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④的理想生活状态。马克思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解读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⑤ “全面的本质”中的“全面”是指人的一切相关属性,即个人关系与能力的普遍性,而这种普遍性与分工是密切相关的。在早期社会形态中,物质匮乏使人们不得不集多种能力于一身,但是这个时候每个人的发展能力是比较低下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⑥。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应该做到满足人的需要,提高人的素质与能力,充分彰显人的个性,发展人的社会关系。故而,人的自由发展与全面发展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四) 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多样性和可选择性

人类文明发展虽然是一种历史性活动,其发展的基本规律是明确的,但是这

① 参见谢清果:《文明共生论:世界文明交往范式的“中国方案”——习近平关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思想体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② 参见丰子义:《马克思与人类文明的走向》,《北方论丛》2018年第4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43页。

一规律下的具体道路并非唯一的，而是具有多样性与可选择性。文明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个有时会包含停滞甚至有可能倒退的曲折过程。多年以来，“西方文明中心论”鼓吹者漠视其他国家与地区在探索文明发展道路的贡献。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之中，关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科学论述早可窥见，其中不仅有对人类文明发展一般规律的阐释，也有对文明发展具体道路的分析。总体来说，马克思认为不能将历史理论割裂理解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①。故而，马克思在研究亚细亚社会、俄国公社等文明发展道路时指出，相同的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会因为不同的背景下的国家与地区中，而让文明发展道路在表现形式上有所差异。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分析，历史发展中一般规律与具体道路有区别亦有联系。^②历史的发展方向是有迹可循的，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也总是有着共同的现实渴求，这便是由历史的本质与规律所决定的。但是，即便是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也不能够具象地规定所有国家与地区一定循着这个方向发展，并保证这是实现人类诉求的唯一的道路。鉴于此，不同的国家与地区应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文明发展道路。^③

三、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观的当代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伟大实践推动了当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观的理论创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中国化时代化，展示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独特优势。这不仅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更体现了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所作出的创新贡献。

（一）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新境界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观有助于开辟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新境界。后起国家发展速度日益加快，但国际经济发展态势整体严峻，环境气候问题突出，同时，反全球化思潮也正在兴起。在应对全人类难题之时，西方理论的解读及洞见显然无法满足需求。全球金融危机后，人们普遍开始转向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发现《资本论》中其实早有预见。马克思的理论不仅可以解析和预测当前的全球变革，还提供了值得深入思考的理论，为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因此，这必然要求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观“重新出场”。我们并不能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里寻找现成的答案，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若无视历史和现实的变迁，只是生搬硬套他们的思想，那么结果只能是发展道路步履维艰。因此，我们应该在把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6页。

^② 参见赵英红：《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兼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理论自觉》，《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③ 参见本书编写组编著：《社会主义发展简史》，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年版，第112～113页。

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之上深度剖析和研究现时的问题，期望寻找到应对之策。中国共产党在过去数十年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稳步开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还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① 这些成就的背后，是中国回答了人类文明该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并找到了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与道路。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与道路，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新时代的深入拓展，同时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二）创新了社会主义文明的形态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观有助于创新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下中国共产党的原创性贡献，创新了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与传统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具有制度优越性和发展活力性。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现，消除了以往文明时代的内在悖谬，加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引领力。其一，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中华传统文明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蜕变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成长环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主张与其他文明相互交流借鉴、共同进步的。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代化产物之一，蕴含着丰富鲜明的民族底色与中华特色。其二，人类文明新形态强调多样性的文明发展，并将以人民为中心、和谐共生、推动共同富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原则作为基础，体现着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巨大成就打破了“西方文明=世界文明”的幻境，为人类走出文明困境提供了全新选择。

（三）提供了有助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思想指南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观提供了有助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思想指南，“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②。马克思从历史的角度指出资本主义文明具有野蛮性，并强调资本主义社会通过侵略扩张与殖民统治实现资本的血腥积累，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榨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殖。因此，资本主义文明最终只是为了少部分人谋利的文明，生命具有短暂性。^③ 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的虚伪本质，拨开了资本主义文明的遮羞布，指明了建立共产主义新文明是历史必然。而中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把握文明的发展规律，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丰富和发展人民民主、充分尊重

① 参见梅景辉、张琦：《中国共产党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学理基础、实践探索和价值意蕴》，《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

③ 参见李冉、刘文祥：《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文明观：思想渊源、丰富内涵、特点价值》，《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人民的权利和主体地位，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主张合作共赢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t Civilization Concept and Its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Song Kaiqing

Abstract: Marx's conception of civiliz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riginated from the criticism of western traditional rationalism, developed from the criticism of the paradox of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and came into being with the emergen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arx comprehensively criticized the permanence of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thoroughly exposed its hypocrisy and limitations, and pointed out that in the long river of human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capitalism is only a historical stage, and will eventually be replaced by a higher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socialist civilization.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rovides scientific answers to many questions about the research vision,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the realization of goals and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human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In today's China,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ncept of civilization has been further innovated and developed, successfully opening up a new realm of Marxist concept of civilization, innovating the form of socialist civilization, providing ideological guidelines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adding a civilization colo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world civilization.

Key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t Civilization View; Marx; New Forms of Human Civilization

[责任编辑：鲁法芹]

《资本论》的唯物史观运用及其当代意义^{*}

王广良 刘玉武^{**}

【摘要】唯物史观的运用是指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分析研究对象。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理论前提，从唯物史观角度来把握《资本论》是一个重要的学术维度，从《资本论》视角看待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具体化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实证。长期以来，理论界由于认识分歧，造成了唯物史观与《资本论》部分研究的分离。本文旨在重估唯物史观与《资本论》的关系，基于《资本论》视域，展现唯物史观的客观性、实践性和历史性；基于唯物史观视域，推导《资本论》“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推理逻辑、“从低级到高级”的世界演化途径、“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文本呈现方式，从而全面把握《资本论》蕴含的唯物史观学术价值和当代意义，发挥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理论力量，指导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关键词】唯物史观；资本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和发展规律，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完成了政治经济学史上的划时代革命。《资本论》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著作。在哲学意义上，它以严密的逻辑推理揭示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对唯物史观进行了确证。在经济学意义上，它通过对资本运行规律的分析，揭示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和经济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正是对政治经济学进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项目编号：22ZD077）子项目“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的主要挑战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2022 年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重点课题“大数据时代青年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2SZH0218）阶段性成果。

^{**} 王广良，新疆农业大学党办校办主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刘玉武，新疆师范大学新疆意识形态安全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哲学。

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确证。无论是唯物史观的建立，还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都是建立在《资本论》所建立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理论前提，从唯物史观角度认识《资本论》是一个重要的学术维度，从《资本论》视角看待唯物史观是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具体化的重要验证。当前，全球经济整体低迷，有必要让世界再一次将目光投向马克思和《资本论》，让学术界再一次聚焦《资本论》中唯物史观的实用价值研究。正确看待《资本论》对唯物史观的确证、叙事逻辑及其当代价值，对于发挥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理论力量，认识和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规律与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

一、《资本论》对唯物史观运用的认识

历史观是人们对社会发展历史的总体看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正确的历史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对交往和交往形式的分析，形成了生产关系的科学概念和思想。基于对现实的生产和生产关系的研究，马克思揭示了社会生活本质、社会发展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①的剖析，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起源和社会关系的本质，破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拜物教和经济范畴的天然性，阐明了经济范畴形式与社会生产关系的内在关联性，从而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唯物史观的创立经历了从《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至1846年5月）的“初步阐述”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序言”中的“经典论述”，再到《资本论》的实证将其推向“成熟”的历程。正如马克思在一封信中对朋友所说的，希望在向读者推介《资本论》时，能够“更多地强调《资本论》的唯物主义基础”^②。马克思在这里所提的“唯物主义基础”，既包括了辩证唯物主义，也包括了历史唯物主义。

然而，长期以来理论界对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重要概念和原理，在认识上有许多分歧。^③ 有种观点认为《资本论》与唯物史观是分离和对立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其划分依据一方面体现着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般逻辑，另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9页。

③ 参见马昀、卫兴华：《用唯物史观科学把握生产力的历史作用》，《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

一方面也展现着这三大组成部分各自的系统功能。从一般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基础性认识工具作用,政治经济学发挥了对唯物史观的实证性论证工具功能,科学社会主义体现了马克思的理想性价值归宿功能。作为马克思主义两大理论基石的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在这一结构划分上更集中、更具体地展现出理论内容的功能性。相关研究总会有一种倾向性,即有意无意夸大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各自的功能、学科的独立性,而忽视相互之间的联系,继而导致对《资本论》与唯物史观关系的历史地位与学术价值无论多么认可,但都始终囿于实证层面,始终强调把《资本论》限定为政治经济学范畴的经典著作,而弱化其站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直达人类社会本质的深度来看待其重要价值。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基于实证化经济学解读路径、纯哲学化解读路径的差异,造成《资本论》与唯物史观的分离与对立。这种割裂的认识倾向,很容易让《资本论》应有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被低估。

事实上,倾注了马克思毕生心血的《资本论》,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及运用原则,深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深处和实践场域,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历程,剖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动力,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剥削本质,从而全面深刻地把握资本主义发展的过去和现在并预测其未来,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正如列宁认为,“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资本论》)是用唯物主义方法科学地分析一个(而且是最复杂的一个)社会形态的范例,是大家公认的无与伦比的范例”^①。毛泽东也曾指出“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②。苏联学者巴季谢夫在《作为哲学著作的〈资本论〉》中也对《资本论》的哲学逻辑作了明确概括,即“我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具有越来越多的新特点。为了理解这些新特点,《资本论》的哲学方法论的意义突出起来了,它已经成为创造性思维的辩证文化的源泉和新的认识活动的榜样。正是作为哲学著作,《资本论》具有越来越重大的意义”^③。足见,忽视《资本论》所拥有的唯物史观的指导意义,就会忽略其哲学世界观与历史观的学理价值。唯物史观是用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历史的发展,全面把握唯物史观的基本内涵特征,有助于正确评析长期以来学界关于唯物史观与《资本论》关系的理论争论和分歧。

①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

③ 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写:《〈资本论〉哲学与现时代》,孙越生、沈真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40页。

二、《资本论》对唯物史观的确证

马克思指出,《资本论》的方法是辩证的方法。马克思通过研究和叙述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指出了纷繁复杂人类社会表象的内在根本经济关系范畴,也正是这种经济关系决定了人类社会发展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从这个意义看,《资本论》整合了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的双重使命,在经济学意义上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正如有的学者指出,《资本论》是马克思经济学与哲学完美结合的理论巨著。在《资本论》中,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是一体两翼的关系,是以《资本论》为文本载体的两个方面的辩证统一。^①唯物史观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有规律的过程,这种规律寓于人类实践活动之中。《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和经济运行规律的考察,科学论证了唯物史观的客观性、实践性、历史性特征。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剖析展现了唯物史观的客观性,客观性是马克思主义立足唯物主义哲学传统所形成的重要特征。唯物史观将唯物主义这一根本原则贯彻到底,彻底将唯心主义驱逐出人类的全部活动领域。以客观性来标识人类历史,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突破传统神秘主义宗教史观、英雄史观、虚无主义等,构建一个建立在对客观世界如实、正确反映和摹写的历史认识论的哲学承诺。从唯物史观到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以客观性为第一原则,以真实资本主义世界为认知对象。《资本论》所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实证精神、客观意识,在实证层面全力支撑唯物史观提出的“人类历史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核心观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正是在于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对资本主义的客观认知为前提和基础,并进行科学的、系统的、实证的分析。《资本论》对整个资本主义所展开的研究以商品为逻辑起点,这个起点同时也是历史真实,并非马克思出于批判性、规范性而构建的概念。商品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构建自身系统的单位要素,同时也是剖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增殖秘密的客观事实。如不从这一客观事实出发进行研究,劳动、剩余价值、利润、资本、地租、资本积累和集中、资本循环等就无法理解,整个对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认知模式也无法构建。正如列宁所认为的,马克思得出结论的方法是“对有关事实的细心研究”^②。可以说,《资本论》不仅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客观性原则,而且也充分运用了唯物史观的客观性原则。

《资本论》对“现实的人”的分析展现了唯物史观的实践性。实践性是马克

^① 参见王维平、张起梁:《经济学—哲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底蕴——〈资本论〉及其手稿对唯物史观的深化》,《理论探讨》2020年第2期。

^②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页。

思主义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体现了科学的实践性。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①，“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②。无论是唯物史观还是政治经济学，最终都是要论证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一革命性世界图景和“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尤其是作为实证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典型代表作《资本论》，不是以一种镜像的原则姿态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出机械的、片面的反映，而是立足于对“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的研究论证，并以一种规范的、批判的姿态引导到更高层次理想社会的探索和构建上来。比如，《资本论》揭示一切财富源于劳动者的劳动的本质，指出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创造了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成为利润的来源和整个资本主义大厦的地基，这本身就是从“现实的人”出发，其本具有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变成了“异化劳动”，从而得出资本主义必须是被劳动者推翻、异化劳动必须被扬弃而回归成“自由自觉的活动”，本就具有实践意味。再如，《资本论》中关于对资本认识的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③，既揭示了资本来源于剩余劳动这个基本事实，又渗透着对这一现象的批判、对资本的恶的本质的一种基于规范性的控诉，最重要的是暗含着对以此为基础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进行变革的实践诉求。可以说，《资本论》在论证“两个必然”的过程中，并非以一种外在于世界的“旁观者”姿态作出资本主义必然命运的单纯预测，恰恰相反，是一种积极融入世界之中，对无产阶级劳苦大众“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的启蒙、动员、激励，从而将“必然性”与“能动性”加以整合。《资本论》无论从多大程度上发现资本主义的秘密，都并不以此为终极目标，而是以此为实证依据，用以激发广大无产阶级觉醒，形成强大革命力量，完成宏大的无产阶级历史使命。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动态分析展现了唯物史观的历史性。历史性是唯物史观初始的内在规定性。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因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具体的更替过程。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经济制度乃至社会形态，也处在形成、发展、繁荣、衰退和灭亡过程之中。发展本就是一种替代，资本主义无论是作为认识对象还是认识活动本身，都是动态的、具体的、历史的。《资本论》从实证角度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不仅立足客观事实，更立足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动态发展方向和阶段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第一版“序言”中就提出：“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④这一论述奠定了马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克思对资本主义研究的历史主义基调，旗帜鲜明地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研究贯穿唯物史观的原则，指出资本主义“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①。因而，资本主义研究的诸多范畴，如商品、分工、货币、剩余劳动、利润、价格、市场、经济危机等，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各自内涵也伴随着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展而不断扩充、重组、升级等，其根本动力正是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矛盾运动规律。在《资本论》文本表述中，资本主义社会与其说是一个静止的实体，不如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以动态的、过程的视野来看待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构成要素的发展变化，正是《资本论》贯彻唯物史观原则和方法论的集中表现。

三、《资本论》运用唯物史观的叙事逻辑

《资本论》作为马克思“整个一生科学研究的成果”^②，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资本论》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使用价值与价值、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一般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资本的技术构成与价值构成、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分配关系等经济现象和经济范畴的分析，系统论证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资本论》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原理以及抽象与具体、本质与现象、逻辑与历史、一般与特殊、整体与局部等重要范畴的辩证论证，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转化为一系列经济规律和一个个经济过程，以严密的论证、系统的推理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运行规律，揭开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神秘面纱，这一论证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本论》运用唯物史观的叙事过程。

首先是“从一般到具体”的叙事过程。唯物史观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范式，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前提。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社会主义目标铺设了最基础、最具普遍性的逻辑前提，是以批判性研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思考与“两个必然”目标有关的一切内容的认知模式和分析框架，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性、普遍性叙述分析。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就带有一定的具体性、直观性和可验证性，表现为对可感知的资本主义系统要素的调查研究，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以具象、微观的方式印证表达唯物史观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一般规律的分析到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一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从一般到具体”的叙事逻辑过程。正如马克思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11页。

在1859年正式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中所指出,“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①。这个“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也就是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构建的一套认识世界、分析人类社会本质规律的认知模式和框架,是具有真理性内涵与地位的哲学体系,即“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认知模式。从唯物史观到《资本论》的剩余价值学说,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体系从哲学意义上的一般性落实到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表现为具有实证性、具体性和操作性的结论。奠定从唯物史观到剩余价值学说这个“从一般到特殊”论证机理的底层逻辑,是唯物史观历史地认识世界的独特哲学范式和认知模式。以“历史地认识世界”作为研究具体问题、现实领域的“元”视角,实现从唯物史观的“一般”到剩余价值学说的“特殊”,体现了马克思从“本质抽象”到“本质直观”的逻辑推演。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②。正是在真理、本质、规律这个层面,《资本论》在微观上对唯物史观的奠基才显得如此精准、顺畅。

如果说“从一般到特殊”是唯物史观在《资本论》中阐述的一种内在逻辑轨迹和思维理路,那么它的外化即“历史地认识世界”则会认识到世界作为一个动态发展过程的演化图景,即“从低级到高级”,这一点是与超越了庸俗进化论和激变论的唯物辩证发展观相吻合的。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下不断演化,而演化的方向显然因人的主体意识、自由意志和实践活动而具有区别性和超越性,即“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而这种基于进步发展论的演化图景,显然是超越了自然生物的演化进程,呈现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的特征,体现着主客观统一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资本论》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图景的展示,比如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转化为剩余价值、资本原始积累转化为资本积累、资本循环转化为资本周转、单个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以及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息、地租等,充分体现了“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化规律。从商品这个“单细胞”发展成整个资本主义高度复杂的“生态圈”,无论是共时还是历时,总体演化规律都是趋向于更强大的环境适应性和更自主的财富创造力。每一个范畴都有自身的演化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29页。

轨迹，也都经历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①。这一论述充分体现了“螺旋式上升”的特点，体现了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体而微”的图景勾勒，对“人类社会五形态理论”的阐述，对“从低级到高级”演化总趋势的精准把握。

《资本论》运用唯物史观的叙事逻辑还体现为“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文本呈现方式。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中，提出了马克思关于坚持逻辑与历史相一致原则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指出“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②，逻辑研究的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③。这是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经典描述，成为理解《资本论》与唯物史观关系的重要方面。《资本论》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批判和分析离不开唯物史观所蕴含的方法论，《资本论》文本表现为经济学研究与哲学阐释的一体化，呈现出逻辑与历史相一致。从逻辑上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从商品入手进行分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开展商品拜物教批判，驱散对商品认识、理解的迷雾，从而从“物与物的虚幻关系”中揭示人与人的真实关系，还原真实的商品世界。这不仅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独特研究方法，更是唯物史观在《资本论》中独特文本的呈现方式。从历史脉络来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抓住生产关系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和，沿着这一进路，理解和把握生产力、生产方式、政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阶级等基本范畴，揭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科学说明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走向，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看作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从而形成“社会有机体”思想，进而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由何处来，预设资本主义社会向何处去的方向。

四、《资本论》的唯物史观运用对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指导意义

唯物史观在《资本论》中的运用，无论是作为可见的系统要素组成，还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3页。

作为可读的阐述理路,从事实和逻辑层面上都确立了其科学性,时至今日仍焕发着时代光彩,对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资本论》唯物史观运用中“现实的人”的实践起点坚定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坚持人民至上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方面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价值追求。《资本论》号称“工人阶级的圣经”。高扬人民性是《资本论》唯物史观的微观奠基,是指导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遵循的深层价值底蕴。正是基于《资本论》从历史的角度探讨资本增殖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异化”关系,并揭示其扬弃的必然性,当代中国基本经济制度才要旗帜鲜明地构建“人民的经济学”,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始终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利益最大化和少数人的财富积累,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则是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旨在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制度性保障。无论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还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抑或是强调市场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在不同层次践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根本观点。从新中国“三大改造”到改革开放再到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探索,始终坚持着“为人民服务”“共同富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以人为本”“人民至上”这一脉相承的根本宗旨和价值底蕴,使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人民美好生活需求方面形成了强大的制度合力优势,确保人民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彰显社会主义制度无与伦比的优越性。

《资本论》唯物史观的运用对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当前社会的基本矛盾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发一般规律的科学。生产是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的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研究生产的规律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社会生产的一般规律进行了探讨。马克思认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①“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②“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从而节约地利用自然力,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③马克思对社会生产一般规律的研究,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20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7~588页。

反映了社会再生产一般条件和一般要求对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一切社会都是适用的。中国共产党善于并充分运用马克思的矛盾运动规律指导经济发展。“全面深化改革”正是矛盾分析法的精准运用，通过感知、体察到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在创造巨大成就之后出现了一系列诸如不协调、不平衡、不充分、不可持续、阶层利益冲突等问题，通过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与时俱进地解决深层次体制弊端，诊断经济体制内部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之处，推动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任何一次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其本质都是对发展矛盾的一次发现和治理，实现对原有制度绩效的超越和弊端的扬弃。研究并挖掘唯物史观《资本论》运用的内涵，用矛盾分析法看待新时代我国经济制度的完善，是《资本论》所提供的宝贵的方法论财富。

《资本论》对唯物史观的运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对唯物史观进行再认识，一定意义上也是确认市场经济的历史方位。《资本论》与其他一切经济学理论的根本区别在于，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权力结构和利益关系的本质、规律，属于市场经济范畴，而不是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同样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也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要求和客观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应秉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本质，不能将诸如资本、货币、劳动力等范畴仅仅设定为生产要素，以满足所谓的优化配置，而更要将这些范畴所反映的经济关系作为理论构建和研究对象，以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和规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①。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方向和本质的这一把握，要求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无论社会如何发展，都必须将金融服务、资本市场、虚拟经济、数字经济等“风筝线”牢牢拴在实体经济上，打牢实体经济根基，这是现阶段乃至未来我国经济发展之本。劳动价值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基底，我们崇尚劳动，这也要求我们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实证力作，处处体现着科学精神和求真精神。马克思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揭示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定位有着重要理论意义，要求我们通过深化唯物史观，从基础理论层面予以认识。

五、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马克思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16页。

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出的重要判断，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唯物史观作出的大“历史时代”的科学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资本论》的唯物史观运用为本源和基础，作为反映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作为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创新。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面对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我们要从《资本论》中汲取唯物史观养料和宝贵资源，指导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The Applic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Das Kapital*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Wang Guangliang Liu Yuwu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refers to the analysis of research objects us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materialist historical view is the theoretical premise for Marx to write *Das Kapit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terialist view of history, grasping *Das Kapital* is an important academic dimen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s Kapital*, the concretization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materialist historical view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empirical. For a long time, the theoretical community has caused a separation between the materialist historical view and Capital due to differences in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Capital should be reassessed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apital, and the objectivity, practicality and historicit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hould be showcased.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is paper deduces the deductive reasoning logic of *Das Kapital* from the general to the special, the world evolution path from the lower to the higher, and the textual presentation method of “logic consistent with history”,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grasp the theoretical value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ntained in *Das Kapital*, exert the theoretical power of Marxist economic theory, and guid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basic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Key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Das Kapital*;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责任编辑：焦佩]

《矛盾论》对“两个结合”的运用及其当代启示*

徐 聪**

【摘 要】《矛盾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经典著作，对“两个结合”的运用以及对推进“两个结合”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内外因辩证关系原理、矛盾的互相转化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批判了错误的思想根源，推动了中国革命胜利，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他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内外因辩证关系原理、矛盾的互相转化与中国传统辩证法、中国传统哲学、“阴阳”辩证法有机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矛盾论》中“两个结合”的运用对新时代“两个结合”具有重要启示：坚持守正创新，立足新时代，推进实践基础上的“两个结合”；坚持内外联动，推动“两创”和坚持胸怀天下；坚持立破并举，批判错误思潮，建构新的文化生命体。

【关键词】《矛盾论》；“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泽东同志就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他撰写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名篇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①《矛盾论》对“两个结合”的运用在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思想内涵。《矛盾论》不仅仅是在翻译、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由实践经验总结上升到理论高度的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之作。分析《矛盾论》对“两个结合”的运用，对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及其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1&ZD008）、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新时代‘大思政课’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1VSZ035）阶段性成果。

** 徐聪，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3页。

于推进新时代的“两个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矛盾论》对“第一个结合”的运用

“《矛盾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范本，它总结了中国人民革命的经验，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①为了克服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将唯物辩证法同中国革命实际进行深度融通，推动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呈现出鲜明的中国作风，堪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典范。

（一）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列宁指出：“马克思的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②经过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世界观作为自己的哲学理论，并将它转化为改造旧中国的方法论。但早期一些党的领导人尚不知悉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已是苏俄化的，将它作为中国革命必须遵循的普遍性原则，结果遭受了一些挫折、失败。毛泽东从秋收起义受挫的残酷现实中意识到，苏俄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既有必须遵循的普遍性原则，也有只适合苏俄国情而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特殊对策。因此，毛泽东指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着本身的特殊性，也就是使这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最本质的东西。“在他看来，只有教条主义者才会认为不需要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就可以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③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是不可能照抄照搬西方的经验或者苏联模式，而是要根据中国革命和现实的情况进行选择，这就是中国革命实际的特殊性。中国革命的道路在不同历史时期和阶段，所面临的矛盾和情况是各不相同的。毛泽东科学地运用矛盾的特殊性原理，正确分析中国革命形势，作出正确判断，指导革命取得成功。因此，《矛盾论》更重要的是注重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而更加具体地指导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矛盾论》系统全面地总结了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结合中，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指导，并且辩

① 李达：《〈实践论〉〈矛盾论〉解说》，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37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28 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2 页。

③ 唐正东：《〈矛盾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南京社会科学》2023 年第 6 期。

证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要与中国的革命和实际相结合，从而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这就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时代变化，引领时代潮流，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时代在变迁，形势在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想永葆生机和活力，就要与变化了的社会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当今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们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基础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取得新成果，指导中国社会发展取得新的进步。

（二）将内外因辩证关系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是内因、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强调了事物发展的动力来自自身的矛盾：“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① 这形象揭示了事物的内部矛盾对其运动和发展的作用。因为自身的矛盾是此事物存在的根本基础，是一事物区别于另一事物的内在本质，它决定了事物发展的方向和事物的根本性质。在《矛盾论》中，毛泽东通过许多事例进行了充分的论证，指出自然界中机械运动、动植物的发展主要是由于内部的矛盾性，再指出社会进步发展的动力主要是内因，也就是事物的根本矛盾。社会的变化、发展、进步，主要是因为社会内部的发展，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而外因则是通过事物的内因对事物起到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并不能改变此事物的性质和基本方向。另外，内外因之间还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互相联系，不可分割。无论是新事物还是旧事物，在其发展的初期都会有其根本的特性，但同时也都会受到其他事物的影响，包括此事物产生的条件、地点、时间等。所以，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论述了内因和外因的辩证法，特别强调内因、内部矛盾，将人们的眼光、注意力引向中国社会内在矛盾的分析，引向中国革命内因的研究，引向中国革命胜利经验与失败教训的内因探索，立足于中国社会情况、中国革命实践以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身的力量，反对离开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实践以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主体性而空谈马克思主义，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错误。我们研究事物、思考问题、制定战略、总结经验，都必须注重内因的分析。但教条主义者、机械论者、外因论者却看不到这一点，总是把挫折和失败完全归结为客观原因和外部条件。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页。

败，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但在遵义会议上，他们却为反“围剿”失败进行辩护，甚至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是由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这实际上等于拒绝承认错误、总结经验。针对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态度，毛泽东将内外因辩证关系原理与中国革命有机结合并得出结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①也就是说，要依据自身的、内部的力量来搞革命，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

1946年，国民党打破和平的局面，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目的是消灭共产党。在具体的战术上，毛泽东将内外因辩证关系原理与中国革命有机结合，用矛盾思想来指导战争，认为国民党主动发起的内战对人民来说，是背信弃义的，是被人民所排斥的，亦是不得民心的，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口号，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及军队士气，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这一思想，国民党的不得民心和共产党的士气大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此同时，针对国民党的进攻，共产党还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解放战争中，逐步实现了由“防御”到“进攻”的战术转化，成为推动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经验。毛泽东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始终贯穿对实践的具体分析，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活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指导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三）把矛盾的互相转化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恩格斯深刻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②历史映照现实，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不是从中国社会客观的矛盾运动出发来认识中国社会，而是盲目地执行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不切实际的指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把矛盾的互相转化与中国的革命和实际有机结合，把马克思主义转化为具有理论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力地批判了教条主义、狭隘经验主义，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发展和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经验。

毛泽东把两个相互对立和斗争着的要素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称为矛盾的同一性：“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种意义。为什么这里也有同一性呢？你们看，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经过革命转化为统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3页。

治者，原来是统治者的资产阶级却转化为被统治者，转化到对方原来所占的地位。”^①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尚未发生革命这个“一定的条件”下，以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身份而相互依存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但在发生了革命这个“一定的条件”下，它们的地位就会相互转化。这是在矛盾同一性的有条件性和相对性的前提下，对矛盾双方相互转化问题的深刻阐释。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把矛盾的互相转化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与教条主义、狭隘经验主义等主观主义的批判中形成发展起来，这是批判中的建构；《矛盾论》又通过建构起新的理论、思想，更有力地批判教条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没有这种新的理论建构，很难识破教条主义、狭隘经验主义的实质和危害，这是建构中的批判，体现了批判性和建构性相统一。

二、《矛盾论》对“第二个结合”的运用

“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结合起来”^②，熟谙中国传统文化的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将唯物辩证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矛盾论》对“第二个结合”的运用促使唯物辩证法和博大精深的中华历史文化实现融通互构，使唯物辩证法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之中，实现唯物辩证法的民族化、本土化。

（一）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与中国传统辩证法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历史文化背景决定了我们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时候，要结合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以事物运动就是矛盾的思想以及列宁的“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③，作为论述矛盾普遍性的根据，并对此普遍性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又在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④的基础上，对矛盾的特殊性进行了阐明。对于普遍性和特殊性，毛泽东更注重“特殊性”。在《矛盾论》中，他用大量的篇幅说明“特殊性”的问题，并强调党内的很多同志，如果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有机结合，就不能正确认识和指挥革命。矛盾在不同阶段及矛盾的各个侧面所具有的特殊性是不同的，在对其进行分析时不能带有主观性，必须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对具体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他还借用《水浒传》中“宋江三打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8～329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③ 《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06页。

④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8页。

祝家庄”的典故，强调在最初攻打祝家庄时，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方法不对就打了败仗，经过辩证分析、合理布局后才获得胜利。毛泽东又深入阐述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联，即共性和个性的关联，有共性才有个性，没有个性也谈不上共性，而这种共性和个性构成了矛盾事物的精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① 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一再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要同民族特色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功。特别是在今天中国发展的实践道路上，我们在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同时，更应认识到中国发展的实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② 这也正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有机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哲学辩证法有机结合，所传达给我们的一种科学的认识、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正如斯图尔特·R. 施拉姆所言：“毛泽东极其坚定地相信自己与中国及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不仅产生了强烈而不妥协的民族主义，而且必然会坚持按照中国环境和中国文化的需要去修改外来的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③ 正是注重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才能使“两个结合”不仅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指南，而且为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支持。

（二）将内外因辩证关系原理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④ 毛泽东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的内外因辩证关系原理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融合在一起，经过改造、提炼和加工后，创造性地融入《矛盾论》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首先要让马克思‘说汉语’。这种语言层面的转换不是简单的翻译问题，而是以中国人所特有的言说方式去解读马克思主义，其结果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式诠释。”^⑤ 在对辩证法的认识上，中国传统辩证法包含朴素性质的辩证法内容，而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0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76页。

③ [美] 斯图尔特·R. 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田松年、杨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0页。

⑤ 何中华、郝书翠：《“第二个结合”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光明日报》2023年6月28日。

义哲学的思想对其进行阐述，使中国传统的辩证法思想被赋予了更加科学的解释。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主要是由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造成的，社会的变化主要是由社会内部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的发展造成的。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

唯物辩证法强调内因的根本性作用，把事物的发展看成是由其内部矛盾引起的必然的自我运动的过程，但它并不否定、排斥外部原因的作用，而是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在内因和外因的双重作用下发展变化的。毛泽东用通俗易懂且极富中华民族特色的语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阐述，他举例说：“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①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论述了内因和外因的辩证法，特别强调内因、内部矛盾，他引用宋代苏轼《范增论》中的“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强调内因的重要性。因此，毛泽东不仅科学地向人们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内容，还通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方式体现出民族特色，使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真正实现中国化，并有效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

（三）把矛盾的互相转化同“阴阳”辩证法相结合

“毛泽东讲述对立面的统一与斗争规律，以《矛盾论》名篇，标题便带有民族特色。从内容来看，更融入了我国古代辩证法的宝贵遗产。”^②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同“阴阳”辩证法相结合，把矛盾的互相转化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典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转化为具有理论形态和民族特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使来源于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并内化为其中的文化基因。

正如黑格尔所言：“只有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了。”^③在对辩证法的认识上，中国传统辩证法中包含朴素性质的辩证法内容，两千多年前战国时代的韩非在《韩非子·难势》中就开始使用“矛盾”来表述客观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毛泽东最著名的理论贡献中，有两项分别出自《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论文，在它们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概念之前，其溯源可以一直追溯到非常古老的中国观念中去，它们是‘实事求是’和古代的‘阴阳’辩证法。”^④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谈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303页。

② 汪澍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③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87页。

④ [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田松年、杨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到研究问题最忌主观性和片面性时，引用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来辨析认知片面性的错误，强调全面认识事物的重要性。毛泽东还指出《水浒传》中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通过家喻户晓的《水浒传》来引导人们的正确认识，认识到全面性是防止我们犯错误、防止僵化的重要方法。因此，毛泽东不仅科学地向人们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内容，还通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方式体现出民族特色，使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坚持把矛盾的互相转化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典故相结合。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评述诸子学说时指出：“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在《矛盾论》中的“相反相成”同样说明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反”指的是两个对立面的斗争，“相成”指的是两个对立面的联结，说明了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同一性通过斗争性来体现，这就实现了矛盾的同一性、斗争性和中国古代哲学的有机结合。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①在谈到矛盾的互相转化是现实的、具体的时候，毛泽东列举出《山海经》中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的“后羿射日”、《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具有七十二种变化等等诸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典故来论证。这些“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②。毛泽东通过这些生动形象的神话故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达到通俗易懂的效果。他进而说明这些神话故事所体现的矛盾变化是一种构想出来的同一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就是通过这种科学的方式来体现事物变化的同一性。

三、《矛盾论》对推进“两个结合”的当代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③作为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代表之作，《矛盾论》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将唯物辩证法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指导了中国革命胜利，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推进新时代的“两个结合”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一）坚持守正创新，立足新时代，推进实践基础上的“两个结合”

“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1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1页。

③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① 概言之，矛盾论问题的精髓，即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②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要坚持“立足国情”的特殊性，从具体问题的角度出发，并结合新时代特征，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两个结合”。

一要坚守真理，努力做到真正懂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社会实践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使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实践、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③ 不断认识、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开放性、时代性的理论特质和品格，反对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结合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不断进行新的理论创造。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同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贯通起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深邃，常用常新、常学常新。坚持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掌握贯穿其中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始终保持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更好地把科学理论转化为治国理政的行动实践，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

二要立足新时代，开拓创新，推进实践基础上的“两个结合”。“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④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认识世界、把握规律、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开创了指导无产阶级斗争并取得胜利的科学理论，向全世界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是被实践成果证明的科学真理。时代在不断变化，社会在快速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跨越时空的思想价值，仍然显示出其独特的真理力量。马克思主义具有真理性，但墨守成规、僵化教条地对待真理只会食洋不化、适得其反，难以达到指导实践的效果。在理论学习和实践探索中，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真理，但实践的发展变化要求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指明的方向，根据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才能确保其真理之“树”根深叶茂、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0页。

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本固枝荣。深入推进“两个结合”，要立足新时代，开拓创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①“两个结合”能够立足时代发展前沿，准确把握时代大势，回应现实需要，破解现实难题，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用马克思主义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继承优秀历史文化，并融入人民群众，使之成为强大物质力量，在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中、在守正和创新的结合中推进“两个结合”行稳致远。

（二）坚持内外联动，推动“两创”和坚持胸怀天下

毛泽东将内外因辩证关系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和中国传统哲学有机结合，指导了中国革命胜利，丰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就启发在“两个结合”中，紧抓“内因”推动“两创”，兼顾“外因”坚持胸怀天下。

一是紧抓“内因”，推动“两创”。“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力量，要结合新的实际发扬光大。”^②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破解当今世界贫富分化、地区冲突、零和博弈、人口膨胀、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难题，对于推动解决“中国形象”的塑造、“中国方案”的设计、“中国话语”的创新、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等民族复兴重要议题，具有更加凸显的参考价值和启迪意义，是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倍加珍惜的宝贵财富。然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内蕴的时代价值并不会自动发挥作用，必须要经历一个被激活与升华的现代化转型过程。具言之，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将被激活了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升华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构成，从而实现二者的“结合”。

二是兼顾“外因”，坚持胸怀天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非单纯基于中国维度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其中诸多内容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单纯民族性价值而上升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维度。”^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传承和发展的根本，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既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服务于有效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又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既要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落地生根，又要运用

① 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求是》2022 年第 14 期。

② 何中华：《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党的文献》2021 年第 3 期。

③ 尚庆飞：《“第二个结合”深层逻辑的三维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 年第 2 期。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和世界问题。推动“两个结合”，要坚持胸怀天下，树立世界历史意识和人类整体意识，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放到整个世界发展的总体中加以考察，立足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层面和立场，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根本性问题和整个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的普遍性问题，创造性地发现和解决人类、时代和世界问题。

（三）坚持立破并举，批判错误思潮，建构新的文化生命体

“如果丧失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性，就不可能有对现实矛盾的解释力。”^①毛泽东坚持批判性和建构性相统一，在《矛盾论》中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教条主义、狭隘经验主义等主观主义，并建构起新的文化生命体。

一是批判错误思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秉持客观、科学的态度，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不复古泥古，不简单否定，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全盘西化论的错误论调，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的错误倾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要系统梳理古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还要对其全面批判地继承。只有如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会真正具有民族根基与文化血脉。要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和时代性的理论品格寓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之中，不断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与当代表达形式，使中华民族的价值共识、精神追求、政治智慧、历史经验寓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并将其转化为高度的文化自信、清醒的理论自觉、科学的行动实践。

二是建构新的文化生命体。“融合不是一方征服或吞并另一方，也不是一方支配或主导另一方，而是双方共同构建、创造中华新文化。”^②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基因，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使马克思主义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推进“两个结合”的深化发展，让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彼此契合中互相成就，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活力必将进一步充分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必将进一步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能契合相通、交相辉映，在21世纪新征程上赢得新的荣光。

^① 陈锡喜：《意识形态：当代中国的理论和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3页。

^② 王立胜：《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哲学探析》，《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The Application and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of “Two Combinations” in *On Contradiction*

Xu Cong

Abstract: As a classic work that combine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Chinese reality and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On Contradiction* has the important enlightening value in promoting research on the “Two Combinations” through its application. Mao Zedong combined the principles of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of contradictions,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and the mutual transformation of contradictions in *On Contradiction* with the Chinese revolution, criticized the root of erroneous ideas, promoted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formed a Marxist theory of contradi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e organically combines the principles of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of contradictions,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and the mutual transformation of contradictions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dialectics and “yin-yang” dialectics, promoting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dialectics, making Marxist philosophy “Chinese language”, and forming a Marxist contradiction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application of “Two Combinations” in *On Contradiction*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the “Two Combinations” in the new era: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s of integrity and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new era, promote the “Two Combinations” on the basis of practice; we should adhere to internal and external linkage, promot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persist in having a broad vision for the world;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both standing and breaking, criticize erroneous ideologies, and construct a new cultural life form.

Keywords: *On Contradiction*; “Two Combinations”;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责任编辑: 于少青]

**“两个结合”与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建设相关研究**

中华文化生命体的四重向度研究

王苏琪*

【摘要】中华文化生命体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相互成就的鲜活生命体。抗争精神是保持生命延续活性和遗传基因的内在驱动力，形成了文化生命体的内生向度；中华文化生命体自身善学兼容，是其生命体孕育、茁壮成长的逻辑向度，物质形态为中华文化生命体奠定了根基，制度形态完成其生命图绘，观念形态则将生命体的生产活动、交往方式、精神文化形成“统合”；中华文化生命体经过吸收转化、创造运用、创新发展的现实历练，是它保持蓬勃生机的实践向度；多元融汇、和谐共生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天下情怀，使其形成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价值呈现，标识中华文化生命体正以新的文明形态，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容构成和全新表达。

【关键词】文化生命体；内生向度；逻辑向度；实践向度；价值向度

文化生命体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首创和原创。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①，“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②。文化生命体的主格是文化，是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在适应、利用、改造物质世界客体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思想、观念、精神，实质是“人化”或“人类化”^③。梁漱溟提出：“且看文化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④因而，通常我们也把人们在实现自身价值观念过程中表现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看作文化。生命体的生物学概念为生物进化体系，是具有繁殖能力、能自发进行

* 王苏琪，河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①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②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③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④ 《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2页。

熵变的自我进化体系。文化是鲜活的，又是实践的，文化生命体可以理解为活力充盈、自我发展、不断进化的生命体系。文化生命体同其他生命体一样，具有生命孕育、成长和发展的一般特征，即具有物质基础与结构基础，新陈代谢，对环境的应激、调适和繁衍进化能力。但文化生命体又不同于一般生命体，它是“人类化”的，“不能被视作一种工具性或手段性的规定，相反，作为我们存在的塑造者和建构者，文化构成了我们存在的本身，就是我们的生命”^①。在此意义上，中华文化生命体凝聚着中华儿女世代集体智慧精华，是中华民族得以生存和延续的精神命脉，也是不断感染感召着一代又一代人跟从的信仰洪流，更是潜移默化影响着每一个人的根本遵循。五千多年的中华文化具有一脉相传的内在连贯性、延续性，同时又具有强大的协同性、系统性和发展性。

一、中华文化生命体孕育的内生向度

生命体都有自己的内生动力，文化生命体亦有自己的内驱力，如同种子的胚芽，自带了生命的延续活性和遗传基因。中华文化生命体最根本的内生力量就是抗争精神。从神话传说的女娲补天、后羿神日，到流传至今的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在面对力量悬殊、不知胜负的巨大困难时，中华民族都率先表现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抗争本能。孔子周游列国，颠沛流离，虽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仍坚守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并现身说法教育传承。墨子以“非攻”劝和，饱经十昼夜，最终成功劝阻楚王止战。张骞“凿空”西域，九死一生，明知不可而全力为之，开辟了丝绸之路。文天祥面对山河破碎，迎难而上，明知不可而从容为之，大义殉国。中国共产党人在风云变幻的战争年代，面对列强、军阀的屠戮，在国势衰微中奋起抗争，于亡国灭种中发出呐喊，在渺茫中自救，保持改天换命的乐观主义抗争精神，建党、建军、建国，抗美援朝，“两弹一星”……走出了一条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独特的民族不屈的抗争大道。

抗争只是不服输，但真正要取得最终的胜利，自强不息是我们民族的遗传基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根植在中华民族血脉中的基因。渊源于黄河流域的先祖耕种土地，对天时地利没有办法完全掌控，只有群体战天斗地不弃努力，才能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劳作中总结出的实践理性，使人们认识到只有合乎规律的辛苦付出，才能产生必然性结果。万物因果相连，日月运行“无所屈挠，动必合义”，人们自觉遵道合于天理。从先秦到汉唐，宋明至民国，儒家将“天理”解释为“自强不息”，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属性和主流意识。世代代家庭教育之始，头悬梁锥刺股的学习，卧薪尝胆、苏秦映雪、岳母刺字等自强

^① 姜逸：《推进“两个结合”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访山东大学何中华教授》，《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22年第1期。

故事，在民众中广为流传，为赓续血脉提供了丰厚滋养。无数仁人志士、贤才能绅的奋斗经历加持其中，形成了中华民族所推崇的精神特质，滋养一代代中华儿女。孙中山倡导“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毛泽东指出：“五年以来，我们经过了几个阶段。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我们渡过了困难。”^①“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②，这种顽强不屈的精神熔铸升华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核心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个民族之所以伟大，根本就在于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都从来不放弃、不退缩、不止步，百折不挠为自己的前途命运而奋斗。”^③因而他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④。中华五千多年来自强不息的精神，经过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在实践中的弘扬与拓殖，已成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强大凝聚动力，涵化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二、中华文化生命体成长的逻辑向度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外在“楔入”的结果，而是中国文化自身善学兼容的必然，也是中华文化生命体孕育的逻辑起点。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向北方少数民族学习，改变汉尊夷卑的观念，文化认同使各民族融合交流，形成了华夏文化的主体。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入华”，不仅带来了主体外异域的文化对流，甚至带来宗教的崇拜和信仰，儒家文化因其能够求同存异兼收并蓄，表现出强大的包容性和同化力，华夏文化依然是主流。辽宋金元时期民族大融合，辽、金、元少数民族之所以能够建立政权，一方面是学习、吸收并推广华夏族的传统文化，获得民众的认可；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沿用汉族政治制度加速它们的封建化进程，使中华文化根脉绵延不绝，并增添了外向的积极成分。明清时期，特别是清朝末年，中国在列强的军事胁迫下被动打开国门，西方文化强势侵入，冲击着中华文化主体。“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中国社会向西方学习的自觉呼喊，张之洞更是主张维新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维新运动以“自强”为口号，立志奋起，自强救国。中国向西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07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70页。

方的学习,前期集中于“器物”及技术设备方面,并且不限于一国而向多国学习,向美欧学习兴办新式工矿业、铁路、电报,向日本学习海军建设和轮船制造,中后期则向英国、德国学习创办报纸杂志,介绍西方的哲学思维和政治理念,开启民智,吸收其科学理性,并派出留美旅欧学生,改良政治制度,鉴赏先进文化。即使在国家困厄之时,中国对文化采取的态度仍然是保留传统,尊崇国粹,吸纳精华,重修典籍。

20世纪初的中国,靠改良不可能翻身,唯有革命才能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西方列强的侵犯、打压使传统文化在民族心理上严重受挫,“二元特性”表现明显:一方面质疑传统文化,对此失去了信任,另一方面拒绝全盘西化。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马克思主义自身就是全球史观,东方社会的中国、俄国本身也是世界成员之一,并不是理论传播的“盲区”,而是在被覆盖统摄范围之内。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实践能力的明证”,表明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东方成为一种真实的物质力量。^①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实践的方式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实际,使其成为自己战胜敌人的强大思想武器,学习——吸收转化——创造运用,以中国人自己的逻辑和方式演进。“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②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不过是中华文化的客体化形态,从认识到实践,已经内在地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结合。中华民族以平视的眼光,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外契的“契子”,更没有把自己看作受动的、被改造的客体,而是从主体的需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能动建构,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中华文化融合起来,成为自我主体属性的一部分,凸显了“中国性”。这一主体性的确立,由自发到自觉,从自由到自为,在中国革命时期就已经完成了起始点创建。所以,毛泽东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③中华文化生命体有其支撑的物质形态、制度形态和观念形态的基础和结构,这是其精神内核和生命力蓬勃发展的逻辑构成。

首先是物质形态,它是社会物质生产及其经济关系的反映。中国被迫卷入世界的工业化、现代化大潮时,清代理论家冯桂芬于1861年在《校邠庐抗议》中就提出,强我当“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呼吁学习西方的物质技术以增强国家根

① 参见姜逸:《推进“两个结合”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访山东大学何中华教授》,《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22年第1期。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7页。

本。洋务运动掀起的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和民用科学技术，既是中国发奋图强追赶国际工业化的建设开端，也是艰难迈向现代化创建的物质基础。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推动了当时国内落后生产力的发展，中国被动地卷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深刻认识到物质基础建设的重要性，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强调：“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① 物质基础是客观实在，“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不同认识的根源，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离不开植根其上的经济基础，因为这个以“物质方式”为本质的形态意蕴着现实的“生产方式尺度”，这个尺度构成了文化大厦的根基。邓小平也指出：“现在连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们从亲身的实践中，懂得了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富裕起来。”^② “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③ 今天我们更加深信物质文明带来的底气，“文化软实力”靠的不是文化自身，而是文化之外的“硬实力”。如果没有18、19世纪的“日不落”英国，没有接续其后美国世界经济第一的“硬实力”，英语不可能成为世界性语言，西方不可能占据国际意识形态主导权。同样，如果没有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的整体崛起，没有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硬实力”地位，中华文化就不可能成为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攻击打压的对象。

其次是制度形态，它是人们生产生活在政治上的映射。人们的物质生产关系决定了生活中一切现象，人的意向、观念和法律所形成和通过的制度，都能从中找到依据。建立在物质基座上的制度形态，通过文化完成图绘。文化不是凝固的雕塑，而是流动的活水，水往哪个方向流，取决于社会制度。恩格斯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④ 社会素质的实质是社会性，通过社会制度充分展示和体现。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服务，最终与资本追逐利润和全球扩张的本质相一致。亨廷顿认为：“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贸易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跟着国旗走，但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历史上，一个文明权力的扩张通常总是同时伴随着其文化的繁荣，而且这一文明几乎总是运用它的这种权力向其他社会推行其价值观、实践和体制……19世纪以欧洲殖民主义为表现形式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

的西方权力和 20 世纪美国的霸权把西方文化推广到了当代世界的大部分地区。”^① 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所以封建的糟粕没有完全剔除，科学民主的精神与主体尚未完全结合，文化发展得不到制度保障，因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得不到充分彰显。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服务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科学民主意识与人民群众统一起来，有了制度保障，才能将各种零乱堆积的“杂物”——传统物或外来物，当作必要的原料，吸取精华，剔除糟粕，并加以陶冶和熔铸，从而拓展出自己独特的文化。21 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全球视野纵横开阖，制度空间更加巨大，为文化生命体开辟了现代化宽广道路。

最后是观念形态，它是人们生产活动、交往方式、精神文化的“统合”。中华文化是由五千年文明延续发展和沉积而成的，具有相当稳定的形态，是一种伦理型文化，直至五四运动冲击带来新文化。辛亥革命后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是一场制度革命的胜利，表明共和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袁世凯和张勋的复辟又说明仅有制度层面的变革是不够的，“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是不会成功的”^②。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陈独秀认为“国人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和人权并重”^③，提出“伦理之觉悟是最后之觉悟”^④，要求从人的个性解放出发，革除旧文化中的落后国民性，树立科学与民主观念。这种新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完全推翻了“儒者三纲”的旧伦理观念，将“人的价值”放在首位，使为民者、为妻者、为子者脱离了“奴隶道德”，拥有独立之人格、科学之精神，新文化运动开启了进入观念现代化的层面。

在五四新文化的洗礼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相继提出了古今中西文化沟通互补的思想。李大钊就认为东西文明互有短长，他指出：“世界中将来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⑤ 这种提法已经上升到唯物史观文化论的思想高度。毛泽东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辩证综合的文化观念，他指出：“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⑥ 徐特立曾讲解毛泽东的这一论述，他认为“就是我们古代的也要，现在的也要，外国的也要，中国的也要。把古代的变为自己的，和现代的结合起来，把外国的变为自己的，和中国的结合起来”^⑦，这样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毛泽东的辩证文化观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

① [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88 页。

②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34 页。

③ 陈独秀：《敬告青年》，《独秀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2 年版，第 10 页。

④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独秀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2 年版，第 45 页。

⑤ 《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75 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00 页。

⑦ 转引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58 页。

原则,随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观念的树立和巩固,古今中外优秀文化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中国各民族在漫长岁月中共同创造、验证择摘,保留了从未中断、不能割舍的精华部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实事求是、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民为邦本、富民厚生的价值观,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的未来理想,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人文精神,守中致和、知行合一的思维方法,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亲仁善邻、贵和尚中的交往逻辑等,既是中华文化的突出特征,也是历史长河与实践波澜壮阔交织的智慧结晶,沉淀凝聚为中华文化的精神根脉。

三、中华文化生命体发展的实践向度

中国文化哺育了每一个中华儿女,文化生命体的发展离不开世代代的实践。秦统一后,提出“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文字的统一开拓了中国文化的深远源泉。隋唐时期,琼楼玉宇、诗词词赋、书画印刷等“对其邻国人民产生影响……日本人仿照长安建造了奈良和京都,他们在艺术、文学、宗教和行政管理机构上都模仿他们伟大的邻居……尤其是丝绸、茶叶、瓷器、纸张,以及包括绘画在内的艺术品琳琅满目,街道和客栈呈现出一种充满活力的国际化面貌,吸引许多从遥远西方而来的商贾,交换和使用这个帝国的用品,日子久了,难以抵挡其文化的侵染”^①。尽管中国不同地域文化存在差异,齐鲁文化、燕赵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等反映了不同的人文特色,但多元一体“大一统”却是中华民族深层社会稳定的心理结构,正因为如此,每当历史上外敌入侵之时,中华民族都能够万众一心地抵御外侮;而每当内乱出现之时,人们往往又可以在“中华一体”的民族认同基础上,捐弃前嫌,团结一致,变分为合,化敌为友。坚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的社会思维,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实践特色,推动了中华文化生命体的整体发展和社会进步。

“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②中国共产党领导劳苦大众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实践中,形成了文化先锋队和生力军。“这个文

① [美] 赖德烈:《中国人:他们的故事和文化》,陶李春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2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①新中国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的胜利,也使中华文化生命体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启了全方位、多层次、广角度、宽视界的伟大探寻,生产力的发展突飞猛进,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社会科学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无论是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哲学,还是在历史学、文学和艺术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中华文化在与世界文化的学习互鉴中,拥有了自己的博大胸襟和全球格局。中国共产党将社会主义改革、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浓缩在同一时空中,“三位一体”“三重突破”的实践历程不仅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规划了总路线和时间表,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凝聚了力量,开拓了新的境界,也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两个结合”开启了新篇章,“中国化”“时代化”成为它的显著特色,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属于马克思主义,更是属于中国的、中国文化的,是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现代化理论学者艾森斯塔德看来,现代化的关键就是形成一种有弹性的社会结构,这种弹性能有效应对社会问题,有着独特的制度特征和文化特征,从而有着“独特的文明”。马克思主义本身已融入中国文化中,并逐步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为一体,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华民族现代文化正以这样一种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精神支撑,向世界展示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途。

实践没有止境。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将在2035年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是我们立足新时代党的精神自觉和文化使命而提出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文化的繁荣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环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个领域的建设要齐头并进,共谋发展。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中国,如果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没有理论创新的勇气,不能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仅党和国家事业无法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生命力、说服力。”^②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7~698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30页。

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实践，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担负起党的历史使命和文化责任，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文化事业日益繁荣，保持文化生命体的蓬勃生机。

四、中华文化生命体展示的价值向度

中国需要世界。五四运动是我们孱弱之际寻求自我救赎的呐喊，新文化的传播让我国发现了可吸收滋补的新养分，向外学习民主与科学、自由与解放，开始自觉地意识到生命活络的涌动。这种涌动具有积极意义，价值深远，它为中华文化生命体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打开了理性之门。但当时的这种外向学习明显处于“学徒状态”。“学徒状态”是有局限的，它存在依赖、因循的不足，把从外学来的现成的东西当成永远正确的“模版”，在思维方式上容易限于“外在反思”，在行动实践中容易套用公式，走出“学徒状态”获得文化的“自我反思”必须要经历“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仿照苏联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这种“学徒状态”禁锢了思路，压制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不仅在经济、军事上受制于苏联的现成经验而失利，而且也导致政治和文化上的矛盾与冲突，表现为决策上不自信。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深入中国的社会现实，审视自己的道路、民族、历史与文化，总结军事斗争血的教训。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反思论证，遵义会议后，将自己所面对的领域具体化为“现实中国”，真正去解决“中国问题”，从而摆脱“学徒状态”，确立“自我主宰”的成长发展。1938年，毛泽东明确提出，可以学习别人的经验，但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至此，中华文明生命体获得了一种“明确地改变自身的力量，那种将过去、陌生的东西与身边的、现在的东西融为一体的力量，那种治愈创伤、弥补损失、修补破碎模型的力量”^①。这种力量发展起来，就能将多方撷取的思想、文化资源当作必要的原料和养分，让自己理直气壮地主宰。即使我们在请求外援时，这种力量也会让我们不卑不亢。毛泽东在祝贺斯大林60岁生日时写道：“我们中国人民，是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②“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领袖，社会主义的人民，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政治家、劳动者，才能真正援助；而我们的事业，没有他们的援助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③他深刻意识到中国肌

① 陈瑜：《以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哺育新的文化生命体》，《文汇报》2023年6月11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页。

体的生命力中所具备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品格，社会主义的品格不仅内向地自我茁壮成长，还要吸纳兼蓄外向的支援和力量，社会主义文化必然包含了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他在纪念白求恩的文章中说：“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① 毛泽东倡导文化上要批判地吸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提出：“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上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② 1949年，他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了文化自信，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③ 抗美援朝胜利后，他总结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振奋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这种自信和自豪更加坚定了我们文化的自信。

邓小平继承和丰富了毛泽东思想，他在统筹规划我国改革开放时，无不投出自自信自强的文化底蕴，更是多次展示中国的文化担当。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先把自己的事办好，一心一意搞建设，走自己的路，只有我们发展起来了，才能有更大的价值。他在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谈道：“听说荷兰不少土地是填海造出来的，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了不起。中国有句话，叫做‘愚公移山’，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传统，你们称得上是‘愚公移海’……我们要向你们学习……我们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就是再过十三年，达到一个小康社会的水平。我们进一步的目标是下一个世纪的五十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到那时，国家总的力量就大了，可以为人类做更多的事情，在解决南北问题方面可以尽更多的力量。我们就是有这么一个雄心壮志。”^④

世界更需要中国。中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在全国人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的同时，也为世界各族人民带来更大福祉，显示出无与伦比的价值意义。首先，中华文化生命体所根植的物质形态更加丰富和强盛。这不仅造福中国人民，增加了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使文化自信更加坚定，而且和平发展、共建共享的价值观和国际主义精神惠及全球，中国更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根据《环球时报》的数据，2000年至2014年间，中国对外援助的经济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233页。

总额接近美国，达 3544 亿美元；从 2019 年到 2022 年，中国对外援助项目累计超过 8700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 6 万亿元；而近十年来，中国年均对外援助达到 70 亿美元。中国本身是发展中国家，但依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无偿援助、优惠贷款，提供了大量技术、人员和智力支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建成了大批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项目，承担起国际责任，一如既往为维护推动全球发展，维护世界秩序作出自己的贡献。

其次，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的声音、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丝路基金、全球发展与南南合作基金、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等国际发展平台，以国际化的胸怀，深切体察各国发展意愿，并敢于发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心声，代表国际上三分之二的国家，维护世界关键多数的国家权益，要求建立新的国际治理体系，主动参与国际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反对西方国家采取价值先导或者意识形态先行的“一元论”规则进行价值观和文化输出。中国坚决反对“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倡议不干涉别国内政，以开放、包容、普惠、平等、共赢来推动各国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文化交流，互学互鉴。正如麦肯锡咨询公司在 2022 年底发布的报告中说，中国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世界，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增长中为全球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中国贡献的维度日渐丰富，展现出越来越多的大国担当，在国际上发挥更加重要的稳定作用，给世界以确定性、信心和希望。如果说这种责任、担当与文化的品格有关，那么可以说，独立自主、协和万邦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如此独特和坚韧”^①。

最后，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科技的发展，全球化一体化加剧，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地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园，各国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地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只有坚持合作共赢、创新引领、求同存异、万物并育，才能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更大空间。“如果奉行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老一套逻辑，如果采取尔虞我诈、以邻为壑的老一套办法，结果必然是封上了别人的门，也堵上了自己的路，侵蚀的是自己发展的根基，损害的是全人类的未来。”^②中国倡导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命运共同体发展理念，正是一贯秉持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价值观念表达，更是源于中国文化“四海之内皆兄弟”相互平等的主体交往观，体现了中华文化深切关注人类命运的宽广胸襟和天下情怀。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蕴超越了“一国的安全建立在别国不安全之上”的旧安全观，超越了“赢者通吃、只顾自己”的狭隘发展观，也超越了“强势压迫、文化殖民”的霸权文化观。现在，“人类曾经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数次飞

① 陈瑜：《以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哺育新的文化生命体》，《文汇报》2023 年 6 月 11 日。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434 页。

跃，带来了社会生产力大发展，同时也伴生着蜕变的阵痛。今天，世界再次来到这样一个重要历史节点。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潮中，除旧布新必然导致产业变革，这个过程是艰难痛苦的”^①。如果人类不能够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合力克服挑战，命运与共，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不能“成功跨越蜕变”，各国都会丧失发展的新生机、新活力，没有办法给人民带来更好生活、更多福祉。

中国适时提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全新的价值导向，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这是因为，第一，从价值本位上看，这种“新形态”是在文明演进过程中发展壮大的，是以全体人民“人口规模巨大”为覆盖面，将全体人民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目标，将“人”主体重置于价值中心，实现了人的价值本位的复归，超越了以往社会将“物与资本”置于中心的位置，延续人类自身的文明。第二，从价值逻辑上看，资本主义以资本的增殖为最高价值逻辑，最终使社会限于恶性循环的危机之中，常常使文明达到的结果总是同它希望达到的结果相反，出现文明的冲突与撕裂。社会主义“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②的价值逻辑，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消解了存在与本质、自由与必然、个体与人类之间的对立与斗争，使其追求的结果与达到的结果真正形成了逻辑统一。第三，从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形态上看，现实世界所处的文明形态是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它是“既成”的工业化文明形态，尽管它创造世界历史，开拓了世界市场，形成了现代文明城市，带来了生产力的大发展，但它“是依靠征服、对抗、掠夺和奴役得以登场的，资本主义文明并不是人类文明的蓝本，也不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形态”^③。今天工业文明正伴生着“蜕变的阵痛”，世界来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人类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④，推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模式，这种新模式强调“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进步”，任何人、任何国家都需要和衷共济、和合共生。“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文明新形态”准备了现实主体，而“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可憧憬的未来，消除了现实生活中的文化壁垒，消除了人类心灵互动的观念纒繆，打破人们交往的精神隔阂，人人都享有文化滋养，各种文明和谐共生。

如果说文明是不同民族把实践活动镌刻成历史、积淀而成的成绩和结果，那么，文化则是人们创造一切物质和非物质成果的过程。文化常常凝结在物质之中又超乎其外，能够被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⑤。它包含的诸多要素，蕴含跨越时空、超越国度的价值呈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4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87页。

③ 黄建军：《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0期。

④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9页。

⑤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39页。

现，它所具有的深入、系统的传承、发展与进化的特征，使中华文化生命体不仅能够适应当前的全球化环境，而且能够扩展影响力，满足各国人民对文化生命体的研究与探索，更能汲取不同文化的元素和营养，为文化生命体的成长壮大吐故纳新、灌注能量。

总之，中国化、时代化的中华文化生命体，因为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和道义力量，不断增强生机和活力，正气满盈；因为有中国的创新开拓，激发出新的生命因子，其主体性不断提升，激荡出强大的地气和底气。二者的结合是双向的，又是相互赋能的，彰显了中华文化生命体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随着实践的推进，中华文化生命体必将在创新发展中形成新的文明形态，进而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

The Study on the Four Dimensions of Chinese Culture Life Form

Wang Suqi

Abstract: The Chinese cultural life body is a living life body that combines Marxist truth with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chieves each other. The spirit of resistance is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to maintain the continuation of life and genetics, forming the endogenous dimension of the cultural life body. The Chinese cultural life body itself is good at learning and compatible, and it i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ts life body to nurture and thrive. It forms its logical dimension.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life body through absorption, transformation, creation and applic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s the practical dimension for it to maintain its vitality. The cultural value concept of multi-integration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and the world's feelings that pay attention to the common destiny of mankind form its value presentation of beauty, harmony and beauty, marking that the Chinese cultural life body is taking a new form of civilization and becoming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words: Cultural Life; Endogenous Dimension; Logical Dimension; Practical Dimension; Value Dimension

[责任编辑：靳贺]

中华文明和平性：理论意蕴、历史演证 和时代价值

李汶桦 唐垠箫*

【摘要】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文明内蕴的和平、和睦、和谐的价值理念，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和平观相结合，使这一特性拥有了更加深厚的理论底蕴。中国共产党深受中华文明和平性的影响，在社会主义探索与建设初期为中国人民谋求和平的社会发展环境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华文明和平性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对党和国家的内政、外交、国防产生深远影响，走和平发展道路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和平性将继续为创新和平理念、推进和平实践、实现和平愿望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 中华文明；和平性；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① 这一论断的重要价值在于，用“四个决定”深刻阐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的时代价值。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究竟是如何对近现代中国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的，现有的研究成果中还较少涉及，“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为解答这一学理问题提供了直接答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平理念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和平观，从高度“契合”走向深度“结合”，从理论演证走向实践确证，这对于塑造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远意义。

* 李汶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治理、中国外交；唐垠箫，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①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4 页。

一、“第二个结合”丰富了中华文明和平性的理论意涵

中华文明五千多年以来，一直延续着和平、和睦、和谐的价值理念，并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多本著作中，同样对“和平”同样有着丰富的论述。二者由高度“契合”走向深度“结合”，极大丰富了中华文明独特的和平性的理论意涵。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平理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平理念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概括来说，包含“天下一家”的世界观、“兼济天下”的价值观、“和合共生”的安全观等。

一是“天下一家”的世界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一家”的世界观强调人类的共同性和相互关联。首先，“天下一家”的世界观以“天下无外”为认知基础，认为天下体系只有内部性而没有外部性，任何外部性都可以被化为内部性，在逻辑上排除了不可化解的竞争和敌人的概念，超越对立斗争的政治观念。^①其次，“天下一家”的世界观以“天下为公”为价值导向，以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强调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共同命运，追求社会的和谐与公平正义，推崇各路贤达在众人中成长成材。最后，“天下一家”的世界观以“天下大同”为理想目标，认为所有人都应该是平等的，不论其国家、民族或阶级。“大同”被视为玄同合一、物我相融的人格理想。^②同时，“大同”理想寄托了中华民族对“家国天下”与“和合共生”的盼望与追求，成为中华民族不断为之奋斗的精神目标。

二是“兼济天下”的价值观。“兼济天下”的价值观强调追求社会的整体利益与和谐。“兼济”表示兼顾、兼容和平衡，体现了一种全面关注、平衡发展的思想。一方面，“兼济天下”对内表现为高度重视人民利益的朴素民本思想，将民心得失视为统治的根基。“兼济天下”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人民至上、民生至上和公平正义，倡导关注人民的生活水平、基本需求和幸福感，致力于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另一方面，“兼济天下”对外表现为协调共赢的和谐交往思想，最直接表现为朝贡体系。中国历朝历代依靠文化吸引而非暴力征服的方式，中国通过与周边和远方的国家建立朝贡关系，维持睦邻友好的外交关系，实现了各方的利益平衡和共同发展。

三是“和合共生”的安全观。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强调“和合共生”的安全观。“和合共生”包括“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而不同”的认识观与“和衷

^① 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② 参见吴志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华文化基础》，《政治学研究》2023年第1期。

共济”的方法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强调从万物相互联系出发而非孤立片面看待世界的观点，认为整个世界存在有机关联，强调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终极理想是使人通过修养之道，成就理想人格，以共进于大同太平之社会。同时，“和而不同”的认识观直接指出同异事物的根本逻辑，核心强调需同时看到事物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并通过差异性和多样性造就整体性和共同性的力量。而“和衷共济”的方法观出自“夫苦匏不材于人，共济而已”（《国语·鲁语下》），体现协作合作、团结一致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包含“中和”的行世之道和道德规范。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和平观

马克思恩格斯的和平观渗透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方方面面。从整体来看，“和平”不仅仅是消除武装冲突和战争的状态，更是建立在社会公平正义、人类解放和自由发展基础上的一种社会关系和国际秩序。实现和平的关键是消除阶级斗争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及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恩格斯坚定地主张：“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拥护和平。”^①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揭示了和平的本质、必要条件和实现方式，为我们理解和追求真正的和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

其一，马克思主义以人的本质为和平观的立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立足于人类社会发 展实际，科学地认知和阐述和平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始终是以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为立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人类历史的前提和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他们理论研究的归宿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性的，需要与他人互动、合作和交流，构建社会关系。“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和平是符合人类本性的生存状态，人本性是和平的基本规定性。”^② 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通过消除剥削、压迫和不平等的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才能达到真正的和平。

其二，马克思主义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和平的路径。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了战争的本质，同时也揭示了和平的本质，认为战争是对和平的破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人类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而战争是二者矛盾不可调和的暴烈性表现方式。“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消灭。”^③ 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剥削和阶级对立，是社会不平等和不和谐的根源。为实现真正的和平，需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6页。

② 李爱华：《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和平意蕴论析》，《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4页。

要构建一套社会主义制度，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消除私人占有和阶级剥削。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才能真正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为实现和平提供了新的路径。

其三，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和革命为争取和平的方式。和平不仅体现人的本质，也具有阶级性。马克思主义揭示了阶级斗争的本质和作用。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实现工人阶级联合，才能解决社会矛盾，“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联合终究会根绝一切战争”^①。阶级斗争伴随着社会的剧变和革命的发生，通过工人阶级联合实现和平。革命是被剥削阶级为了推翻压迫和剥削的制度而进行的有组织的行动。列宁指出：“被压迫阶级要求得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异化’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②通过革命，被压迫阶级可以推翻统治阶级，建立自己的政治权力，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为实现和平提供必要的手段。

（三）马克思恩格斯的和平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平理念的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③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④马克思恩格斯的和平观能与中国本土文化精神相通，契合具体表现在社会理想契合、实践理性相通与辩证方法互补三方面。

马克思恩格斯的和平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追求的社会理想与价值目标相近，以“和”“合”价值观创造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社会理想的契合是文化间相通与借鉴的基础。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和平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平理念都具有相似的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首要也是最基本的命题就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与之相对应的目标性命题就是共产主义理想。理想性同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和平”是维系社会关系的重要原则和政治目标。从儒家的“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到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等，和平是各派思想家的共同目标。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理念的价值追求，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页。

^②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页。

^③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78页。

^④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8页。

同时包含“和而不同”的深刻内涵，强调“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和平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平理念都在不同层面表现出对人的高度重视。“真正的共同体”与个人的发展直接相关，个人的自由和解放有赖于建立“真正的共同体”。“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①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精神也始终以天下百姓作为社会主题，以民生为重，强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与中华文化的实践经验相互契合，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和平道路的具体实践。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实现哲学革命的逻辑起点，理性是实践的理性，实践是理性的实践。理性来源于实践，实践活动的有效性又离不开理性的指导。实践理性的马克思主义打破古希腊哲学对世界的二元分立、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思维，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现代化历史过程绝不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唯一途径。同时，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在特殊的自然环境、经济模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等条件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文化习惯和文化积淀。中华文化经过数千年的演绎与扬弃，深深地融进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以“天下一家”的世界观、“兼济天下”的价值观与“和合共生”的安全观指导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强调以实践的经验和智慧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中华文化的辩证智慧相互补充，以对立统一与矛盾转化解决和平道路进程中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坚持以发展而不是静止、全面而不是片面、系统而不是零散、普遍联系而不是单一孤立的观点来观察事物，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规律，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满了辩证法思想，从周易八卦到道家文化，再到儒家文化、宋明理学、法家、禅宗等，都包含着辩证法思想。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的对立统一原理和中华文化的辩证智慧中的“阴阳”思想等，都强调事物内部存在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但又相互依存、相互影响。这些都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能够指导我们正确处理各种对立关系，在对立中寻求共同点，推动合作与和谐，实现和平的目标。

二、中华文明和平性的历史演证：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实践

从世界历史角度来看，公元1500年以后的人类历史本质上是世界各国和各地被先后卷入现代化大潮的历史。^②在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间的100多年时间里，世界上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均或多或少地侵略过中国，逼迫中国赔款、割地、开放通商口岸，以及给外国人以法外特权等。中国共产党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1页。

^② 参见王鸣野：《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及国别特征》，《人民论坛》2023年第6期。

成立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为谋求和平的社会环境浴血奋战，开启中国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接续奋斗，中国探索出了一条以和平发展为特色的现代化新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① 这表明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之一，和平发展道路与中国式现代化关系密不可分，中华文明和平性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

（一）社会主义探索与建设初期：以和平理念争取和平环境

毛泽东的和平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进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共产党有识之士在实践的基础上，经过理性思维的加工，打破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与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桎梏，走出了一条工农武装割据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融入人民革命诉求、国家责任和民族担当，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第一，以“斗争求和平”分析和平与战争的矛盾关系，为现代化的初步探索争取良好外部环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把正义的战争与和平的目标辩证地统一在一起，把战争的目的与和平的目标辩证地统一在一起。“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② 毛泽东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③ 以战止战的思想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在最大限度争取和平、保障民生的客观标准和战略目标的统领下，决定如何使用战争手段与和平手段这两种不同属性的战略资源，这对诠释以和为贵的战略偏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把营造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作为新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面临着繁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任务，赢得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对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至关重要。毛泽东指出：“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④ 为此，他认为“今后还应当做更多的工作，争取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使它们更加发展，以有利于世界的持久和平，也就有利于我国的建设”^⑤。他表示：“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68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19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6页。

④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页。

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48页。

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①毛泽东始终基于现实情况,将国家发展利益放在首位,把争取和平环境视为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巩固社会稳定、发展生产和进行经济建设的重要前提。

第三,以“和平共处”为初步探索现代化建设的方针,为现代化建设构建总体稳定的环境。毛泽东多次论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庄严宣告:“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②毛泽东一贯主张,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应当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各个国家的事情应当由各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去管,任何外国无权干涉。1954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明确提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③1955年5月,毛泽东在与印尼客人谈话时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和平为上”^④。面对冷战时期的国际紧张局势,各国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和制度差异,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倡导和平、反对侵略与霸权主义,主张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国际社会建立公正、合理、民主、包容的国际秩序。

第四,以构建“统一战线”解决不同政治力量间的矛盾,巩固现代化初步探索成果。“统一战线”广义上指不同政治力量为了某种共同目标而采取的一致行动,在国际关系中可以表现为同盟或者多种形式共同体等行为。1950年,毛泽东指出:“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⑤为实现永久和平,中国共产党表示愿意和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合作,毛泽东提出了全世界“和平民主力量联合”的思想。20世纪70年代,中国共产党认真分析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审时度势提出“三个世界”的论断,以团结世界上同样受到压迫和剥削的国家和人民、联合全世界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巩固中国在初步探索现代化过程中取得的成果。“统一战线”思想体现了中国强调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达共赢的思维方式。

(二) 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和平思维助力和平发展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形成了一种以求真务实为特点的和平思维方式和实践路径。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46页。

②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页。

③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页。

④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页。

⑤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页。

第一，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的科学论断，使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战争与革命视角向和平与发展视角的重大转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最早是邓小平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基于“中国和平社会主义”的理念，和平与发展问题揭示了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东西方的对抗与世界人民反霸维和的矛盾，同时揭示了世界政治与经济发展两大领域的主要矛盾与发展潮流。在对“和平与发展”主题进行深刻理解后，中国在探索 and 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条内生型与和平性的现代化道路，为希望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与民族提供了现代化的新选择，同时也响应了时代发展的主题。邓小平提出“利用国际和平环境更多地吸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①，并通过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打破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避免陷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争论与冲突，提出“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实践决定论，将中国引向了改革开放的时代。

第二，以“一国两制”方案解决国家统一与发展间矛盾，以和平统一路径助推现代化进程。在现实政策层面上，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平社会主义的理念，“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②，对外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解决周边领土问题，对内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解决国家统一问题，表现了中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极大诚意。一方面，“一国两制”探索以和平方式解决意识形态争端的新路子，被确立为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对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贡献普遍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而两岸和平统一也有利于国家现代化建设。

第三，继承与发展和平理念，以新安全观应对新形势变化。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基本判断，指出“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③，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出了“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④。以对话合作方式处理国家间冲突与矛盾，探索与思考中国如何致力于实现世界和平，丰富和发展了当代中国和合战略文化的理论内涵。进入新世纪以来，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进一步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分析国内外新发展形势的背景下提出“和谐世界”理念，政治上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包容的新安全观，经济上追求互利共赢与共同发展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平观的实质内容不断扩充更新，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和国际合作平台，促进了国内稳定和社会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页。

③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5页。

④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页。

和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新时代和平理论助力现代化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在认识上不断深化，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第一，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新时代和平理念的价值引领。“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共同追求。”^①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极大地拓展了人类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为中国的开放道路和世界各国的发展道路提供了价值观层面的论证。全人类共同价值既有目的价值也有手段价值的性质，既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正确和平理念指引，又为解决人类普遍安全问题开辟全新的实践路径。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实现了更为包容的价值观体系，还为和平理论提供了价值观体系的支撑。这里包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天下为公”等理念，是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贡献。同时，全人类共同价值更是对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追求价值的高度概括，体现出开放与包容的更为宽广的融合，使全人类共同价值成为新时代和平理论的价值基础与价值引领。

第二，在和平理论构建上形成以新型国际关系、全球治理观、和平发展道路三位一体的和平理论结构体系。首先，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理论的关系基础。提倡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代表着中国超越和平崛起的单向论述，丰富了和平发展的内容^②，为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全球治理观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理论的全球落实。中国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三大全球性倡议，为解决世界各国发展不平衡、安全困境和全球治理赤字等问题开辟了道路。最后，和平发展道路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理论的道路实践。中国提出了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道路，超越资本逻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超越两极分化逻辑，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重要目标和主要特征；超越单一物质逻辑，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超越霸权逻辑，将中国的发展融入世界。

第三，以具体实践解决人类普遍安全问题。首先，坚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应对新时代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和国家安全挑战提供行动指南，为国家安全和发展创造有利外部环境，并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安全保障。其次，推动构建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543 页。

② 参见门洪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的责任与担当》，《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 年第 3 期。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人类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思想智慧为基础，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为人类社会共同发展与现代化建设进程指明了方向。最后，以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取代“文明冲突”。中国式现代化超越“文明冲突论”“西方中心论”和“零和博弈论”，紧紧扎根中国土壤，立足中华文明发展逻辑，又牢牢遵循现代文明建构规律，展现出鲜明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强大的涵化力，“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①。

三、中华文明和平性的时代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旨归

中华文明和平性为中国式现代化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积累丰富的经验智慧。中华文明和平性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和平理论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中华文明和平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文化和道德支撑，塑造了和平发展的价值观念和理念。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平理论的实践则为中华文明和平性提供了现实的支持和展示，通过推动和平发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目标，进一步彰显了中华文明和平性。中华文明和平性决定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一）中华文明和平性决定中国式现代化包容互鉴的和平理念

中华文明和平性的历史底蕴与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和平实践，共同促进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自信和自觉。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科学理论内涵，使其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

中华文明和平性为和平发展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指导。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以内部制度创新来化解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不将这些问题外溢到世界，同时与外部世界保持对话合作的关系，实现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共同发展，这就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内涵有二：一是和平发展现代化道路的内部基础。在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问题和压力时，总是旨在通过内部社会活力和制度创新来消化解决，而不是以对外扩张来转嫁问题和压力的方式解决发展瓶颈。二是和平发展现代化道路的外部含义。在世界上走和平发展道路，同外部世界保持对话合作、互利共赢，发展起来后不称霸、不争霸，反对结盟对抗的冷战政治，倡导更多国家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华文明和平性决定了中国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83页。

的和平理论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理论，是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的理论，是不搞党同伐异的理论，更是不搞文化霸权的理论。和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塑造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和平性格、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天下一家的大国气度。

中华文明和平性为和平发展现代化道路提供精神支撑。中华文明和平性包含着人类共同理想的内容，承载着谋求人类解放与世界和平的理念。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展开坚决斗争，开辟一条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许多弊端，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作出新贡献。中国共产党的历次党章都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中华文明和平性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为指导，并将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中华民族传统“和”文化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把握时代大势、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把中国命运与世界发展大势紧紧联系在一起，正确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历史的脉动中抓住机遇、用好机遇，走出一条和平与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和平性特征，在历史进程中保持主动性和先进性。

（二）中华文明和平性决定中国式现代化互利共赢的和平实践

中华文明和平性将和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倡导和平发展、和谐共处的理念，强调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共同发展、相互支持的方式推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中华文明和平性决定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走立足实际与世界发展大势探索出的自身和平发展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

中华文明和平性决定中国谋划和平发展的战略布局。经过中国共产党百年结合、丰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践，当代中国在和平问题上已经形成了科学严密的和平体系，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实践。这一理论体系由一系列外交、国防、战略、国家统一的理论、政策组成，其中以“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为理论基础，以“和平发展道路”为主干，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准则，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国与国关系准则，以“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为国防力量建设准则，以“对话协商”为处理国家间矛盾途径，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为国家统一问题原则。这种和平体系富含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历经一百多年实践，展示了中国和平共处的友好态度，彰显了共生共荣的宽广心胸。在这样的战略布局下，将和平性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就是要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强调军力的防御性质，减少误解和疑虑；就是要通过积极的外交政策，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沟通与合作；就是要通过开放包容的经济政策，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就是要加强文化交流，促进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尊重。

中华文明和平性决定中国始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回答和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时代之间的中国方案，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① 人类命运共同体涵养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生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生长于中国发展的长期实践，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重要时代拓新。一方面，中华文明和平性使“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②，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统文化基础；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和平性又是对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继承延续，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昭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主体范围、能力体系、联合状态，是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时代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就是要始终坚持国际合作和共赢发展，通过多边机制实现各国共同发展；就是要坚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加深人们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认知。

（三）中华文明和平性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惠及全球的和平愿望

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桥梁和纽带，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全人类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结起来，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崇高的时代使命。为人类发展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

首先，中华文明和平性要求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中国将和平发展作为发展的战略方向，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同各国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其次，中华文明和平性要求中国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中华文明和平性始终要求中国把自身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统一起来，顺应历史前进的逻辑，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平等互惠基础上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关系，彰显出古老中华文明的智慧和当代中国的责任担当。中国以开放胸襟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以互利共赢方式与世界各国合作，为各国提供了新的合作机遇，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合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和改革作出了积极贡献。最后，中华文明和平性要求中国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一方面，中华文明和平性始终指引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的作用和维护国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62 页。

^②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 1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86 页。

际法治，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新机遇，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思路，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有益探索；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和平性的主体包容特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摆脱了单一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摒弃了西方国家所谓的“普世价值”，保持了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

四、结语

中华文明和平性扎根于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文明和平性的突出特征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又是对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与弘扬。这一理论体系以和平发展为核心，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旨在推动中国成为世界和平发展潮流中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和平发展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选择，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和平发展道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理论，不仅为中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指引和政策支撑，也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和平性并非一成不变，需要努力维护和不断巩固。只有通过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中华文明和平性。中华文明和平性是我们应当珍视和发扬的宝贵财富，未来我们要继续深入挖掘中华文明和平性的丰富内涵，提出更多中国方案，使之在人类应对风险挑战、开辟光明未来的道路上彰显更大的价值、更强的力量。

Peaceful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oretical Implication,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Times Value

Li Wenhua Tang Yinxiao

Abstract: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remarkably peaceful. The value concept of peace, harmony and compatibility embodied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combined with the peace concept of Marx and Engels, which gives this characteristic more profound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The CPC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peaceful natur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he early stage of socialist exploration and construction, Chinese people

fought hard and indomitably to seek a peaceful soci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In exploring the path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the peaceful nature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been constantly given new connotations of the times, which has 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domestic, foreign affairs and national defense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Taking the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o advance and expand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peaceful natur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ill continue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nnovating the concept of peace, advancing the practice of peace and realizing the aspiration for peace.

Keywords: Chinese Civilization; Peaceful Natur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Peaceful Development Path

[责任编辑：于少青]

论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思维

张晓周*

【摘要】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蕴含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涵，体现着独具中国特色的创新思维，彰显着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这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的重要创新理念与思维有：“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体现了创新思维的综合性；“道法自然”的生态伦理观，体现了创新思维的辩证性；“寄情山水”的生态美学观，体现了创新思维的体验性；“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实践观，体现了创新思维的实践性。这些理念与创新思维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之所以取得成就的法宝，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相结合的智慧钥匙。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3 年 7 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举世瞩目，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显著标志。”^①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效得益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智慧引领，而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都强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维方式与生态价值。深入挖掘后，我们发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

* 张晓周，哲学博士，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① 《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 年 7 月 19 日。

内涵与思维方式。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独具特色的思想意蕴与创新思维推动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开创性工作”,彰显着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并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结合提供智慧支撑。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为世界气候治理与环境保护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借鉴,而传统生态理念与创新思维为中国从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生态自然观

环境破坏与生态问题的出现主要是工业化进程中过度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的,而在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往往对自然界进行宰制与统治,使得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紧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集中体现为“天人合一”的理念与思维方式。

(一)“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

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讲道:“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①“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识与总结。用传统“天人合一”解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把生态文明思想植根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使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对天人关系的探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古老、最重要的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人、天、地三才并生一体的和合结构;老子建构了人、地、天、道的“域中四大”(《道德经·二十五章》)体系,主张人要效法天地自然;庄子讲“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董仲舒主张“以类合之,天人一也”^②;张载明确提到“天人合一”^③的命题;王阳明进一步强调了程颢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④。“天人合一”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与特征的概括与升华,更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⑤。传统“天人合一”思想既承认人在天地自然中的地位,又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使人与自然达到了动态的平衡与和谐。把“天人合一”引入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说明人在自然中所应确立的角色与地位,人应当顺应、辅助自然生态的循环转化,人要与自然万物一体共存、同体共生。

①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347页。

② (清)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20页。

③ (宋)张载撰:《张子正蒙》,(清)王夫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264页。

④ (宋)程颢、程颐撰:《二程遗书》,潘富恩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64页。

⑤ 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国文化》1991年第1期。

马克思同样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甚至把自然视作“人的无机的身体”。他说:“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①马克思看重作为感性有机生命的人,而自然界是无机的,在有机生命与无机自然界之间,马克思运用“无机的身体”把自然界与人统一为一个整体,人与自然界是一体的。尽管人是有机体的生命体,但人需要从自然界中获取空气、水等无机物作为生命构成要素的一部分,从而成为完整的人。有机、无机统一于人,人也完成了对自然与社会的统一。马克思把人与自然作为统一整体的观点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张人同自然万物为一体的观念相契合,这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内容。

(二) 生态自然观体现了创新思维的综合性

“党中央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②这个“突出优势”到底是什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思维就是“突出优势”之一。已有学者指出这种思维具有革命性^③,这种创新思维又被命名为“象思维”,以便与西方哲学主流的概念思维相区分,并且毛泽东在论述矛盾论与辩证法时就吸收、运用了象思维。^④象思维具有原创性与革新性,因此也可称为创新思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⑤发展观的深刻革命,需要创新思维的引领。这种创新的象思维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表现出了综合性、辩证性、体验性与实践性的重要特征,是生态文明建设得以成功的重要保障。

生态自然观体现了创新思维的综合性。把生态自然与人类社会统合起来,是象思维的优势所在,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凸显了创新思维的统合功能。习近平总书记提到“金木水火土,太极生两仪,两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6页。

③ 参见郁庆治:《中国生态文明的价值理念与思维方式》,《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第1期。

④ 参见王南湜:《重估毛泽东辩证法中的中国传统元素——从中西思维方式比较视角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95页。

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循环不已”^①，这是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太极五行的整体化生、系统循环思想来论述“生命共同体”。太极、阴阳、五行是中华文明象思维的典型代表。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先哲以天地山泽水火雷风等八种自然物象，来论述生态自然与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与特征，用于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习近平总书记继承该理论与思维方法，取象比类，创造性地发展出人与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生命共同体思想，人与生态各要素的命脉关系，以及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循环链条。“山水林田湖草沙”与“天地山泽水火雷风”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是以“象”“物象”为基本的思维单元。前者构成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命共同体”，而后者则诠释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野中的宇宙大生命。物象与物象直接在时空中关联，并未被抽象为分割的概念，这是“象思维”与“概念思维”的重要区别。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历史观也蕴含着象思维的方法。传统经典中主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贲卦》）。自然界的日月昼夜交替，向人们呈现着天文气象、生态物象；先哲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建构了敬畏天文生态、重视人文教化的中华文明。把天文生态与人文化成有机贯通起来，是象思维把天与人统合起来的典范。没有天文也就没有人文，没有生态也就没有文明，中华文明正是建立在自然生态万物之象的基础之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文明的复兴，这种文明既能兼顾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各种复杂关系，又有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天下一家、地球是生命共同体的大国智慧与创新精神。象思维能够为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整体思维与统合能力。中华民族把生态自然各个物象统合起来，整体而系统地建设生态文明，走出一条创新之路，引领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在生态文明建设中需要综合、整体与系统的创新思维，“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也无不彰显着综合性、整体性与系统性的创新思维。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生态伦理观

中华民族历来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强调人类要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进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这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道法自然”的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道法自然”的生态伦理观。

（一）“道法自然”的生态伦理观

“道法自然”出自传统经典《道德经》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55页。

自然”，是指人类的认知与实践要取法、效法、敬畏天地自然的法则，要合乎天地自然的规律。人类与大地、天、道共同构成了宇宙大自然生态。尽管“道法自然”出自道家，但是儒家先贤也有“道法自然”的追求。周敦颐和程颢为北宋著名哲学家，他们尊崇自然，敬畏万物，留下了“窗前草不除”的历史佳话。《宋元学案》记载程颢不仅不除窗前草，而且养了数条小鱼，经常去观赏它们，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欲观万物自得意。”“万物自得意”就是一种“道然自然”的精神追求，顺应、遵循自然万物自身的规律。自然万物同样具有生存、存在的权利，人类不能仅仅为了自身发展而违背自然规律、过度破坏自然。人类社会是天地自然的一部分，与生态自然法则、规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但是因为人类认知与实践的局限性，时常出现违背天地自然的规律与法则，这就是人类的“妄为”。在人类“妄为”与生态平衡、万物有序运转之间就产生了一种紧张与矛盾，而道家智慧就是努力在寻找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出路就是“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就是“不妄为”，在不妄为的前提下作为，进行生产、生活实践。

“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①包括生活、生产实践的“人类计划”，必然要遵循自然规律，否则就是人类的“妄为”。这里的“灾难”就是人类“妄为”所造成的。“妄为”在当下体现为“人类中心主义”，具体表现为西方哲学中“人是万物的尺度”、康德式“人为自然立法”的观念以及人类施加给自然的过度实践活动。“人类中心主义”只会导致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宰制、任意开发与肆意破坏，这就是工业文明时代的思想范式与实践模式。“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在自然万物之中的绝对领先、优越地位，实际也是人的自我意识对自然万物的统治。马克思批判抽象概念、资本对人的统治，这也可视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人类对自然万物的无情统治，使自然万物处于异化的状态，而导致了危及人类生存的恶果。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②人类之所以会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是因为人把自然界视为任意宰制破坏的对象，人并未对自然规律具有清醒而理性的认识。在恩格斯的笔下，自然似乎成为有情感的生命体，对人类的傲慢态度与破坏自然的行为进行“报复”。如果想要改变这种情况，就要对自然界心存敬畏，以合乎自然的逻辑开发、利用自然，才能避免自然界对我们的报复，而这就需要“道法自然”的生态伦理观。“人类中心主义”是导致生态危机、环境恶化的重要思想根源，因此，破解“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观念与思维定式成为化解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前提与路径。“道法自然”的生态伦理观将会有力地变革、转化“人类中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9～560页。

主义”的思想范式与实践方式，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思想与实践的智慧力量。

（二）生态伦理观体现了创新思维的辩证性

上文提到的象思维，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该辩证法并非以“概念”为思维单元，而是以“象”为思维单元，可称为“象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典范的毛泽东辩证法便是吸收、运用了“象辩证法”。毛泽东辩证法是以抽象、思辨、重分析为主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思维”与以直悟、类推、重整体为主的传统“象思维”相结合的产物，是两者的“综合体”^①。由此看来，利用“象辩证法”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优良传统与文化基因的体现。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②，就是对“象辩证法”最具创造性的发展与推进。“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并非抽象的概念，它们的具体生动的物象。传统象思维的重要特点是“立象尽意”，通过具体物象来表达深刻的意义与内涵，从生存境遇中认识不同物象的辩证关系。“绿水青山”指向生态环境，“金山银山”指向经济发展。两者并非在概念上达到了辩证统一，而是在现实的生存态势与发展情境中获得了对立统一。朱熹在论及天人关系时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于天也；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③天与人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即”字很好地表达了这种辩证关系。自然生态属于天的范畴，而经济社会归于人的范畴。“天即人，人即天”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属于同类哲学命题。“即”“就是”所关联的两个物象表面上看是不相关的，甚至是相反的，但在实际的生存实践中是能相互转化，是辩证统一的。像这样以“即”“就是”关联起来的自然物象与社会物象是对“象辩证法”的最佳诠释。

西方的“生态中心主义”是在批判与变革“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而形成的哲学流派。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极端。如果“生态中心主义”一味地强调动植物的权利与生态的自身价值，这样就会限制人类的生产与生活实践活动。那就是只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这显然不适合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国情与发展情势。“道法自然”的生态伦理观辩证地对待“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并且超越了两者，是要在人类与自然生态之间找到一条居中守正的平衡发展道路。这更加符合生态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更加适合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之路，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多次地论述“道法自然”生态伦理观的深刻原因。

① 王南湜：《重估毛泽东辩证法中的中国传统元素——从中西思维方式比较视角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9页。

③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472页。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生态美学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体现着中华民族对“自然”之真的认识，而“道法自然”生态伦理观体现着中华民族对“自然”之善的洞见。除了对“自然”真与善的把握之外，中华民族更有对“自然”之美的永恒追求，这就体现在“寄情山水”的生态美学观中。

（一）“寄情山水”的生态美学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应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山峦层林尽染，平原蓝绿交融，城乡鸟语花香。这样的自然美景，既带给人们美的享受，也是人类走向未来的依托。”^①山青水绿的生态环境能够给人美的享受，这属于生态建设的美学范畴。面对土地污染、重金属和水污染的现状，习近平总书记用传统诗句中的怡人意境来回应这些生态危机，他引用苏东坡的“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借用范仲淹的“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等，勾勒自然环境本来的面貌。这是对现实环境被污染的反衬与比照，同时也是建设生态环境所应努力的方向与目标。乡情美景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部分，要让诗情画意融入现代化的生活、生产当中。传统社会追求一种诗意的生存方式，这不同于当下被工业化所主导的现代性生活。谋求一种感性诗意与现代化场景的平衡，是把传统诗意、美学的生存方式融入现代化的生活当中、融进生态文明建设之中。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好山乐水、寄情山水的生态美学传统。儒家讲“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把人的仁爱之心与智慧品格与山水关联起来；道家主张向水学习，因为“上善若水”（《道德经·第八章》），水有滋养万物而不争功的上善之德。文人骚客更是创作了无数美丽的诗篇与画作，把中华民族对美的追求表现得淋漓尽致。钱学森就设想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美学运用到“山水城市”建设之中，他计划把中国山水诗词、中国古典园林建筑和中国山水画所蕴含的生态内容用于克服和弥补工业化进程中城市建设的弊端与不足。中国山水诗词、中国古典园林建筑和中国山水画集中体现出来的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美学追求。“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②对生态之美的追求就是人民重要的美好生活需要之一，中国山水诗词、中国古典园林建筑和中国山水画能够为城市、乡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贡献生态美学智慧。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74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9页。

中国人自古就有诗意浪漫的精神气质，不论是“嫦娥奔月”的传说，还是与田园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活追求与态度，都要在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因此，生态美学观应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纯粹工业的、异化的物质生产过程，它理应需要有人对美的诗意的精神追求与人文关怀，这也更符合服务于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的价值理念与实践路径。

（二）生态美学观体现了创新思维的体验性

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①。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就是要让人民对生态环境有好的体验、愉悦的感受、美的享受，使人民对优美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分与持久。工业文明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人被概念思维、工具理性所固化、所异化，仅用功利眼光来审视、评价周围的事物与生态环境。人对他人、对社会、对生态自然缺乏体验情感，没有同情之心，就不会有尊重自然、敬畏规律的态度与观念。尊重与敬畏是基于体验而产生的情感。而中国的象思维注重感悟、体验与情感，能够表达一种因仁爱自然万物而与万物构成生命共同体的体验。宋代大儒张载强调“乾父坤母”“民胞物与”^②，就是基于象思维而体会出天地自然是滋养人类的父亲、母亲。这是象思维的取象比类，可以视为一种典型的体验式情感表达。如果人类能够把生态自然视作人类的母亲，那么就会尊重自然。从用概念把握自然，用工具理性分析认知自然，到对生态自然的体验与尊重的转化，都需要象思维的参与。

中国传统诗歌更是体现了象思维的体验特征。上文所引用诗句中就有很多意象，比如云散、月明、天容、海色、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层林尽染、蓝绿交融、鸟语花香等。甚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沙是命运共同体”中的“山”“水”等都是要通过体验而领会的意象。象思维讲究“立象尽意”，意象必然需要通过体验才能领会它们的深意，这个“意”就是需要通过体验而获得诗情画意、一种美的享受与感受、精神的愉悦。西方现当代哲学从概念思维传统到“生存转向”，从纯粹思辨转向生存体验，也是对体验的追求，更是向中华文化象思维的靠近。崇尚道家思想的现象学家海德格尔在反思现代技术对人的异化、工业文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的基础上，引用并大力地阐发了诗人荷尔德林的理念——“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③。“诗意地栖居”追求回到人与自然本真关系上，强调体验与生存在哲学中的重要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72页。

② （宋）张载撰：《张子正蒙》，（清）王夫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254页。

③ [德]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5页。

价值。真正衡量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不仅是从物质、制度层面去评价，更要从是否对他人友善，是否对其他民族和平相处，是否对自然友好敬畏的层面进行考察与评判。如果能对他人、自然有感同身受的体验，那么也就不会发生对他人、他族与自然的无情冷血式的伤害与破坏，也才能真正实现对生命之美的追求。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生态实践观

中华民族重视“知行合一”，重视生态实践。在把握了“自然”的真、善、美之后，我们就把这种认识运用在生产与生活实践当中，这体现在“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实践观上。

（一）“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实践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是生态文明的真谛。”^①“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实践原则，出自唐代政治家陆贽的《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入为出，虽遇灾难，下无困穷。”^②自然界能够提供的动植物、非再生资源都是有一定规模数量的，人类所能生产的产品也是有其限度的。因此，在开采、挖掘自然资源时就要有一定的限度与节制，这样才能保证资源的充足与可持续利用。这就是要在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画一道红线，不允许超过这道红线。在工业文明的视角下，为了一味满足经济发展、人类的欲望，生态资源与环境被无休止地开采与利用，已经超出了自然界能够承载的最大限度，因此产生了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的后果。“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度”的智慧把握与拿捏，它是对“过”与“不及”的双重超越，是一种“守正”不偏的智慧。正是因为自然万物都有其度、有其限度，才要采取“知止不殆”“勤俭节约”的实践准则。人类只有将自己的行为“止”于自然生态的限度之内，才能走上真正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发展道路。

为了保证“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实践观，必然要借助制度与法度的约束。《周礼》记载周朝存在“以九职任万民”的制度安排与职业划分，“九职”中有六职与生态环境相关。宋代大儒程颢强调加强“六府”“五官”“虞衡之职”的制度安排，用以保护材木、水产等生态资源，如此才能取得“变通长久”的良好生态效益。周朝的《伐崇令》规定：“毋坏室，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尽管《伐崇令》是军事纪律，但却具有“环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75页。

^② （唐）陆贽：《陆贽集》卷二二，刘泽民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63页。

境保护法”的性质，亦是中国先哲运用法律强制措施来保护生态环境的典范。古时的“虞衡制度”和《伐崇令》成为生态文明中法治与制度建设的重要借鉴，运用严格制度设计、严密法治措施成为保护生态环境的强有力手段。

“软性”制度是指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这些“软性”的规定就是道德文化、礼乐教化对人长期影响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化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矛盾，必须依靠文化的熏陶、教化、激励作用，发挥先进文化的凝聚、润滑、整合作用。”^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道德原则与礼仪规范，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与礼仪就是为了使人更好地与他人、自然、社会相处。传统道德与礼仪可以转变为新时代的生态文明规范，继而在生产、生活中教化人、感化人，提升人的生态道德和行为准则，加速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二）生态实践观体现了创新思维的实践性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实践观的核心在一个“度”字。“度”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强调的“中庸”之道、“中和”之法。“中庸”“中和”的实践智慧是建立在对天地万物之流动、变化之象的动态有机地领会基础上的。这种实践智慧具有时空一体性，怀有忧患意识，重在长远考虑，而不会只顾眼前，不谋求未来。中华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是囊括天文、历法与地理在内的有机实践论，比如“二十四节气”就是农业实践的文明成果。生态实践观与农业文明具有天然亲和性，它不同于工业文明宰制性发展观。在生态文明中，无论是绿色发展理念，还是绿色科技，包括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都是要改变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与工业革命的既有思维范式与发展模式，并向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人与万物互联为一的创新思维与实践观念的转变与提升，这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所在。

马克思哲学是现代实践哲学的典范，它既不同于传统的本体哲学，也不同于主体哲学，它与中国哲学的实践特质关系更为密切。^②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也是象思维的重要特点，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结合的重要原因。以经学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以经世致用为旨归的，是具有鲜明特色的实践哲学。在经学中，礼乐教化与法律严惩相互配合，以达到经世、治世的理想。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③ 对于生态实践来说，同样如此。一方面，需要运用礼乐教化、道德规范对工厂企业、百姓民众进行引导；另一方

① 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9页。

② 参见王南湜：《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三重意蕴》，《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③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98页。

面，用严格的法律制度、政策规定来惩罚破坏生态环境的生产者、经营者乃至消费者。由此，就能形成一整套的制度措施来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良性推进与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所蕴含的深厚思想资源与创新思维，必将为中华民族引领世界发展提供智慧支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理论基础，为中华民族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实践经验。

总而言之，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应在天地自然之中进行认识与实践，人和自然具有紧密的互动关系，而非单方面地对自然进行任意宰制与肆意统治。从“天人合一”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天”之自然相对于“人”具有明确的优先性，而人并非完全处于自然的中心地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理应超越西方工业文明，这就需要把“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道法自然”的生态伦理观、“寄情山水”的生态美学观和“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实践观纳入其理论架构与实践当中。这些理念运用于实践能够不断超越西方的工业文明进程，并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革故鼎新”的创新思维。唯有如此，才能改变西方工业文明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错误认识与不适宜的生产、生活实践方式，才能创新性地变革发展方式，有效地建设与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具有五千多年深厚底蕴的中华民族正是因为不断地进行自我革命与转化创新，才保证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先进生态理念与创新思维必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透显真理光芒，贡献时代价值。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ve Thinking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Zhang Xiaozhou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a thousand-year project concern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China's ecological progress is rich in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reflecting innovative thinking with uniqu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highlighting the outstanding innovation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This is a prominent advantag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essence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provides important innovative ideas and thinking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hich includes: the ecological nature view of “harmony between nature and man” reflects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innovative thinking; the ecological ethics of “Tao law and nature” reflects the dialectic of innovative thinking; the ecological aesthetic view of “caring for mountains and rivers” reflects the experience of innovative thinking; the ecological practice view of “taking with degree and using with restraint” reflects the practicality of innovative thinking. These ideas and innovative thinking are the magic weapon for the succes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y are also the wisdom key to the combination of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Key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novative Thinking

[责任编辑: 于少青]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价值^{*}

杨晓娟 姜红明^{**}

【摘要】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超越了欧美发达国家现代化范式，也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突破，同时创新了新兴市场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创造了人类新的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既基于自身国情又借鉴各国经验，既传承历史文化又融合现代文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功，不仅让现代化发展成果惠及 14 亿多中国人民，而且对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有着不可替代的启示意义，对人类未来发展也有着重要引导价值，是中华民族奉献给历史与时代独特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世界价值

现代化是一个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世界现象，是通过经济全球化而由西欧国家扩展到全球的历史进程，世界各国都在自觉或被动的历史进程中走向现代化。然而，由于历史、文化和国情的差异，世界各国进入现代化的方式并不一样，起步有早有晚，动力源泉或内或外，但同一类型国家又有着一些共同特征。西方国家以对外殖民掠夺、对内剥削人民方式开始其现代化进程，在技术革命的加持下较早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进程（以工业化为核心），目前正在完成第二次现代化进程（以信息化为核心）。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的人口大国，以非剥削、不掠夺、无殖民的社会主义方式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并逐步开启第二次现代化进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的现代化历史飞跃，改写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形

^{*} 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思想政治理论课）“新时代思政课讲好中国故事的有效表达研究”（项目编号：22Z088）阶段性成果。

^{**} 杨晓娟，博士，武昌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姜红明，武昌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成了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全新文明形态，拓展了希望保持国家独立又能实现经济富裕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一、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全面超越以往世界现代化图景

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我们党领导人民在追求现代化的奋斗中，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②。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超越了欧美发达国家现代化范式，不同于苏联现代化发展模式，也与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相异，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

（一）中国文明新形态超越了欧美发达国家现代化模式

世界现代化进程肇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英国以纺织业技术革新为开端，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为枢纽，最终在生产领域建立了机械工业部类。随后，英国以“圈地运动”方式依靠对农民的剥夺完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以榨取工人剩余价值方式获得超额财富，以殖民扩张方式掠夺世界资源并建立世界市场，以资本输出方式建立国际分工体系。英国工业化建设的成功，使之率先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并随着殖民掠夺和“日不落帝国”的形成，逐渐将全人类卷入到现代化进程中来。英国工业的发展也刺激了欧洲大陆资本主义的发展，荷兰、法国、意大利、德国等西欧国家也迅速走上工业化发展道路。美国独立后，建立起彻底的资本主义制度体系，更有力地促进了美国工业社会的形成。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也仿效英国建立起君主立宪制度，开始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发展，造成工业资源约束日趋紧张，世界市场瓜分矛盾进一步突出，最终在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面前演化成世界性战争，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重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依靠其历史上侵吞的财富优势，建立起有利于西方的国际经济秩序，依靠其科技先发优势打造“价格剪刀”继续收割落后国家“韭菜”，依靠强大军事实力和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2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4页。

对全球资源的掠夺来保持其现代化领先水平。欧美国家的工业先发历史和依靠战争、殖民、掠夺获得财富,使它们率先实现了现代化,过渡到现代国家行列,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一批发达国家。

中国在早期与西方工业文明痛苦碰撞中,虽然不断向西方学习,从技术、工业、制度到文化,乃至社会生活,不断模仿和追随西方现代化,但得到的是一次次惨痛失败的教训。直至中国共产党率领人民历经28年不屈斗争建立起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探索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发展规律,中华民族才展现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现实国情、发展水平、国际环境和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我们不可能走西方依靠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来实现现代化。如何把一个贫困落后、人口众多、基础薄弱、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工业国家,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面临的巨大难题。70多年来,我们党带领人民抢抓机遇、不懈创新、开拓进取、接续奋斗,在曲折探索中不断升华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最终成功开辟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鲜明特征。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通过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并联发展,促进国家现代化持续、快速、健康提高,缩短了发展时间,也杜绝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城市病”“社会病”滋生;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格局,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条件,打破了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规律;通过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较完善的制度基础,避免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撕裂、族群对抗和政治极化;通过实施精准扶贫战略,让中国人民历史性地告别了绝对贫困,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杜绝西方现代化中两极分化现象在中国的发生;通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彰显人民至上价值旨归,让人民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突破了西方现代化过程中“资本至上”逻辑;通过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全体人民意志,跳出了西方现代化的物质主义陷阱;通过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提升科技创新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支撑作用,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摆脱了西方国家凭借科技优势对我实施脱钩断供和极限施压的威胁;通过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强大军队和巩固国防,确保我们不再吞下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苦果;通过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出了人类中心主义误区;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各国发展实现双赢和多赢创造更好条件,突破了西方现代化历史中“国强必

霸”魔咒；通过党的自我革命特别是强力正风反腐，增强了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纯洁性，打破了世界上一些老党大党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中国式现代化极大丰富了现代化的实践内涵，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的独尊定式，形成了有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全新方案，打破了只有遵循资本逻辑才能实现现代化的神话，突破了只有通过战争、掠夺和霸权才能富强的西方现代化路径，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固有的两极分化弊端，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范式的根本性超越。

（二）中国文明新形态突破了苏联现代化的发展范本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苏联随之诞生，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地以非剥削制度代替剥削制度的伟大社会实践。西方国家企图扼杀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对苏联不断实施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颠覆和文化渗透。特别是二战后，西方国家还结成阵营，对苏联进行全面“冷战”。面对外部强大的军事经济压力，苏联采取了赶超型的现代化发展方案。苏联在政治上采用高度集权体制，党政不分，个人集权，实行领导职务终身制、干部等级授职制；经济上建立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经济体制，生产资料公有，实行按劳分配，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发展；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以剥夺农民的方式发展现代工业。这一模式短期内有利于集中有限人力物力，调动一切资源开展现代化建设。事实上，苏联在其现代化建设初期曾取得惊人成就：仅用12年就基本完成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飞跃，工业总产值超越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法国和德国，一度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同时在教育、科技、文化方面也都走在世界前列，充分显现出苏联模式在现代化建设方面的短期优越性。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缺乏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而苏联具有与我们相同的意识形态、相近的国情、相似的国际压力，苏联的现代化建设又取得巨大成功，因此借鉴苏联模式来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在当时几乎是一种必然选择。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模式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也的确发挥了重要启动作用：国家兴建了大批重点工业企业，交通运输业发展迅速，国防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凭借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我们有效打破了国际封锁，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安全稳定的环境。我们选择苏联模式，也得到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认同，从而融入了东方社会主义阵营，获得了社会主义国家大量援助，加速了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1950年至1956年，我国社会生产在经历抗美援朝这样的重大战争时期仍然得到了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建立。但苏联现代化建设模式的弊端同样是显而易见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模式忽视了价值规律作用，最终导致经济结构失衡。国家经济经过一段时期快速提升后就陷入活力不足状态，发展出现僵化甚至停滞状态，阻碍了经济现代化水平的持续提高；国家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以党代政，造成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权力寻租现象突出，导致人民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政治现代化进程再次受阻；片面发展重工业

造成资源极大浪费,并直接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不到有效体现,促进国家现代化的动力开始下降。诸如此类问题,显示出以苏联模式实现现代化,在中国也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就提出“以苏为鉴”,寻求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来实现现代化,并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全面突破了苏联模式影响和“左”的思想束缚,最终走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摆脱了苏联模式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再采取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而是建立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紧密结合、实现优势互补的现代经济体系;不再将国家权力集中于少数领导人手中,而是以党内民主促进人民民主,充分彰显人民至上理念的现代政治体系;不再是权大于法、以言代法的人治模式,而是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国家治理水平不断提高的现代法治体系;不再是片面地以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推进现代化的模式,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总体布局。中国式现代化不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超越了苏联的现代化模式。

(三) 中国文明新形态创新了新兴市场国家的现代化道路

二战后,大批殖民地摆脱宗主国统治,成为新兴的民族主义国家,并开始探索本国现代化发展道路。部分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明显成功,跻身以西方世界为中心的现代国家和地区行列,亚洲“四小龙”、南美诸国、中东石油国家、南非、俄罗斯及东欧部分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各有特色,成就引人注目。亚洲“四小龙”在1970—1990年利用发达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机会,大量吸引西方资金和技术,利用本地廉价劳动力优势成功跻身发达地区之列;石油国家中的沙特、阿联酋、阿曼、科威特、卡塔尔、委内瑞拉等国依靠特有资源禀赋获得了巨额财富,但这些国家大多还没有完成第一次现代化。伊朗、伊拉克等国一度借助石油资源强劲推进现代化进程,建设成就也十分耀眼,但最终其现代化进程因战争中断。南美的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哥伦比亚和智利等国在20世纪中后期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推进现代化建设,虽一度取得较大成就,但由于社会分配不均,造成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最终陷入经济衰退的“拉美陷阱”;亚洲“四小虎”曾学习“四小龙”经济现代化方式,也取得过较好的发展成绩,但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惨遭摧残,至今仍步履蹒跚;东欧国家早期采用苏联模式推进现代化未获成功,在政治剧变经济转轨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及波罗的海三国依靠大量举债获得了较明显的经济成就,现代化发展水平也达到高收入甚至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继承了苏联主要遗产的俄罗斯则在现代化进程中一波三折,至今未能完成;南非现代化起步于殖民时代的“矿业革命”,二战期间及战后,其制造业发展势头良好,并建立起较发达的现代工业体系,成为南半球工业化程度最高

的发展中国家。然而，由于长期的种族隔离政策诱发黑人运动，南非社会动荡不安，现代化建设出现曲折。1994年黑人领袖曼德拉执政后虽曾取得一些经济建设成就，但曼德拉政府及其后任对黑人人权的过度保护和宽松的移民政策，导致种族矛盾加剧和排外事件不断，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其现代化进程曲折多难。

总体看，在新兴市场国家中，亚洲“四小龙”是真正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其他国家则在现代化进程中曲折徘徊。亚洲“四小龙”因人口少而经济体量不大，易受国际市场影响，现代化发展仍然充满各种未知风险。各新兴市场国家在政治方面主要采取威权主义体制推进现代化进程，因而政治安全状态易受国家领导人个人能力、素质和决策影响；在经济方面大多采用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结果造成贫富分化加剧、外国资本控制本国经济、社会动荡不安；在文化领域则出现西方文化大肆入侵，引发本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严重冲突。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既吸取世界各国现代化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一些成功经验，又保持本国鲜明特色，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各自长处，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种种机遇，成功实现了第一次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既具有世界现代化的一般特征，更有着本国鲜明特色，保持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主权的独立，取得了现代化进程中政治长期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巨大成就，同时推进了社会共同富裕，是一条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

二、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示了人类现代化的全新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对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一条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是能让后发现代化国家既保持自身独立又能快速实现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为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

（一）抓住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问题推进国家发展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党在深刻反思“十年动乱”违背发展规律、脱离经济发展而使国家现代化建设遭受严重挫折的历史教训中，最终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始终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取得了巨大成就。邓小平反复强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会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①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跨越的历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页。

史经验充分说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是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根本途径，未来我们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仍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①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也应当始终遵循这一规律。没有经济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其他方面的现代化。

（二）不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采取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各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大难题。西方国家率先实现现代化，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产生“现代化即西方化”的认识误区。西方现代化道路曾经充满战争、掠夺与奴役，今天依然经常发动战争维护其霸权地位，依靠科技经济优势欺压和剥削别国人民，发展中国家既不具备走这种道路的能力，血腥的现代化道路更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在一些国家发展彷徨之际，西方精英曾为它们开出“华盛顿共识”的现代化“药方”。1990年，当一些债务缠身的拉美国家急需进行经济改革，一些政治剧变后的东欧国家急需进行制度转轨时，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提出以“休克疗法”作为激进转轨的政策工具，以自由化和私有化为取向推进各国经济社会改革。其结果是造成拉美国家陷入发展陷阱，东欧国家债台高筑，各国政府管控乏力，外国资本趁机攻城略地，一些国家人民深陷困难，经济两极分化，政治腐败严重，社会动荡不安。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努力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艰苦奋斗，全面改革，主动创新，大胆试验，逐步开放，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形成了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北京共识”，创造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基于本国国情而探索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因此，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首先就应当清楚本国国情，按照本国特点探索和发展现代化，绝不能盲目仿效和照搬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一些落后国家照搬西方政治经济模式来推进现代化，已经反复被证明是失败的。

（三）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全面进步

中国式现代化是造福人民的现代化。推进现代化，必须增进民生福祉，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我们既注意发展的重点，又重视各方面的协调发展。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在筹划以工业化促进现代化发展战略时就提出了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四个现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9页。

代化”目标（1954年提出，后于1964年将“交通运输业”转换为“科学技术”）。随着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我们党将现代化建设的内容由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不断提升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平衡性，促进经济与社会持续、稳健、和谐发展，推进人民共建、共享、共富，极大提高了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特别是精准扶贫战略，让全体中国人民历史性地告别了绝对贫困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后发现代化国家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发达国家现代化水平，就不能走西方线性发展、渐次发展的串联式现代化道路，而应采取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叠加发展的并联模式。中国并联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促进了社会平衡发展，也实现了“时空压缩”条件下对西方的“换道超车”，以较短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近200年才完成的第一次现代化进程。这些宝贵经验对于未摆脱欠发达状态的国家代化建设事业而言，无疑有着不可忽略的历史借鉴意义。

（四）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确保国家稳定社会和谐

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政治架构大多采取威权主义模式，国家权力集中于单一领袖或政治精英阶层。威权主义虽有利于集中国家力量来强力推进现代化进程，但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成为腐败温床，最终往往导致社会动荡甚至引发战争。中国在推进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大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发挥协商民主与选票民主的各自优势，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在中国政治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党把反腐斗争始终放在突出位置，坚持刀口向内，全面正风反腐，以自我革命方式努力提升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坚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一体化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建设，确保党风政风清明，政府廉洁高效，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展，让执政党在人民心中有良好形象和崇高威望，从而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现代化建设得以在社会稳定的条件下顺利进行。

（五）努力营造有利国际环境促进共同繁荣

中国人民自古热爱和平，“和”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今天搞现代化建设，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党对内追求建设和谐社会，对外追求维护世界和平。中国现代化建设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获得的“和平红利”。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对外关系，独创性提出“一国两制”方式来解决香港、澳门等历史遗留问题，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倡议解决国际争端，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来推动各国共同发展，始终按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确定中国外交立场，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

律平等，反复阐明中国永远不称霸，率先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坚定扩大对外开放，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并通过中国的发展来推动世界的繁荣，而不是以邻为壑，以牺牲别国利益来发展自己。当然，任何国家也不能强迫我们吞下损害中国主权和发展利益的苦果，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原则立场。我们在推动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来推进现代化，同时欢迎别国搭乘中国发展的“便车”，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出现各种曲折，缺乏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往往是重要原因之一。有的国家的重要主权也受西方大国控制，也有少数发展中国家搞地区霸权主义，冲突和战争经常发生，现代化建设也就难免出现波折。中国的和平外交经验与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如何推进现代化发展也同样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三、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人类未来发展具有深远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基于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既基于自身国情又借鉴各国经验，既传承历史文化又融合现代文明，体现了我国现代化发展方向，也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创举，不仅破解了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共同问题，而且也打破了“现代化即西方化”的路径依赖，为人类整体实现现代化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

（一）中国文明新形态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而这种变化发展有其内在客观规律。人们不能改变或废除这些规律，但可以在实践中认识、掌握这些规律并在实践中遵循和利用这些规律来改造社会和获得自由。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同样有其特定的历史规律，但对现代化规律的认识受认识水平的约束，运用这些规律还受特定利益及历史条件的影响。中国在几十年时间里走过西方几百年现代化的历程，实现从贫穷落后到繁荣富强的历史蝶变，是在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中完成的。作为全球性运动的现代化，其方式多样性是历史的必然。根据本国国情寻找自身现代化发展道路，是现代文明应有的特征。20 世纪的西方式现代化虽然让少数国家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但也导致世界危机不断，战乱不休，发展失衡，贫富分化，社会失控。我们党深刻洞察资本主义现代

化方式的弊端，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和基本国情，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紧紧依靠人民，艰苦奋斗，守正创新，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运用各国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依据历史条件的变化赋予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全新视野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并在长期探索、反复比较基础上的科学选择。中国式现代化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怎样建设现代化的历史课题，擘画了以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前景。

（二）中国文明新形态开辟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人口大国实现现代化的独特路径

从历史起点上看，我们是由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争得民族独立后开始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超大型国家，超强的历史惯性、超广的国土空间和超大的人口规模，导致中国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有着与西方世界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迥异的“大国之难”。在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我们曾经以“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工业化、以“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仿效西方政治民主化、以“新文化运动”追随西方文化科学化、以“新生活运动”模仿西方社会世俗化，但因缺乏科学理论指导，又脱离中国实情，最终无一不以失败告终。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也曾学习和借鉴苏联现代化建设经验，虽曾取得极大成就，但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模式很快显现出其弱点和不足。改革开放后，我们党立足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国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不断在改革实践中探索总结，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最终形成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中国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4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历史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充分显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①到2022年，我国经济总量达到12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也达到8.57万元，达到了世界银行（IBRD）高收入国家人均1.257万美元的标准。同时，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是全世界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高科技领域也走向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5G通信、大数据、高铁、航天、深海探测、杂交水稻等大批科技成果领先全球；全过程人民民主展现出强大生命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幅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法治中国、平安中国、健康中国、数字中国、美丽中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党同时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3页。

规划了未来分两步走建设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实现第一次现代化,让占全球人口近1/5的中国人民过上了更为幸福的生活,人口总量超过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这一成就本身在人类现代化发展史上就具有里程碑意义。“在我国这样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多么伟大、多么不易!”^①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已成功开辟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人口大国实现现代化的独特路径,创新了人类现代化的文明形态。

(三) 中国文明新形态实现了从物的现代化到人的全面现代化的历史超越

与西方现代化的单向度目标不同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协调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中国的发展路径既遵循了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紧密结合本国国情、人民期盼和党的意志,创造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特殊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了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单一文明形态,实现了从物的现代化到人的现代化,从经济的现代化到全面的现代化的飞跃”^②。西方现代化始终遵从“资本逻辑”,讲求物质利润最大化,是一条“物本”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则遵从“人民逻辑”,讲求以人民为中心,是一条“人本”现代化发展道路。西方的私有制让少数人在现代化中获得最大物质利益;中国则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兼顾效率与公平,坚持在现代化发展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西方物欲式的现代化虽然增加了财富积累,但也造成了信仰缺失、物欲横流,导致人们精神贫乏,思想颓废,吸毒、淫乱、犯罪、自杀等社会病无药可求,种族冲突、社会撕裂、政治极化等问题难以遏止;中国式现代化则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我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人民意志,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阵地,努力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同时通过高质量的思想文化教育来促进人的现代化,培养和造就大批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不仅仅是实现经济发展、科技昌明和制度健全,更包括人民精神富裕,民族团结进步,国家意志统一,全体人民全面自由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③。人的现代化,既是现代化的前提,也是现代化的目标和归宿,更是对西方物质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超越。

(四) 中国文明新形态突破了向自然无限索取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

人类中心主义是西方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早在古希腊时期,智者学派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就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观念;中世纪的欧洲神学认为,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24页。

② 宋雄伟:《立足中国式现代化 构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光明日报》2022年1月14日。

③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94页。

世界是上帝为了人而创设的，人才是宇宙中心，因此，人可以征服、利用和统治自然界；近代欧洲哲学家康德也强烈主张“人是目的”。中国文化则自古主张“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其物质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决定了其生产方式必定是对自然界无限索取以满足人的欲望。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许多国家都经历了对自然资源肆意掠夺和生态环境恶性破坏的阶段，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往往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严重问题。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自然界成为先发资本主义国家任意索取的原料仓库，它们不仅对本国自然资源进行竭泽而渔地开发，更通过殖民扩张对全球自然界进行巧取豪夺。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全球资源的掠夺能力不断强化，由此引发了全球生态异化和环境危机，造成人与自然的严重冲突，气候灾难、环境污染和生物多样性丧失成为难以克服的生态问题，自然环境甚至被破坏到不可修复程度，全球生态自净能力显著下降，自然界新陈代谢出现断裂迹象。中国早期学习西方工业化过程中也曾提出“人定胜天”思想，虽然与自然界的斗争改善了人民生活，但过度向自然界索取也引发了各种生态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党深刻认识到，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走科学发展道路，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中，我们党努力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推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天人合一”思想转化为“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思维，与时俱进地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目标，超越了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重构了人与自然关系，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之路。

（五）中国文明新形态破解了后发现代化国家执政党兴衰成败的历史周期率

后发现代化国家在挣脱西方殖民体系后，大多选择西方所谓的“民主体制”作为政治架构，以“多党制”“普选制”“三权分立”为基本政治形态。然而，这些国家并不能摆脱受西方控制的命运，社会经济发展仍普遍落后。目前全球47个最不发达国家，除极少数还保留君主制和采用有别于西方的政体外，大多沿袭了西方民主制。但这些国家政局不稳、社会动荡、战争频发成为常态，7.5亿人民仍在生存线上挣扎。即使是摆脱了最不发达状态的一些后发现代化国家，也同样出现政权更迭频仍、社会对抗严重等问题，除少数国家因“强人政治”而保持过有限时期的相对稳定外，大多数国家的执政党也如走马灯一般不停变换。甚至连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在西方和平演变与自我蜕变中丧失政权。他们选择西方政体后大多也出现社会动荡、冲突不断、战争四起现象，不稳定的政局和不连续的政策导致人民流离失所，经济社会发展困难。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建设中把党的自身建设放在第一位，牢记初心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

性，努力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创造了当今世界执政党中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政治奇迹，破解了后发现代化国家执政党兴衰成败历史周期率。邓小平曾反复强调：“中国要摆脱贫困，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稳定。”“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①中国社会长期保持稳定，为国家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政治条件。国家稳定，经济建设就有了可靠政治保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就能真正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水平的不断跃升，不仅对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执政党建设有巨大借鉴价值，对发达国家的政治建设也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六）中国文明新形态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营造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同样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秘诀之一。长期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不仅让人民不受战争蹂躏，也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良好条件。我们坚持在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基础上与世界所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坚持睦邻友好，以邻为伴，与邻为善，坚持多边主义和独立自主，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国家间冲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历来强调“强不执弱”“富不侮贫”，主张“协和万邦”，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国际条件。中国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外交宗旨，积极承担大国国际义务，在国际维和斗争中担当重要角色，对发展中国家给予力所能及援助，为人类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为了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政府反复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以中国发展带动各国共同繁荣，以各国繁荣来助推中国发展。今天，世界各国人民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彼此生活交汇，无法孤立独存，建设更加美好世界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习近平主席强调：“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②中国政府提出的“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共识，也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8、286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22页。

The World Value of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Yang Xiaojuan Jiang Hongming

Abstract: Realizing modernization is the common pursuit of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not only surpasses the modernization paradigm of developed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but also breaks through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model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novates th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path of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and creates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based on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draws lessons from the experience of other countries, inheriting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integrating modern civilization. The great succes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not only makes the achievements of modernization benefit 1.4 billion Chinese people, but also has irreplaceable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realize modernization, and also has important guiding valu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mankind. It is the unique Chinese wisdom and Chinese plan dedicated by the Chinese nation to history and times.

Key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World Value

[责任编辑: 闫惠惠]

论新时代推动我国文化高质量发展的五重意蕴^{*}

李侑峰 王 员^{**}

【摘 要】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必然要求。探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五重意蕴，即狠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保障；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是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是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增强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是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合力之源；贯彻落实“双效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是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指标，对新时代推动我国文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五重意蕴；文化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①，文化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文化高质量发展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必然要求。2022 年 8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以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如何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使我国由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迈进，是今后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要课题。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双效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五个方面搭建文化高质量发展的体系框架，不失为学术研究探索的一个合理切入点。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逻辑与历史责任研究”（项目编号：23BKS034）、江西师范大学 2021 年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的优势研究”（项目编号：YJS2021045）阶段性成果。

^{**} 李侑峰，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广西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王员，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8 页。

一、狠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保障

“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① 虽然我国进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但在文化高质量发展道路上仍然面临诸多意识形态挑战和风险。因此，需要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文化建设的思想引领和方向保障，确保我国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安全，同时保持意识形态必要的张力，释放文化领域的活力，确保文化建设高质量稳步发展。

一是把党的文化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工作规范化、制度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开放包容、不断发展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该思想体系中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许多文化建设的新观点、新判断、新思想，是指导社会主义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理论创新。要建立健全相关部门以及社会相关业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制机制，尤其是要制定完善相关单位部门党委（党组）理论中心组等各层级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制机制。建立专题调研机制、巡听旁听机制、管理考核机制，形成严谨规范的工作程序，让广大党员干部切实掌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科学规律，重点掌握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强化理论武装转化为现实成效的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提高各级党员干部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水平。进一步提高党的文化理论的创新创造水平，确保在面临内外极限风险挑战的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仍然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和引领力，确保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攻坚克难的执政根基不动摇。善于把党的文化创新理论应用到现实挑战中，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团结广大人民，勇于面对百年变局背景下的意识形态挑战，实现意识形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保障文化建设稳定有序发展，为党和政府克服各种危机和挑战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二是要善于把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平台与文化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全国性文艺评奖等重要项目、重要单位及重要活动打造成促进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充分发挥这些载体的资源优势，锚定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哲学社会科学的目标，围绕“阐释中国道路、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的重大要求，联合社会各界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产出一系列有价值、有深度、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和对策建议。文化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多学科融合的庞大课题，有关部门应注重整合不同平台的力量，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学科、经济学科、文化学科、管理学科等多学科交叉融合方面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3页。

作出努力,为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作出有益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

三是针对性地把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高质量发展融合起来。有针对性地加强学校和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建立健全共同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推动实现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高质量发展融合,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方面适当融入文化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导向教育,引导学生们形成合理的文化价值观。重点在电影类、戏剧类、艺术类院校,以及各大院校的相关院系、专业有针对性地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激发广大师生学习文化、创造文化的热情的有效思想武器,引导师生主动融入国家文化高质量发展大格局。在社会各界加大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宣传力度,全面推动有关部门、企业、社会团体、学校等多主体的有关人员认真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等有力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先进理论,并且完善有利于理论转化为实际成果的体制机制,为有关部门、企业、社会团体、学校等多主体合作育人提供制度规范和保障,在共同培养高质量的文化人才方面形成稳定完善的合作机制。

四是意识形态工作要保持必要的张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应是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而非阻滞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与发挥意识形态对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保持意识形态工作的张力并不矛盾。首先,科学界定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根据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的要求,应对文化领域存在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明确“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指政治立场和政治判断”^①问题,防止把意识形态问题扩大化,把非意识形态的问题意识形态化。推动文化意识形态问题实行规范化、精准化、高效化管理,提高各级党员干部对文化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鉴别力和判断力,合理解放思想,保护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制度优化创新以及推动文化创新创造的积极性。其次,处理好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文化制度顶层设计要对意识形态的“内核与外围、基础层面与运作层面”^②有清晰的把握,在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既有从理论到理论的“应然是”阐释状态,也有从实践到实践的“实然是”推进状态。既要保持意识形态理论的崇高性纯洁性和历史的方向感,使文化治理实践不偏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又要看到意识形态实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强大生命力,推动文化领域意识形态的价值创新维度和形式创新维度。最后,把容错纠错思维深度融入顶层设计中。“干事业总是有风险的,要允许试错,不能期望每

① 祁述裕等:《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8页。

② 张志丹:《论当代中国基本意识形态与操作性意识形态之间的合理张力》,《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5期。

一项工作只成功不失败。”^①文化高质量发展同样要经过一个探索的过程。“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宽容干部在工作中特别是改革创新中的失误”^②，在应对意识形态风险挑战的过程中要适时推行“试错性”改革探索，以便摸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更好地推动文化体制深化改革。在“试错性”探索未造成大范围深刻负面影响的前提下，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对负责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内容方法等改革创新的相关责任人适用容错纠错机制，建立以正向激励为主的评价体系，为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强力监督、得力引导。

二、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是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最深层的内核，也是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带动作用，应做到如下几点。

一要把理想信念教育转化为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把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阶段化、分步骤落实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具体部署和实践中去，持续推动文化领域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建设，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把理想信念教育转化为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为抓手，有针对性地加强文化领域的群体道德建设，广泛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教育，让文化建设主体传承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并将之内化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引导人们树立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坚定信念，形成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全体人民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达成一致、团结一心，在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中实现远大理想。其中，青少年是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鲜血液和未来动力，应针对青少年群体加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理想信念教育，构建多部门、多领域齐抓共管的“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工作机制，不仅文化单位要管，其他相关单位也要管，不仅文化领域要管，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明领域也要管，强化青少年的文化高质量发展理念，为使他们成长为文化建设的栋梁人才共同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① 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版，第212页。

^②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33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68页。

二要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文化高质量发展的立法执法引领。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文化法律法规的建立健全中去,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具体的文化法律法规,把文化发展过程中有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经验做法、政策制度及时上升至法律法规层面。通过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文化法律法规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化建设中落地落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①办法中去,适当在法律法规层面予以确认,推动文化建设相关主体积极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文化高质量发展与否评判标准的观念深入人心,并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三要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营养和智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相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具有双重推动效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②,“在中外文化沟通交流中,我们要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耐力、定力”^③。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挑战,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需要大力推进“第二个结合”,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为文化建设提供先进理论指引;需要大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既要让文化建设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充足的养料和原料,又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在新时代的新发展,更好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科技文化、数字文化等新型文化紧密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直播、VR/AR、3D制造、光影体验、沉浸式舞台等文化新业态深度融合,并优化文化新业态的治理,引导文化新业态朝高质量方向发展;需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重点项目规划》中提到的23个重点项目为核心,高标准制定相应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办法,加强监督管理,传导良性压力,在高标准推动23个重点项目的过程中促进文化高质量发展。

四要推动志愿服务支持文化高质量的常态化、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健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志愿服务体系,在《关于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意见》《志愿服务条例》等政策文件的基础上,推动志愿服务支持文化高质量的常态化、制度化建设,持续提升文化建设领域志愿者的精准化、专业化水平。不仅要鼓励更多热衷于文化建设的志愿者参与进来,增加志愿者的数量,更要建立健全志愿者的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39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64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05页。

培养培训工作机制，让专业的、高素养的人才参与到文化建设中来，提升志愿者的服务质量。拓宽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和活动的渠道和空间，建立健全志愿服务组织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运行机制，使志愿服务组织能够有效弥补政府在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上的不足和缺口，提升文化治理效能。

五要完善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诚信建设长效机制。把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和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加强文化领域内各类主体的信用建设，使诚实守信成为文化市场运行的基本价值导向和各类主体共同的价值追求。同时，建立健全文化领域的监督管理制度和信用惩戒机制，加大文化领域诚信缺失的监管和惩戒力度，打造文化领域良好的诚信生态环境。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是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

文化高质量发展的价值目标，就是更好地保障人民文化权益，让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①，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②，才能实现文化高质量发展。

一要实现城乡人民精神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③，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其所要求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④。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求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要在“持续夯实精神富裕的物质根基，始终坚持精神富裕的正确方向，扎实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传承弘扬，更好推动优质精神产品的新创造，建优拓广高品质精神食粮的供给之路”^⑤五个方面做好顶层设计。既要在人民精神共同富裕中促进高质量发展，又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人民精神共同富裕。实现人民精神共同富裕，要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一步落实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的要求，发挥广大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动性、能动性，激发群众当中蕴含的巨大文化创造动能和创造潜力，健全支持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机制，满足人民多层次、多角度、多方面文化需求的动能，解决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67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322页。

③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01页。

④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01页。

⑤ 沈壮海：《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光明日报》2022年4月29日。

文化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矛盾问题。把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建设作为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和突破口,大力优化城乡公共文化资源配置,提升基层文化设施建设水平,建立健全支持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机制,开展各种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把文化惠民工程的实效性纳入基层干部的考核内容,使基层文化资源不仅建设质量高,还要物尽其用,为民所用。扩大基层文化惠民工程覆盖面,把高质、优质的文化资源适度向基层倾斜投放,推动基层文化惠民工程提质提档。打通并拓宽网络渠道,让数字科技为文化高质量发展助力赋能,使基层群众更为便捷顺畅地共享丰富的、优质的文化资源。整合社会各界力量,鼓励和引导文化机构、公司、学者、民间能人等参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在抓基层民俗文化旅游活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等方面下力气,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群众文化活动,形成文化活动高质量开展的文化生态共同体。

二要充分采用科技手段优化文化治理。优质高效的网络文化治理是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要“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①。综合运用互联网通信技术、大数据云计算技术、数字多媒体技术和移动智能终端技术等高科技手段,推动文化和旅游相融合、线上和线下相融合、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相融合,及时对文化治理进行全过程、常态化、动态化监控。提升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主体的信息收集与共享能力。在海量数据中筛选、萃取价值含量高的数据资源,掌握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动态,掌握群众文化心理、文化活动的新变化、新需求,收集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源,消除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过程中的信息孤岛效应,把广大人民最关切、最紧迫的意见和建议纳入文化治理的重要决策中,最大限度保障人民文化权益,引导社会各界推出更多群众喜爱的文化精品。用数据技术丰富文化协同治理的形式和载体,为文化治理多元主体提供对话、交流与协商的便利平台与充足机会,在文化领域贯彻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在创新活动载体的探索中形成文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协调互动格局,推动文化内外部协同治理良性循环。推动实现以政府为主体引领的文化治理智能化和治理机制科学化,实现多元主体高度协同有序、方向一致,形成文化高质量发展合力。要重视运用大数据技术来降低有毒文化、负面文化等对人民群众的影响。采用先进技术,提升以政府为主导的文化治理效率,充分收集文化治理相关数据信息,既要找出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各种有益因素,又要对文化治理的各类风险形成有效预警,精准找出可能影响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阻碍因素和风险因素,进行提前防范处理。既要为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技术支撑,又要增强群众的文化安全感。要善于利用大数据技术来掌握广大民众的文化审美心理,综合考虑文化产品对受众的认知和行为产生的系统化影响,对人民大众的文化审美心理进行提前研判,找出符合文化发展规律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11页。

的、高质高效的受众接受模式，提升文化治理成效。

三要强化中国特色的高质量文化内容供应力度。根据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搭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文化内容生产供应体系。首先，高质量文化内容供应应紧扣人民的生活实际、时代变化脉搏、民族和国家需要。政府、企业以及社会组织等应完善高质量文化内容产出的引导激励机制，通过设置专业奖项、开展专项活动等措施，调动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加强对广大文化工作者的创作引导，引导他们深入人民群众，“才能洞悉生活本质，才能把握时代脉动，才能领悟人民心声”^①，进一步丰富创作包含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智慧，“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②，有深度、有内涵的优秀文化作品，从而“使文艺创作具有深沉的力量和隽永的魅力”^③，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其次，高质量文化内容供应应突出产品分众化，力争实现人群全覆盖。既要满足多数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体现出高质量文化作品的一般性，又要满足特定群体、特殊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体现出高质量文化作品的特殊性，从而避免产生人民精神文化食粮单调化、同质化、浅层化等问题。最后，高质量文化内容供应应具有强大包容性，能在草根文化与精英文化，快餐文化、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找到平衡点、契合点。要破除高质量文化作品皆言语晦涩难懂、辞藻华丽、言语高深的错误观念，对于能同时达到“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要求的文化作品，都应纳入高质量文化作品的范围予以奖励和推广。高质量文化内容供应要求文化治理具备自我纠错、健康发展的能力。这就要求建立健全文化内生能力的内外运行机制，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生力、引领力和感染力。鼓励和引导参与文化治理的多方主体自觉、主动和与各种非先进文化作斗争，避免人民向灰色空间、黑色空间寻求精神满足，从而引发难以控制的文化治理问题。

四要注重引导群众参与文化创作生产活动，健全支持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机制。新时代，以普通民众为创作主体的网络直播、短视频、图文等文化新业态方兴未艾，在大众文化创作环境上，要充分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优势，依托网络云端优势，拓宽民众参与渠道，构建多主体、多领域协调联动机制，共同打造有利于大众文化创作的有利环境。在大众文化创作内容把关上，应赋予平民创作者更为广阔、更为活泼的创作空间，尤其要注重通过数字科技对民众的“媒体化赋权”和“媒介化赋能”，使群众性文化活动机制更为灵活和创新。拓宽民众参与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渠道，尤其要注意探索推行把人民群众利益和公共

①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9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24页。

③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9页。

文化活动紧密结合起来的群众性文化活动机制，如“文明实践积分制”“一组两会”协商自治架构等实践机制，鼓励和引导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发挥参与其中的主体性、主动性、首创性，扩大文化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参与面，营造大众文化创作的浓厚氛围，形成开放多元、充满活力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供给体系，焕发社会各类人才的文化创作热情。保护和激发人们的创造潜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引领大众创作更多高质量文化产品，使人民成为高质量文化内容的生产者、科学治理的参与者、丰硕文化成果的享受者。增强人民文化修养、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最大化发挥人民的文化创作潜力，以人民为主体推动文化高质量创新创造。同时，还要发挥文化精英的文化创作带动作用，强化文化精英对大众文化创作的传、帮、带作用，激励文化精英引导和带动广大人民参与到高质量的文化创作中，做好旗帜引领、经验传授、示范带动等工作。

四、加强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是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合力之源

文化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只有形成国内国外强有力的舆论引导合力，确保文化高质量发展拥有核心舆论引导力量、优良舆论引导环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才能沿着高质量的方向平衡前进。对此，要强化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对文化高质量的引领，牢牢坚持党管媒体原则，构建多主体联合监管、多领域协调互动的文化治理网络，同时积极参与全球文化治理，形成强大的内外舆论引导合力。

一要坚持党管媒体原则，强化党对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理念全方位贯彻落实到文化高质量发展中去，并以常态化制度化的形式明确下来。中国共产党是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的主心骨和领头羊，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对文化建设的全面领导，才能有效应对历史虚无主义、筑牢意识形态防线，在风云激荡的百年大变局中保持战略定力与责任担当，为实现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持续推动文化发展稳中提质、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坚持党管媒体原则，需要厘清文化治理中政府与社会、市场、个人的关系，对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以及个人等各类治理主体的价值定位、作用发挥、相互关系有准确掌握，把握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话语逻辑与科学规律。坚持党管媒体原则，需要加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中的党组织建设，“在对内对外双重维度上增强党的组织力”^①，实现对媒体力量的强力组织引领，使党组织成为引领文化高质量发

^① 刘华：《中国共产党组织力的多维向度：内涵意蕴、政党需求、历史逻辑、提升路径》，《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23年第1期。

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凸显党员干部在文化治理实践中的价值定位与价值发挥。充分发挥党组织、党员干部在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引领带动作用。坚持党管媒体原则，党要牢牢掌握文化高质量发展评价标准的主动权，建立健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办法，并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在实践运用中增强其权威性，凝聚人民，使之成为社会各界共识。

二要强化舆论引导文化高质量发展力度，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力。在舆论引领文化高质量发展方面狠下功夫，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加大力度宣传高质量文化作品、优质文化生产者以及优秀文化治理的人事物，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构建“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同频共振、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互补、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文化高质量发展主流舆论格局；以党媒为中坚力量，引领社会各界凝聚起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共识，让各类治理主体既做到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又做到协作有序、合作共赢，为建成灵活高效的运行机制、系统科学的舆论引导机制贡献最大力量。既要准确把握影响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苗头性”问题，强化网上网下各类舆论信息管理主体责任，抵制错误的、低劣的思想舆论，引领广大人民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宣传斗争，又要善于掌握群众关心的文化高质量发展兴趣点和增长点，强化对舆情的引导，着力提高人们的文化审美水平和法治素养，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文化审美观，使高质量的优秀作品产出成为人们持续关注的焦点问题，打造有利于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舆论环境，进而搭建高质量的优质文化内容库，强化对高质量文化产品的支持，大力弘扬高质量文化作品，提升高质量文化产品的传播效能。加强5G网络、卫星通信、数据中心等媒体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应用，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为支撑，整合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市级媒体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四级媒体力量，不同层级之间形成有效衔接和联动的体制机制。优化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凝聚全媒体传播合力，改进和创新正面宣传方式方法，完善舆论监督制度，健全重大舆情和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

三要建立健全多领域协调互动的文化综合治理体系。随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深入实施，以及社会信息化、数据化、网络化、智能化程度不断加深，文化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的“文化+”发展模式日益流行、发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代表的文化行业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日益深入，文化业态日益丰富、产业边界日趋模糊。要实现文化高质量发展，仅在网络一端加强和创新互联网内容建设，落实互联网企业信息管理主体责任，全面提高网络治理能力，营造优良网络生态环境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按照“网下管什么，网上管什么”原则来构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才能有效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要打破狭隘的文化治理观念，凝聚文化领域外部共识，推动文化治理外部协

同,形成文化领域外的治理合力,更为有力地对舆论进行监督和引领,汇聚起引领文化高质量发展的磅礴伟力。要着眼于常态化、稳固化、系统化的制度构建,善用系统思维统筹谋划文化治理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要点,以“大文化”的理念来进行顶层设计,对文化治理对象互相联系的多方要素及其结构和功能进行系统性的深入掌握,在分类治理的基础上进行宏观统筹推进。注重文化领域与其他领域体制机制之间的衔接性、连贯性、协调性、体系性,立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妥善处理文化与经济、政治等各领域多方复杂关系,实现对有益于文化治理的各级各类资源的有效统筹和合理配置,使文化领域与其他领域治理之间形成协调联动、信息共享、运转高效、优势互补、互惠多赢的优良生态体系。充分发挥各部门各单位文化治理的最大效能、协调联动的最大优势,实现文化治理资源的开拓创新、有效共享、优化配置、有效整合与保值增值,有效破解文化服务有效供给不足、城乡不均衡、供需错位、受益面不均等非均衡化问题,使文化布局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更为优化完善,从而使纷繁复杂、内容庞大、关联性强的文化治理达到高效化、现代化的效果,实现更大范围的舆论引导。

四要积极参与全球文化治理,增强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国际舆论引导力。党的二十大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①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必然要求增强国际舆论引导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②,是增强国际舆论引导力的应有之义。中国作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要实现文化高质量发展,理应推动文化建设凝聚力走出去,积极参与全球文化治理体系,在“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奉行单边主义,推动逆全球化潮流,尤其是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后,逆全球化的浪潮更加强烈,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价值壁垒更加强化。随着俄乌冲突爆发,美国固守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理念,重新挑起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对立,原本交流互鉴的全球文化治理态势受到冲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跨意识形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交流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越是面临冲击挑战,“越不能搞自我封闭、自我隔绝”^③。要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参与全球文化治理,在“继续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继续促进可持续发展、继续推进科技创新、继续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6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编写组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21年版,第428页。

③ 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0页。

系”^①的全球治理实践中精心做好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②，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强化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优势和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引导世界人民全面客观认识中国，提高中国价值观念的国际知名度和认同度。此外，还要强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交流，联合、协助发展中国家公平、平等参与全球文化交流进程，协助广大中小型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发出完善全球治理的有力强音。给世界上那些既渴望加快文化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文化独立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在世界上广交朋友，让世界友好国家成为共同推动中国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助力。

五、贯彻落实“双效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是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指标

实现文化高质量发展，要求在文化创作生产中必须正确把握和处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实现两者关系的相统一。能否贯彻落实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是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指标。只有正确处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与产业属性、深刻认识和把握文化产品属性和文化生产创作规律，才能做到“双效统一”。

一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打通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之间的制度壁垒，形成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实现文化资源的良性流动和优化配置，使文化创作生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达到最优化。诚然，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性质职能、资金来源、运行机制、调控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但这些差异并非完全对立、隔绝，而是相互交叉、渗透，在特定情况下还会互相转换。因此，要深化对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科学认识，掌握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探明文化治理高质量发展规律，精细化、精准化地处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之间的差异和特点，打通两者之间的制度壁垒。推动文化企事业单位妥善处理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之间、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实现市场主体平等准入，要素与资源、商品与服务自由流通”^③的治理现代化目标。精准把握各类公共文化机构的自身定位，理清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与非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妥善处理文化发展中公益性和营利性的关系，确保公共文化机构公益服务的宗旨和使命不变，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464、465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316页。

③ 何立胜：《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需要把握好几个关系》，《光明日报》2022年8月15日。

辩证统一、良性互促；明晰文化产业的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和经济社会发展功能，完善文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制度，推动文化产业更好地与公共文化服务融合发展，拓宽两者融合发展的空间。既要进一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公共文化服务，又要抓住文化产业新旧动能转换的核心要素，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重点抓好数字出版、数字影视、高新视频等文化新业态的治理，从“意识形态风险分级监控制度、核心价值正向美德实现机制、平等对话互动协调制度、不良文化甄别审查制度”^①着手，健全引导新型文化业态健康发展机制，进而引导文化新业态在设计、体验、品牌等方面实现高质量发展。大胆推进文化领域思想解放，打破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领域固化、利益固化的藩篱，对不利于实现“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要求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进行大破大改。以国有文化企业为引领龙头，完善文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制度，强化文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榜样示范，在强示范的探索中摸清文化事业和文化企业贯彻落实“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规律，进而构建更为完善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管理机制，更好地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二要加快构建全国统一文化大市场，使文化高质量发展获得源源不断的推动力。在2022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文化市场实际，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文件，进一步细化、强化相关任务要求，让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等各项要求^②能够真正得到贯彻落实。从而加快建设全国统一文化大市场，实现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促进文化要素与资源、商品与服务在国内循环畅通，使各类文化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各类文化生产要素充分涌流，以畅通的国内文化市场大循环为基础推动国内国际文化市场联通互动。统筹兼顾国内国外两大文化市场，在打造国内健全的、安全的文化产业链、供应链，提升国内文化产业技术水平和质量水平的基础上，对接国际高标准文化市场规则，推动国内文化产业积极参与全球文化治理，构建文化领域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的程度取决于文化与市场结合的深度以及文化面向世界开放的程度”^③，只有不断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进一步摸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下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规律，使全国统一文化大市场与国际文化市

① 胡剑：《新型文化业态健康发展观及其制度实现研究》，《学术探索》2020年第4期。

② 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6、8、10、12、14页。

③ 蔡武进：《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70年：历程和走向》，《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场持续繁荣兴旺，文化高质量发展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推动力。此外，在推动国内国际文化市场持续繁荣的同时，还要强化文化企事业单位的社会责任担当，尤其要加强对文化新业态的引导。在构建全国统一文化大市场的过程中健全引导新型文化业态健康发展机制，推动文化企事业单位更好地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

三要强化“双效统一”的市场导向，完善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的工作机制。要形成文化高质量发展服务的良好市场导向，突出强调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要求。“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①其一，加强对文化市场的规范引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级党委和政府应通过综合手段，有效规范和引导文化市场，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导，既要考虑市场接受度的具体指标，实现经济效益，又要兼顾社会效益，不能被市场逐利性牵着鼻子走。引导文化市场形成“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欢迎”^②的文化产品需求导向，使文化市场发挥引领风尚、服务社会、教育人民、促进发展的重要功能。国有文化企业要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要求上先试先行，做好榜样示范，把探索得到的有益经验做法推广推行，引领民营文化企业及时跟进。要做好文化领域的立法保障，在文化法律制度建设，将“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理念融入文化生产者、文化消费者和文化管理者三者关系的处理中，在文化基本法中予以明确规定^③，并让该要求在各类企业章程和各项规章制度中得以鲜明体现，使“双效统一”成为文化市场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其二，加强对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引导。综合运用资金扶持、文艺评奖、舆论宣传、教育培训、人才激励、榜样示范等手段，建立国家扶持艺术创作与生产的长效机制。教育引导文化工作者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培育形成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的崇高文化创作品格，自觉与低俗庸俗媚俗的文化创作风气划清界限，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批驳斗争，引导文化市场健康发展。教育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正确处理好“两个效益”的关系，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喜爱和欢迎，而不能靠低俗庸俗媚俗去赢得“喝彩”，换取所谓的经济效益。尽可能提供便利条件，在“双效统一”上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廓清迷雾、指明方向，让他们的文化创作既能掌握文化市场脉搏实现经济价值，又能促进社会发展进步实现社会价值。教育引导广大文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65页。

②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页。

③ 参见齐崇文：《文化领域立法要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学习时报》2020年第9期。

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创作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六、结语

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更好地适应世界百年变局带来的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更好地完成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的文化使命，就必须在推动我国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上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使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主流导向和鲜明要求。当然，在新的起点上，要实现文化高质量发展，顺利完成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在理论探索方面仍然有不少问题需要阐释明晰，在实践探索上仍然面临着不少风险挑战，这需要更多的研究者在把握党的文化建设规律的基础上，承上启下、继往开来，进行更为深刻而有益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扎实推进文化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

Five Implications of Promoting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New Era

Li Youfeng Wang Yuan

Abstract: Promoting high-quality cultural development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promoting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self-improvement in the new era, and creating a new brilliance in socialist culture.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d five systems for adhering to and improving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which is a summary of the wisdom and experience of the Party in promoting cultural construction. Starting from these fiv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the five implications of high-quality cultural development can be explored: enh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ideology is the direction guarantee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cultural development; strengthening the cultiv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is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cultural development; adhering to the people-centered work orient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cultural development; stressing the

correct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 is the joint source of promoting high-quality cultural development; implementing the “dual effect unified” cultural creation and production system is a key indicator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cultural development.

Keywords: The New Era;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ulture; Cultural Governanc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焦佩]

《论语》“‘正名’以‘正政’”思想 及其对党的自我革命的启示*

朱夫夫 黄志高**

【摘 要】 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和马克思主义的魂脉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基础，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重新审视《论语》“正名”思想，会发现“正名”与党的自我革命多有“契合”。如就逻辑的起点来看，二者都以问题或矛盾为论述起点；从逻辑展开来看，二者都围绕“自我”这个主体展开；从逻辑的重心来看，二者都有致力于维持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设计；从价值旨归来看，二者皆有“治国、平天下”的价值旨归。从“正名”以“正政”思想的核心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正名”以“正政”的起点、展开、重心、旨归进行批判，得出党的自我革命的提出不是偶然，而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不觉的传统价值理念相融通的结果。

【关键词】 《论语》；正名；正政；党的自我革命；启示

“正”，《说文》曰：“是也”。饶炯《部首订》曰：“‘是’下说‘直也’，义即相当无偏之谓”。在《论语》中“正”字“共 24 见，作为动词使用共 20 见”^①。“正”字的意思有表示订正，使合乎规范，如“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论语·子罕》）；有指人品的正直、公正，如“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论语·宪问》）；有指纠正、匡正，如“就有道而正焉”（《论语·学而》）；有指言行举止端正，如“必正席先尝之”（《论语·乡党》）；在《礼记·经解》中，孔子将“正”作为治理、管理来理解。

* 本文系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重大项目“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及其逻辑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022ZD001）、安徽理工大学 2023 年党建研究专项课题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党建工作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两个结合’形成的原创性成果”（项目编号：djkt2023-11）阶段性成果。

** 朱夫夫，安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研究；黄志高，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研究。

① 崔清田：《名学与辩学》，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1 页。

“‘名’字在《论语》中共8见”^①，除去《论语·子路》中3见，剩余5见。如“名”作名字、名称解，“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如作名声、名誉解“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博学而无所成名”（《论语·子罕》）、“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如作动词称赞、赞美解，“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论语·泰伯》）。

“正名”并非孔子所创，在春秋国家政治生活中早已充分展开。晋文公的“正名育类”思想，通过对当时社会中处于不同地位（公、大夫、士、庶人）、从事不同职业（工商、皂隶、官宰）的人进行“正名”，地位不同，获取俸禄的多少不同，职业不同，获取的金钱来源不同，而实现“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的社会理想。从历史文本产生的影响来看，《论语·子路》中“必也正名乎”影响最大，孔子想通过纠正“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的问题，从而构建出一整套的“正名”以“正政”治国方略。

一、《论语》“正名”以“正政”思想的核心架构

从“正名”的起点出发，希望实现政通人和的“正政”目标。这一治国方略的构建中遵循着这样的逻辑：时代中的矛盾呼唤“正名”理论的出现，而这种理论的建构又是儒家由“内圣”开出“外王”治国理念的反映。就“内圣”而言，走一条由“正名”至“正己”而后至“正政”之路；就“外王”而言，主张“正礼明制”的制度构建之路。最后在价值旨归上实现“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希冀通过“修己”的内圣，达到“安人”的国家治理理想。

（一）“正名”的起点：“名实相怨”的时代矛盾催生“正名”以“正政”的政治设想

解决现实问题是理论产生的动力。当时让孔子忧虑的是政权、社会、文化、人伦等存在多重混乱的政治现实，因没有科学的方法，孔子只能从抽象的观念中寻觅藏于现象后面的名实相怨的规律，从而提出“以名匡实”的政治设想。

1. “卫君待子而为政”的时代背景

《史记》记载：“是时，卫君辄父不得立，在外，诸侯数以为让，而孔子弟子多仕于卫，卫君欲得孔子为政。”君臣父子之间的矛盾严重影响了当时卫国的政治生活秩序。这种矛盾并非只在卫国发生，而是整个时代都处于这种矛盾中。郭沫若在《名辩思潮的批判》中说：“在这新旧交迭的时代，正所谓‘青黄不

^① 崔清田：《名学与辩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接’，故尔‘名实相怨，绝而无交’。”^① 孔子看到社会转型过程中这种矛盾的外在表现，即“树塞门”“有反坫”“八佾舞于庭”等“名不正”现象，而现象的背后是君王离政，大夫专权，而后政权不稳，民手足无措的“实不正”本质。“正名”的直接目的在于寻求一种理论来改变当时名实相怨的政治秩序，开创了“正名”以“正政”的思想先河。

2. “以名匡实”的政治设想

孔子提出“正名”为了解决社会中因名实矛盾而产生的贵贱无序、人伦颠倒的社会问题，即“旧名与新实不符，新名亦未能建立”^②，“正名”在于改制“旧名”，创立“新名”使之符合“新实”。这将人们关注的目光从天上转移至人间，从彼岸世界转向此岸世界，直面社会现实问题，洞悉社会矛盾，感受到时代发展的脉动。“正名”过程是由表及里、由言到行、由名到实、通过正不正之名来纠正不正之实，所以毛泽东在论述“正名”时指出，“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③。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体现“人”的主体地位，是对西周以来的“神权”价值观的反对。

（二）“正名”的展开：“正心修身”的内圣要求催生“正己”以“正政”的路径展开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似乎是儒家的一种政治正确，“事不成”的政治现实，使他们内求于自我的“名正”，从而展开了“正名”先“正己”，“己正”方能“正政”的内圣逻辑。

1. “正名”何以“正己”？

“名”本来就关乎自我。《说文》中“名，自命也”，“自”意味着“名”本身关乎“自我”。“自命”通过主体自我区分“我与他”“此与彼”之名。但“自命”主体不同会得出“名”相异，不同的“名”孰是孰非、孰正孰不正需要确立判断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君子之名，要成就君子之名，正心修身就成为“名”的应有之义。马一浮在《复性书院讲录》中说：“正名也者，正其心也，心正则致太平矣。”^④“正名”是主体对客体的“格物”。《论语》“正名”与《大学》中的“格物”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格”乃“正”、“格物”乃“正物”，即端正实物的名实或名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格物”等于“正名”或“正名”等于“格物”。^⑤从《大学》叙述的顺序来看，没有“格物”，就谈不上“诚意”“正心”，只有“格物”后才能获得正确的认知，进一步修正和提升自己。所以

①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3页。

②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0页。

③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页。

④ 马一浮：《复性书院讲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9～90页。

⑤ 杨柳桥：《〈大学〉的“格物”即是〈论语〉的“正名”》，《哲学研究》1978年第12期。

“正名”需要经过“正心”“诚意”“修身”的“内圣”阶段，而后才能更好地了解和把握客观世界，才能最终走向“外王”。

2. “正己”何以“正政”？

“名不正”是一种客观外在因素，“正名”需要主体的修为才能达到“言顺”“事成”的目标，即“正政”的目标。如何做到“修身为政”，孔子说君子“名必言、言必行”，同时又对君子的言与行做了具体要求，君子“言忠信，行笃敬”（《论语·卫灵公》）。“忠”“信”是自我修养的目标，也是为政者的品德，而“笃敬”是自我修养的态度方法，也是为政者的修身功夫。言行一致与名实相符是“正己”走向“正政”的具体过程，故“正名”只有放在正心修身的“正己”之上才能得以“正政”。毛泽东在论述孔子“正名”思想时指出“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①，是对“正名”的主体“自我”逻辑的肯定，也是对“正己”以“正政”的肯定。

（三）“正名”的重心：“正礼明制”的制度需求催生“正礼”以“正政”的制度厘定

“礼”学又称“外王之学”，是儒家外在的客观的政治制度。在传统的视域中“内圣”是体，“外王”是用，明“体”自然达“用”。“礼”虽为“用”，但不可或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礼制的建立能够很好协调社会中的的人际关系，故“正名”自然要走到“正礼”的层面才能开创“家齐、国治、天下平”的外王局面。

1. “正名”何以“正礼”？

“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左传·桓公二年》）“正名”是为了“正礼”，“正礼”是为了更好“正名”。孔子提出“正名”旨趣并非限于“釐定学名译名”或“统一语言文字”，而在于“企图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以为新来的封建社会的韧带”^②，即一种新的统治制度。构建这种制度支撑我们将它看作礼仁重构，它不仅是“正名”的核心，而且是孔子学说的核心。通过确立新的统治制度，使人们各安其位、恪守其分，从而完成“正名”的初衷，形成上下有序的政治秩序。所以，孔子将“正名”与“兴礼乐”“中刑罚”结合在一起时“正名”的重心为“正礼明制”。

2. “正礼”何以“正政”？

儒家之“礼”，一者“治国之礼”，即谋求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政治秩序的重构，如“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左传·隐公十一年》）；二者“教化之礼”，这其实是宗法制度衍生出来的规范与道德，是治国之礼的延伸。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页。

^②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7页。

“‘礼’不但是政治的骨干，是一种仪文，而且是一种制度，在等级制构成的各阶层中各有其自己之分际的一种尺度。”^①“正礼”需要对“礼”进行改造，方法有二：其一，因革损益。所谓“因”，就是对三代之“礼”的吸收保留，体现了文化的继承性；所谓“革”，就是对三代之礼的改革创新，体现了文化的批判创新性。孔子时代之“礼”“是从时代的积累所递传下来的人文进化的轨迹”^②。正礼明制并非对三代之礼无差别继承，而是“对于过去的文化于部分地整理接受之外，也部分地批判改造”^③，即孔子所说“礼所损益”。其二，援仁入礼。“礼乐不兴”困难不是“周礼”的湮落，而是人们普遍知礼而不行礼，即毛泽东所批判的“君子做起事来却只知做不仁的事，不知做仁的事”^④。孔子认识到行礼必须有其内在基础，才能变成人们自觉的行动，这个内在的基础是“仁”。“《论语》中仁字出现109次”^⑤，通过对“仁”这个核心概念的加工，使“仁”从一个与忠、义、信、孝并列具有宽泛内涵的字，成为“礼”之核心，故“正名”的重心又可以看作“正仁”。

（四）“正名”的旨归：“修己安人”的历史使命催生“正民”以“正政”的价值旨归

“正名”的价值旨归反映出“内圣”与“外王”的价值统一，表现为“修己”与“安人”、“修己”与“安百姓”的统一。作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正名”倡导以伦理道德的方式解决礼乐崩坏的现实问题，体现了儒家“为政以德”的政治追求和“修己安人”的历史使命。

1. “修己安人”是对历史周期率的早期反思

从“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的表述来看，“正名”的最终落脚点在使“民有所措手足”，即“安人”“安百姓”“平天下”，这种价值旨归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武王伐纣使素居西土小邦“周”取代大邑“商”，“天命恒常”的思想观念逐渐被“天命靡常”所代替。这种思想观念转换的逻辑是“人”才是影响天命的决定因素，所以孔子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礼记·中庸》）当人们对天命转移做出进一步总结，逐渐发现“德”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这种“德”又集中体现在“为政以德”，即执政者的道德关乎天命转移，如“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左传·庄公十一年》）。

① 《吕振羽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页。

②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6页。

③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7页。

④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页。

⑤ 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编著：《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2. “修己安人”使“正名”具有双重历史使命

“修己”是端正自身，规正自我行为使之合乎礼仪法度的德行操守。“安人”是“修己”的进阶，是在自身行为端正的前提下以自身的德行操守去引导他人。如何从“修己”至“安人”，方法是“正”，“正”的目的是希望为政者能够及时反思自己的言行，在为政时做出表率，通过上行下效而达到政治的清明有序。那么“正”什么？孔子认为“正”在于“正其身”“正其令”。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正其身”指为政者要正确处理好自身“言与行”“名与实”之间的关系，做到言行一致、名实相符；做到德称其位、功当其禄；做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论语·季氏》）。“正其令”为政者制定的政令需要符合民的利益，只有“令正”，政令才能得以贯彻和实施。

二、《论语》“正名”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批判

“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要把握好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关系，对儒家“正名”思想开展马克思主义批判是必须的，只有对儒家“正名”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才能更好地“正革命秩序之名”^①。但是这种批判又必须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一者有人会对《论语》“正名”思想全盘肯定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纠正其中的错误；二者有人会对《论语》“正名”思想全盘否定，抹杀它的历史贡献而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对《论语》“正名”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②。

（一）对“正名”中“名实相怨”的批判

“名实相怨”是“正名”理论产生的逻辑起点，是孔子看到了此矛盾，也为解决这个矛盾提出了方案。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名实矛盾是否为当时所遇多种矛盾中的根本矛盾，“以名匡实”的解决方案是否真正能解决当时所遇问题。

1. “以名匡实”并非对症良方

孔子或许看到了当时社会存在着多种矛盾或问题，看到矛盾却没抓主要矛盾是孔子以“名实相怨”作为“正名”起点的主要问题。如“在孔子的脑子里，不啻浮现着如次的几个问题：一、等级名分的焚乱；二、诸侯相互的侵伐与兼并；三、宗法制度的破坏；四、农民和封建主间的矛盾的发展和封建统治者地位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页。

^②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56～57页。

的动摇”^①。孔子没有弄清社会发展的动力究竟是什么,“不肯从社会发展之自身的运动上去把握,而只肯从抽象的心理学的范畴上觅取观念论的解释”^②。将次要矛盾当作主要矛盾,将矛盾的表象当作矛盾的实质,不可能解决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每当社会遇到问题时“便拿出一个‘正名主义’来”^③,作为安定秩序的武器,很显然起不到实质的效果。

2. “名为主”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本质

《论语》“正名”思想,是“名为主”还是“实为主”,是正名还是正实,这是关乎“正名”哲学立场的根本问题。对“名为主”的批判集中表现在:其一,对“正名”唯心主义本质的批判,启于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说:“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④沿着这种理解范式,杨荣国以墨子“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来批判孔子“正名”唯心主义的特质。^⑤任继愈认为“正名”是“以‘名’为第一性的名实观”^⑥,呼应了毛泽东对孔子“正名”思想的论断,即“孔子是名为主”^⑦。崔清田认为,在孔子那里“名为第一性,实为第二性”^⑧。其二,对形而上学本质的批判。沿着物质决定意识,“实”决定“名”的逻辑,对“正名”唯心主义的批判,很容易过渡到对“正名”形而上学实质的批判。蔡伯铭认为,孔子“正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概念论”^⑨。孙中原认为:“孔子的名实一致思想的背后,有一个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前提。”^⑩周云之认为,孔子“把‘正名以正实’的原则绝对化了”^⑪,从而导致了哲学上的形而上学。

(二) 对“正名”中“正心修身”的批判

由于过分强调以“内圣”驭“外王”,以“内圣”取代“外王”,儒家“内圣之学”沦为毫无经世作用的心性空谈。除此之外,历史中真正能够严格按照儒家的“内圣”修养理论来正心修身的也屈指可数,原因在于“内圣”理论有缺陷。

① 《吕振羽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6页。

② 《吕振羽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6页。

③ 《吕振羽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7页。

④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页。

⑤ 参见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10页。

⑥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9页。

⑦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页。

⑧ 崔清田:《名学与辨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4页。

⑨ 蔡伯铭:《孔子正名论的逻辑思想》,《黄石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

⑩ 孙中原:《论孔子的逻辑思想》,《孔子研究》1986年第3期。

⑪ 周云之:《孔子是先秦名辩逻辑的重要启蒙思想家》,《孔子研究》1990年第3期。

1. “正心修身”并非救世良策

“正名”经过正心修身的“修己”，至平天下的“安民”，并以“礼”为制度的线条贯穿于“外王”阶段，看似合理其实不然。虽然可以将“正名”的逻辑展开分为“内圣”和“外王”两个阶段，但其侧重点在“内圣”，即“正心修身”阶段。在“外王”阶段，孔子几乎找不到出路，提的治国之策并不符合社会需要，这也是孔子周游列国终不得志的重要原因。这一点或许孔子有着非常深的体会，在《论语》中，孔子虽然对管仲违背礼制的事大为恼火，但对管仲的外在“事功”却大加赞赏，称其为“大仁”，如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从这个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对外在事功的欣赏，以内圣驭外王显然也不是孔子想要的结果，只是以唯心主义的方法论，根本找不到“外王”之路。

2. “正心修身”不能真正践行

如果不论“事功”，但就“反求诸己”“反身而诚”“正心修身”的“内圣”而言也是有值得批判的地方。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曾对儒家修身思想立场的唯心性、修养形式的抽象性、修养理论与实践脱节等方面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并举了一个典型案例。“有一个老秀才亲自对我说：孔子说的话只有两句他能做到，那就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其余的他都做不到，而且从来也没有准备去做。”^①不只是清末的秀才做不到，就是整个儒家几千年的发展史中能真正做到“正心修身”的也屈指可数，其原因在于：首先，脱离群众的虚伪性是“正心修身”不能贯彻的原因。从修身主体上看，虽然《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但又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论语·颜渊》），修身的主体仅落在君子身上，而对普通民众则少有此要求。从修身的目的来看，“用这些‘圣贤之道’去压迫被剥削者，用满口仁义道德去欺骗人民”^②，当动机不纯，修身也就流于形式。其次，脱离实践的抽象性。“古代许多人的所谓修养，大都是唯心的、形式的、抽象的、脱离社会实践的东西。”^③正是这种抽象性，使自我修养成为书斋里的活动，成为一些人的自我标榜，修身的成效得不到检验。最后，脱离客观的主观性。“以为只要保持他们抽象的‘善良之心’，就可以改变现实，改变社会和改变自己。”^④修养理论的唯心主义实质决定了传统修养论只能局限于传统的“心性之学”，秉承改变不了社会就要改变自己的观念，虽有积极“入世”的成分，但更多的是消极“出世”。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0～111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页。

^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页。

^④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页。

(三) 对“正名”中“正礼明制”的批判

“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对“内仁外礼”的制度设计有着重大影响，以“仁”为体，“礼”为用，从而构建起系统而完整的制度体系。对“正名”中正礼明制的批判，既要批判外在的“礼”，又要批判内在的“仁”。

1. “礼”逆历史潮流

正礼明制作为“正名”思想的核心或“正名”的纲领性措施，既是孔子“正名”的目的，又是贯穿于整个“正名”过程的主要精神。将损益之后的礼作为一种新礼还是旧礼之争，直接演变成孔子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抑或是顺历史潮流还是逆历史潮流。《论语》中，“言‘礼’者三十有九章，‘礼’字凡七十有五见”^①。针对孔子提出的“礼有损益”争议尚多，有人认为“孔子主张的礼已经基本上不是周礼，而是一种新的礼了”^②，如郭沫若在《孔墨的批判》一文中说：“在孔子当时的所谓周礼又已经比周公时代更进步了。”^③理由简言之就是损益后的“礼”如新酒虽注入旧瓶但还是新酒，问题关键在于这个旧瓶中还剩多少旧酒，新酒与旧酒的比例是多少。蔡尚思认为：“孔子以三代的礼为不变的‘宗’。这是最主要的大礼方面。但三代的礼也各有损益即随时变革，这是次要的小礼方面。‘不变’的是大礼，‘万变’的是小礼。”^④其实从孔子所向往的社会来看损益之礼，孔子是“信而好古”的守旧派无疑，“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以“周礼”为历史评判标准，主张从新兴富强的大齐国倒退至固守礼教的小鲁国再倒退至周公之道的历史演化，对周礼的损益也就是恢复到西周的时代之礼，无疑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2. “仁”的历史局限

《论语》中“言‘仁’者五十有八章”。赵纪彬曾经指出，“‘仁’字凡百有五见”。对“援仁入礼”还是“克己复礼为仁”这一争议，他指出，孔子“能以亲身践履西周奴隶制度就是‘为仁’的实际内容”^⑤。假使“援仁入礼”能够实现，将“仁”作为一种时代的精神，“礼”作为一种时代的实践，那么“仁”是否又能为“礼”提供理论指导呢？答案又是否定的。“社会基础变了，政治生活的内容也变了，政治信念或道德准则必然跟着变。孔子看到这种变化，却不能使自己的观念适应社会存在的变化”^⑥，这就说明问题的根本在于“仁”是不是符合社会的需要，“仁”的观念若不合时宜，在具体的“正名”中必定出错。总体

① 赵纪彬：《论语新探》，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88页。

② 蔡尚思主编：《十家论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8页。

③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6页。

④ 蔡尚思主编：《十家论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0页。

⑤ 赵纪彬：《论语新探》，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88～289页。

⑥ 蔡尚思主编：《十家论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7页。

来看孔子所说的“仁”除了其鲜明的阶级性之外，其僵化的思想实质跟不上历史的潮流，甚至逆历史潮流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后。

（四）对“正名”中“修己安人”的批判

有人说：“孔子所谓‘人’和我们现在所谓‘人’的意义差不多。”^①真实的情况是不是这样，这关系到我们理解《论语》中“修己以安人”中的“己”与“人”，也关系到对“正名”价值旨归的批判。

1. “己”的阶级统治本质

《论语》中“‘己’出现29例”^②。“己”与“自”或“我”相同，与“人”或“他”相对。对于“己”的本质，赵纪彬指出，“孔丘沿用了奴隶主贵族人‘己’对称、自称为‘己’的传统”。从这里看孔子之“己”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代表了统治阶级之“己”。“己”具有阶级性还不主要是批判的问题，批判的核心在于“克己”是否能真正“为生民立命”。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由己”，“以‘己’为‘为仁’实践的主体及‘取譬’方法的出发点”^③后，批判肯定不在于“己”或“克己”本身，而在于与“己”相联系的内容，即“仁”“礼”身上。当“礼”“仁”具有剥削性质之后，“克己”相当于对这种反动理论的实践，是不可能完成儒家政治理想的。除此之外，“为仁由己”也有“‘无己’即不能‘为仁’之义”^④，如果没有统治阶级的利益，也就没有所谓的“仁”了。

2. “人”的抽象性虚伪性

有人认为，春秋时期的“人”是一种泛指，指代一切人，没有具体政治上的意义，如孔子讲“爱人”指代爱一切人，因为孔子讲“泛爱众”就是指众人。这种抽象的人掩盖了阶级剥削的本质。杨伯峻对此做过解释：“狭义的人只指士大夫以上各阶层的人。”^⑤如孔子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人”和“民”相对，“人”与“民”的对言说明他们二者是有区别的。同样的，孔子拿“修己以安人”与“修己以安百姓”对举说明“百姓”并不包括在“人”的范畴之内。赵纪彬在《释人民》中引《论语》言及“人”和“民”的一百多条考证，指出在春秋时期根本不存在“人民”这一概念。“‘人’与‘民’相当于奴隶制社会的两大阶级，‘民’是奴隶阶级，‘人’是奴隶主阶级。”^⑥既然春秋时期“人”是统治阶级的代称，属于君子的范畴，那么与君子相对的“小人”是否又指代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哲学研究编辑部编辑：《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75页。

② 宋德刚：《先秦儒道思想中的“己”与“自”——以孔子、老子为例》，《现代哲学》2019年第6期。

③ 赵纪彬：《论语新探》，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页。

④ 赵纪彬：《论语新探》，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95页。

⑤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5页。

⑥ 赵纪彬：《论语新探》，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7页。

老百姓或者其他被剥削阶级呢？赵纪彬通过考证，认为这也是对“小人”的误解，“《论语》所说‘小人’乃与‘复礼’的‘君子’相对立的‘人’中的变革派别”^①，与奴隶无关。故春秋时期的“人”指代统治阶级，“安人”指代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利益分配或政治秩序。那么问题又出现了，孔子不是还说了“安百姓”抑或“安民”吗？我们再来看紧接“修己以安百姓”后面的论述，“尧舜其犹病诸”，也就是说“安百姓”的任务连尧舜这样的圣人都难以完成，更不用说自誉为君子的孔子能够完成了。其实孔子也并未打算“安百姓”，虽然他提出“有教无类”的思想接近于“安百姓”，但是直接目的不是使人民生活得更好，而在于驯化人民安于现状，不要造反。

三、党的自我革命是对“正名”以“正政”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党的自我革命如何能与儒家“正名”思想联系在一起。恩格斯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几乎可以发现以后的所有看法的胚胎、萌芽。”^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③。这需从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认识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这并不是说“正名”就是历史上的自我革命抑或党的自我革命是新时代的“正名”。党的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结果，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生深刻的“化学反应”的结果，其根本性质是马克思主义的。

（一）鲜明的问题导向是自我革命的逻辑起点

同《论语》中“正名”以“正政”的逻辑起点一样，党的自我革命的提出源自新时代党的建设面临着急速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面临着党内外突出存在的各种问题和挑战。与“正名”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人能对时代发展规律进行科学把握，对党建领域的主要矛盾进行科学回应。

1. “辨方位而正则”与党的自我革命的出场

辨方位的根本意义在于“为一定历史时期的人们确立时代坐标、明确时代本质与特征、把握时代主要矛盾和发展趋势”^④。第一，自我革命是对“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⑤ 矛盾的回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共产党宣言》

① 赵纪彬：《论语新探》，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02页。

③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页。

④ 《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姜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期。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66页。

中，马克思、恩格斯科学阐明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① 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为了解决这个时代的矛盾，而党的自我革命的提出就是为了使无产阶级政党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从而更好地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第二，自我革命是对新时代矛盾的关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理论的产生，源泉只能是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动力只能是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现实要求。”^②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敏锐察觉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适时地做出了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变换的判断，这是党自我革命的依据和导向。在社会革命中，“涉及矛盾和问题的尖锐性”^③ 前所未见，对党自身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要求。辨方位的目的是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法则。通过对大、小历史时代的分析，找出解决矛盾的关键所在：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

2. 党的自我革命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对“大党独有难题”的回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④，而党的自我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必然以“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⑤ 为导向，这个突出问题就是“大党独有难题”^⑥。第一，“大党”凸显了党性和人民性的特色。从党员人数与组织规模来看称之为“大党”，从肩负的历史使命与永葆先进性与纯洁性的任务来看称之为“大党”，从致力于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与人类的崇高事业来看称之为“大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如何成就“大的样子”是对这一矛盾的回应。第二，“独有”凸显了矛盾的特殊性。无数政党生生死死，分化组合，有百年历史的政党屈指可数，但其中的大多数已经疲态外露，老态龙钟，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正青春？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善于发现自身问题，解决自身问题。“大党独有难题”正是中国共产党善于发现问题的典型代表。在第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将这些“独有”难题用“六个如何始终”进行了总结，这六个基本问题是党的自我革命中的核心问题，构建起党的自我革命的理论框架与实践指南。

（二）打铁必须自身硬是自我革命的逻辑展开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

① 习近平：《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求是》2019年第22期。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63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516页。

④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0页。

⑤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0页。

⑥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3页。

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①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原有的“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提法表述为“打铁必须自身硬”^②,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沿用了该提法,指出“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③。从“还需”到“必须”,一词之差中体现了解决自身问题的决心变深、力度变强。为了把党锻造成一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坚硬钢铁,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个目标,围绕“自身”这个主体,以“硬”为品质,党的自我革命得以逐步展开。

1. 锻造“坚硬钢铁”在于“主动彻底改变自身”^④的精神

“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作为我们这个大党必须解决的独有难题之一,表明自我革命是围绕“正心修身”而展开。《论语》“正名”思想主要沿着“正心修身”的逻辑展开的根本原因在于不懂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因而找不到“外王”之路,而被迫走向“内圣”,最后也落入唯心主义的泥潭不能自拔。党的自我革命也是围绕改变自身而展开,但是这种“正心修身”首先具有主动性,并非向外找不到出路而被迫进行的“内圣”,而是在“第一个答案”基础之上的再探索;其次具有自觉性,这种自觉性与延续两千多年的“内圣”逻辑相关,是对传统“内圣”转化与创新的文化自觉;最后具有彻底性,因为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之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避免落入唯心主义的窠臼。

2. 锻造“坚硬钢铁”需要提升“四自”的功夫

为应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党的十七届七中全会全党提出“四自能力”^⑤,十八大对此沿用,自此“四自能力”成为党建领域的一个重要术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自我革命与“四自能力”在党的重要文献中首次一起出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四自能力”去掉了“能力”后缀成为党提升自我的“一套功夫”。正是由于“四自能力”与“自我革命”的使用内涵具有相当的接近性,因而在党的权威政治文本的演化中二者最终产生了密切的语义连带关系。^⑥从这个方面来看,党的自我革命始终指向“自我”。

(三) 完善制度规范体系是自我革命的逻辑重心

礼制的目的在于安定人心,实现社会秩序化,但是相较于这种政治生活秩序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0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3页。

④ 甄占民等:《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7页。

⑤ 即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

⑥ 参见甄占民等:《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0~41页。

与社会人伦关系的构建，“礼制”最根本的目的在于掌握政权，如果把政权都丢了还谈什么“礼制”。这也就是说“正礼明制”是以维持社会有序运转为目的而对社会关系进行的深刻调整，从而保障“正名”工作的顺利进行，但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巩固长期执政地位，这对今天党的自我革命有着启发意义。

1.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到“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

“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荀子继承了孔子“礼”的思想并进行外在拓展，赋予礼以规则制度的含义。“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前汉纪·孝武皇帝纪一》），古人尚能如此，更不要说当今的中国共产党人。“有制”才能“有治”，就党的自我革命而言，制度建设极其关键。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至“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这十几年时间，制度建设从开始作为一种限制权力滥用的治党、管权、治吏工具上升为规范化、程序化的制度体系。在“破旧”与“立新”、“顶层设计”与“微观建设”、“立制”与“执行”的相互结合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为推进自我革命提供制度保障，充分发挥依规治党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政治保障作用。

2. 完善制度规范体系在于正自我革命的秩序之名

如果说“名”为礼仪、制度的具体性的法则，那么“正名者按盛周封建天下之制度，而调整君臣上下之权利与义务之谓”^①。“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礼记·经解》）“礼制”的作用在于保障“正名”的实施。毛泽东说，“‘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②，那就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如果沿着这样的思路理解，党的自我革命就是正革命秩序之名的延续。党的自我革命是“使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③，而完善制度规范体系则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党的自我革命的实施。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作为新的伟大工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以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健全监督体系为基点，以形成纠正偏差机制、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为抓手，以发挥政治巡视利剑作用，用好问责利器为举措，以增强党内法规的权威性和执行力、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增强监督实效等为目标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构建，来保障党的自我革命有规可依、有法可依。

（四）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是自我革命的逻辑归宿

为了实现“正名”的价值旨归，儒家采用正己正人、推己及人的办法来达到“安人”的目的。而党的自我革命本身可以说是“正己”的行为，中国共产

^①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4页。

党只有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引领人民完成社会革命的任务，才能实现执政为民的目标。

1. “修己安人”与无产阶级的双重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题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最高目标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①如果说“修己”“安人”是传统儒家的双重历史使命：那么马克思主义政党也有这样的双重历史使命：一是解放自身，二是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②，但这也并不否定无产阶级在一边改造社会中一边改造自己，也并不否定无产阶级在改造自身主观世界的同时是为了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解放自身即与“修己”相契合，即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③。解放全人类即与“安人”相契合，即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④。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在对由“内圣”开出“外王”、由“修身”至“治国、平天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而来。

2. 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既与“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轨度其信，可明征也，而后可以治人”（《左传·襄公二十一年》）类似，也与孟子所言“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孟子·尽心上》）相近，即在做到正己的基础之上，才可以教导他人、规范社会，为社会发展指明前进的方向。但是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与传统儒家“修己”“安人”的根本区别在于可实践性。这种实践性决定了这种引领“不是一个单向的领导工作，也不是各方面引领的机械组合，而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具有鲜明的整体性、全面性和协同性等特征”^⑤。它有根本的立场、明确的目标、组织的基础、理论的指南、精神的支撑、历史的资源等等，它使中国共产党在引领社会革命中越来越强。

四、结语

《论语》“正名”思想以“己”为主体，从解决名实矛盾的“正名”出发至“正礼乐”再至“正民”的“正政”之路，毛泽东称之为“正封建秩序之名”^⑥。

① 李秀林等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33页。

② 李秀林等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34页。

③ 《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42页。

④ 《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42页。

⑤ 田旭明：《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内在逻辑和规律叙事》，《广西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

⑥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页。

这与党的自我革命围绕“自身”将党锻造成一块“坚硬钢铁”，以鲜明的问题导向为出发点，完善各项制度规范体系，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正革命秩序之名”^①逻辑有着“契合”之处。“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②，结合“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③，需要对这条传统的“正政”之路上的糟粕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进行批判，对其蕴含的时代精华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④。党的自我革命正是在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性探索。

The Thought of “Rectification of Name” to “Rectification of Politics” in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

Zhu Fufu Huang Zhigao

Abstract: Adhering to the root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soul of Marxism is the basis of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rom the basic viewpoints of Marxism, re-examining the “rectification of name” thought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we will find that “rectification of name” and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 have more “correspondence” with each ot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gical development, both of them revolve around the subject of “self”. From the viewpoint of logic, both have institutional designs dedicated to maintaining the long-term stability of the country. From the viewpoint of value orientation, both of them have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and stabilizing the world”. Starting from the core of “rectification of name” to “rectification of politics” thought, this paper criticizes the starting point, development, focus and purpose of “rectification of name” to “rectification of politics” with Marxist method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self-revolution of the Party is not an accident, but the result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30 页。

②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6 页。

③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6 页。

④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6 页。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traditional values of the vast number of people.

Keywords: “Rectification of Name”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Marxist Criticism;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 Enlightenment

[责任编辑: 李谷悦]

文化治理的理论渊源、鲜明特征和基本原则

郭晨娟 施惠玲*

【摘要】随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正式提出，我国学界愈发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以及文化治理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的重大意义。探究文化治理的理论渊源，梳理文化治理在我国的研究历程，明确“文化治理”这一人们进行文化生产、文化传播和文化消费等的一切与精神文化相关的治理活动，考察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文化治理的实践性、阶级性和人民性特征，尝试提出文化治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进我国文化治理体系和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文化治理；文化生产；文化传播；文化消费

2023年10月7日至8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命题。我国学界愈发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及文化治理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的重大意义，亟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习近平文化思想进行深刻学理阐释，把对文化治理的研究和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力争找到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可行路径。

一、文化治理的理论渊源

梳理文化治理的源流，对我们研究和推进文化治理发展具有重要的前提性意义。

（一）西方文化治理的理论借鉴

文化治理思想在西方出现较早。起初葛兰西发展出文化霸权理论，他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对统治阶级维持统治秩序的重要性，亦即重视意识形态统治或者说

* 郭晨娟，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施惠玲，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治理、政治传播。

“文化”统治的重要性。随后,福柯提出治理性(治理术)概念,强调通过自由进行治理。^①在葛兰西和福柯等人理论的影响下,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本尼特将“治理性”概念引入文化研究之中。他提出的“社会生活的治理化”理论影响深远,指出国家试图通过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等公共场所潜移默化影响公民,从而达到社会生活的治理化目标。他强调,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更是一种作用于社会生活之上的治理机制,文化治理在公共生活领域具有实用性。西方的文化治理思想可以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期以发挥文化治理作用提供重要借鉴。

(二) 我国文化治理的理论源流

“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治理所具有的伟大力量,正在被一次又一次确认。”^②我国古代文化治理的滥觞或许最早可追溯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周易·系辞下》)。远古时代没有文字,人们结绳记事,治理天下。随着时代变迁,结绳不够用了。后代的圣人(据说是仓颉)就发明了文字,用文字书契来代替结绳。从“结绳”到“书契”的转变,就是中华民族早期“治”和“治理”的萌芽。由于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高,为调和不同的个体使之采取合作的行动、完成共同的事务,“结绳”和“书契”作为特殊的协调性的文化工具出现了。因此可以说,文化在我国的出现天然具有治理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对文化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具有的重要作用的可见一斑,古代的文化治理思想成为现今文化治理的思想源头。

我国学术界的“文化治理”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94年。何满子在《文化治理》一文中指出,“文化治理”旨在“抵制庸俗文化、坚持健康趣味”^③。以“文化治理”为主题,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的搜索结果中,排除无关研究资源可知:第一,相关论文的最早发表时间为2003年,是王方群和徐顽强发表的《浅议高科技园区的文化治理》一文^④;第二,在北大核心数据库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库(CSSCI)数据库中,相关文献最早出现在2006年,是靳永翥在《东南学术》上发表的《“顾客”理念及其引发的文化治理困境》。^⑤这说明在2006年以前文化治理研究仍处于探索初期,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学术理论探讨。

自2012年起,我国学界对文化治理的研究进入积极探索的阶段。有些学者以文化治理为研究视角来分析我国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例如,刘华和黄金池在文

① 参见[美]史蒂文·卢克斯:《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彭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2页。

② 何山石:《十三经廉政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③ 何满子:《文化治理》,《瞭望新闻周刊》1994年第9期。

④ 参见王方群、徐顽强:《浅议高科技园区的文化治理》,《中国高新区》2003年第6期。

⑤ 参见靳永翥:《“顾客”理念及其引发的文化治理困境》,《东南学术》2006年第4期。

化治理视域下进行我国知识产权文化政策结构性优化研究。^① 张兴研究文化治理视域下图书馆发展路径。^② 范玉刚探讨文化治理视域下的城市文明典范塑造。^③ 有些学者将文化治理应用到具体领域。比如,李成恩和常亮提出,对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体系施以文化治理,是推动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④ 吴尚丽以贵州省黔西南州为例,探讨易地扶贫搬迁中文化治理的重要意义和积极效果。^⑤ 还有学者对我国学界的文化治理进行了系统梳理。蔡武进总结了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 70 年的历程和走向。^⑥ 肖波宁和蓝玉从理论、政策与实践对三十年来的中国文化治理研究进行了概括。^⑦ 总体上,这一阶段我国学界的研究主要是逐步深入对文化治理经验和方式的思考。

概言之,文化治理是一种集理念、制度、机制和技术于一体的治理形式与治理领域。^⑧ 正如罗红光为《文化关键词》所作序言中提到的一样:“当今人类面临的问题是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如环境、人权、教育、福利等,这些问题的根基是具有价值导向的文化,也就是说人类问题的核心是文化问题。”^⑨ 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我们要充分重视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解决相关问题就是我们党在进行治国理政中的文化治理。文化治理指人们进行文化生产、文化传播和文化消费等的一切与精神文化相关的治理活动。马克思主义强调文化在现今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主张将文化实践运用到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发挥文化和经济、政治等其他方面的联动作用,以期推动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治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简言之,文化治理在将文化作为治理活动的对象的同时,也将文化作为治理的功能和手段。

① 参见刘华、黄金池:《文化治理视域下我国知识产权文化政策结构性优化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② 参见张兴:《文化治理视域下图书馆发展路径研究》,《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0年第10期。

③ 参见范玉刚:《文化治理视域下的城市文明典范塑造》,《理论视野》2023年第4期。

④ 参见李成恩、常亮:《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体系的文化治理及其实现路径》,《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

⑤ 参见吴尚丽:《易地扶贫搬迁中的文化治理研究——以贵州省黔西南州为例》,《贵州民族研究》2019年第6期。

⑥ 参见蔡武进:《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 70 年:历程和走向》,《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⑦ 参见肖波宁、蓝玉:《中国文化治理研究三十年:理论、政策与实践》,《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⑧ 参见祁述裕等:《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34~35页。

⑨ [日] 镜味治也:《文化关键词》,张泓明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序”第3页。

二、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文化治理的鲜明特征

马克思主义文化治理思想强调,国家对治理的关注点应发生一个根本性的转向,不再把治理单纯局限于经济领域,要看到文化治理的现实力量,这与文化治理的实践性、阶级性和人民性特征密不可分。

(一) 文化治理的实践性

之所以强调文化治理,是因为学者越来越看到文化与经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通过其可以提高治理绩效。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包括文化主体、文化结构和文化动力等在内的文化结构是多层次的。在这个体系中,既有物质的力量,又有精神的力量,文化的能动作用又是一个重要层次。不仅如此,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和一定阶段的文化水平相适应,并受到相应的文化的影响,都显示出各个阶段不同的文化治理特征。并且描述了生产力发展对观念文化等上层建筑变革的决定性作用,经济、政治对文化样态的形塑充当了决定性因素。反过来说,即便文化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但是文化与生产力具有本质关联,文化的发展方向在规律层面受到生产力发展指向的引导与规制,二者的发展水平往往表现出高度一致性。当文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时,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生产要素,可以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当然这需要通过文化治理作用于制度等来发挥功效。关于经济、制度和文化的关系,恩格斯曾指出:“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①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提醒我们需要利用文化治理建立科学的制度,以此推动国家的发展进步。

要把文化治理放在关乎社会历史发展前途的高度来看待。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市民社会是指社会的物质生产形式即经济基础,它决定着文化治理等上层建筑的发展,经济是基础,文化治理是上层建筑,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从社会历史进程来看,一定的文化治理是一定的经济的表现,而一定的文化治理又反作用于一定的经济,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文化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相关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文化治理与经济的关系更为密切。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文化治理与经济紧密联系,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经济表现形式之一,而一定的经济又反过来影响着文化治理的水平。此外,随着生产力和科技水平不断提高,文化治理与经济之间的联系呈现出日益紧密的状态。只有二者协调发展、相互促进,才能实现共同进步与繁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对立统一规律,文化治理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

与经济之间也存在着对立统一规律，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总之，文化治理不是一种绝对的文化决定论，而是在肯定社会经济是文化力量的物质基础的同时，强调通过文化治理可以发挥积极作用，鼓励社会经济向着好的方向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文化需要以经济为物质支撑，文化又可以发挥积极作用，鼓励社会经济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文化力量作用于经济以及经济力量作用于文化，是一个相互的过程，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文化可以把握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进而发挥引导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作用。二是当社会核心价值观内化为情感化的人文元素时，就能以内聚力的形式对人的观念和行为产生巨大影响，由此产生的巨大心理能量可以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经济、文化相互纠缠，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正因如此，现代国家都不遗余力地推进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更是不乏通过强制方式以期实现硬实力与软实力的融合。这就是文化治理愈发重要的体现。

（二）文化治理的阶级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施蒂纳“夸大了他周围与他最接近的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①。那些力图取得全方位统治地位的阶级，都无一例外地把自己的意识形态表达为社会全体成员的普遍意识形态，都无一例外地要求对被统治阶级实行物质和意识上的全面控制。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中，当一个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占据统治地位时，它所宣扬的意识形态就成为国家这种“虚幻的共同体”的集体意识形态，会影响到社会全体成员。此外，任何一个阶级在没有上升到统治地位时，都会尽力扩大自己的思想影响，而当它上升到统治地位时，就会利用各种宣传机构和宣传手段，使自身的文化思想成为社会的主导意识。而且，在历史的进程中，后来的统治者总是把自己的文化思想推向更远的地方，使其“所依赖的基础要宽广一些”^②。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批判。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揭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因果联系，资产阶级的发展同时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壮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此消彼长的力量对比不只是物质上的变化，在精神文化上的表现也是如此，“无产阶级越发展……资产者就越是变得畏首畏尾”^③。“如果其他阶级出身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④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依托无产阶级却拿自己没有学会的东西教给别人的教育者要想彻底成为无产阶级，就要无条件地摒弃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的世界观，学会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在无阶级内开展教育工作。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文化治理的阶级性、排他性进行了宏观概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39页。

主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必须是无产阶级世界观，这就需要无产阶级进行文化治理，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期，无产阶级并未上升为统治阶级，因此他们并未对无产阶级的文化治理的阶级性进行详尽论述。他们的后继者列宁进一步具体化了文化治理的阶级性思想。列宁提出“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①。在文化的诸因素中，哲学、宗教、艺术等通常是通过制度等政治手段来影响社会发展的，不可避免带有阶级性。列宁认为，要使出版物成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应该是消除资产阶级等其他阶级的消极文化影响，文化生产要与无产阶级政党的文化思想保持一致，不唯利、不唯名。

（三）文化治理的人民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强调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必然性时，也指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偶然性，这是在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重大影响下形成的。和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论述的一样，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②，会给他过多的荣誉和侮辱。在人的参与下的各民族生产力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的差异及现实道路选择不同，包括文明形态等的实践不同，尊重文化价值和多样性是进行文化发展的首要前提，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强调文化发展中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要性。

文化的阶级观和人民观是一体两面、相互对立的。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强调“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③。正反经验告诉我们，在文化治理中要坚持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方面，在社会结构中，文化居于上层建筑系统之中，具有阶级性，反映统治阶级的性质和利益，并通过主体能动性反作用于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领域。另一方面，文化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并确证自身的一种存在方式。我们现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关键是要认识人、理解人，以此能够按照人的本质来进行文化实践活动。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因为团结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百年探索，才得以成功创造不同于并超越于旧中国文明形态的中华文明新形态、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重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化治理的实践性、阶级性和人民性，有助于我们再次发现这一概念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① 《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3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9页。

三、文化治理的基本原则

现今我国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文化治理思想，并且应用其指导文化治理实践。具体而言，文化治理实践领域可以分为文化生产、文化传播以及文化消费领域的治理。

（一）文化生产：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马克思认为文化生产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不是意识决定生活”^①，而是生活决定包括意识在内的文化，归根结底是物质生产决定文化生产。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物质生产对文化生产决定性力量的基本方法包括以下两点。一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联系的观点看待劳动和文化之间的联系。“随着劳动的社会性的发展……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②他们强调文化是随着劳动实践活动而产生和发展，尤其是通过文化生产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二是马克思恩格斯从实践出发来考察文化。他们认为文化和实践是密不可分的，凸显了文化的实践性及社会性。总之，文化是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进行良性的文化生产活动至关重要。

正如余敏所说：“从15世纪开始的现代化过程催生了文化生产的理论和实践。”^③现代化与文化生产形成双向互动关系。在追求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文化生产被动纳入资本价值增殖运动中，这会大大拓宽人的文化认知眼界、提高人的文化素质，但同时又异化了人，迫使人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进行不良的文化生产。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数据时代呼啸而来，当大数据技术裹挟着深刻的利益诉求日益深入文化生产领域时，文化生产终极价值的实现就堪忧了。当前大数据技术运用于文化生产的实际动因是利益驱动，大数据时代文化生产的实质是资本逻辑下获取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其最终走向将是人的异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生产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实现。要实现这个终极目标，前提是必须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正如毛泽东强调的：“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④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其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要承担起文化治理的领导主体责任，尤其是成为文化生产的领导核心。只有“聚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个首要政治任务……加强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0页。

③ 余敏：《对现代化语境下当代中国文化生产的思考》，《长沙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

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为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坚强政治保证”^①，我们党才能强化文化治理的顶层设计，调动各方面的文化治理主体力量，破解文化治理领域的重难点问题，推动文化治理的工作进程。只有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才能坚持在文化生产领域中作为目的的人与作为手段的人相统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我们应当明确人不仅是手段更是目的，大力发展文化生产是满足人民美好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手段，要坚持价值理性为体、工具理性为用，扬弃文化异化，使包括文化生产在内的实践活动真正成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以此促进人之全面自由发展的实现。

（二）文化传播：坚持走中国特色文化治理之路

当今我国十分重视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认为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生产要素不仅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信息和管理，也包括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可以凝聚团队精神、形成奋斗力量、激发创造活力。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激励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中带领中国人民办成了许多大事要事，取得了彪炳史册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文化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和新引擎。党的十八大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提出“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这些政策一以贯之，为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新的动力，激发了社会主义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将文化产业视为现代经济的重要部分，强调其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关键作用。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与经济的双向互动，使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今后我们也更应注重文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作用，大力推进文化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②。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习近平文化思想相契合，正是文化治理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文化思想突出强调文化的主导作用，指出文化不仅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而且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驱动力。

随着融媒体时代的到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为我们党的文化传播带来冲击与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当前，

^① 张烁：《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人民日报》2023年10月9日。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2页。

只有坚持把文化与治理相结合,走中国特色文化治理之路,才能在抵御西方不良文化思潮的同时,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潜移默化地引领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听党话、跟党走,最终汇聚成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国要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要善于利用融媒体的特点与优势,用现代的方式传播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将多元的文化理念与创新的文化产品相融合,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走中国特色文化治理之路。

(三) 文化消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文化消费”是专属于人类的享受型的实践活动,人类是文化消费活动的唯一主体。人是文化的动物,但是,与动物不同,人类是唯一以文化的方式生存的存在者,而其他动物都不能够真正理解文化的意义,更不用说进行文化实践活动了。“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②“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即实践,包含“文化实践”,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之一。任何文化都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作为人与生俱来的、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的存在方式。而且,马克思更为强调:人作为有生命的个体存在,其本质不在于他的自然性,而在于社会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③。作为人的对象化活动的文化,更是社会存在物。这自然包含双重含义,一方面,文化实践活动包含文化消费活动,确证人的本质力量;另一方面,文化应该是由人创造并且为人消费的对象。

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的创造者往往不是文化的享受者,他们往往是“单方面的、畸形的发展”^④。但是,人民群众是文化的最终创造者,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文化发展的最终动因,为此要消除文化异化,用人的全面发展逻辑取代资本逻辑,使人民大众成为文化的享受者。马克思恩格斯离开思维观念和意识等文化范畴,揭示“现实的人不是人”即“人的二重化问题”的根源在于从现实生活条件找寻现实的解决之道。这也和我们当前所追求的人民精神共富、文化共享相契合,文化共享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前提的,而社会生活条件为个人发展提供基本保障和空间。

为此,在文化消费中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我们党深刻认识到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是亿万人民的事业,人民是文化实践的主体,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才能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我们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在文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2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6页。

化治理中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注重倾听人民声音、回应人民关切、增进人民福祉，“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①。不断加强互联网的普及，通过互联网的普及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距和地区居民文化消费差距，努力使党的文化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得到人民群众衷心拥护，让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成果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综上，探究文化治理的理论渊源，梳理文化治理在我国的研究历程，总结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文化治理特征和实践基本原则，不仅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推进我国文化治理体系和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还期望在当前复杂多变的世界形势下，重视和发挥文化治理的作用，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助力。

The Theoretical Origin,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Basic Principles of Cultural Governa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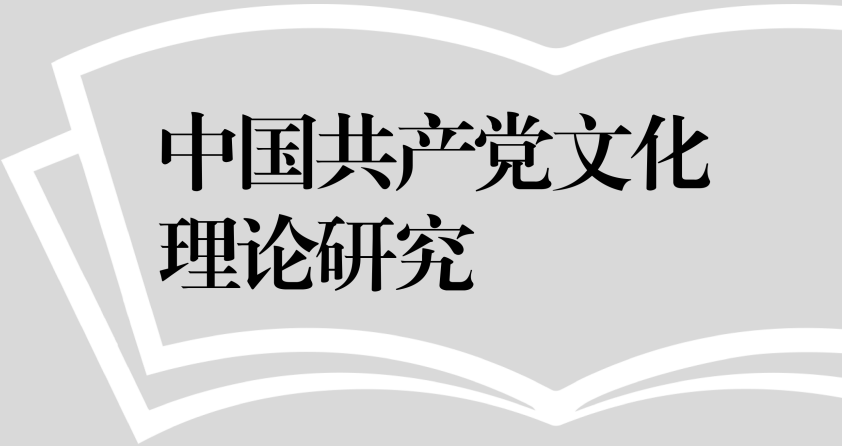
Guo Chenjuan Shi Huiling

Abstract: With the formal proposal of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have increasingly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e and the great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governance in the process of embrac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a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theory origin of cultural governance, comb cultural governance in our country, clear "cultural governance" which the people conduct all governance activities related to spiritual culture such as cultural production, communication and consumption, examine the practical, class and people-oriented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governance under Marxist vision, try to put forward the basic principles which cultural governance should follow,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lead the Chinese people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ability.

Keywords: Cultural Governance; Cultural Production; Cultural Dissemination; Cultural Consumption

[责任编辑：李谷悦]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45 页。



中国共产党文化 理论研究

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成就百年伟业的文化密码^{*}

查建友^{**}

【摘要】中国共产党铸就了百年伟业，分析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对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文化的视角，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成就百年伟业的深层原因。理论创新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发挥着凝集共识、引领思想、支撑发展的重要作用，并将继续托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关键词】百年伟业；理论创新；文化密码；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改变自身命运的百年，也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百年。习近平总书记精辟地概括为：“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①今天，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如何科学全面地认识和研究、评价和总结党的一百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基于文化理论的视角，理论创新贯穿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引领着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始终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使共产党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展壮大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并长期执政、长盛不衰；使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披荆斩棘、攻坚克难，创造为世人瞩目的中国奇迹，为世界发展贡献了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不畏险阻、勇攀高峰，正一步步从救国大业、兴国大业走向民族复兴伟业。

一、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成就百年伟业的深层原因

纵观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成就非凡伟业的深层原因。

^{*} 本文系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力建设的百年历程和基本经验研究”（项目编号：YB2022008）阶段性成果。

^{**} 查建友，哲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79～480页。

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推动理论的创新创造,始终以先进理论保持初心使命,以先进理论引领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与世界同发展共进步;中国共产党敢于直面问题和危机,不断纠偏拨正、坚持真理,勇于自我革命,持续保持旺盛的生机和活力。

(一) 坚持理论创新,不忘初心,保持党的使命感、责任感

生命之树常青,源自理论之水常新。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并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不断推动理论的创新创造,始终以先进理论保持初心使命,以先进理论指引实践行动,以先进理论激发动力生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理论创新持续不断,涌现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理论成果,指导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阶段承担起带领中国人民开展救国、建国、兴国、富国、强国、民族复兴等历史重任。

革命战争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无数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不屈不挠探索中国的救亡道路。其间,党的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为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革命最终取得了胜利。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实现“立国”“兴国”以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理想。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整个社会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造、建设运动。其间,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成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包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尊重价值规律,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①,为这一时期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推进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具体的社会实践领域,从1957年开始,毛泽东思想的贯彻落实犯了“左”的错误,越来越偏离正确的轨道,最终酿成悲剧,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事业。

改革开放时期,十年动乱和长期贫穷落后的压力推动国家社会生活的正常化,“富国富民”和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理想。其间,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创新性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把党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2~13页。

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发展社会生产力上来，改革开放在不断探索中向前推进，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这一时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也是党随着社会实践变化所进行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邓小平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科学地思考和回答了时代问题，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时代，在国内外新情况下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理想。其间，共产党理论创新典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于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现实情况，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坚持理论创新，与时俱进，强化党的时代感、进步感

时代是思想之母，思想理论深深植根于一定时代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思想理论是社会实践、时代需要的产物，重大创新性思想理论必然是对社会实践重大课题的创造性和系统性回答。而思想理论一旦被创新创造出来，又以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力量凝聚、方向引领等方式反作用于实践活动。“革命的思想是一种炸药，它不是世界上任何爆炸物所能代替的。”^③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使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与世界同发展共进步。

从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始，如何创新性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与时俱进，就一直成为党的理论创新的头等大事。经过不断探索，我们找到了切实可行的办法，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创新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并激发其生机和活力，才能把握时代的脉搏，正确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

延安时期，随着抗日战争形势、国共两党力量对比的不断变化，许多重大的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0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09页。

^③ [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98页。

理论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因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国现实国情和世界发展趋势，推动理论创新，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科学建构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统一了全党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认识，正确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建设符合人民期盼的、顺应世界发展趋势的现代民主政治国家。理论引领现实，同时期的延安积极开展民主政治实践，确保大众民主自由权利的落实，陕甘宁边区政府呈现出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景象，极大地团结了社会不同阶层，调动了各方面积极因素，为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并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毛泽东在同黄炎培的对话中就认为：建设民主政治，让人民负起责任，参与政治、监督政府，就能跳出“人亡政息”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随社会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吸收、借鉴人类社会优秀文明成果，实现了理论上的创新创造，使我们党始终勇立时代潮头、走在世界前列。例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与市场经济关系紧密的市场精神、法制观念、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念被我党吸收到文化建设中来。再如，党的十八大把“民主”“自由”“法治”等理念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主动面向世界，努力博采众长，大力推陈出新的创新思维和文化自觉。新时代，在国内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强烈、国外部分国家对中国崛起误解及打压等情况下，我们党创新性地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和平崛起”战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并在实践中努力推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为人类未来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三）坚持理论创新，自我革命，增强党的危机感、紧迫感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走过弯路，经历了曲折和失误。但是，党敢于直面问题，不断修正错误、坚持真理，勇于自我革命，不断自我提升、自我超越，从而始终保持先进性和战斗力，带领人民不断向前。坚持以理论创新、思想改造推动党的建设，引领党的自我革命，以随时保持党的危机感、紧迫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重要法宝。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左”倾和右倾错误多次给党造成巨大损失，反思和解决这个问题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因此，中国共产党不断进行理论上的反思创新，并逐渐认识到：强化危机意识，加强党的建设并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一项

^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三——一九四九）》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87～688页。

极端重要的工作。在1939年10月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把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提出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①。延安时期，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主要方法的整风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最终改造了思想，整顿了学风、党风和文风，清算了党内“左”倾、右倾错误的思想根源，团结了党，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定的思想基础。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冷静地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②，全党必须继续保持和发扬革命精神。

改革开放时期，很多党的领导干部在物欲中迷失了自我，在“糖衣炮弹”的攻势下败下阵来，解决贪腐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场刻不容缓的攻坚战。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以理论创新引领党的自我革命，以制度建设维护党的肌体健康，时刻保持警醒以防腐拒变。邓小平强调“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③。江泽民提出党的建设是“新的伟大工程”，“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④。胡锦涛提出：“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⑤

新时代，以理论创新引领党的自我革命，牢固树立危机意识，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永葆生机活力，依然是党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我们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放松，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⑥“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使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⑦

总结中国共产党走过的一百多年辉煌历程，正是由于持续不断的自我革命、纠偏拨正，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强大的组织力、行动力和生命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页。

④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6页。

⑤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9～50页。

⑥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7期。

⑦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4页。

力，能不忘初心、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勇敢前行。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创新的历史经验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在进取中突破，于挫折中奋起，从总结中提高，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① 理论创新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根本方法、基本原则和关键做法上形成了极其丰富的经验，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

立足实践论方法挖掘理论创新的活水源头。理论创新植根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尤其是孕育、提升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纵观百年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无不着眼于大众的吃穿住行、交往状态、价值取向、道德实践等现实生活，考察分析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制度规范等，为理论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理论只有反映现实、贴近生活、贴近人民，关注人民的生产生活，了解人民的所思所想，融入人民的日常生活，才能获得人民的认可，才会生机勃勃、活力无限。如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深入实践，实地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改革开放后，围绕实践主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转换，理论创新、文化建设的主题也随之发生转换：从单一“红色文化”走向“多彩文化”即多样化文化，成为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文化管理走向文化治理，逐步走向依法治文，成为文化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坚持价值论方法凸显人民的理论创新主体地位。理论创新、文化发展的主体是人民，即文化的创造主体和享受主体。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始终把实现人民根本利益作为理论创新、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毛泽东强调：“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② 邓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

小平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凡是于人民有利的东西，无不尽力提倡与实行”^①，党和政府的工作一切以人民利益为标准，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衡量一切言行“对不对”“当不当”的最高标准，并以此标准来检验党的领导和作风。由此，“领导就是服务”^②。习近平总书记也一再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③

运用系统研究方法揭示文化发展、理论创新的本质规律。文化的发展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尤其是物质实践活动紧密相连，受物质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制约。只有立足于社会大系统，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理论创新活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④毛泽东也强调：“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⑤正是把文化置于社会大系统中来考察，分析实践活动中主体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正确认识和理解文化的地位、作用，把握文化的本质，中国共产党真正把握了文化的实践生成机制，揭示了理论创新、文化发展的本质规律，推动理论的创新创造和文化的发展繁荣。

（二）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理论创新的观念前提。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维护党的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思想基础，是理论创新和文化建设的理论指南。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思想、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关系的思想、文化发展趋势的思想（全球化和多样化）、意识形态思想等，为党的理论创新指明了方向。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与认识辩证关系原理表明，理论创新的源头在实践，须从社会实践出发来推动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实现了理论的创新创造：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现实催生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尽快使人民摆脱贫困面貌的现实催生了“改革开放”政策，实现党的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催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确保理论创新的性质和方向。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决定于经济基础，党的理论创新必然要坚持和服务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42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51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4页。

要求。“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①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针成为文艺发展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再一次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③。新时期，坚定“四个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环节。纵观党的百年历史，在理论创新、文化建设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文化建设的需要，也是保证文化建设先进性的必然要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引领文化创新助推人与社会的发展。人民是文化的创造者和享受者，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理论创新、文化发展才能活力不断、生机勃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根基和血脉在人民，“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④。确实，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植根于人民，依靠人民，一切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才能创造中国共产党的百年伟业。

（三）理论创新的核心经验

1. 激发主体活力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也必然是理论创新的主体和活力之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⑤尤其是人民群众中的知识分子群体，接受过系统和专业训练、掌握专门知识和技能、以生产传播精神文化为业，在理论创新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是文化生产和理论创新的主力军，是决定文化发展的关键力量。因此，文化的创新和繁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分子作用的发挥。回顾党的百年伟业，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正确对待知识分子，以包容、谦虚的态度对待知识分子的意见建议，为知识分子创设良好的社会环境，以激发知识分子活力，为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当下，要深入激发主体活力，一方面，可有步骤地探索推行“无条件基本收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④ 杨晔：《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人民日报》2018年4月9日。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5页。

人”（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 UBI^①）措施，为主体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真正激发释放主体的“创新”能量。一定程度而言，UBI的实施也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基本体现，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可以为创新创业提供更安全的环境，激发人的创新创造活力。事实也证明，在一些高福利、宽松自由的社会氛围里，人的创造性能得到极大激发。另一方面，深入推进法治建设，依法治文。党和政府必须认真落实宪法相关规定，切实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形成制度化、规范化、透明化的文化发展环境。只有法治才能保障文化的繁荣发展，才能保障文化创新活力的持续增强。根本而言，必须加强公民社会建设，启蒙公民意识，提升公民能力，保障公民权利，以培育现代化的公民。只有形成具有健全人格、自主意识的现代公民，文化复兴才有希望，民族复兴才有可能。而现代化公民的培养是保障文化创新活力生生不息的根本途径，是中国社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唯一途径。

2. 营造生态环境

理论创新是一种探索活动，实践结果难以预期，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需要宽松包容、允许试错的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但政治环境尤其重要。宽松的政治环境下，文化主体能免除后顾之忧，在自由、和谐的社会环境里，在不违背法律（良法）和社会公德的前提下，天马行空地思考，无所顾忌地探索，最大限度地激发主体的消费、传播和创造活力。

回顾历史，20世纪80年代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大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的僵化教条，营造了相对宽松、自由、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在此基础上，条条框框相对少了，对人的束缚减轻了，人们可以无所顾忌地自由思想、大胆创新，最大限度地激发出了创新创造活力。展望未来，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通过制度建设营造开放自由、容许试错和包容异见的社会环境，培育创新文化、弘扬创新精神，才能真正激发文化创新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3. 构建思想平台

思想文化市场通过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为理论创新提供了人力、财力支持，引入了先进的技术条件，形成了竞争机制，推进了创新成果转化，成为理论创新创造的孵化器；同时，在思想文化市场里，优秀的、高品质的文化产品才能凸显出来，人们才能真正选择自己需要的文化活动，真正发挥出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优势，为人们提供更好的精神产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

^① UBI是指共同体无条件地、定期地发给所有成员一笔现金收入，不附带工作要求或经济状况审查。这是美国尼克松总统在半个世纪前提出的一种社会治理理念。新冠疫情之前，UBI已经在芬兰、丹麦、英国、荷兰、法国、美国、肯尼亚等许多国家开始试验。为了应对新冠疫情，美国、英国、日本、丹麦等国家采取的纾困举措都带有UBI的色彩。参见谢小庆：《“躺平”有利于“双创”》，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文明与本能”。

综观当今各国,凡是具有成熟、完善的思想文化市场的国家或地区,各种社会思潮、理论主张充分对话,深入交流,往往能形成社会共识;伴随各种问题、矛盾的呈现,人们畅所欲言,把不满发泄出来,舒缓了社会紧张,培育了“和而不同”的社会秩序。当代中国,通过思想文化市场的交流、辩论,进而发现、引导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案例比比皆是,为进一步培育和完善思想文化市场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例如,柴静制作的以雾霾调查为主要内容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定程度上加速推动了政府对环境污染的治理进程;徐峥参演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对现实中医疗问题的关注,引发了全民热议,最终推动政府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升社会公共服务质量;媒体曝光的各种社会不公、旅游景区“脏乱差”、民众素质不高等问题,往往能激发起人们的热议、反思,进而集思广益,推动问题的解决。由上述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对于社会生活中的事件、矛盾、问题,在人们的关注、讨论中,不同观点往往能相互对冲、澄清,形成新的解释和更多的选择,进而化解矛盾、形成共识、引导解决。

展望未来,逐步培育和完善思想文化市场,能让14亿多中国人的精神飞扬起来,让文化活力喷涌勃发。不断完善思想文化市场,为不同的文化、文明开展平等对话、交流互鉴、相互启迪提供基础平台,有利于不同文化、文明间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创新的启示

理论创新奠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核心和关键在于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实现思想理论的创新创造,促使高水平文化作品喷涌勃发。思想理论的创新创造是文化发展的根本标志和主要方式,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现实表现和必然要求。只有源源不断的思想理论创新,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理论支撑。

理论创新托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民族复兴一直是中华民族为之奋斗的伟大理想和不懈追求,当前,我们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伟大的梦想需要伟大的精神托举。只有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实现思想理论的创新创造,才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缺少文化复兴的“民族复兴”将是一句空话。同时,民族的复兴最终落脚点是文化的复兴,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标识,文化复兴才能保证民族灵魂的清明和民族精神的强健,才能使民族长盛不衰、屹立不倒,缺少文化复兴的“民族复兴”注定是昙花一现。

理论创新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为了满足本民族的精神文化需要,更是为人类文化发展、文明进步作出贡献。创造出伟大的文化作品,启人深思,助人成长;创新出

先进的价值理念，引领人类不断追求自由、文明、和谐的美好生活；创造出新的社会制度，开拓出新的发展道路，为解决全球重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人类生活提供榜样，让人们活得尊严、自由、幸福。

Theoretical Innovation: The Cultural Code of the Centennial Great Achieve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Zha Jianyou

Abstract: The CPC has created a century of great achievements. Analyzing and summarizing the Party's major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in 21st centur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build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in the new era and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of great rejuve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s the deep reason for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oretical innovation runs through the course of the CPC's century-long struggl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athering consensus, guiding thought, and supporting development. It will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Chinese drea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Keywords: 100-Year Great Caus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Culture Cod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责任编辑：靳贺]

艰苦奋斗精神的时代内涵、价值意蕴及弘扬路径*

迟成勇**

【摘 要】 勤俭节约的生活品德、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及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等，构成艰苦奋斗精神的时代内涵。弘扬艰苦奋斗精神，对于涵养人们勤劳节俭的生活品德、提升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推进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及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都具有显著的价值意蕴。弘扬艰苦奋斗精神的现实路径是：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为根基，以青少年学生为重点，以各级领导干部为表率，加强艰苦奋斗精神教育；立足中华文化，创新方式方法，讲好中国艰苦奋斗故事；结合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立德树人为目标，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

【关键词】 艰苦奋斗精神；时代内涵；价值意蕴；弘扬路径

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人民自立自强的精神标识，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也具有超越时空、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中华民族祖先依靠艰苦奋斗传统美德，创造了绵延不绝、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大变革中，继承和弘扬艰苦奋斗精神，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和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采取切实有效的现实路径，坚持和弘扬艰苦奋斗精神，对涵养人们勤俭节约的生活品德、提升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及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都具有显著的价值意蕴。

一、艰苦奋斗精神的时代内涵

艰苦奋斗作为一种传统美德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总是随着社会

* 本文系 2023 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艰苦奋斗精神重要论述研究”（项目编号：2023SJZDSZ021）阶段性成果。

** 迟成勇，哲学博士，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哲学。

发展和时代变迁而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每个时期的艰苦奋斗精神内涵都充分反映其时代的特点，呈现出时代的独特内涵，既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又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勤俭节约的生活品德、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及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等，构成艰苦奋斗精神的时代内涵。

（一）勤俭节约的生活品德

从伦理角度讲，艰苦奋斗是一种美德，要求人们勤俭节约、奋发向上、艰苦创业。中国古代是个典型的农业文明，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主要靠天收，期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但是如果风不调、雨不顺，农业歉收，那么只能依靠节衣缩食渡过难关。落后的生产方式使人们在与大自然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过程中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浪费。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中华民族逐步养成了吃苦耐劳、勤劳节约的生活品德。《左传·宣公二十年》云：“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百姓的生活或生计在于勤劳，勤劳就不会出现物质资料的匮乏，勤劳是创造财富的源泉。《尚书·大禹谟》云：“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治国要勤劳，齐家要节俭。《左传·庄公二十四年》云：“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节俭是人们认同的共有善德，奢侈是人们厌恶的最大恶德。勤劳与节俭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美德，它是高尚品德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体现。

勤俭节约是中西文化共有的精神品格。根据柏拉图的早期对话记述，苏格拉底曾讨论“四主德”即“智慧”“公正”“勇敢”“节制”。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理性主义传统，提出“德性就是中道”的命题，认为节制是吝啬与奢侈之间的中道。德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资本主义精神应该是一种节俭勤奋，而非奢侈豪华。”^①勤俭节约之德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核，是推动资本主义精神快速发展的精神动力。与此相比，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勤俭节约是中国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必备品质和伦理要求，也是中华祖先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伦理智慧，常与国家兴衰、社会风尚、家教家风、个人修养紧密联系。勤俭节约的生活品德，是艰苦奋斗传统美德的基本内涵。

（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从价值角度讲，艰苦奋斗是一种动力，鼓舞人们自强不息、不畏艰难、奋发进取。儒家经典《周易》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命题，就是对艰苦奋斗传统美德的生动注释。哲学家张岱年指出：“‘自强不息’即主动地努力向上，决不懈怠。这包含勉力向前、坚韧不拔的意义……历史上，坚持反对不法

^① [德]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0页。

权贵的忠直之士，尽力抵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孜孜不倦探索真理的思想家、科学家，致力于移风易俗的文学家、艺术家，都体现了‘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① 张岱年先生对自强不息的诠释，实际上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反抗暴政和外来侵略，这是爱国主义传统；二是坚强不屈的独立人格意志，这是传统的人格价值观；三是先进知识分子不畏艰难、开拓创新，这是传统的革故鼎新精神。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家罗国杰教授则进一步阐释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与勤俭节约的生活美德之间的辩证关系：“古代思想家所推崇的自强不息、勤俭节约的精神就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艰苦奋斗精神的核心内涵。可以这样说，离开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就无法在艰难困苦面前保持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不具备勤俭节约的优良美德，就会让骄奢淫逸之风瓦解高昂的斗志。因此，艰苦奋斗以勤俭为前提，以自强为根基。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就是要保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质朴作风，发扬不畏艰险、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② 自强不息与勤俭节约相互联系、相互包含，共同构成了艰苦奋斗传统美德的核心内涵。

勤俭节约、自强不息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积淀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传基因。2001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传统美德，把“勤俭自强”规定为公民道德基本规范之一，认为勤俭自强既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也是现阶段每一个公民所应具有的美德。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纲要》，坚持在继承传统中创新发展，自觉传承中华传统美德，把“勤俭持家”规定为公民的家庭美德，鼓励人们在家庭里做一个好成员；把“自强自律”规定为公民的个人品德，鼓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好品行。勤俭节约、自强不息作为中华传统美德在新时代得以继承和弘扬。

（三）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艰苦奋斗的时代内涵再次得以拓展和升华。艰苦奋斗不仅表现在日常生活、修身养性方面，而且还表现在绿色发展、绿色生活、简约生活及低碳生活等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实施全面节约战略，推进各类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③ 实施全面节约战略，需要从思想意识、生产领域、消费生活等方面入手，发扬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推进节约集约及循环利用，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生活。可见，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绿色发展，是对艰苦奋斗传统美德的创新发展 and 时代提升。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是生态文明的真

① 《张岱年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2～63页。

② 《罗国杰文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49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50页。

谛。我们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拒绝奢华和浪费，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风尚。”^①又说：“鼓励引导消费者购买节能环保再生产品，推动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②“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③在实践层面，勤俭节约表现为建设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和绿色出行等。近年来，党和政府又大力倡导“光盘行动”与“文明餐桌”的生活理念，积极组织引导全社会各界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传播者和践行者，坚决杜绝舌尖上的浪费。“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从国家出发，从单位出发，从家庭出发，从自身出发，都离不开开源节流、珍惜资源、勤俭奋进，并由此形成勤俭节约、绿色发展、低碳生活和绿色生活的社会风尚。倡导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时代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内在需要。

从一定意义上讲，人们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及消费模式折射出特定时代人们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理念。推动形成绿色发展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就是要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如果说在农业文明时代，人们秉持勤俭节约或节衣缩食的生活品德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维持生存和发展的话，那么在生态文明时代，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不仅为了生存和发展，更重要的是为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让人们的生活更加文明健康、更加幸福美好。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是新时代文明健康生活、幸福美好生活的生动体现，也是艰苦奋斗传统美德在生态文明时代的特有新内涵。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发展史。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历史。艰苦奋斗既彰显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精神脉络和内在动力，也诠释着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的价值逻辑，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价值共识和精神标识。

二、艰苦奋斗精神的价值意蕴

艰苦奋斗精神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也具有超越时空、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对于涵养人们勤劳节俭的生活品德、提升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及助力中华民族伟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285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280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50页。

大复兴等都具有显著的价值意蕴。

（一）涵养人们勤劳节俭的生活品德

中华民族历来以勤劳节俭著称于世，勤劳节俭、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勤劳节俭美德推动和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繁荣。勤劳是指人们对待劳动的态度，它要求人们热爱劳动，积极参加劳动，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勤劳与懒惰相对立。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了人类，也创造了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创造了中华民族，造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也必将创造出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① 节俭是指人们对待个人生活的态度，它要求人们节制自己的消费欲望，约束自己的消费行为，适度的或合理的消费，自觉节约各类资源。节俭与奢侈相对立。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奢侈都是公众的敌人，节俭都是社会的恩人”^② 的命题，认为在消费上节俭是善行，奢侈是恶行。勤劳与节俭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勤劳是节俭的基础，没有勤劳，节俭就失去前提和动力；节俭是勤劳的延续，没有节俭，勤劳所得之财富就会浪费殆尽。正如古人所云：“勤与俭，治生之道也。不勤则寡入，不俭则妄费。寡入而妄费则财匮，财匮则苟取，愚者为寡廉鲜耻之事，黠者入行险侥幸之途。”^③ 勤劳节俭既是一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必备的美好品德，也是一个社会形成良好风气的道德根基；不仅是一个人的生活态度、精神面貌，而且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崇尚和文化气节。

在当代中国，由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物质财富的日益增长，人们的物质消费观念发生很大的变化，过去那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消费观念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我消费，故我在”的消费主义理念，亦即通过疯狂消费来自己的人生梦想和存在价值。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迎来了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但与此同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及消费主义等现象在社会上开始滋生蔓延，奢侈浪费、攀比消费、超前消费等现象时有发生，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正面临着被社会淡忘的危险。“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看，节俭没有过时；从积累与消费的关系看，节俭依然需要。在提倡低碳生活、绿色经济的今天，必须重新唤起人们对传统节俭观的崇尚与信仰，破除当下普遍流行的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271页。

② [英]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13页。

③ 杨继盛：《杨忠愍公遗笔（及其他五种）》，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2页。

享乐主义消费倾向，引导人们构筑合理适度的消费观。”^①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消费升级，更好满足生存型、发展型和享受型等多类型多层次的消费需求，同时在物质生活更加宽裕和互联网快速普及的环境中，人们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日益呈现出数字化、个性化、社交化等新特点。但是无论经济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到何种程度，勤俭节约作为一种美德还是要大力提倡的。

古人提出“俭以养德”的命题，即节俭对提升人们的道德品质具有重要作用。大力弘扬勤劳节俭美德，有助于人们形成勤劳致富、理性消费、合理开发利用资源的品德，因而也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作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内生动力，消费反映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一定意义上讲，勤俭节约也是创造美好生活的内在需要。因为美好生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们通过奋斗创造出来的。在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过程中，当代中国人更加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习近平总书记说：“要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勤劳致富，勤俭持家。”^② 我们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劳奋斗和俭朴节约的传统美德，涵养人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生活品德，努力使全社会形成“以勤劳为荣、以懒惰为耻”“以节俭为荣、以奢侈为耻”的荣辱价值观，结合生活实践使之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为。

（二）提升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

精神风貌是指一个人、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在思想觉悟、品德修养、理想信念及能力气质等方面的外在表现，属于意识形态层面的内容，它能够彰显一个人、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精气神。习近平总书记说：“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历经苦难，但没有任何一次苦难能够打垮我们，最后都推动了我们民族精神、意志、力量的一次次升华。”^③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自强不息、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精神，是激励我们中华民族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精神力量，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近代以来，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导致中国长期处于落后挨打、任人宰割的局面，而自卑自负、萎靡不振、故步自封等则成为近代部分中国人在精神风貌上的消极表现。相比较而言，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积极的精神风貌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才有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倒、饱经风霜而不衰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而才有绵延不绝、光辉灿烂

^① 张自慧：《劳动之美与节俭之德的现代价值》，《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②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95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35页。

的中华文明。

自五四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开始由被动转为主动,因为中国共产党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基础上对中华传统民族精神进行创造性改造和时代提升,实现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转型,相继塑造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及西柏坡精神等革命精神,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焕然一新。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新精神的开端乃是各种文化形式的一个彻底变革的产物,乃是走完各种错综复杂的道路并作出各种艰苦的奋斗努力而后取得的代价。”^①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继承和弘扬现代革命精神的基础上,相继弘扬和培育了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及“两弹一星”精神等建设精神,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再次得以提升。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相继弘扬和培育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女排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及载人航天精神等时代精神,中华民族再一次实现了精神上的伟大觉醒和创新发展,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再次得以升华。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布局相互交织的时代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精神的弘扬和培育,提出“实现中国梦需要弘扬中国精神”的时代命题。一方面弘扬和培育了劳动精神、劳模精神、伟大抗疫精神及脱贫攻坚精神等新时代精神,另一方面铸就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深深融入我们党、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之中,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②。可见,艰苦奋斗精神是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内在品质,艰苦奋斗精神贯穿于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程中,蕴含于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事实表明,艰苦奋斗精神从总体上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华民族的精神逻辑轨迹和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提升。总之,弘扬艰苦奋斗精神有助于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有助于构筑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使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更加厚重深邃,从而大大改观和提升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正以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迈向未来。

① [德]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514~515页。

（三）推进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来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它是由党的性质、宗旨和初心使命决定的。历史与现实表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把党建设好建设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聚精会神抓好党的建设，使我们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纯洁、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战斗力。”^①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执政，历史久、人数多、规模大，既有办大事、建伟业的优势，也面临着治国治党的独有难题。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这“六个如何始终”集中概括了中国共产党治国治党面临的突出难题。中国共产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深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只有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才能不断破解大党的独有难题，进而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初就把艰苦奋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进程中，艰苦奋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已经创造性转化为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成为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条鲜明的主题。“艰苦奋斗精神的百年坚守，是与不同历史时期加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结合在一起来的。”^② 党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告诉我们，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传家宝。可以说，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也是靠艰苦奋斗发展壮大、成就伟业的。中国共产党始终立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中华传统美德艰苦奋斗与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结合起来，创造性把艰苦奋斗传统上升到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高度。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把艰苦奋斗精神融入党的作风建设，不仅铸就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而且塑造了共产党人践行初心使命、实现伟大梦想的实践品格。艰苦奋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代表着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重大成就，展现了我们党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汇聚成我们党的红色血脉。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决不能丢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传家宝。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品质，是我们立

^①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281 页。

^② 迟成勇：《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的内在品质》，《东方论坛》2021 年第 4 期。

党立国的根基，也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的根基。从一定意义上说，艰苦奋斗精神不仅是传统美德或道德律令，而且是标注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历史进程的精神旗帜。中国共产党靠艰苦奋斗赢得过去，更要靠艰苦奋斗开辟未来。

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重塑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改进工作作风，各项工作都很重要，但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① 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坚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品格，始终保持苦干实干的精神状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现实证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才能应对“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破除“四风”顽疾，永葆党的政治本色。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党一定要保持艰苦奋斗、戒骄戒躁的作风，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②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三个务必”，即“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③。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两个务必”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务必”，是我们党跨越70多年时空的对话，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贯穿其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遵循的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及一脉相承的价值自信和价值自觉，为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根本遵循。

（四）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古往今来，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往往既是经济总量、军事实力、科技水平等硬实力提高的进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及民族精神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则是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及民族振兴为主要内容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形象表达。近代中国历史证明，旧式的农民战争和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都不可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更不可能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人民开始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就改换了方向，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进程不仅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进行的实践和理论双重探索的过程，而且还是中国共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87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54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页。

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或中国精神不断赓续的过程。历史证明，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革命、建设和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历史和现实表明，人类的美好理想都不可能唾手可得，都离不开筚路蓝缕、胼手胝足的艰苦奋斗。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证明，中华民族以吃苦耐劳著称于世，中华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充分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遇到了种种艰难险阻，我们的事业成功都是经过艰辛探索、艰苦奋斗取得的。想一帆风顺推进我们的事业，想顺顺当当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那是不可能的。”^①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还得要靠艰苦奋斗精神来凝聚、激励全党和全国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我们国家发展到什么水平，不论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永远不能丢。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不仅是我们一路走来、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也是我们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的重要保证。”^② 艰苦奋斗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也需要坚韧的精神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需要坚实的物质力量，而且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历史和现实表明，艰苦奋斗是成就伟业不可或缺的条件。没有艰苦奋斗精神做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没有艰苦奋斗精神做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和进步的，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要在物质上强，更要在精神上强。精神上强，才是更持久、更深沉、更有力量的。”^③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④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必然会有艰巨繁重的任务，必然会有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特别需要我们发扬艰苦奋斗精神。”^⑤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需要艰苦奋斗。艰苦奋斗精神始终是激励我们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强大精神力量。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402页。

② 谢环驰：《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 守护好祖国北疆这道亮丽风景线》，《人民日报》2019年3月6日。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37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2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36页。

三、艰苦奋斗精神的弘扬路径

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的重要法宝。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要采取切实有效的现实路径：一是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为根基，以青少年学生为重点，以各级领导干部为表率，加强艰苦奋斗精神教育；二是立足中华文化，创新方式方法，讲好中国艰苦奋斗故事；三是结合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立德树人为目标，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

（一）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为根基，以青少年学生为重点，以各级领导干部为表率，加强艰苦奋斗精神教育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希望大家注重家教。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①“希望大家注重家风。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②“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为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为根基加强艰苦奋斗精神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

第一，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为根基加强艰苦奋斗精神教育。古人说，“国之本在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家风好，子女教育得好，社会风气好才有基础。”^④因此，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有助于夯实弘扬艰苦奋斗精神的根基。一是要注重对家庭成员和青少年加强中华传统家庭美德教育。要把“尊老爱幼、妻贤夫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耕读传家、勤俭持家，知书达礼、遵纪守法，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⑤自觉地融入家庭家风建设，为和谐幸福家庭奠定传统美德基础。二是父母或年长者应自觉把“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勤能补拙”“俭以养德”等有关勤俭持家的谚语自觉融入家庭家风建设，并带头躬行践履，教育引导家庭成员或子女倍加珍惜劳动果实，逐步养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8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4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4页。

④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3页。

⑤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0页。

成勤俭持家的美好品德。三是领导干部带头搞好家庭家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抓好家庭家风建设,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在管好自己的同时,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①。“把家风建设作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重要内容,弘扬真善美、抑制假恶丑,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氛围,推动社会风气明显好转。”^②总之,广大家庭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把家庭家风建设好,为全社会形成艰苦奋斗的良好风尚打下坚实的根基。

第二,青少年学生是加强艰苦奋斗精神教育的重点。青少年学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他们的精神品质直接影响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未来。因此,青少年学生是加强艰苦奋斗精神教育的重点。总体上看,大中小学学生的情况是良好的,素质是过硬的,但仍然存在如下不尽人意的地方:一是在学习上,部分学生学习不够刻苦,甚至有厌学情绪或躺平现象;二是在消费上,部分学生有浪费粮食的行为,还存在高消费、超前消费、攀比消费等非理性消费现象;三是在心理上,部分学生不能够正确对待老师、家长的批评教育,动辄有轻生的念头或行为,耐挫力和意志力较差,心理品质有待提高等。可见,对青少年学生加强艰苦奋斗精神教育,是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内在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广大青少年的教育,让他们从小就树立起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观念,不要养成贪吃懒做、好逸恶劳、游手好闲、投机取巧、坐享其成等错误观念。这是真正关系我们民族发展的一个长远大计,一定要抓好。”^③弘扬艰苦奋斗精神,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塑造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目标,加强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把艰苦奋斗精神教育融入课程学习、日常生活及社会实践活动,使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其中,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因此要充分发挥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在加强艰苦奋斗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

第三,各级领导干部是践行艰苦奋斗精神的表率。中华民族历来十分注重官德民风的塑造,这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包含的道理。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意思是说,君子的德行好比风,小人的德行好比草,风吹到草上,草就必然跟着倒。其延伸意就是强调当政者或领导者要发挥垂范表率作用,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抓关键少数”的意义。教育实践表明,党风政风具有鲜明的价值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34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34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272页。

导向作用,党风政风正,民风社风淳,优良的党风政风能够带动良好的民风和社会风气的形成。因此,在引领民风和社会风尚上,在践行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方面,各级领导干部要当好旗帜和标杆,全体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各级党政军机关、事业单位,各人民团体、国有企业,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率先垂范,严格执行公务接待制度,严格落实各项节约措施,坚决杜绝公款浪费现象。”^①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践行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努力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光荣的浓厚氛围,努力在社会形成“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的社会主义荣辱价值观。

(二) 立足中华文化,创新方式方法,讲好中国艰苦奋斗故事

艰苦奋斗精神是中华文化的精华精髓和内在品质。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②讲故事是加强艰苦奋斗精神教育的最佳路径。立足中华文化,创新方式方法,讲好中国艰苦奋斗故事,其中包含“谁来讲故事”“讲什么样的故事”“如何讲故事”三个方面。

第一,就“谁来讲故事”而言,人是讲故事的主体。应该说,习近平总书记是讲故事的大家。无论是会议上的发言、调研时的谈话,还是出访时的演讲、报刊上的文章,他都善于用故事来传达深意,感染他人。习近平总书记是我们讲好中国故事的榜样。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当前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中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不仅中央的同志要讲,而且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讲;不仅宣传部门要讲、媒体要讲,而且实际工作部门都要讲、各条战线都要讲……要动员各方面一起做思想舆论工作,加强统筹协调,整合各类资源,推动内宣外宣一体发展,奏响交响乐、大合唱,把中国故事讲得愈来愈精彩,让中国声音愈来愈洪亮。”^③从主体看,家庭父母或年长者、学校教师、企事业单位领导及党政部门领导干部等,都应该是艰苦奋斗故事的讲解员,要不断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练就讲好中国艰苦奋斗故事的强大内功,饱含深情地把艰苦奋斗故事讲得精彩、生动、鲜活,更加鲜明地展现艰苦奋斗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着力涵养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

第二,就“讲什么样的故事”而言,讲好中国艰苦奋斗故事就是要具体讲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271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64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11页。

清楚中华民族的艰苦奋斗故事、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奋斗故事、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故事等。立足中华文化，讲好中国艰苦奋斗的故事，首先要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关艰苦奋斗传统美德的人物和事件，讲好中华民族的艰苦奋斗故事，如女娲补天的故事、大禹治水的故事、愚公移山的故事及以节俭著称的汉文帝的故事等。其次要传承红色革命文化，发掘红色革命文化中有关艰苦奋斗精神的人物和事件，讲好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奋斗故事，比如“半条棉被”的故事、张思德的故事、红军爬雪山及过草地的故事、南泥湾的故事、三大战役的故事、长津湖战役的故事、自卫反击战的故事等。最后阐释社会主义文化中有关艰苦奋斗精神的人物和事件，讲好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故事，比如王进喜的故事、雷锋的故事、焦裕禄的故事、孔繁森的故事、黄文秀的故事，开钻大庆油田的故事、开挖红旗渠的故事、“两弹一星”的故事、中国空间站的故事、脱贫攻坚的故事及中国抗疫的故事等。用丰富多彩的中国艰苦奋斗故事，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激发人们的改革热情和奋斗激情。

第三，就“如何讲故事”而言，需要创新方式方法，建构多样化的讲解模式。如何讲好中国艰苦奋斗的故事，不仅要进行理论讲解，而且还要进行实践讲解；不仅要有“线下讲解”，也要有“线上讲解”；不仅要有书本、报纸、杂志等“静态的讲解”，还要有话剧、戏剧、影视剧等“动态的讲解”等。创新方式方法是为了讲好故事，彰显其中的“道”，而不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不要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要把‘道’贯通于故事之中，通过引人入胜的方式启人入‘道’，通过循循善诱的方式让人悟‘道’。”^①因此，讲故事要通过创新方式方法，把艰苦奋斗的事实、形象、情感和道理寓于其中。也就是说，既要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寓于艰苦奋斗的故事中，还要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寓于艰苦奋斗的故事中，向全国人民展示一个历史的、文化的、自信的中国，向世界人民展现一个真实的、立体的、全面的中国。此外，还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高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艰苦奋斗故事的质量。

（三）结合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立德树人为目标，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②的时代命题。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到党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13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4页。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实际上彰显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实践逻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际上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即国家的德、社会的德。艰苦奋斗精神本质上是一种积极的能动的实践精神，它不仅是一种攻坚克难的意志品质和精神状态，而且是一种在实践中能够体现出的伦理精神和道德品德。因此，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与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内在的关联。以立德树人为目标，把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与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既能够帮助人们把艰苦奋斗确立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品质，也能够增强人们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能力。

第一，结合广泛践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价值诉求，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的重大问题，也就是要求我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居于最高层，对其他层面的价值诉求具有统领作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国家层面的价值诉求，体现了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期盼和价值选择，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家价值层面的本质规定性与现实目标追求，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进方向，贯穿并渗透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从国家伦理层面看，艰苦奋斗精神是当代中国国家伦理精神的显著内容。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推动人们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人们积极参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建设，把个人奋斗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民族振兴结合起来，不仅能够培育人们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而且能够增强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复兴信念。

第二，结合广泛践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价值诉求，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的重大问题，也就是要求我们建设一个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主义社会。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是从社会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凝练，也是对美好社会的时代表征。它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属性，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价值层面的本质规定性和现实目标追求，指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前进方向，贯穿并渗透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核心价值观展现了人们为之奋斗的美好前景，激励着人们奋勇前行。从社会伦理层面看，艰苦奋斗精神是当代中国社会伦理精神的重要内容。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推动人们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人们积极参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建设，不仅能够培养人们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而且能够提高人们的社会主义法治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第三，结合广泛践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艰苦

奋斗精神。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诉求，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也就是要求我们培养具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道德品质的社会主义公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要求，是从公民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观照。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公民的基本价值追求和道德准则要求，传承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中国革命传统道德，涵盖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四个方面，明确了每位公民对国家、对工作、对社会、对他人应尽的责任和应履行的义务，是人们在参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及日常生活中必备的道德品质，指导着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前进方向，贯穿并渗透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伟大实践。从公民伦理层面看，艰苦奋斗精神是当代中国道德精神的重要体现。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推动人们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核心价值观融入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在培育公民艰苦奋斗精神品质的同时，着力提升公民的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

On the Era Connotation, Value Implication, and Realistic Path of Promoting the Spirit of Hard Work and Struggle

Chi Chengyong

Abstract: The moral character of diligence, thrift, and frugality, the spirit of self-improvement, and the simple, moderate, green, and low-carbon lifestyle constitute the contemporary connotation of the spirit of hard work and struggle. Promoting the spirit of hard work and struggle has significant value in cultivating people's moral character of diligence and frugality, enhancing the spiritual style of Chinese nation, promoting comprehensive and strict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and help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nation. The realistic path to promote the spirit of hard work and struggle is to take family education and family ethics as the foundation, focus on young students, and set an example for leaders at all levels to strengthen the education of the spirit of hard work and struggle; innovate methods and tell the story of China's hard work and struggle well based on Chinese culture; vigorously promote the spirit of hard work and struggle combining with the widespread practice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with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talents.

Keywords: Spirit of Hard Work and Struggle; The Connotation of the Times; Value Implications; Realistic Path

[责任编辑: 闫惠惠]

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来意识形态工作的发展历程及成功经验^{*}

冯文燕 刁秋华^{**}

【摘要】意识形态工作关乎党的前途命运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建党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历经意识形态发展的六个阶段，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针对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要总结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宝贵经验，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坚持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的统一，坚持正面宣传与舆论斗争的统一，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多年；意识形态；过程；经验

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国家安全、民族发展，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无产阶级的先哲们在提出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时，反复强调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认为意识形态工作可以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提供思想保障和精神支撑。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多年来，始终把意识形态工作贯穿于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工作的手段和方式，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意识形态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不断强化，并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但意识形态工作一刻也不能忽视和放松。当下，面临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形势，回顾建党一百多年来意识形态工作的发展历程并总结、归纳成功经

^{*} 本文系北京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一般项目“青年人格建构：新时代大学生数字素养培育路径研究”（项目编号：BJSZ2023YB2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科研基金资助项目“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项目编号：ZX20230062）阶段性成果。

^{**} 冯文燕，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意识形态、党的建设；刁秋华，新疆大学教务处考试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教学管理。

验，对党在新时代有效应对西方国家的价值输出和文化渗透、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主动权、树立“四个自信”、打赢意识形态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意识形态的相关意蕴

“意识形态”在社会科学和哲学研究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和范畴，是上层建筑构成要素之一，在特定的社会中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集团）利益诉求的表达和思想体系的表现，在一定的情况下能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影响社会的发展。伴随西方哲学的发展，“意识形态”一词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至今，人们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但是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和定义却众说纷纭。学界普遍认为“意识形态”一词出现于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是由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哲学家特拉西在其著作《意识形态的要素》中提出的。在特拉西的视域中，意识形态是一个肯定性的词汇，指的是观念的科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并以期通过对观念规律、原则等的研究来改造世界。“意识形态”一词传播的早期，得到了拿破仑的认可，但随着拿破仑称帝之心日盛，意识形态理论所提出的民主、革命、共和、自由等与拿破仑的理念发生了冲突，拿破仑称特拉西等意识形态家脱离实际、是“空论家”，意识形态理论是空想。由此，意识形态家被拒于国家体制之外，“意识形态”一词也被打上了“虚假”性的标签。^①

在提出后的半个多世纪，意识形态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以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唯心史观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后，意识形态才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最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从“虚假”的视角来解读意识形态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当时整个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没有从现实生活出发，而是肆意地曲解和撇开人类历史，造成了人们对客观认识的表面化，而这种表面的认识一旦被统治阶级利用，统治阶级就会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虚假”作用，掩盖其阶级本质。此后，马克思又在著作中对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解读。在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剖析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逐渐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成形。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列宁在意识形态理论的建构上发挥了划时代的作用。列宁跳出了“虚假”性的视角，给予了意识形态更中性化的定义，认为意识形态就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建立的一套思想体系，并提出了科学的意识形态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是科学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建设上，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

^① 参见武振华：《论习近平意识形态建设思想的生成逻辑和时代特色》，《理论学刊》2018 年第 4 期。

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无产阶级的解放需要科学的、先进的思想理论的指导，但先进的社会主义意识不会在无产阶级中自发产生，需要无产阶级政党的“灌输”。此外，列宁还就意识形态重要性、加强意识形态制度建设等发表了自己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渊源。

一个政党不能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一个政党的奋斗目标以及贯彻实施的方针、路线、政策无不体现着它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政党一切活动的价值遵循与思想指引。马克思主义也认为，当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进入了社会领域，其阶级性就会被体现和确立。因此，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代表着特定阶级的意志，具有鲜明的阶级印记。“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②，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阶级立场和政治站位，向世界宣明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代表广大人民最根本的利益，致力于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建党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围绕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时代主题，不断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探索，从而维护了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党的执政能力也显著提升。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惨痛教训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和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新形势下，增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更好地推进意识形态工作，从而实现价值引导、凝心聚力，关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来意识形态工作的发展历程

意识形态工作贯穿在党的每一个目标、决策、任务之中，是我们推进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建党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紧抓不放是政权不断巩固、国家实现长足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形势与任务的变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基础上，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为意识形态工作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一系列理论成果，牢牢掌握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夯实了奋进的思想基石。鉴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各阶段目标和任务的不同，建党一百多年来意识形态的发展历程可分为六个阶段。

^①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5页。

第一阶段：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前。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实践的結合中，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在上海诞生。中共一大纲领提出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并规定党员要承认本党的党章和政策。由此表明，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印在了自己的旗帜上。面对民族危亡，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发展史上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毛泽东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由来已久，早在1926年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时，在其所作的报告中就曾提及要重视党报和党内教育。而1929年12月古田会议上毛泽东作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更是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作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推动了党员思想和党内生活的政治化和科学化。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许多共产党人迫于形势到农村开展土地革命，造成党员的主体由工人变为了农民，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针对这种现状，毛泽东在文中指出，要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指导，面对单纯的军事思想，红军要服从党的领导，在军事任务之外，红军要承担起宣传、教育、武装群众的任务。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给党的建设带来了严重的损失，1942年，党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通过整风运动厘清了思想，实现了党内团结。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完成了初步的探索。

第二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面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命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意识形态工作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敌对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终实现了巩固新生政权、维护国家稳定的目标任务。毛泽东曾强调，我们这样一个东方大国，不仅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有自己的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过程中也会有许多自己的特点。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帝国主义思想的渗透和国内残余的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思想的消极影响，我们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进行广泛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并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最终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苏共二十大以后，在帝国主义的进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混乱的背景下，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的多方面问题进行了科学准确的分析，于1957年2月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文中，毛泽东使用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概念，指出在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还存在着斗争，这种斗争是激烈的、长期的、曲折的，必须要善于、敢于同其他的意识形态进行斗争，要捍卫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随后，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由于受到“左”倾思想等的影响，后期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认识出现了偏差，导致意识形态工作出现了严重的错误，为我们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尽管在这一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探索出现了曲折，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意

意识形态工作仍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三阶段：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四大前。“文革”结束以后，面对意识形态工作上的失误，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对于国内外局势呈现的新情况、新特点，我们亟须树立正确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指导方针，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团结力量、凝聚人心、鼓舞斗志。邓小平率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1978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提出了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终被重新确立，同时提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我们党不仅在思想路线上实现了拨乱反正，还实现了工作中心的转移，意识形态工作逐步围绕党的建设大局和工作中心有序展开。对于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对意识形态工作不重视和资本主义自由化的错误思潮影响等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的新问题，邓小平提出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于1979年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严谨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的作用、历史地位，推动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平稳发展。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命题，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意识形态工作要服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不得干扰；强调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深刻解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提出意识形态的教育工作要实现思想教育与物质利益的有机结合……这些意识形态工作的创新性论断，保证了我国建设、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第四阶段：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六大前。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在国际上，一方面伴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创；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科学技术高速发展，西方国家加快了“和平演变”的步伐，利用文娱、科技产品等不断向外输出资本主义的文化和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遭遇挑战。在国内，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腐朽落后的思想开始侵染意识形态阵地，加之获取信息的手段日趋多样，在各种思潮的激荡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多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我国意识形态工作面临多重困境。如何适应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为改革的深入注入一针“强心剂”，是摆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面前的时代课题与历史任务。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意识形态领域“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提出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育“四有”新人；提出以文化为载体，通过以文化人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以提升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为着力点，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这一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

与时俱进，适应了急剧变化的国内外局势，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向心力，保证了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第五阶段：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八大前。新世纪的社会进入转型期，经济上，我国仅用几十年就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道路，但快速发展的同时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利益上的分歧引发了道德滑坡、价值观上的扭曲；政治上，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原则开始向党内渗透，部分党员干部由于自身把关不严，在党内滋生了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污染了党内政治生态，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根基；文化上，西方敌对势力利用电视、书籍以及互联网等先进的通信手段一方面不断兜售其所谓的“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大肆发表反华言论，抹黑丑化中国。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深化改革的办法去化解改革开放中遇到的矛盾，依靠科学发展去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扭转了道德失范、思想滑坡的局面，推动了社会风气的向好发展；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坚定党内的理想及信念；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意识形态工作，通过一系列举措正确处理了矛盾、协调了各方利益、激发了社会活力。在这一时期，意识形态工作解决了社会转型带来的思想和价值观问题，为接下来的发展夯实了思想基础，指明了价值导向。

第六阶段：从党的十八大至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意识形态工作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就外部而言，虽然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中国也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但经济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发展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转嫁国内矛盾，不断施压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以借此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利用互联网进行价值输出，试图消解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与民族精神、文化。就内部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跨越，逐步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但理想信念缺失、思想道德滑坡、腐朽文化沉渣泛起的现象依旧存在，而且网络的匿名性、虚拟性导致在网络舆情的管理和引导上存在诸多瓶颈。新时代给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凝心聚力，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吸引力、感染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断巩固；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向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华文化，“四个自信”不断增强；创新网络意识形态管理的手段和方式，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运而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意识形态安全、传播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确立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一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最新成果，为伟大梦想的实现筑牢了思想基础，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三、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来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经验

恩格斯曾说过，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意识形态工作经验，在新时代，我们要珍惜这些基本经验，以现实为根本立足点，以世情、国情、党情为导向依据，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地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支撑。

（一）在“破”与“立”中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不破不立。意识形态的建设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不是一个死循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正确的意识对客观事物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反之就会对客观事物的发展产生阻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只有不断进行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才能证明其先进性。毛泽东曾深刻地解析到，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必须要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必须要遵循，但是任何国家的思想界、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必须要产生自己的理论旗手、创造新的理论，为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的东西是不行的。党在意识形态工作的过程中，始终把创新发展摆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在解决革命、建设、改革诸多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推动了实践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在改革深化的过程中不断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富有创新性、时代性的理念和论断，为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保障。面对当下意识形态工作的新形势，我们要善于跳出原有的思维定式，保持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敏锐度，不断创新工作的理论、方法、手段、内容，特别要利用好网络意识形态的规律和特点，营造良好的网络舆论生态，开创意识形态工作新局。

水有源，树有根，只有立足本源，才有创新的资本和勇气。意识形态的发展不是凭空臆造的，是有据可循的，意识形态的发展具有继承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借鉴、吸收、创新的过程。列宁曾评价道：“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也有其根源：一是马克思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9页。

主义的理论之源，体现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之源，体现意识形态的民族特质。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中国的发展举旗定向，同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化的解读，创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人为本的工作导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都在实践中得到了坚持、贯彻。只有不忘本来，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找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结合点，守好根、固好源，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丰厚滋养。

（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属性要求我们在意识形态工作上要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一个时代，如果一个阶级在物质上占据了统治地位，其在精神领域也会占据统治地位。那么，当一个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统治，他们都要发展出一套利于自身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理论并不断进行维护。同理，这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也不例外。针对资产阶级提出的“超党性”“超阶级”的错误言论，马克思恩格斯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认为有无党性是判断真假共产主义的试金石，并申明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是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之后，在中国获得了发展和新生，并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指引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在此期间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也得到了确立和巩固。从理论根源和党性两方面来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要充分发挥服务发展、服务建设、服务群众的作用，就一定要在实践中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给出了坚定而清晰的回答。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党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和人民群众立场上的，在宣传教育群众时，一方面要从群众的实际出发，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使用群众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另一方面要注重壮大人民力量，放手发动群众，这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力量。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各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始终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坚定了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党性和人民性向来都是一致、统一的，并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等有关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场合提出新阶段的意识形态工作要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为人民服务。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树立人民情怀，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推进中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以人民对优质的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作为目标，同时注重人民

主体性作用的发挥，汇聚人民群众的智慧，助推意识形态工作新的发展。

（三）围绕中心任务，坚持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的统一

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从表面看，两者分属不同的领域。经济建设凸显的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通过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完成社会再生产的过程，而其间资源、科学技术、管理、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发挥着重要作用；意识形态工作属于思想领域，是一定的阶级（或集团）为了自己本阶级（或集团）的利益，通过教育、舆论、斗争等手段将其所倡导的价值观进行对外宣传，以获得社会成员对其核心价值的认同，从而维护自己阶级（或集团）的利益。但究其本质，两者最终要回归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中去。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观念的上层建筑，其体系的形成不可能是空中楼阁，必定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作基石；经济的发展需要先进的理念做指导，同时需要强大的社会向心力作支撑，而这些又恰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功能和作用。虽然两者着力点各有侧重，但是彼此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都统一于一定的历史社会发展阶段之中。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也启示我们，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同样也要出大问题。

从革命战争时期到深化改革的今天，注重经济工作的同时注重发挥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是党意识形态工作的宝贵经验。建国初期，毛泽东曾预言文化建设的高潮必将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而到来，并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注重对人民群众思想的引领和改造，这为我国民主改革和工业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①“文化大革命”时期，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经济的建设，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后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把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随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同时邓小平提醒全党，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后，不可只埋头于经济工作而忽略思想方面的建设。历史和现实反复向我们证明，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不可偏废一方，要协调发展，不然社会主义的建设就会出现失误和曲折，甚至走向失败。国家的硬实力越强，越不能放弃软实力的培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的战略高度做出了经济工作是我们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我们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的重大论断，为新形势下的意识形态工作指明了方向。当今世界，国家间的竞争和较量已由原来的“硬碰硬”转为更加柔性、隐蔽的方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对我们发起了全面的进攻与挑战。我们要实现经济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齐抓共管，就必须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出发，搞好经济建设，同时通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一系列手段，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凝聚力和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

^① 参见李珍：《毛泽东对加强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工作的理论探索》，《党的文献》2017年第5期。

（四）以党管媒体为抓手，坚持正面宣传与舆论斗争的统一

坚持党管媒体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传统。从理论渊源上来讲，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提及媒体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党报党刊是同敌人作斗争的重要阵地，列宁认为报纸刊物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可以利用的工具。自建党起，中国共产党就不断借助报纸、刊物等宣传自己的观念和主张，并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加强媒体的党性。毛泽东向来重视对媒体的管理工作，提出要把报纸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并在三大战役结束后要求在管理城市工作中要善于管理报纸、通讯社等。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党又相继提出了党报党刊要积极宣传党的主张、新闻宣传工作要严守党的纪律等新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认识到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要坚持党性，这事关治国理政、安邦定国。在党的领导下，新闻媒体工作围绕党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和目标，对推进党的政策宣传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无论格局、形势如何变幻，我们要在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下，在正面宣传和舆论斗争的统一中，开创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新局面。

壮大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意识形态体现的是一定阶级（或集团）的价值诉求，为了维护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以正面宣传的手段来巩固意识形态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就通过宣传张思德、白求恩、董存瑞等榜样的英勇事迹来为革命事业激扬斗志、汇聚力。改革开放以来，党在新闻媒体工作中坚持以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为主，激发了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和信心。随着改革进入攻坚区、深水区，主流意识形态与其他思想的交锋也变得更加激烈，只有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才能帮助广大干部群众纠正错误思想、厘清是非界限、树立正确价值导向。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新时期的宣传思想工作要坚持以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在正面宣传时，既要注重事实报道、价值宣传，又要体现差异化、个性化需求，特别是要利用好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拓展正面宣传的发声空间，切实发挥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效能，让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真正深入人心。

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并不意味着放弃舆论斗争。正面宣传和舆论斗争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正面宣传的过程中必然要对各种错误的思想进行批驳和斗争。意识形态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人在哪里阵地就在哪里，在关键领域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就会去占领。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通过撰写评论与国民党等国内外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的舆论斗争，发挥了“笔杆子”的强大战斗力。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提及我们宣传工作中的不足之处时指出，对于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想我们还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习近平就强调，对于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指导地位的思潮我们要予以批驳和抵制。当下，干扰主流意识形态的因素

依然存在，要在宣传中坚守政治原则，要在危害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的问题上敢发声、善发声，利用好网络媒介，把握好时效度，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在长期的斗争和探索中形成的，是人民和历史的选择。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关乎改革开放的前途命运，关乎事业成败、民族复兴。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清楚看到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存在长期性、复杂性等诸多特征。我们必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总结经验、遵循规律、解放思想，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特别是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下好先手棋、过好网络关，同时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彰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科学性、时代性。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Ideological Work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ver the Past Century

Feng Wenyan Diao Qiuhua

Abstract: Ideological work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work for the Party, which concerns the future and destiny of the Party and the long-term stability of the country. Since its foundation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dheres to Marxism in leading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 process of revolution, development and reform, and goes through six stages of ideological development, so that the construction theory of socialist ide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formed. 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 faced with the new situation and requirements of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summarizing the valuable experience of the Party's ideological work is necessary, which includes adhering to the unity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the unity of party spirit and people spirit, the unity of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ideological work, the unity of positive propaganda and public opinion struggle, which can provide a strong ideological guarantee and strong spiritual strength for creating a new situation in the cause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ver the past century; Ideology; Process; Experience

[责任编辑：闫惠惠]

湖南苏区及湖南苏区政法文化的概念阐释^{*}

谢时研^{**}

【摘要】湖南苏区是1927年9月至1937年12月期间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境内开展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区域。湖南苏区政法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境内苏区创建的一种新的政法文化，对当时其他苏区政法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湖南苏区是坚持“农村中心”革命模式下的政法文化，并在充分结合湖南地方实际的基础上进行政法文化创新。从文化的属性来看，湖南苏区政法文化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法律文化。从历史序列来看，湖南苏区政法文化是从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建设的资产阶级政法文化转变为共产党独立创建的一种新型政法文化。从湖湘文化的渊源来看，湖南苏区政法文化是湖湘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延续，它传承了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并结合土地革命进行了创新与发展。

【关键词】湖南苏区；政法文化；红色法治；苏维埃文化

湖南苏区政法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类型，受到了当时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中国法律文化正在经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当时，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面临多种选择，在经历了民国时期曲折的法律文化发展之后，中共最终选择了苏联法律文化，中国广大革命根据地由此进入了苏维埃政法文化发展的轨道。湖南作为苏维埃政法文化的试验区，率先开创了在农村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模式，革命根据地成为苏维埃政法文化衍生的场域。湖南苏区政法文化的发展，不断推动湖南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迈进，并由此将湖南广大农村地区带入现代化的发展轨道。

一、“湖南苏区”概念的提出

“湖南苏区”这一概念既是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革命话语的历史生成，也是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近代湖湘法治文化转型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BFX024）阶段性成果。

^{**} 谢时研，法学博士，吉首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法治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宪法文化、红色法治文化。

学界对湖南行政区域内苏维埃革命及政权建设所赋予的文化标识。因此,对“湖南苏区”这一概念的知识性考古,必须从上述两个维度把握“湖南苏区”概念运用的双重意义。

(一)“湖南苏区”概念的提出及运用

苏区是“苏维埃区域”的简称。^①然而,“苏维埃区域”并不是国共分裂之后一开始就使用的概念,中共党内最初是用“革命地域”“割据局面”指称革命活动的区域。^②直到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才明确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区域称为“苏维埃区域”。可见,“苏维埃区域”概念的出现和固定,经历了一个复杂的理性选择过程。

“湖南苏区”这一概念很早就出现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一些革命历史文献当中。1931年1月,《中央通告(四中全会后的第一号)——目前政治形势及党的中心任务》明确提出:“在战斗中,要联系各苏区的行动,尤其是江西、闽西、湖南、湖北的苏区。”^③1934年3月6日,在中国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书记的埃韦特,在给李竹声的信中指出:“或者红军后撤数百里是没有任何理由的,或者说敌人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或者湖北、湖南苏区的可悲历史。”^④1939年8月26日,《毛泽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面报告》中提出了“湖南苏区”“江西苏区”的概念。比如,毛泽民在该报告中提出,“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建议遭到了一些同志的反对,其中也有项英同志,他们主张占领赣州和吉安,把江西苏区同湖南苏区连在一起”。该报告还提到毛泽东有关“福建苏区”的概念,指出“这次胜利后,毛泽东同志建议党派红军前往福建北部,同福建苏区联系在一起”^⑤。可见,共产国际和中共很早就已经在有关文件中多次使用“湖南苏区”这一概念,从这些文件当中同时出现的“江西苏区”“湖北苏区”“福建苏区”等概念的使用可以初步判

① 1927年以后,随着全国各地苏维埃区域的不断创建和发展,“苏维埃区域”这个名字因不符合根据地人们的语言习惯而被人们简称为“苏区”。193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的决定,将“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参见本书编撰委员会:《伟大的苏区精神》,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17页。

② 1927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下发了第十六号中央通告,对在乡村和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策略作了进一步解释,要求在农村中要尽量发动武装暴动和开展游击战争,一有固定的革命地域,即须建立农民代表会议的革命政权。1927年10月24日,湖南省委紧急会议决议案便要求湘西、湘南“在最近一、二月内即应创造一农民暴动割据的局面,为将来全省农民暴动的重镇”。参见袁超乘:《分野与统一:中共话语中“苏维埃区域”的出现——一个概念史视角的解释》,《苏区研究》2018年第3期。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6页。

④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版,第97页。

⑤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版,第297页。

断,当时所指的“湖南苏区”是指湖南省境内的苏区。

实际上,笔者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考证后发现,学界也是在上述意义上使用“湖南苏区”这一概念。

首先,从历史学界来看,“湖南苏区”这一概念在《湖南省志·军事志》^①《湖南省志·财政志》^②《湖南省志·新闻出版志·报业》^③《湖南省志·综合经济志·劳动》^④等湖南省志中被广泛使用。此外,还有一些历史学著作中也大量使用“湖南苏区”的概念。如宋斐夫主编的《湖南通史》(现代卷)指出:“湖南苏区大都地处偏僻山区,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显得更为突出。”^⑤范忠程在《近代湖南社会转型纪要》一书提到:“1928—1930年间,湖南苏区各县普遍地进行了土地革命,废除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⑥周秋光、莫志斌主编的《湖南教育史》也提到:“湖南苏区也建立起了一些以流通革命书刊为主的小型图书馆(室),时称列宁图书馆或红色图书馆。”^⑦显然,历史学界也将“湖南苏区”这一概念理解为湖南省境内的苏区。

其次,从党史学界来看,“湖南苏区”这一概念的使用更为普遍。王驰、胡光凡主编的《湖南苏区文艺运动·湘籍作家在解放区》,该书是以“湖南苏区”命名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专门研究了湖南苏区的文艺运动和文艺作品。^⑧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主编的《湖南苏区史研究》(2012卷)和《湖南苏区历史研究》(2014卷),这两部著作是有关湖南苏区党史研究的权威著作,对湖南苏

① 《湖南省志·军事志》提出:“湖南苏区按照这个文件精神,动员资本家及从农村逃到城市的地主豪绅进行了筹款。”(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军事志》第5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561页)

② 《湖南省志·财政志》提出:“湖南苏区的财政收入来源有限,而财政支出的需要很多,收支矛盾很大,只能实行最低标准的供给制。”(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财政志》第15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90页)

③ 《湖南省志·新闻出版志·报业》第三章有“湖南苏区报刊存目”,该存目包括了湘鄂赣苏区、湘赣苏区两类。参见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新闻出版志·报业》第20卷,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

④ 《湖南省志·综合经济志·劳动》提出:“在湖南苏区,中国共产党和民主政府十分重视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劳动权利。”(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综合经济志·劳动》第7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⑤ 宋斐夫主编:《湖南通史》(现代卷),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295~297页。

⑥ 范忠程:《近代湖南社会转型纪要》,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页。

⑦ 周秋光、莫志斌主编:《湖南教育史》第2卷,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845页。

⑧ 该书的上编为“湖南苏区文艺运动”,分别介绍了井冈山、湘赣、湘鄂赣、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的文艺作品、重要历史文献、诗词等;下编为“湘籍作家在解放区”,主要包括湖南苏区文艺运动和湘籍作家对中国解放区文学所作出的重要贡献等多篇论文。参见王驰、胡光凡主编:《湖南苏区文艺运动·湘籍作家在解放区》(湖南卷),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区历史进行了详细考证。^①此外,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夏远生在《“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毛泽东与湖南苏区》一文中也指出,从湖南苏区渊源发展历史来看,属于井冈山苏区与湘赣苏区的主要地区包括茶陵县、醴陵市、炎陵县、攸县、汝城县、桂东县、资兴市、耒阳市、安仁县;属于湘赣苏区的地区主要包括北湖区和苏仙区(原郴县)、株洲县(原醴陵、湘潭之一部)、桂阳县、宜章县、嘉禾县、永兴县、临武县;属于湘鄂赣苏区的地区主要包括平江县、长沙县、浏阳市、湘阴县、岳阳县、汨罗市、临湘市。^②可见,党史学界所指的湖南苏区实际上是包括井冈山、湘鄂赣、湘赣、湘鄂西、湘鄂川黔等五块革命根据地的湖南境内苏区。

再次,从法史学界来看,“湖南苏区”这一概念已经开始逐步运用于法治领域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湖南师范大学夏新华教授指导了《湖南苏区政法文化研究(1927—1937)》(博士学位论文)、《表达与实践:土地革命时期湖南苏维埃县组织法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等多篇硕士博士论文。近年来有关湖南苏区的论文主要有夏新华、徐小芳的《土地革命时期湖南苏维埃县法制初探》、谢时研的《湖南苏区政法文化:渊源追溯、生成逻辑与历史演变》《湖南苏区民众的政法心理与政法意识探原》等。这些论文主要是从区域性研究视角对湖南境内苏区的法治现象进行深入探讨,注重探讨湖湘文化和湖南苏区法治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也注重探讨湖南苏区内部各块革命根据地法治实践之间的相互影响。

最后,国外一些学者也有使用“湖南苏区”这一概念。如美国学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明确提出“湖南苏区”的概念,他指出:“贺龙的第二方面红军在一九三五年最后从湖南苏区撤出时,据说有步枪四万多支。”^③英国学者勃脱兰在《华北前线》一书中提出:“1930年,中央军用骑兵进攻湖南苏区。”^④美国学者海伦·福斯特·斯诺在《红都延安采访实录》中写道:“撤出长沙后,平江成了湖南苏区的中心县,全县都变成了苏区。”^⑤英国学者柯尔在《社会主义思想史: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1914—1931)》一书中写道:“1930年7月,李由于以为复苏即将到来,便决定采取行动,命令湖南苏区的一

① 《湖南年鉴》(2013)指出:“14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开展苏区县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编纂出版60余万字的《湖南苏区历史研究》专题资政文集。湖南上报15个县为中央苏区县联动发展区,为进一步推进湖南苏区县认定工作打下基础。”(湖南年鉴社编:《湖南年鉴》(2013),湖南年鉴社2013年版,第277页)

② 参见夏远生:《“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毛泽东与湖南苏区》,《湘潮》(上半月)2012年第4期。

③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2页。

④ [英]勃脱兰:《华北前线》,林淡秋等译,文缘出版社1939年版,第276页。

⑤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红都延安采访实录》,张士义、张香存译,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页。

支农民部队进攻和占领长沙城。”^①可见,国外学者也将“湖南苏区”界定为湖南省境内的苏区。

(二)“湖南苏区”概念的提出理由

共产国际、中共有关历史文件中提出的“湖南苏区”是一个历史概念,由于相关文献资料的缺乏以及研究视角的选择,本文在此对这种意义上概念的提出理由不作深入的学术探讨。笔者主要试图探讨的是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湖南苏区”的提出理由。

从目前来看,学界有关“湖南苏区”的研究成果主要还是以某一革命根据地为研究视角。^②这种研究范式让我们很难观察到各块革命根据地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开展区域性研究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路径。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已经产生了一批有关江西苏区的研究成果,他们主要是从一种区域性视角展开对“江西苏区”^③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各个领域的研究。据统计,学界以“江西苏区”为题的著作共计18部^④,从这些著作的内容及篇章结构来看,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是从广义上的“江西苏区”进行研究,也即从区域性研究视角展开研究。如杨燕杰在《〈江西苏区大事纪略〉的编辑构思过程》一文中,特别提到有人将在江西与湖南、湖北等省的毗邻地区所建立的井冈山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闽浙(皖)赣苏区以及中央苏区等革命根据地合为一体,统称为“江西苏区”。他还认为,江西苏区各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并非孤立的,它们彼此之间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⑤李国强在《江西苏区史研究概述》一文中认为,江西苏区史研究“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除井冈山研究成

① [英] G. D. H. 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1914—1931)》第4卷下册,奚瑞森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21页。

② 笔者从中国知网搜索发现,截至2022年3月24日,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井冈山苏区”为题的论文312篇,以“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湘鄂赣苏区”为题的论文93篇,以“湘赣革命根据地”“湘赣苏区”为题的论文46篇,以“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湘鄂西苏区”为题的论文110篇,以“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湘鄂川黔苏区”为题的论文63篇。

③ 目前学界对“江西苏区”的概念界定不一,主要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狭义上的“江西苏区”是指江西省苏维埃政权区域,该区域后被纳入中央苏区范围,当时称该区域为“江西苏区”。而广义的“江西苏区”是指江西省境内的苏维埃区域。如江西师范大学王员教授曾撰写的《江西苏区在毛泽东思想形成中的贡献》一文明确提出:“江西苏区是指土地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江西通过武装起义先后建立起来的各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的总称。”(王员:《江西苏区在毛泽东思想形成中的贡献》,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

④ 据笔者统计,以“江西苏区”为题的著作主要有:《江西苏区史》《江西苏区若干历史问题研究》《江西苏区大事纪略》《江西苏区纪事(1927—1939)》《江西苏区新闻史》《江西苏区文化研究》《江西苏区文学史》《江西苏区文学史稿》《江西苏区民主政治建设研究》《江西苏区公路交通史》《江西苏区音乐文化研究》《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江西苏区报刊研究》《江西苏区红歌谣》《江西苏区党的思想建设研究》《江西苏区党的建设与政权建设》《江西苏区妇女运动史料选编》《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等等。

⑤ 参见杨燕杰:《〈江西苏区大事纪略〉的编辑构思过程》,《辞书研究》1987年第6期。

果丰硕外,江西境内各个苏区均有专史问世”。他特别指出了当前苏区史研究开始从单个山头的研究向苏区专门史研究的转换,同时也开始从注重军事、政治方面研究转向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研究。^① 上述研究表明,学界有关“江西苏区”研究已经实现了从单个根据地的“山头式”研究到江西境内苏区的“区域性”研究的转向。

此外,学界也将区域性研究方法拓展到广东、湖北等其他省的境内苏区研究,这可以从有关“广东苏区”的研究成果^②,以及“湖北苏区”的研究成果^③等其他地方苏区的研究成果得到印证。可以说,针对苏区的区域性研究视角不仅被学界认可而且被广泛运用,这既可以从“江西苏区”等地方苏区的研究成果中观察到这一学术动态,也可以从“中国苏区”的研究成果中得到一些启示。如何友良的《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余伯流和何友良主编的《中国苏区史》等著作,以及《中国苏维埃区域会匪问题研究》《中国苏维埃区域劳资政策评析》等论文。

尽管学界将湖南苏区界定为湖南境内苏区,但从相关研究成果来看,部分学者对“湖南苏区”的区域界定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主要有两种选择:其一,将与湖南交界的井冈山、湘赣、湘鄂赣、湘鄂西、湘鄂川黔苏区五块革命根据地进行整合,或称之为苏区的“地理叠加”。这种意义上的“湖南苏区”主要从湖南边界的五块革命根据地的整体层面进行研究,如王驰、胡光凡主编的《湖南苏区文艺运动·湘籍作家在解放区》主要从井冈山、湘赣、湘鄂赣、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的整体维度对文艺作品、重要历史文献、诗词等进行研究。其二,将同湖南交界的井冈山、湘赣、湘鄂赣、湘鄂西、湘鄂川黔等苏区的湖南境内苏区进行理论裁剪,或称之为苏区的“地理切割”。这种意义上的“湖南苏区”主要是从湖南境内的县级苏维埃政权层面进行研究,如夏新华、徐小芳的《土地革命时期湖南苏维埃县法制初探》一文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总而言之,将“湖南苏区”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运用“区域性”研究方法展开湖南境内苏区的研究,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十分必要。目前学界有关江西苏区的区域性研究已经有了部分成果,并在湖北、广东等其他地方苏区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突破,这也表明区域性研究可能成为未来“湖南苏区”研究的一种重要研究范式。

① 参见李国强:《江西苏区史研究概述》,《文史知识》1998年第1期。

② 据笔者统计,截至2022年3月24日,在广东境内展开苏维埃政权研究的有:以“广东省苏区”为题的论文1篇,即《广东省苏区镇基础教育阶段学生性教育情况分析》;以“广东原中央苏区”为题的论文25篇;以“广东苏维埃革命”为题的论文3篇;以“广东土地革命”为题的论文20篇。著作也有多部,如《广东革命根据地史》《革命的地方性:广东土地革命研究(1927—1934)》《广东人民武装斗争史(土地革命时期)》《广东革命根据地选论(1927—1937)》《广东中央苏区平远革命简史》《广东中央苏区梅江革命简史》《广东中央苏区龙川革命简史》,等等。

③ 据笔者统计,截至2022年3月24日,以“湖北苏区”为题的论文主要有2篇:《土地革命时期湖北苏区防疫减灾事业述论》《湖北土地上的苏区》。

二、湖南苏区政法文化的多样性与整体性

如前所述,不管是从历史文献的原文出处,还是学界在论著中关于该概念的运用,无不说明“湖南苏区”是一个区域性概念。这里所指的“湖南苏区”,是1927年至1937年间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地区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革命政权,实行地方割据的苏维埃区域。在湖南苏区,曾经建立了包括省级、县级、区级、乡级、村级五级苏维埃政权。2012年7月30日,湖南省苏区县认定工作领导小组、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制定出台的《湖南省苏区县认定工作领导小组关于井冈山、湘赣、湘鄂赣、湘鄂西、湘鄂川黔苏区县的认定意见》,认定湖南省级苏维埃政权6个^①,湖南跨省区苏维埃政权12个^②,湖南省苏区县38个^③,还有其他一些区域性、局部性工农兵苏维埃政权21个^④。

在前面相关概念的探讨中,笔者已经对“湖南苏区”概念进行了深入阐述。那么,什么是政法文化?从概念的种属关系来看,政法文化与法律文化是一组具有密切关联的概念。法律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性范畴,它是对人类全部法律实践经

① 湖南省级苏维埃政权相继建立,主要包括1930年7月成立的湖南省苏维埃政府、1930年10月成立的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1931年5月成立的湘东南省苏维埃政府、1931年7月成立的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1931年10月成立的湘赣省苏维埃政府、1934年11月成立的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参见湖南省苏区县认定工作领导小组、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湖南苏区历史研究》,内部资料,2012年,第10页。

② 湖南跨省区苏维埃政权遍布全省,主要包括1928年成立的湘南工农兵苏维埃政府、1928年5月成立的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1929年9月成立的湘鄂赣边境革命委员会、1930年4月成立的湘鄂西五县联军苏维埃政府、1930年7月成立的湘鄂赣边境苏维埃政府、1930年8月成立的湘东工农兵苏维埃政府、1930年9月建立的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1931年2月成立的湘东南工农兵苏维埃政府、1931年4月成立的湘鄂边联县苏维埃政府、1931年4月成立的洞庭特区苏维埃政府、1933年10月成立的湘鄂边苏维埃政府、1934年1月成立的湘鄂边中心县苏维埃政府。参见湖南省苏区县认定工作领导小组、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湖南苏区历史研究》,内部资料,2012年,第10页。

③ 2012年,经湖南省苏区县认定工作领导小组批准认定的湖南苏区县有:醴陵县苏区——今醴陵市、株洲县;汝城县苏区;茶陵县苏区;桃源县苏区;宜章县苏区;郴县苏区——今苏仙区、北湖区;永兴县苏区;耒阳县苏区——今耒阳市;桂阳县苏区;嘉禾县苏区;临澧县苏区;资兴县苏区——今资兴市;桂东县苏区;安仁县苏区;桑植县苏区;常德县苏区——今鼎城区、武陵区;酃县苏区——今炎陵县;平江县苏区;石门县苏区;浏阳县苏区——今浏阳市;大庸县苏区——今永定区、武陵源区;华容县苏区;长沙县苏区;攸县苏区;岳阳县苏区——今岳阳县、君山区;临湘县苏区——今临湘市、云溪区;湘阴县苏区——今湘阴县、汨罗市;南县苏区;安乡县苏区;沅江县苏区;益阳县苏区——今赫山区、桃江县、资阳区;慈利县苏区;汉寿县苏区;澧县苏区——今澧县、津市;龙山县苏区;永顺县苏区;保靖县苏区;沅陵县苏区。参见湖南省苏区县认定工作领导小组、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湖南苏区历史研究》,内部资料,2012年,第4~10页。

④ 湖南还建立了一些区域性、局部性的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主要包括韶山苏维埃政权、新宁苏维埃政权、隆回苏维埃政权、邵阳苏维埃政权、城步苏维埃政权、常宁苏维埃政权、临武苏维埃政权、江华苏维埃政权、新化苏维埃政权、洞口苏维埃政权、阳明山苏维埃政权、衡阳工农武装割据及苏维埃政权、溆浦工农武装割据政权、宁远苏维埃政权、绥宁苏维埃政权、通道苏维埃政权、新田苏维埃政权、道县苏维埃政权、东安苏维埃政权、蓝山苏维埃政权、花垣苏维埃政权。参见湖南省苏区县认定工作领导小组、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湖南苏区历史研究》,内部资料,2012年,第10~11页。

验、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的理性概括。然而，政法文化作为一种以政治方式形成的法律文化，是法律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因此构成法律文化的子文化。政法文化与法律文化相比较，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党管政法”，政法文化凸显了法律运行过程中的政治逻辑。

关于湖南苏区政法文化的概念问题，笔者认为，湖南苏区政法文化是一个复合概念，它是“湖南苏区”与“政法文化”这两个概念的叠加形态，而“湖南苏区”限定了“政法文化”所处的历史时空范围。因此，湖南苏区政法文化是指土地革命时期（1927—1937）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地区领导创建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法律文化，它是由湖南苏区政法精神文化、政法物质文化、政法制度文化、政法行为文化等构成的一种复合形态法律文化。

从上述有关湖南苏区政法文化的概念认识中，我们可以发现该概念本身就是对文化的多元性进行统合的一个概念。当然，关于湖南苏区政法文化的多样性和整体性，我们主要还是要用历史事实来解答这一问题。湖南苏区的早期土地革命是在中共湖南省委的统一领导之下开展的，尽管湖南境内苏维埃政权建设比较分散，苏区政权建设及政法实践主要由各特委领导并在各特区开展，但当时湖南苏区总体上还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湖南省委为统一领导湖南苏区的苏维埃政权建设及政法工作，出台了大量的党内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湖南省委在指导特委、县委工作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湖南苏区部分重要案件的审判工作发挥了领导作用。尤其是1930年在红军攻打长沙之后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建制省的工农兵政权——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这说明湖南苏区已经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省级苏维埃政权，标志着湖南苏区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已经形成。从当时中国苏区的建设情况来看，湖南苏区在这方面同江西苏区具有很多的相似性，因为湖南苏区和江西苏区都曾建立了省级苏维埃政府，省委在领导本行政区域苏维埃工作方面发挥核心作用。^①因此，从某种程度而言，在1931年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取消之前，湖南省委对整个湖南苏区是统揽全局的，是湖南全境范围政法文化建设的领导核心，由此形成的湖南苏区政法文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整体性特征。

然而，随着湖南省苏维埃政府的取消，在湖南边界地区分别成立了湘东南省苏维埃政府、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等省级革命政权，在这些省级苏区均成立了省级党组织。由于湖南苏区行政管辖区域的重新分配和重大调整，湖南苏区开始进入湖南边界省委领导时期，湖南省委也因此不再对湖南境内苏区进行领导。湖南苏区的这种分治局面，再加上湖南边界省委在领导各自苏区政法文化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社

^① 譬如，1930年10月7日，在江西省吉安城中山广场召开吉安暴动胜利大会，宣告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1935年5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解体。参见中共吉安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吉安历史：1921—1949》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74页。

会环境不同,导致了这些边界省级苏区的政法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譬如,湘鄂西苏区、湘鄂川黔苏区设立了较多的县级革命委员会政权,湘鄂川黔苏区还设立了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由于革命委员会体制下的政法文化是一种临时形态的政法文化,它同苏维埃政府政权体制下的政法机构、政法体制等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区别,这也使得湖南苏区政法文化呈现出多样性特点。

当然,湖南苏区政法文化的多样性并不是绝对的,它也是在整体性前提下所具有的多样性。其一,在湖南边界省级政权成立之前,湖南苏区的政法文化曾经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为后来湖南边界省级苏区开展政法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和启示。其二,由于井冈山苏区在政法文化建设方面率先进行了探索,而且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这就使井冈山苏区的政法文化建设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当时井冈山苏区建设经验曾被中央明确要求在全国范围广泛地进行宣传和推介。这就使湖南边界省级苏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井冈山苏区政法文化的影响,从而使湖南苏区政法文化的多样性中具有很强的共同性。其三,湖南苏区深受湖湘文化影响,湖湘文化所具有的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等精神特质深刻影响了湖南境内的每一个人。正是由于湖湘文化在塑造湖南苏区政治精英人物的政法思想、湖南民众的政法意识等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湖南苏区的隐性政法文化得以具有统一性的基础,并对湖南苏区政法制度、政法实践等显性政法文化产生重要影响。

总之,湖南苏区政法文化既具有整体性,又具有多样性,因而对湖南苏区政法文化研究要注重把整体性和多样性结合起来,从湖南苏区各根据地政法文化建设的历史事实,以及湖湘文化与湖南苏区政法文化的关系形态来把握这种整体性与多样性。

三、湖南苏区政法文化的本质属性问题

中国共产党从苏联移植到湖南苏区的政法文化,并不是盲目的照搬照抄,而是结合湖南具体实际进行创新的一种新的政法文化,湖南苏区政法文化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具有明显湖湘特色的政法文化。

其一,从文化的属性来看,湖南苏区政法文化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法律文化,强调了政治对法律的统领以及法律的工具主义性质,因而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性。随着秋收起义在湖南地区的爆发,毛泽东率先提出要抛弃国民党这面“黑旗”,打出了共产党独立领导工农民主革命这面“红旗”,由此促成了中国政法文化的转型。然而,特殊的历史环境决定了湖南苏区政法文化具有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不同的特点,也具有区别于中央苏区以及江西、广东、湖北、四川等其他苏区政法文化的特点。湖南苏区的政法实践表明,湖南苏区很早就已经开始了在中共领导之下进行司法审判的实践。譬如,茶陵县的“湖口肃反”、郴县

苏区的“反白事件”、平江县苏区的“梁案”等。这些发生在湖南苏区的典型案例已经足以说明，湖南苏区具有党管政法的传统，也即“政法传统”。这一传统的核心就是党领导政法工作，它注重审判机构在司法过程的调查研究和对当事人的说服教育等，司法审判过程贯彻了民主集中制，司法审判结果强调实质正义的实现。尽管它同国民政府的“司法党义化”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强调党领导司法，但在司法正义的实现方式上具有重要区别。湖南苏区开创的“政法传统”，对革命动员、肃清反革命分子、化解群众矛盾、教育群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大众化司法，广泛动员群众参加公审，成功地将苏维埃政权延伸到广大农村的基层社会，实现了共产党对农村社会的权力掌控，从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二，从历史序列来看，湖南苏区政法文化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政法文化的现代转型，它是从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建设的资产阶级政法文化转变为共产党独立创建的一种新型政法文化。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之后，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始独立领导政法文化建设，并将苏联政法文化在湖南广大农村地区进行移植。这种在革命根据地所建构的新型政法文化形态，一方面同国民政府时期孙中山、徐谦所倡导的“以党治国”“司法党义化”等为核心的政法文化相区别，另一方面又吸收了国民党领导政法工作的传统及工作经验，尤其是继承了国共合作期间工农运动中所产生的政法文化，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土地革命的需要进行改造和提升。从这种意义而言，它超越了国共合作时期提出“以俄为师”的口号下借鉴苏联政法文化所作出的努力，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更是直接从苏联现有的政法制度设计中寻找建政方案，使湖南苏区成为苏联政法文化的先行试验区。

湖南苏区政法文化的话语体系建构，通过对国共合作期间国民政府政法话语的直接改造，逐渐在湖南农村地区形成独特的苏维埃政法文化模式。毛泽东在1926年至1927年间政治活动的农村取向，为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农村战略作了必不可少的过渡。迥异于苏联的“城市中心论”模式，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之后主张“乡村为中心”的革命模式，提出到广大农村地区建立农民为革命主体的工农民主政权，进而在湘赣边界地区成功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所依赖的这些农村地区的支持者——贫农群众，他们是中国政治真正的边缘群众，也是乡村社会结构中生产性的然而又是被动的客体，对他们的动员创造了一股新生政治力量。因而，该战略也成功地实现了把当权政府对农民的冷漠转化为农民运动的力量。

在湖南苏区，立法主体是多元的，党政机关及群团组织制定了大量的政法类法律规范。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政法类法律规范的核心立法主体，围绕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建设及政法制度设计，湖南苏区各级党组织制定了大量的党内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苏维埃政府作为重要立法主体，也制定了一系列政法类法律规范。此外，湖南苏区的群团组织存在的“拟政党化”“拟政府化”现象，使各群

团组织具有党政机关所具有的立法、执法、司法等功能，群团组织也是政法类法律规范的重要立法主体。在湖南苏区，党、政府、群团组织都具有政法职能。比如，在党和共青团之间，甚至还存在着职责不分、将共青团视为第二党的情况；乡村农民协会甚至代行乡苏维埃职权，带领赤卫队捕杀地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及反革命分子等。可见，湖南苏区各政法主体之间的身份边界比较模糊，这也导致了湖南苏区常常出现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甚至党管苏维埃政法工作过多的现象。湖南苏区政法文化的复杂性、不规范化等特点，说明湖南苏区政法文化是一种不太成熟的“革命型”政法文化。

其三，从湖湘文化的渊源来看，湖南苏区政法文化是湖湘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延续，它传承了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并保持了一贯的连续性。从文化的历史发展规律而言，精神文化构成文化的核心，政治家的思想无疑具有一种历史的穿透性，其影响力之广泛、深远是文化其他组成部分无法取代的。湖南作为革命文化的摇篮，是理学发源地，湖南政治精英人物深受理学思想尤其是理学经世派思想影响。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湖南苏区开展的政法文化建设，体现了湖湘文化的“敢为人先”的精神特质。而湖南苏区政法文化方面的一系列“首创”，比如毛泽东在建军方面提出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在建政方面创建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在肃反方面开展的“湖口肃反”，则是“敢为人先”精神的集中体现。湖南苏区政法文化的创新性也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湖湘文化精神，主要体现在毛泽东坚持从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出发，否定了苏联和中央提出的“城市中心论”，提出了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从而开创了在广大农村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及政法文化的新局面。正因如此，湖南苏区毛泽东、任弼时、谭余保、贺龙、朱德、彭德怀等一批党政军领导人物，深受湖南理学传统影响，又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视野，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并将土地革命置于中国革命的中心位置。在他们的领导下，湖南土地革命风起云涌，一大批被作为政法对象的地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反革命分子等受到了严厉的打击和制裁，维护了农民的权利，保障了苏区的政权稳定。他们的政法思想也成为湖南苏区政法文化的核心部分，对湖南苏区的政法制度、政法实践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

湖南苏区政法文化作为革命根据地的一种政法文化，是在特定的历史时空形成的，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南苏区政法文化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法文化最直接、最主要的历史渊源，它确立了当代中国政治法律体制的基本框架，决定了当代中国政法文化建设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毛泽东等政治精英人员在创建苏区政法文化方面的实践和探索，为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和实践经验。正因如此，我们需要总结湖南苏区政法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实践理性和司法规律，为当前中国政法文化发展和政法改革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引领和经验借鉴。

四、结语

湖南苏区政法文化作为一种实践理性非常浓厚的法律文化，同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文化相比较，公开表明自身的无产阶级立场，具有明显的优越性。湖南苏区的政法制度及实践，通过司法大众化，推动工农群众参与土豪劣绅、反革命分子的公审，司法过程体现了主权在民的理念，彰显了司法的实质理性。中国共产党通过在湖南苏区进行政法宣传、政法机构设置、政法制度建构以及政法实践，由此产生的是一种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法律文化。尽管湖南苏区政法文化是一种地方型苏区政法文化，但它在中国政法文化百年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The Concept Explanation of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Culture of Hunan Soviet Area and Hunan Soviet Area

Xie Shiyan

Abstract: The Soviet Area of Hunan was the area wher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arried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Soviet power in Hunan from September 1927 to December 1937.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culture of Hunan Soviet Area is a new political and legal culture creat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Soviet area of Hunan, which has an important demonstration rol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and legal culture in other Soviet areas at that time. The Soviet area of Hunan adheres to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culture under the revolutionary mode of “rural center”, and carries out the innovation of political and legal culture on the basis of fully combining the local reality of Hunan. From the cultural attribute,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culture of Hunan Soviet Area is a kind of Marxist legal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sequence,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culture in the Soviet area of Hunan was transformed from the bourgeois political and legal culture jointly built by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to a new political and legal culture independently creat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rigin of Huxiang culture,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culture of Hunan Soviet Area is the continuation of Huxiang culture 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 which inherits the basic spirit of Huxiang culture as well as innovates

and develop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Keywords: Hunan Soviet Area; Politics and Law Culture; Red Rule of Law; Soviet Culture

[责任编辑：靳贺]

**“大思政课”
相关研究**

迷信西方的历史浮沉与认知剖析^{*}

刘海涛 杨 威^{**}

【摘 要】在西方实力优势与文化渗透持续存在的情况下，主体的认知变化是导致对西方迷信消长起伏的关键。甲午战争之后形成了西方体制能够救亡图存、维护人权、体用不可分割的认知，使中国对西方的迷信逐渐形成；五四运动之后，对中国国情与发展道路的科学认识、对西方体制效用价值的重新估定、对中西关系认识的深化，是对西方迷信消退的关键；改革开放初期，在国家发展、人权保障、中西关系问题上再次形成的对西方体制的教条主义认知，使迷信西方出现复燃；之后，随着西方体制普遍有效这一认知偏差的纠正与对中西体用关系认识的深化，全盘照搬西方制度的迷信逐渐消退。但人权评价指标的差异性导致的教条主义认知仍然存在，则使迷信西方转化为信奉“普世价值”的形式。

【关键词】迷信西方；国家发展；人权保障；体用关系；教条主义思维

近代以来，部分中国人形成了一种对西方的迷信。在他们眼中，唯有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才是真正理想的社会模式，中国应当以西方市场经济、民主政体、民族国家等社会制度为模版，以西式“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为取向。简言之，中国应当采用西方体制，走资本主义道路。对西方迷信自形成以来便长期影响着我国的社会历史进程，其间虽有消长起伏，但却顽固而持久地存续至今。这一现象在今天不足为奇，但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就会注意到，西方迷信在中国其实既非传统又非主流，其在心理层面与中国传统的崇古鄙夷心态相悖，在政治上更与我国的社会主义体制相对立。为何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会形成对西方的崇拜并对西方道路深信不疑呢？

对此有一种流行的解释，将原因归结为西方的实力震慑与文化渗透。这无疑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项目号：20AKS018）阶段性成果。

^{**} 刘海涛，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杨威，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比较思想政治教育。

揭示了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考察历史事实,却发现这一观点对某些现象缺乏解释力。如在西方实力震慑与文化渗透之下,五四运动之后人们对西方的迷信却逐渐减弱;又如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局势可谓东升西降,但在我国实力迅速提升和意识形态工作不断强化的情况下,迷信西方的现象仍然存在。这些现象提醒我们,必定还有其他因素对迷信西方产生着影响。

“我们中国教育必须取法西洋的缘故,不是势力的大小问题,正是道理的是非问题。”^①陈独秀的这句话正可以给我们启发:人们之所以崇信西方,不仅在于实力之对比,更在于主体之认知。也只有经过理性思考之后,人们才会对自以为是的道理深信不疑,而其中认知的偏差则使这一信念成了迷信。因此,在考察迷信西方的成因时,我们既要看到外在之影响,也不可忽视主体认知这一重要视角。那么,是怎样的认知偏差导致了对西方迷信的形成?又是怎样的认知变化使对西方的迷信消解?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唯有回到历史之中,对迷信西方的消长起伏进行梳理并考察其认知基础。期望通过这一问题的回答能对实力震慑说与文化渗透说做一补充,增进对这一现象的理解并为破除对西方的迷信提供理论参考。

一、全盘西化:迷信西方的形成与认知基础

中国人何时开始形成对西方的迷信?如果仔细考察历史事实,就会发现这一现象并非始于鸦片战争,而是甲午战争之后才成为风潮,主体的认知变化正是其中的关键。

虽然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被迫打开国门,但漫长历史所形成的天朝上国的自我迷信却非短期可以破除。考察此时知识精英提出的口号,如“师夷长技以制夷”“中本西末”“中体西用”等,可知即使西方已经展现出军事实力的强大,却仍然被视为“蛮夷”,其器物学问不过是辅佐中国纲常礼教的末用而已。先进人士的认知尚且如此,更不必说仍然鼓吹祖宗之法、夷夏之防的守旧派了。可见即使实力差距已经显现,但如果认知仍然停留在天朝上国的阶段,连正视西方优势都不可能,自然不会形成对西方的迷信。

但甲午之后,情况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方之“体”开始成为人们学习的对象,对西方的迷信也逐渐形成。梁启超曾对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状况做过简要而精到的描述:“简单说,这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②这很明显陷入了对西方制度的迷信之中。不仅如此,辛亥革命之后,

^① 《陈独秀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1页。

^②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4~45页。

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更是强调不加选择、毫无批判地全盘输入西方文化,以为“我们的唯一办法,是全盘接受西化”^①,甚至认为“近几十年的教训是我们最聪明的办法,便唯有诚意地,老实地,爽快地,不扭扭怩怩地从根上西化”^②。从照搬照抄西方制度到全盘西化,可见当时对西方制度文化已经执迷至深。

这不禁令人思考,为何在这时中国人会变得如此迷信西方并发展到全盘西化的程度?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对西化论者的立论基础做一番考察。需要说明的是,作为这一时期的思想潮流,崇尚西化的言论层出不穷,这里主要将其中较为集中的理由进行归纳。整体来看,其理由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其一,就国家时局而言,认为西方体制是普遍有效的救世良方,只有走西方道路才能救亡图存。能否解决国家所面临的历史性课题自然是评判社会制度可行与否的关键,而在此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眼中,甲午战争的失败已经宣告了旧体制在救亡图存这一历史课题上的无能为力。在他们看来,中国之所以会输给曾经实力远逊于自己的“东邻小国”,就在于之前学习西方“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③,而这才是欧美以及学习欧美的日本能够强盛的原因。此时的西化论者将西方化视为世界之潮流,他们以俄国、日本采用西方体制而强盛,印度、朝鲜未曾西化而沦为殖民地作为论据,认为中国只有进行根本体制的变更才能适于当世之生存。不仅如此,对于中国采用西方体制的前景,他们持十分乐观的态度。如邹容将“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视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④;康有为更是认为:“泰西变法三百年而强,日本变法三十年而强,我中国之地大民众,若能大变法,三年而立。”^⑤此时人们的心理正如毛泽东所描述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⑥。

其二,就人民生活而言,认为西方政体是更为优越先进的文明体制,只有采用西方体制才能保护人权。是否具有历史先进性与道义优越性无疑是选择社会制度的重要标准。而随着中西体制的不断比较,曾经“中国文物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⑦的认知逐渐成为梦呓。在此时的西化论者看来,中国“精之政教文章,粗之布帛水火,无一不相形丑拙”^⑧,可谓“百事不如人”。

① 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81页。

② 张佛泉:《西化问题之批判》,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中册,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463页。

③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5页。

④ 邹容:《革命军》,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653页。

⑤ 《康有为全集》第4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0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⑦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三〇,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088页。

⑧ 《陈独秀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1页。

不仅如此,随着对中西文明发展历程的了解,人们更是发现中西之异不仅是高下之差,更是古今之别:“君权时代,也是社会进化必经的阶级,西洋东洋全是一样,并没有分别……不过西洋文明已从古代超入现代,而东洋文明还正在迟迟不进的时候”^①。而西方体制具有历史进步性的重要标志就在于其对个人权利的维护,西方“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②,乃是令人向往的精神物质都发达的“近世文明”。对比之下,中国社会体制造成“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等“卑劣不法惨酷衰微之象”^③,乃是落后西方一个时代的“古之遗”。在这种认知之下,西方资本主义体制可谓尽善尽美,而中国不仅野蛮落后,而且不配与西方相提并论,自然“只有根本吸收西洋近代文明,决无保存腐旧凝滞的国有旧文明之理”^④。

其三,就中西关系而言,认为西方体用不可分割且与中国无法相通,要学习西方只能全盘西化。西化论者不仅从国家发展与人权保护方面论述了西方制度的优越性,还从社会系统协调的角度论述了全盘采用西方体制文化的必要性。在全盘西化论者看来,多次变法之所以收效甚微,执迷于中西调和是重要原因。因为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都是整套的,各部分之间具有连带关系,“从文化本身的各方面的连带关系来看,我们不能随意的取长去短”^⑤。具体到中西社会而言,两者更是各有其本末,“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⑥。不仅如此,在他们看来,中西两个社会之间存在根本性质的不同,相互之间根本无法调和相通。如李大钊就揭示了当时中西体用配合不佳的情形:“大至政制,微至衣履,西人用之则精神焕发,利便甚溥,而一入于吾人之手,著于吾人之身,则怪象百出,局促弗安”,并将原因归结为“吾人不适于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强调只有“将静止的精神根本扫荡”才可。^⑦陈独秀更是认为中西社会“好像水火冰炭,断然不能相容;要想两样并行,必至弄得非牛非马,一样不成”^⑧。在这种认知之下,中国不学习西方则已,若要学习西方,自然必须全盘西化。

可以发现,在此时西化论者的认知中,西方道路乃是中国救亡之道、人民幸

① 常乃惠:《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8页。

② 《陈独秀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7页。

③ 《陈独秀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8页。

④ 常乃惠:《东西文化问题质胡适之先生——读〈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14页。

⑤ 陈序经:《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杨深编:《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255页。

⑥ 《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9页。

⑦ 《李大钊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

⑧ 《陈独秀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08页。

福之道、社会进步之道，采用西方体制乃是理所当然的选择。这种认知是否准确呢？继续考察历史就会发现，五四之后人们对西方的认知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对西方的迷信也逐渐呈现出消退态势。这不禁令人思考，是怎样的认识变化使对西方的迷信得到消解？对比之下此时的认知又存在哪些偏差？这就需要对五四运动之后人们的思想状况做一番考察。

二、打破迷梦：认知变化与迷信西方的消退

在五四运动之后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对西方道路的迷信呈现持续消退的态势。考察知识分子言论的变化，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趋向。此时虽然仍有人坚持全盘西化主张，但大多数知识分子开始为中国寻求新的道路。如曾经憧憬西方制度的梁启超旅欧归来后对西欧文明的幻想发生破灭，转而号召国人以东方文明拯救西方文明；曾经热情讴歌西方民主、自由的陈独秀、李大钊则转向社会主义信仰。此时《申报》组织过一次有关中国道路的征文，有学者统计其中的思想倾向发现，在知名人士的26篇文章中，“完全赞成走私人资本道路即个人主义道路的，只有1篇；倾向于社会主义方式的，约有5篇；认为应兼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者之长，或主张采取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形式，即主张混合方式的，约有9篇”^①。这大致可以说明人们对西方道路盲目效仿的迷信态度已经发生变化。这一态势在之后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更使“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②。此后，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背景下，公开场合对西方的推崇更是几乎销声匿迹。

应该说，即使经过战争，西方的实力相对中国而言也是十分强大的，更何况西方还开始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和平演变策略，但为什么国人对西方的迷信却在此时持续下降甚至销声匿迹呢？从认知角度可以做出解释，原因就在于对西方认识的深化。

首先，在民族存亡问题上，企图走西方道路实现富强的方案逐渐被视为幻想。之前将西方制度文化视为万能良药，以为能药到病除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但采用西方制度改造中国的实践结果却是“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③，这些直接的感性认识自然使人们对西方体制效用的怀疑不断增长。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带来了思想进步。在新思想指导下，人们开始明白经济物质基础才是解决国家发展问题的关键，“离开了中国的

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9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经济现状来谈生产发展的路线，那恰是闭门造车的乌托邦理想”^①。那么中国的现状是怎样的呢？以马克思主义考察中国国情，原来此时中国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资产阶级力量的弱小已经“断绝了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路”^②，中国并不能通过走西方道路实现富强。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救亡图存只能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③。这一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更是无可怀疑，在民族存亡问题已经有了一个非西方甚至反西方的答案后，对西方的迷信自然快速消退。

可见，之前对西方的认知犯了不顾实际的教条主义错误。西化论者看到了中国变法图强的必要性，但却抱持着一种制度文化决定论的教条主义思维，不顾实际地以为在西方有效的资本主义体制同样可以适用于中国，但实际上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④

其次，在保护人的权利方面，之前认知中至善至美的西方“近世文明”摇身一变成为了“病态文明”“腐朽文明”。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社会内在矛盾的暴露，以及中西交往的增多，使人们对西方体制逐渐有了更为全面理性的认识。原来资本主义并非理想王国，在经济上，资本主义制度会导致少数人独占国家财富而绝大多数人陷于失业贫困；政治上，“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⑤。此时人们对西方的认知正如胡适所言：“凡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夸耀的西欧文明，在这种新估计里，都变成了犯罪的，带血腥的污玷了。”^⑥那么，怎样的制度才真正符合人性、保障人权呢？随着马克思主义成为时代潮流，社会主义成为人们的自觉追求。在唯物史观的映照之下，原来资本主义已经腐朽没落，而共产主义才是“新兴的健康的文明，才能解放一切被压迫的人们使之达到真正的平等自由的境域，才能免除未来的社会的对抗和矛盾的现象”^⑦。在这种价值的重新估定之下，曾经对西方的向往与崇拜自然逐

① 董之学：《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文选》上册，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23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3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⑤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武霞、许俊基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6页。

⑥ 胡适：《建国问题引论》，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文选》上册，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314页。

⑦ 希祖：《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文选》上册，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159页。

渐消散。

可见，此前对西方的认知犯了片面化、极端化的形式主义错误。西化论者虽然敏锐地觉察到西方体制相对于中国的历史优越性，并对旧文化的弊病进行了充分揭露，但却“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①。这导致了对西方的全盘肯定与对中国的全盘否定，进而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的信徒。

最后，在中西关系问题上，逐渐区分出现代化与西方化之不同。之前以为中西社会截然不同、无法相通，因此中国要工业化就必须全盘照搬西方制度文化。但十月革命后苏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业化成就更新了人们的认知，人们逐渐意识到可以将一个地区的文明区分为普遍共性与地区特性两部分。在这种认知之下，西方文明既包括工业生产等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共性，也包括宗教礼仪等具有西方特色的地区传统。因此，“如果我们要学，则所要学者是工业化，不是西洋化”^②，这无疑是认知的极大突破。不仅如此，人们更是逐渐认识到，即使是西方的先进经验也必须与民族特点相结合。“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③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创造出既有时代性又有民族性的新文化。正是在这些认知的进步之下，曾经全盘照搬西方制度文化的迷信不断得到消解。

可见，之前对西方社会的认知犯了静止孤立看问题的形而上学的错误，没有看到不同社会之间的普遍联系和相通之处，混淆了社会各部分的必然联系与偶然因素，因此产生了诸多偏激认识。同时还可以发现，之前在学习西方过程中形成了对西方文化只顾被动接受、缺乏批判分析的学徒心态，这种文化主体性的缺失也是产生全盘西化思想的重要原因。而在新的认知之下，既然西方资本主义体制不是工业化的必要条件且已经暴露出严重弊端，而且中国不能通过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实现富强，那么对西方的迷信自然逐渐消退。

由此可见，认知的深化是这一时期对西方迷信消退的关键。而考察其中缘由，除了实践结果的直接验证之外，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无疑是关键。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知识分子更新了自己的固有思维方式，得以更为科学地认识现代中国与现代世界，从而使之前的认知偏差得到纠正。正如毛泽东指出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2页。

② 冯友兰：《中国现代民族运动之总动向》，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上册，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32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①。对西方认知的变化可以算作一个明证。

三、西化梦的重温：迷信西方的复燃与认知偏差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对西方的迷信在五四运动之后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持续消退，但并未完全得以清除。在改革开放初期，迷信西方又出现了复燃现象，甚至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形成风潮。这一时期全盘西化的主张再次甚嚣尘上，出现了崇拜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自由”“人权”，否定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他们“企图在政治上用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在经济上用资本主义私有制取代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思想文化上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②。这一时期对西方的迷信还由现行经济政治体制深入背后的理论学说，“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③。不可否认西方制度文化有其价值，但不加鉴别、不顾实际的企图走西化的道路，则很明显陷入了对西方的迷信之中。

为何在全部近代史已经证明了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破产的情况下，对西方的迷信会出现复燃？从认知角度考察，原因在于资产阶级自由化人士对西方体制的效用价值再次出现了认知偏差，他们的理由同样可以归纳为国家发展、人权保障、中西关系三方面。

首先，在国家发展问题上，西化论者再次将西方制度视为万能良药，以为采用资本主义制度就能发展经济、根治腐败。在革命胜利之后，现代化建设便成为新中国面临的历史性课题，但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使西化论者在这一问题上出现了认知的偏差。他们忽视中国在怎样极端落后的条件下开展现代化建设，无视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发展成就，单纯将中国此时的发展水平与经过数百年殖民积累的西方发达地区比较，就得出“破坏靠‘老马’，建设靠‘走资’”，“‘老马’的历史任务已经终结”^④等错误结论。同时，面对当时经济领域的腐败现象，西化论者不了解“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我们国家就必然由于种种内外原因而四分五裂，我们民族和人民的前途就会被断送”^⑤的严峻现实，用党的某些失误作为削弱、摆脱党的领导的理由，将一切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的原因归结为坚持党的领导，认为只有照搬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才能对执政党进行有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516 页。

② 《江泽民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73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4 页。

④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理论处编：《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辑录》，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2 页。

⑤ 《江泽民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6 页。

效监督，防止腐败现象的产生。正是在这种极端错误的认知之下，西方资本主义体制再次成为部分人的选择。

其次，在保护人的权利问题上，西化论者再次将西方体制理想化，以为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保障人权。在他们看来，中国必须“老老实实在地承认落伍的现实，全面地、彻底地向西方学习。更严格地讲，不是作为向白种人的西方学习，而是作为人类先进文化的西方学习。中国和西方之间没有冲突，有的只是非人的生存方式与人的生存方式的差别”^①。如果说曾经中国的封建体制的确落后于时代，难道如今以人的解放为理想追求的社会主义体制还不如资本主义优越吗？原来在此时西化论者的认知之中，“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被诬蔑为‘乌托邦’；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被攻击为过时的教条，甚至被诬蔑为宗教迷信；成千上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被攻击为专制独裁”^②。他们不了解西方社会暂时的自我完善和调整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矛盾的彻底消除，简单地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中国未来只有一条道路，即汇集到温情脉脉、充满人道的西方“蓝色文明”之中。正是在这种极端偏激错误的形式主义认知之下，西方资本主义体制再次受到追捧。

最后，在中西关系方面，再次将西方社会视为不可分割且与中国截然对立的整体，认为中国要学习西方只能全盘西化。西化论者忽视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的科技进步与发展成就，以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曲折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科技不是孤立的，是它那里意识形态、它那里思想基础带来的。我们光引进科技，不引进他们的思想，等于引进硬件没有引进软件一样，空的”^③。在经济改革的背景下，他们机械地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对立，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无法相容，因此只要搞市场经济就只能采用资本主义制度、融入西方文化。这很明显再次混淆了社会各部分之间的必然联系与偶然因素，没有区分西方文明的普遍共性与地区特性，犯了静止孤立看待问题的形而上学的错误。这一思维的另一面则是认为走社会主义道路便不能引进西方技术或者市场机制。可以发现，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乃是教条主义者共同的思维误区，他们不从实际出发而只做教条的抽象争论，进而导致了迷信的产生。

西方道路使国家富强、西方政体保护人的权利、中国要吸收西方先进经验就必须全盘西化，此时人们对西方的认知仿佛倒退回了五四运动之前。虽然时代背景已截然不同，但这些认知背后所呈现出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却仍然惊人一致。如果说五四运动之前的西化思潮作为封建主义的对立面还有相当程度的进步意义，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仍然迷信西方

①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理论处编：《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辑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页。

② 宋平：《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8页。

③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理论处编：《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辑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第126页。

道路就完全是错误的。为什么人们对西方的认知会发生倒退？这并不是本文要讨论的主要问题，但如果简单分析，邓小平“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的判断无疑指出了关键。当时的年轻人对中国近代以来的艰苦奋斗历程缺乏感性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等方面教育的不足，无疑会使资产阶级思想趁虚而入，导致“不少人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因此也就不可能了解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幻想在一夜之间把西方的物质文明搬到中国土地上，比较容易接受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宣传”^①。也正是吸取了这一教训，此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思想政治工作的不断增强，人们的认知偏差逐渐得到纠正，对西方的迷信也逐渐消退。

四、“第二次思想解放”：迷信西方的消退与认知变形

虽然改革开放初期全盘西化的言论甚嚣尘上，但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以坚定意志和历史担当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此后，人们对西方的迷信呈现逐渐减弱的态势。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对西方的迷信更是快速消退。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现在主张中国应该无条件尽快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言论不多见了，大多数学者都认识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和现实条件出发”^②。还有学者认为，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无论“左”还是“右”，“不管大家有多少分歧，至少我们在开始摆脱对西方模式的迷信，对美国模式的迷信”，并将此种变化称为“第二次思想解放”^③。但是不是说对西方道路的迷信已经完全消解了呢？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对西方的迷信仍然存在，只不过转换为了更具迷惑力的新形式，这就是对所谓“普世价值”的迷信。在“普世价值”的信奉者看来，中国的确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但这一道路“本质却是对‘普世价值’的拒绝”，“是对中国以现代性社会为目标的转型进程的偏离和倒退”。^④ 那他们所谓的“普世价值”“现代性”又是什么呢？是“欧洲启蒙运动所提倡的自由、理性、个人权利等核心价值观，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市场经济、民主政体和民族国家等一整套制度”^⑤。可见，这一迷信虽然不再执着于对西方现有制度的照搬照抄，却仍然迷信一个理念化的西方，实质是将资产阶级政治理想视为中国的发展目标。

为什么在国际局势东升西降、我国实力迅速提升和意识形态工作不断强化的

①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页。

② 王一程：《马克思主义是剖析“普世价值”问题的科学思想武器》，《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6期。

③ 甘阳：《文明·国家·大学》（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35页。

④ 秦晓：《追问中国的现代性方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2页。

⑤ 秦晓：《追问中国的现代性方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情况下，人们能够破除对西方既有体制和发展模式的迷信，却仍然对所谓“普世价值”抱持迷信态度？从认知角度考察，可以发现原因在于国家发展、中西关系方面的认知偏差得到纠正，但在何种秩序更加维护人权方面的认知偏差仍然存在。

首先，在国家发展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纠正了西方制度普遍有效的认知偏差。只要采用西方模式就能促进经济发展吗？只有三权分立才能监督政党解决腐败问题吗？当东欧、拉美等地区以西方体制为模版、以西方经济理论为指导进行改革后却并未能实现经济腾飞、国家富强，而是党争纷起、社会动荡，难以稳定发展。而对比之下，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走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符合中国实际，而且发展的速度与质量更远超西方，这些事实无疑使曾经的认知偏差得到纠正。尤其在党的十八大之后，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和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恢复，更使“广大青年在政治上彻底抛弃了西方‘三权分立’制度的说教，开始建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信心”^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有些人吹捧西方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那一套，不相信我们党能够刀刃向内、自剜腐肉。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实践给了他们响亮有力的回答。”^②

其次，在中西关系方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成功结合纠正了全盘照搬的认知偏差。只有全盘采用资本主义体制才能发展生产力吗？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能相容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有力打破了社会全盘不可分割的迷思。人们逐渐认识到科技、市场等不过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机制不仅能够结合而且可以更好地发挥各自之长，既能够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又能够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党的二十大提出了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基于自身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我们完全可以在遵循现代化普遍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借鉴西方优秀经验，同时又不放弃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这无疑极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破除了现代化等于西化的迷思。

但在何种秩序更加维护人权这一问题上，却可以发现“普世价值”的信奉者仍然存在认知偏差。为什么将资产阶级政治理想视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标准模板和最终目标？原来在他们眼中，仍然将西式“民主”“自由”“人权”视为现代文明的最终价值秩序。相较而言，中国模式乃是“以威权政治的深厚‘传统’来抵制民主观念的传播和对民主政治的要求”“以传统的‘集体主义’来反对个性解放的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的观念”^③。甚至有人曲解中国式现代化内涵，以为中国现代化只包含富国强兵，而价值追求则被抽离。在他们看来，中国特色社

① 刘书林：《新世纪以来青年价值观新取向分析》，《思想理论教育》2016年第9期。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60页。

③ 雷颐：《启蒙与儒学：从维新到五四》，资中筠：《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4页。

会主义的发展虽然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但在维护个人民主权利和自由等方面却仍然远远落后于西方。如果将这一认知与一百多年之前的中体西用思想对照,我们可以发现这简直就是中体西用的镜像翻转:承认中国道路在物质发展方面的成就,但却仍然以为西方的“纲常礼教”是更为优越先进且万世不变的“天理”。

很明显,这种认知存在极大的偏差。因为中国共产党不仅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通往富强的新道路,在人权方面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有着相较所谓“普世价值”更为优越先进的理想追求。中国共产党绝不抵制民主、反对自由,“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举‘争民主、争人权’的旗帜,鲜明宣示了救国救民、争取人权的主张”^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促进和保护人民各项权利,解决了十四亿多人口的温饱问题,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在人权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世界人权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不仅如此,我国人权发展道路追求的不是一部分人或少数人享有特权,而是广大人民群众享有普惠性人权。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乃是真正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旨归的社会主义将给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这相较于实质是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②的所谓“普世价值”而言,无疑是更为优越先进的存在。

为什么在人权方面中国同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且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更为先进的情况下,却仍然存在认知的偏差呢?深入探索“普世价值”信奉者的认知,可以发现教条主义的思维与人权评价指标的差异性是主要原因。

首先,我们仍然可以发现隐含在这些偏差认识背后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很明显,“普世价值”的信奉者没有看到“民主”“自由”“人权”的社会性、阶级性、历史性。他们忽视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教条地将民主、自由、人权的实现形式局限为西方模式;没有认识到“普世价值”背后的资产阶级性质及其虚伪性,形式主义地以为西式价值就是最好的价值;不了解任何具体制度都要与实际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看不到中国的积极变化和发展,静止孤立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只重视人民的生存权而忽视其他政治权利,这无疑是导致偏差认识的深层原因。

其次,在人权保护问题上评价指标的差异性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所以在国家发展、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人权保障三方面同样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情况下,前两方面的认知偏差能够较快得到纠正,而人权方面却仍然受到教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9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7页。

条主义思维影响，是因为评价指标的明确与否在其中发挥着关键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反腐败斗争的成效、社会主义能否与市场经济结合、是否促进科技发展等问题，有着如国内生产总值（GDP）、科技成果等具有共识的明确评价标准，可以十分清晰地对比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西化论者意识到之前认识的偏误，从而破除全盘照搬西方制度的迷信。

相较而言，在人权评价方面却缺乏共同一致的评价指标。虽然当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强调对人的权利的保护，但由于各国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等历史条件的不同，秉持的人权观各异，导致在人权评价指标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如“强调政治权利的优先保障还是经济社会权利的优先发展，是国际人权界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①，西方国家大多强调个体自由权、排拒国家干涉的政治性权利要求的优先保障，而我国基于传统文化、革命斗争历史和社会主义制度等历史条件形成的人权观则强调以生存权、发展权为核心的经济社会权利要求的优先发展，进而推动人民更广泛权利的实现；又如西方国家强调民主形式，将民主等同于定期投票、多党竞选、三权分立等，而我国强调的人民民主则既注重人民投票权，又注重人民参与权同人民内部充分协商，既注重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又强调法定程序的真正执行和权力真正受人民监督，以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正是由于这些观点差异的存在，一旦缺乏对不同的人权道路及其社会历史背景的考察，就会在教条主义思维影响下将“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内涵、制度形态、实现路径等简化固化为西方形式，并以之作为评价衡量其他国家实践的单一标尺，陷入对西方价值理念及其实现形式的迷信之中。

可见，教条主义的思维模式与人权评价指标的差异性乃是导致认知偏差形成，进而使当前“普世价值”迷信存在一定市场的主要原因。因此，树立科学辩证的思维模式，关注中国所处的现实环境与历史文化传统，了解“民主”“自由”“人权”实现形式的多样性，跳脱出西方预设的思维框架与所谓“国际标准”，全面客观深入地分析西方价值理念及其实质，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维护人权问题上的优越性，乃是破除对“普世价值”迷信的关键。

五、结语

“破除对西方的迷信，这是一件大事，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要进行。在我们国家也要继续破除这种迷信。”^②对西方的迷信，成因十分复杂，限于篇幅，本文仅从认知角度进行了分析。可以发现，西方资本主义体制使国家富强、使人的权利得到保障、西方文明体用不可分割等认知偏差是形成对西方迷信的关

^① 齐延平：《论中国人权精神的建设》，《文史哲》2005年第3期。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页。

键，而迷信者不顾实际的教条主义思维、片面化的形式主义认知、静止孤立看问题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则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结论启示我们，要破除对西方的迷信，除了不断增强自身实力和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之外，从认知角度切入，使人形成科学辩证的思维模式，全面客观深入认识西方资本主义体制，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实际出发看待中国道路的选择，是可以采取的针对性策略。同时必须看到，虽然当前由于认知偏差等因素，西方社会制度与价值观念仍被一些人奉为圭臬，但相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彰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不断增强，人们对西方的迷信必将不断消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站立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十三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①

The Rise and Fall of Superstitions on the West: A Historical Examination and Analytical Insight

Liu Haitao Yang Wei

Abstract: Under the persistent penetration of Wester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forces, the change of subject recognition is the key to the ebb and flow of superstitions on Western culture.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1894, the perception that the Western system could save the nation, safeguard human rights and make the noumenon and function indivisible was formed, which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superstitions on Western culture. After May 4th Movement, th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development path, the reassessment of the utility value of the Western path, and the deepening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became the keys for the gradual fading of superstitions on the Wes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eriod, the doctrinal cognitive bias towards the Western system was formed once again with regard to the issue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so that the superstitions on the West appeared a second time. After then, as the cognitive bias that the Western system was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213 页。

generally effective was corrected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st and West got deepened, the superstition on wholesale copying of Western system gradually faded. However, the persistence of doctrinal cognition resulting from differences in human rights evaluation indicators has transformed Western superstition into an adherence to “universal values”.

Keywords: Superstitions on the West; National Development;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Noumenon and Function Relationship; Doctrinal Thinking

[责任编辑：焦佩]

“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对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挑战及其应对*

秦 芬**

【摘 要】宣扬“去意识形态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渗透和腐化的重要手段，其本质是打着“去意识形态化”的幌子，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近年来，“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在教育领域的影响日益显露，给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带来了严峻考验。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教育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意义，强调教育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根本途径。因此，必须坚决抵制“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对教育事业的侵蚀，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强化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注重对错误思潮的批判，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立德树人功能，自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意识形态教育，同时加强对教育意识形态安全的法治保障。

【关键词】去意识形态化；挑战；实践路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①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②这一重要论述进一步明确了教育作为基础性和战略性支撑的重大意义。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警惕“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对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负面影响，深刻认识我国教育事业、意识形态建设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教育事业的引领作用。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中国革命文化传承研究”（项目编号：19AKS018）阶段性成果。

** 秦芬，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党的建设。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4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4页。

一、“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成因、主张和实质

“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由来已久，最早泛起于20世纪5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蓬勃发展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恐慌和仇视，为遏制社会主义浪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仅从经济、政治、军事上打击社会主义国家，更无时无刻不试图从思想上渗透、腐蚀、分化社会主义国家，“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并不断发展起来的。相较于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意识形态渗透成本更低，更具有隐蔽性和伪装性，往往能收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因此，西方学者纷纷论证意识形态已经过时，打着“打倒意识形态”的旗号来宣扬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冷战结束后西方学者认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意味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失败，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走向了死胡同，故而宣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战胜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时代也已经走向了终结”^①，到福山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认定为“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②，再到塞缪尔·亨廷顿用“文明的冲突”取代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③，直至目前一些西方学者宣扬“普世价值说”和“价值中立说”等，“去意识形态化”思潮一直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渗透和挑战的重要手段。近年来，由于中国的崛起有力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打破了西方模式的垄断，在世界东方开辟和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两种制度和两种思想体系的较量日趋激烈。由是，西方国家认识到通过简单粗暴的污蔑和歪曲已经不能彻底动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理性，故转而利用更具有迷惑性的“去意识形态化”思潮来对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攻击和毁谤，妄图通过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把人们思想搞乱，然后浑水摸鱼、乱中取胜”^④。

“去意识形态化”思潮随着时代的演变不断更新着话语表达方式，其核心主张不外乎以下三点：一是主张意识形态已经终结，认为强调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意识形态所倡导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属于一种传统的革命话语模式，这一理论框架已经不适用于指导如今的社会发展，因此主张脱离政治、脱离意识形态来理解、看待、评价各类事件和问题。比如在文艺领域，主张

① [美] 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五十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2页。

② [美]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③ 参见[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7页。

文艺无国界，应远离意识形态，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教育领域，主张传授不受意识形态干扰的所谓“纯粹的知识”，反对爱国主义教育 and 理想信念教育；在新闻宣传领域，主张“言论自由，采编独立”，反对新闻审查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等等。二是主张价值中立，将意识形态学术化。西方学者认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人们无法轻易评价事物，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资本主义思想都只是不同的学术体系和学术流派而已，学术界应该摆脱意识形态、阶级立场、价值取向来进行单纯的学术研究。要站在中立的立场上把不同的意识形态放在平等的地位供人选择、评价和批判，不赞成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放在主导地位，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视为“思想独裁”，推崇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三是主张“普世价值”具有超意识形态性，将西方的平等、自由、民主、人权、博爱等来源于特定社会关系和历史状况的思想包装为超阶级的、普世性的共同价值追求，认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超越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理念，因而要求各个国家都要效仿西方的制度和模式。比如政治方面追求三权分立和宪政民主的制度设计，经济方面追求全面的私有化、经济利益最大化、片面依赖市场调节的自由化倾向，社会方面忽视人的社会性、追求原子式的个人主义、以自我为中心等。

“去意识形态化”的实质并非真的要抛弃意识形态，而是去马克思主义、去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夸大永恒的、普世的、终极的意识形态，从而达到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意识与存在、思想和现实之间关系的颠倒性和虚假性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因此，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社会也有意识形态，任何社会都不可能脱离意识形态而存在，“去意识形态化”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当今世界，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占据话语主导权的情况下，“去意识形态化”的各种主张实质上是赋予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②，通过强调西方价值观的不可超越性及其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淡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瓦解社会主义国家全体人民的认知体系、价值体系和信仰体系，进而推翻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巩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的霸权地位，维护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质言之，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长期存在的历史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0页。

具有现实性、客观性和不可调和性。因此,“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①。所谓“去意识形态化”“去政治化”,在西方资产阶级那里完全是狡诈阴险的欺骗,在不明事理的人那里则是镜花水月的空想。

二、“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对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挑战

进入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更加艰巨繁重,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深度发展使得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碰撞成为常态。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式更为隐蔽、多样和复杂,以“去意识形态化”思潮为幌子的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手段层出不穷,教育“去意识形态化”便是表现之一。教育“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②,任由“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在教育领域泛滥,只会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第一,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教育事业中的指导地位,动摇中国共产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地位。教育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必然会受到一定时期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其维护政治统治、维系社会稳定的基本途径无一不是通过教育”^③。所谓的教育和政治无关不过是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群众的伪善说法,“在各方面的教育工作中,我们都不能抱着教育不问政治的旧观点,不能让教育工作不联系政治”^④,要“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⑤。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教育提高人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才能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真正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经过了更加全面、更加彻底的加工,不仅有着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更久远的渊源,而且有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能相比的传播工具,一旦我们在教育领域放松警惕,任由“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侵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就会利用自己在大众传媒、公共话语、文化传播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大肆影响我国的意识形态教育和塑造,千方百计地用他们的那一套思想观念解构和消解马克思主义。长此以往,有的人就会“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感召力、影响力就会大打折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就

①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10页。

③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43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2页。

⑤ 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85~186页。

⑥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72页。

会遭到质疑,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就无法巩固和发扬,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作用就会被削弱。

第二,消解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和自信,进而动摇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青少年是国家、民族的未来和希望,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和自信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否成功。如果我们放任“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在教育领域泛滥,我们的教材、图书、绘本等就可能出现歪曲历史事实、传播儿童色情、丑化中国、否定和排斥中国历史文化、抹黑民族英雄、简单灌输种族优劣思想、制造民族对立等内容,就可能出现美化侵略、美化西方国家、推崇资本主义制度、歌颂所谓“普世价值”等内容。在高校,“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渗透尤其严重,一些学科的教材体系和话语体系变成西方理论的翻版和再版,一些学者打着“学术交流”“学术争鸣”的幌子,大肆宣扬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倾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否定中国自己的价值观念、学术理论、制度建设等,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认知体系和信仰体系,而“长时期的学术渗透必然使中国青年、中国教育、中国社会认同‘美国标准’,偏离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道路和中国文化”^①。青少年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确立的关键时期,很容易受到形形色色的思想体系的影响,针对各类社会思潮缺少批判和鉴别能力,教育“去意识形态化”会导致青少年追求个人至上的利己主义而忽视团结合作的集体主义,追求骄奢淫逸的享乐主义而放弃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追求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而质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西方蓄意的、体系化的“认知作战”中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俘虏”。

第三,搞乱我国教育事业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方向。教育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和根本方向,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②。每一项科技的发明创新都离不开人才,每一个人才的培养和成长都离不开教育。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想创造新的辉煌伟业,有效应对国内接踵而来的风险挑战和国外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推动我国现代化事业健康平稳向前发展,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就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去意识形态化”思潮所宣扬的西方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观念对于成长期的青少年来说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和吸引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在互联网领域的主导权传播的娱乐文化、消遣文化、快餐文化等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青少年的历史认同和文化自信。如果不能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他们进行

① 刘建华:《当前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渗透的新手段及其应对》,《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3页。

引领和指引,正确的认知体系和价值观念就难以确立,最终会导致我们培养的人才缺乏使命感和责任感,缺少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缺失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服膺和跪拜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离开堪当时代重任的人才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会沦为空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也就无法实现。

三、新时代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教育事业引领作用的实践路径

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是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和发扬的优良传统,也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①,这不仅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而且也是我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方向和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在教育领域立场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而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明确思想引领、汇聚强大力量、凝聚广泛共识。

第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任何意识形态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可是,任何科学的意识形态(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意识形态)都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②马克思主义作为能够指导发展、引领方向的科学理论,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一如既往地不断坚持和强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为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根本保障。一方面,要着力加快推进制度化建设。针对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和理论成果,不仅要建立健全研究、阐释、宣传等方面的制度机制,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发展和创新,还要建立常态化、规范化、长效化的思想理论学习制度和育人制度,针对不同的学习对象建立因人而异的教育体系,让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有充分认识,对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能深入理解,从而自觉地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必须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通过完善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的监督考核机制和追究问责机制守好意识形态安全的“责任田”,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要严格落实《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各级领导要按照“一岗双责”的要求对职责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工作负起责任。各级各类学校要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将意识形态工作与教学工作紧密结合,制定和完善学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相关制度规范,通过明确的责任清单来落实主体责任,每学期要定期开展调研摸排、集中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28~329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6页。

研判、报告考察等,确保学校的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健全、权责清晰、工作细致、考核规范。

第二,必须强化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注重对错误思潮的批判。“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①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思想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就会去占领,因此,守好宣传思想阵地,巩固共同的思想基础,是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教育事业引领作用的必然要求。一方面,要强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引导新闻出版界、文学艺术界、社科理论界、科技教育界等意识形态阵地与党同心同德,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发挥各自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鼓励他们创作出更多生动活泼、鼓舞人心、健康向上的作品。此外,还要充分发挥融媒体“资源通融、内容兼融、宣传互融”的传播优势,将电视、报纸、广播、互联网等媒介进行整合利用、互通有无,实现宣传教育内容和方式的与时俱进,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不再局限于学校和课堂。另一方面,要对各领域出现的否定党的领导、攻击马克思主义、批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错误思想和言论进行严肃处理,坚决封堵西方资本主义思潮的渗透。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and 科学性就是在同各种思想的斗争中不断确立起来的,因此,面对如今的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去意识形态化、网络民粹主义等种种错误、腐朽、落后思潮,要增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批驳和应对的能力,敢于亮剑,敢于斗争,及时有效地表明态度,理直气壮地加以批判,坚决揭露其真实面目,深刻剖析其产生发展的内在机理和思想体系的本质内核,通过不断建构科学的意识形态来挤压错误思潮的生存空间,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廓清思想迷雾、澄清模糊认识提供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学术支撑。

第三,必须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立德树人功能。“学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可不是一个象牙之塔,也不是一个桃花源。”^②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学校教育作为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途径,承担着立德树人的关键使命任务。具体而言,在教育内容上,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基础,以与时俱进的最新理论成果为重点,构建具有原创性和主体性的话语体系和教学体系。教材必须充分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科学合理的教学内容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同时要加强对教材内容的政治把关,对于“政治上把握不对、不到位的教材,要一票否决”^③。在教育对象上,既要注重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又不能忽视对中小学生的教育和引导。青少年是西方敌对势力主要的思想渗透对象,青少年时期又是意识形态塑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0页。

② 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6页。

③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52页。

造和建构的关键时期，因此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思想动态，构建全方位、全过程的教育环境，发挥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协同育人作用，通过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建设来加强协同合作和资源整合，切实增强不同阶段的育人效果，引导青少年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在教师队伍建设上，必须不断提高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加强对教师的培训和管理，提升教师的知识素养和教育能力，为业务水平突出的教师提供更加充分有力的支持，建设一支奋发有为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同时，也要强化师风师德建设，完善考核监督机制，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对于刻意以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诱导学生的教师要严肃处理，真正实现“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①。在教育方式上，要改革和创新意识形态教育的方式和渠道，既要注重教学方法的创新，多采取案例式、启发式、互动式教学，也要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在现实参与中加深理论认识。当然，也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教育”的形式来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用微视频、微阅读、微电影等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不断强化理论认同。在监督管理上，要加强对学校意识形态阵地的治理，教育系统要对相关内容进行全面有效地监督，对师资、教材、教学方法、教学纪律甚至语言体系都要谨慎监管。学校要定期排查整改，严格把关每个环节，构建意识形态工作“一盘棋”的工作格局，建立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预警机制，加强统筹管理和检查问责，确保敌对势力的思想腐蚀远离我们的校园和学生。总而言之，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抓好课堂教书育人主渠道，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使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学生成长成才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

第四，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传承、发展和积淀，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根和魂，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都不可避免地会传承一部分文化基因。因此，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更有利于唤起青少年的文化主体意识，进而提升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解和认同程度。当今世界，美国意识形态霸权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美国文化的输出，利用各种文化产品的“软包装”来掩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硬内核”，例如迪士尼、NBA、麦当劳、漫威宇宙等都是被美国精心打造的文化符号，旨在潜移默化地传播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使其在全球范围内达到认可和共识。为了突破西方的“围追堵截”，我们一方面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30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67页。

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充分挖掘其中具有时代价值的文化元素,如“民惟邦本”“厚德载物”“舍利取义”“天下为公”“天人合一”“革故鼎新”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天然契合的思想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增添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达。还要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强大文化资源支撑,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底气所在,为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的确立奠定最深厚的根基。另一方面也要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育的形式,学校可以结合本地历史和传统设计校本课程,同时利用班会、升旗仪式、活动课等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传统文化活动,让学生在互动、体验和参与中加深对传统文化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知。此外,还可以积极探索多样化的教育载体和手段,充分利用客户端、视频直播和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形式,支持网络上的意见领袖和“大V”传播和弘扬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重大纪念日等庆典上可以设计能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统文化活动,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赋予深厚的文化底蕴。

第五,必须加强对教育意识形态安全的法治保障。法律是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保障,可以起到硬性约束和规范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政治领域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①为了有效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和挑战,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数十部关于意识形态安全的法律法规,涉及国家安全、网络等领域,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等,起到了一定的规制作用。但是,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越来越深刻复杂,有必要填补意识形态安全法治体系中的立法空白,加快法治化进程,以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一方面,要根据现实需要制定并完善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等为主要内容的全国性法律,通过法律来确定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底线和边界,明确学校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基本任务、组织保障、责任机制、处罚措施等,从而有效遏制危害意识形态安全的言论和行为,保护爱国主义的价值观,倡导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要坚决维护现行意识形态安全法治体系,严格依照相关法律处罚各种损害意识形态安全的行为,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学校要加强对青少年的意识形态法制教育,通过相关的法律课程,切实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对在教育领域内出现的各种思想渗透、政治攻击、煽动颠覆活动保持高度警惕,给予快速有效的处置和应对,充分发挥法律的警醒和震慑作用。在互联网时代,尤其要严厉打击各种利用网络煽动舆论、散播谣言、诱导舆情走向、破坏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等行为,打好网络意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8页。

意识形态安全攻坚战，让互联网不再成为法外之地。

总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需要加快推动教育现代化，培育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业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科技领军人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强大的人力资源支撑，因此教育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必须坚持并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教育的引领作用，坚决抵制“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牢牢筑起抵御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的坚强堡垒，确保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不变色、不变质，使青年一代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理想信念坚定的时代新人，“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①。

The Challenge and Countermeasures on “De-ideologization” to Socialist Educational Cause

Qin Fen

Abstract: Advocating “de-ideologiz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for Western capitalist countries to infiltrate and corrupt the ideological field of our country, and its essence is to replace socialist ideology with capitalist ideology under the guise of “de-ideologiz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influence of the “de-ideologization” trend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pparent, bringing severe tests to the cause of socialist education.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learly put forward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education for the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emphasizing that educ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way to cultivate new talents in the era who will take on the task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hould be consciously integrate into ideological educ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legal guarantee be strengthened for the ideological security of education.

Keywords: De-ideologization; Challenge; Practical Path; Socialist; Educational Cause

[责任编辑：鲁法芹]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71页。

数字资本主义视域下电子游戏问题研究^{*}

刘皓琰^{**}

【摘要】在西方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电子游戏不能仅仅被视为纯粹的娱乐产品，其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实现了产业化，并被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塑造为在经济、文化、政治上施加影响的新工具。在经济领域，电子游戏特有的生产模式与所带来的娱乐消费市场的扩大推动了资本积累的进程；在文化领域，电子游戏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文化霸权的重要媒介；在政治领域，电子游戏则充当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阶级统治的隐蔽武器。为此，必须高度重视西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电子游戏带来的新挑战，为中国的国产游戏市场高质量发展和本土优秀游戏文化的生产传播提供应对方案。

【关键词】电子游戏；数字资本主义；文化霸权；文化强国

马克思曾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①因此，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花样繁多的资本增殖手段是一种必然。在进入资本逻辑与数字技术结合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各种金融工具、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等均被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部分异化为盘剥大众的工具，学界的反思与考察也在近年来逐渐涌现，出现了一批富有价值的成果。与此同时，同样作为数字时代特有的技术产品，电子游戏却似乎逃过法眼，很少被马克思主义理论界谈及。事实上，尽管电子游戏往往以娱乐产品或虚拟空间的形式出现，但其对现实社会强大的映射与反馈功能，使我们不能再仅以纯粹娱乐消费品的角度对其进行认识。当前，作为文化产业中日渐重要的力量，电子游戏产业已经成为西方数字资本主义体系不可缺失的一部分，正在帮助数字资本主义开辟广阔的积累领域，并作为新的介质传播资本意志。为此，我们应当重新认识电子游戏在数字资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大国数字化竞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项目编号：22CKS015）阶段性成果。

^{**} 刘皓琰，经济学博士，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资本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9页。

本主义条件下推行经济和文化霸权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从而能够捍卫中国意识形态安全，进一步发展和提升本土游戏产业和游戏文化国际竞争力，助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一、西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电子游戏产业化

认识电子游戏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首先应当考察电子游戏的发展历史。与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其他游戏形式一样，电子游戏最初也是作为纯粹的娱乐休闲产品而出现的。二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开始进入数字资本主义发展阶段。^① 数字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同时催动了电子游戏的出现，彼时美苏冷战的两极格局逐渐形成，为了取得军备竞赛的胜利，美国加大了对现代化通信和信息技术的研发投入力度。^② 电子游戏成了这一研发过程中的副产品，技术开发人员进行研发的过程中，也在计算机上制造出了用于自娱自乐的电子对抗游戏。1958年，美国物理学家威廉·希金博坦制造了《双人网球》，使玩家可以在示波器上进行具有互动性的网球游戏，被认为是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电子游戏。^③ 初期的电子游戏仅仅是处于实验室之中，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信息行业自由化浪潮的兴起，雅达利等专门的游戏公司成立，开发出了家庭游戏机、街机等游戏载体，才为电子游戏走出实验室提供了必要的技术要素。而在克林顿政府之后，“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提出促进了大量公共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软硬件的开发，为电子游戏大众化和市场化进一步提供了条件，电子游戏才真正走进万千家庭，成为公众进行娱乐休闲活动所选择的主流游戏形式。

数字信息技术的加持是西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诸多新业态的典型特征，但在电子游戏从休闲产品走向产业化的过程中，数字信息技术的跃进只是一个必备的要素。从根本上来看，资本逻辑对资本积累的不懈追求才是其最重要的驱动力。马克思曾鲜明地指出资本逐利性的本质，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也会令“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④，使资本主义社会陷入周期性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在电子游戏快速产业化的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战后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扩张推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滞胀”现象的形成和蔓延，导致了生产停滞和社会投资积极性的被抑制。然而，资本“渴望利用这种作为潜在货币资本贮藏起来的剩余价值来取得利润和收入的企

① 参见刘皓琰：《数字帝国主义》，中国青年出版社2023年版，第14～24页。

② 参见〔苏〕R. A. 法拉马江：《美国军国主义与经济》，北京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26页。

③ 参见北京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游戏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8页。

图”^①并不会停止。因此，当电子游戏作为新的市场机会发生之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对新型生活资料的巨大需求，被贮藏的过剩货币资本迅速投入到了生产这些生活资料的第Ⅱ部类生产部门，转化为生产资本进行扩大再生产。在此期间，雅达利、动视公司、艺电公司等一系列游戏厂商迅速成长，任天堂、索尼、世嘉、微软等电子公司也纷纷进驻游戏行业，负责提供游戏硬件或作为第三方游戏软件厂商，电子游戏的产业化之路便由此开启。

与此同时，在很多初创游戏公司的成长过程中，庞大的金融资本也在背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资本市场上，这些早期的电子游戏公司往往会获得较高的估值，因为它们代表了新技术与未来的消费方向，金融资本基于这种获得高额利润的期望进行投资活动，助推初创企业股价上涨，使这些电子游戏公司可以通过风险投资、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硅谷银行等获得便利的融资渠道。譬如，雅达利的初期运营就得到了来自红杉资本、梅菲尔尔德公司、时代公司、富达投资公司等的风投资本的支持，为初代街机的供应提供了必要的启动基金。^②金融资本为电子游戏行业的扩大再生产源源不断地注入动能，帮助其更新技术工艺、塑造标准化制造环节、汇集创意工人，并衍生出一系列周边产品与商业模式。电子游戏产业便在这一过程中快速构建起日趋成熟并不断延伸的供应链、价值链，逐渐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二、电子游戏与西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积累

在电子游戏产业化的过程中，其在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的多重开发价值逐渐显现出来，并迅速被资本家所捕获，令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和文化控制展现出了新的特点。首先，电子游戏在经济领域的作用是最为突出的。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从生产端来看，电子游戏等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使资本对劳动者的盘剥从生产时间拓展到休闲时间，帮助资本实现了对用户的全生命周期剥削。其次，从消费端来看，电子游戏产业则为资本主义开辟了新的文化消费市场，在扩大逐利空间的同时也为资本主义找到了缓和生产与消费矛盾的重要场所。

（一）电子游戏实现了对“玩工”的全生命周期剥削

在马克思所处的机器大工业时代，生产时间与休闲时间之间有着清晰的界限。资本“唯一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③，为了追求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1页。

② 参见[美]阿伦·拉奥、[美]皮埃罗·斯加鲁菲：《硅谷百年史：伟大的科技创新与创业历程（1900—2013）》，闫景立、侯爱华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年版，第9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7页。

绝对剩余价值，资本家极其重视时间范畴，总是致力于压缩休闲时间，令劳动者越来越多的生产时间进入剥削体系。而在西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随着电子游戏产业的形成，其独特的生产模式令生产时间与休闲时间的界限出现弥合。因为电子游戏行业所依赖的并不只是传统的雇佣工人，还包括大量的“玩工”^①，这使得资本可以通过对工人全生命周期的榨取强化自身构建的资本积累体系。

“玩工”的出现有赖于电子游戏从单机类走向多人联动的竞技类和网络类的过程。单机类的电子游戏更多地依靠游戏产品和游戏设备盈利，但竞技类和网络类游戏的普及却催生了游戏行业独特的生产体系和运营模式并产生了“玩工”这一群体。总体来看，有三种不同类型的“玩工”，他们的活劳动构成游戏产业的财富密码。第一种“玩工”是从事游戏工作的职业玩家。在电子游戏产业的运行过程中，不仅是作为雇佣工人劳动产品的游戏被商品化了，“玩游戏”这一过程同样被商品化了。随着游戏的表演、竞技性质被开发，很多具备高超游戏技能的玩家开始成为职业选手。对于职业“玩工”而言，娱乐时间即工作时间，其劳动过程被影音记录并制作为商品出售，为游戏公司带来大量的赞助费、版权费、转播费等，这构成了游戏公司的重要利润来源。因此可以看到，随着电子游戏产业化发展，越来越多的电子竞技赛事愈发具有影响力。2022年，全球电竞收入已增至13.8亿美元，其中赞助收入、版权收入、商品和门票收入、流媒体收入等均出现了大幅度的提升。^②第二种“玩工”是依附于游戏产业的零工工人。电子游戏的产业化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围绕游戏发展的职业门类，其中典型的代表有游戏主播、视频博主以及游戏陪玩等。这些行业中除少部分从业者成为公司签约的职业员工外，大部分是作为零工工人参与生产活动。零工工人为其所依附的平台带来了庞大的利润，因为这一行业的准入门槛较低，可替代性较强，而平台又掌握着“玩工”通向市场的入口，故而在进行利润分割时拥有着充分的话语权。第三种“玩工”是作为无酬工人的海量普通玩家。电子游戏的架构往往是基于一个开放式的价值创造体系，游戏厂商会为玩家提供“游戏模组”（即玩家自定义修改游戏内容的机制），使玩家也拥有添加游戏内容的能力。而这种自定义机制的开放本质上是一种集体创新的过程，游戏厂商可以免费获得玩工们的脑力劳动成果，以此拓宽游戏边界，不断更新游戏内容，从而使游戏更具可塑性和耐玩性。与此同时，玩家在娱乐过程中还会在不经意间生产大量具有商业价值的数据。游戏厂商便可以通过对玩家的痕迹管理掌握玩家的喜好、位置、活跃时间等个人资料或隐私，从而形成判断市场的大数据，生成更加符合用户偏好的游戏设定。

^① Julian Kücklich, “Precarious Playbour: Modders and the Digital Games Industry”, *Fibreculture Journal*, Vol. 5, No. 1, 2005, pp. 434-453.

^② 参见 Newzoo:《2022年全球电竞及游戏直播市场报告》，2022年4月19日，<https://www.sgpjbg.com/info/33812.html>。

可以看到,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玩工”的出现,区分工人的界限不再以是否被正式雇佣为标尺,玩家不再单纯是消费者而是“产消合一者”^①,部分电子游戏也不再单纯是娱乐产品,而成了一种特殊的生产工具。“玩工”没有工作时长和固定工作场所的限制,可以不分昼夜、不分地区国界地为游戏贡献内容。这种休闲劳动化趋势的形成,意味着资本终于可以侵入劳动者仅有的可自行支配的时间,将休闲时间也变为价值积累的重要源泉。因此,一些电子游戏产业事实上造就了一个不受时空限制、随时随地可以进行价值创造的“社会工厂”,正在不断吸纳更多的玩工为自身的游戏创造内容,将工人的全生命周期都纳入资本积累体系。

(二) 电子游戏推动了娱乐消费市场的扩大

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电子游戏不仅延长了资本剥削的时间维度,同样也拓展了资本逻辑发挥作用的空间维度。从电子游戏产业化的初期进程中可以鲜明地看出,电子游戏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作为一种消化剩余、缓解危机和保持资本增殖的全新空间开发出来的。因为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剩余价值的实现同生产一样,均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大卫·哈维曾指出,每当既有空间中市场的消费能力难以满足当时过剩资本的要求时,一个重要的方式便是“通过在别处开发新的市场,以新的生产能力和新的资源、社会 and 劳动可能性来进行空间转移”^②。随着资本流入游戏行业,娱乐市场迅速兴起,电子游戏产业便成了当时承接过剩资本与开辟新消费的场所,再次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找到了一个重要的利润空间。

事实上,从电子游戏的商品特性和行业特征来看,其本身是非常符合资本主义扩大消费的需要的,这也是资本青睐游戏行业的重要原因。首先,电子游戏不仅相较于传统游戏在娱乐性和可玩性方面有进一步升级,且种类非常多样,可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最重要的是对身体素质与场地等要求不高,允许各种玩家直接参与,这令其天然拥有巨大的潜在市场。其次,电子游戏在本质上属于数字信息商品,不必像传统物质产品那样,在扩大产能时通过线上支付与传输就可以完成商品的结算与交换。最后,除了游戏本身外,电子游戏还能带动游戏设备以及一系列虚拟游戏产品和文化产品的消费。很多游戏有着专门的设备,如游戏主机及其配套的游戏鼠标、手柄、耳机、散热器、VR眼镜等,为了配合与提升游戏体感,这些设备还会定期进行升级和优化。而在网络游戏之中,各种虚拟消费道具也是五花八门,英雄、皮肤、经验卡、装备等都可以被当作虚拟商品售卖。当然,随着产业的发展与融合,电子游戏对很多周边行业的消费也体现出了显著的带动作用。以暴雪公司所开发的《魔兽世界》游戏为例,随着该游戏的

① [美] 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黄明坚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274页。

② [英] 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

成功,以该游戏为主题的电影、角色扮演、手办玩偶、主题酒店、主题公园等都被不断开发出来。而当举办线上或线下的竞技类比赛时,电子游戏还会为网络平台或主办城市带来一系列的商业机会。

也就是说,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资本逻辑与游戏行业的结合,资本不但实现了对世界市场和消费者剩余的进一步开发,而且找到了一种可以部分修复自身生产相对过剩矛盾的重要工具。从数据上来看,游戏公司在过去几十年中的确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2022 年北美游戏市场的收入已经高达 484 亿美元,欧洲地区也达到 329 亿美元。^① 而每当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陷入低潮时,电子游戏产业更会显现出明显的“逆势而上”的态势。譬如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经济的萧条期,索尼公司的 PlayStation 游戏机依然取得了售出 6000 万套的优异成绩。^② 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和英国的游戏软件销售量也分别上涨了 15% 和 26%。^③ 电子游戏的居家消费特点使其不易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公众工作真空期的延长也容易引发游戏消费的增加,故而为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矛盾的爆发提供了新的缓冲区,也为其自我修复提供了重要的渠道。

三、电子游戏与西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霸权

电子游戏与资本间的联系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因为电子游戏除了是虚拟商品外,还是一种文化产品与思想传播工具。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统治阶级为了自身利益会“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化霸权”的概念,认为资产阶级不仅依靠暴力、压迫和军队进行阶级统治,还会利用传播意识形态、思维模式、法律准则的方式来影响和管理人民群众,以获得大众在主观意识上对统治阶级的认可和同意。^⑤ 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电子游戏的文化功能也受制于资本逻辑,其开始在无形间承载西方文化与资产阶级价值观,根据自身需要对东西方文明进行差别渲染,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文化霸权的新工具。

(一) 电子游戏中的西方中心论

西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电子游戏中的文化霸权,首先体现在对西方中心论的

① 参见 Newzoo:《2022 年全球游戏市场报告》,2022 年 7 月 26 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017140779_6546338_0_wfr=spider&for=pc。

② 参见[法]雅克·埃诺:《电子游戏》,马彦华译,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0 页。

③ 参见关萍萍:《互动媒介论:电子游戏多重互动与叙事模式》,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70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52 页。

⑤ 参见[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河南大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19 ~ 222 页。

渲染上。西方中心论试图彰显西方文明的优越和模范地位,论证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统治的合理性和永恒性,把西方的特有观念泛化为衡量人类进步的普遍尺度。^①直接性的意识形态输入极易引起警惕与反感,媒体报刊、文学创作、影视作品等一般性的大众传媒都曾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路径。而电子游戏出现后,也因其强大的叙事功能、娱乐产品的外在包装与受众规模成为宣扬西方中心论的重要载体。

电子游戏中的西方中心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很多欧美游戏中,存在强烈的自我身份认同与文化优越。譬如,在瑞典公司出品的游戏《欧陆风云4》中,东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原始设定,西欧国家有着较快的研发速度,可以满速爬升科技,且容易出现一些先进科技成果,而东方、非洲和美洲国家的科技却自带减益效果,使其在后期几乎很难对抗西方文明。此外,在对外贸易活动中,所有贸易终点都位于欧洲,玩家们拼命向威尼斯或英吉利海峡靠拢,给人以人人都向往欧洲的印象。第二,很多电子游戏中还显现出对西方侵略与殖民史的肯定。西方近代文明伴随着列强的野蛮侵略强势进入,马克思曾指出,其“使荒年更加频繁,饥谨更加严重”^②,为诸多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和民族危机。但一些游戏作品却着力淡化西方国家给其他国家带来的消极后果,强调这一历史的积极效应,认为正是西方的入侵才将世界拉入了人类文明的正轨,这一点在《文明》系列和《帝国时代》系列等游戏中均有所体现。第三,游戏厂商还会借助电子游戏输出带有鲜明西方色彩的价值观念。在游戏所构建的庞大架空世界观与模拟现实的剧情设计背后,设计者常常会携带自己对经济形态、政治制度、社会伦理的价值判断。譬如在动视公司出品的《使命召唤》系列中,美国被塑造为极度重视人权的国家,遵守战争的基本准则,但游戏中的“敌人”往往欺压人民、不择手段。为了维护人权,美国会作为“正义化身”发动战争救人于水火,为落后国家带来所谓的“民主和自由”。战争、强权被认为是保障人权的合理手段,代理人的牺牲、对他国内政的干预也被看作“获得正义”所必要的代价。在游戏施加的各种隐喻和影射中,西方的“普世价值”便透过主角的行为和抉择具有张力地显现出来。

总之,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一些电子游戏被基于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加以塑造,裹挟着西方中心论在全球进行商品流通,顺应了资本主义推行后殖民主义的策略。欧美游戏有着大量的受众群体,玩家在不断地练习和通关的过程中被游戏规则与激励机制反复驯化,在不知不觉间向西方资产阶级所设定的历史与所倡导的价值观念靠拢。由于缺乏进行参照和判定的经历和知识,玩家很容易自然地认为应当完全像西方人那样思考、行事和生活,特别是一些价值观尚未成熟

① 参见李建国:《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西方中心论”》,《思想教育研究》2017年第4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7页。

的青少年，在思想甚至行动中体现对西方的盲目崇尚与渴望。这种输出文化霸权的行径企图以一种隐蔽的方式来消解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实践和本国国情的特殊性，数字资本主义便可以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干预和影响他国意识形态，以实现自身的支配目的。

（二）电子游戏中的东方主义

与西方中心论相对应的，便是部分电子游戏中鲜明的东方主义现象。“东方主义”的概念最初由后殖民理论的代表人物萨义德提出，他在《东方学》开篇就引用了马克思的观点，“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①，意指文化知识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由于缺少话语权力，只能由西方国家根据自己的意志来描述他们。西方国家通过“帮助”东方国家塑造认知方式构建自身作为优越文明的形象，并将东方叙述为落后或妖魔化的对象，以确立东方对西方文化上的从属关系。在部分电子游戏的叙事中便可以看到这种浓厚的东方主义色彩。

电子游戏中的东方主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游戏厂商会根据主观意志对东方国家和人物进行形象塑造。萨义德曾指出，在西方人的东方主义视角里，“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②，电子游戏中的很多角色形象也体现了这种刻板印象。譬如在卡普空公司出品的《街头霸王》系列游戏中，游戏厂商设计了一个印度僧侣角色达尔西姆，他戴着一条骷髅项链，可以喷火、悬浮、伸缩四肢，可能会给人以怪诞和诡异的暗示。第二，很多游戏设计中还传递着鲜明的等级观念。许多欧美游戏的叙事以西方国家或西方白人为主视角，东方人、有色人种等则常常扮演不重要的“工具人”，例如白人主角的仆从，无所事事的流氓、混混，对立阵营或由于落后而需要被拯救的群体等。这些西方国家的游戏主角普遍被设定为身材强壮、技艺高超、有正义感的人物，且往往拥有俊朗的外表。而东方人、有色人种等的背景故事中却往往存在种种不良的嗜好或者可怜的身世，可以在游戏中随意欺辱、处置和杀戮，这种等级观念在《底特律：化身为人类》《侠盗猎车手：圣安地列斯》等游戏中均有体现。第三，很多游戏情节中还会出现对现实和历史的篡改或错误暗示。基于历史元素进行改编设计的游戏并不鲜见，但一些欧美游戏厂商常常在一些焦点历史事件和涉及他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做出有悖事实的蓄意引导。在以二战为题材的游戏中，玩家通常会以欧美国家为主视角，而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的苏联和中国的作用却往往难以得到突出体现，仿佛欧美国家才是决定二战走向的主力军。此外，领土归属的敏感问题也常常在游戏中出现设计谬误，例如在《刺客信条3：兄弟会》中，莫斯科被安置在波兰的板块上。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7页。

②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51页。

总之，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电子游戏开始成为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重要媒介，其承载意识形态的功能也在不断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利用和开发。大多数玩家不会特意去了解东方国家的博大文化与漫长历史，电子游戏所建构的虚拟世界和透露的价值倾向便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玩家的初始认识和判断。部分电子游戏不仅会丑化或妖魔化东方国家的形象，而且传递出东方永远落后于西方的信号，造成他国游戏受众的错误认知，滋生对东方国家的歧视或敌对情绪，而且还会窄化东方国家玩家的身份认同，瓦解其民族共识，消解其对本国发展道路和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促使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在资本意志的支配下，部分电子游戏已经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西方资产阶级继续推行文化殖民的重要载体。

四、电子游戏与西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阶级统治

除了经济与文化层面外，电子游戏在西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功能也不应当被忽视。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就有学者意识到电子游戏已经成为再现和影响政治议题的重要载体。^① 近年来，不断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人物将电子游戏视为传播政治理念的新战场，譬如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龙等均曾在大选期间将触手伸向电子游戏世界。然而，当电子游戏开始夹带越来越多的政治内容时，涉及国家根本属性、最应当被政治生活所谈及的“阶级”问题却丝毫不见。政治生活归根结底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电子游戏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最大的影响也正体现于阶级关系上。数字资本主义下的资产阶级正在通过一些电子游戏淡化阶级观念，消解阶级力量，将这些电子游戏作为强化阶级统治的隐蔽武器。

（一）电子游戏中被淡化的阶级与被污名化的社会主义

在某些电子游戏中，对政治话题的涉及和暗示并不鲜见。譬如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军事冲突期间，艺电公司在《FIFA22》《FIFA Online》等一系列足球游戏中将俄罗斯国家足球队与俄罗斯国内的俱乐部删除。但在西方部分电子游戏厂商不断表达政治倾向与“政治正确”时，有关“阶级”的内容却似乎已经在电子游戏中退场。很少有电子游戏去挖掘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即便出现了模拟经营或模拟执政的主题玩法，涉及工人的情节也常常被简单表达为工资和罢工。生产资料所有制、阶级立场、政党与革命等核心议题几近消失，即使是《全境封锁 2》这样充满政治讽刺意味的作品，也仅仅将政治腐败的根源与政策和人事安排挂钩。可以说，电子游戏中的“阶级”已经成为

^① 参见丁笑飞：《国外学者关于电子游戏的研究——资本主义批判的新视域》，《国外理论动态》2023 年第 2 期。

一个不断被淡化甚至逐渐被遗忘的政治概念。

除了“阶级”这一概念以外，作为无产阶级政治目标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在诸多欧美电子游戏中遭受到了污名化的待遇。社会主义发展史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一些欧美电子游戏中，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政治理想不仅不能被如实描述，还往往会被歪曲和抹黑。譬如在艺电公司发行的《红色警戒》系列游戏中，苏联的形象便被进行了一系列篡改。在二战后一段时期内，苏联的科技和军事装备水平与美国相近，但在游戏中却以科技低下的面貌出现。同时，苏联阵营可能还被贴上了残暴好战的标签，例如苏联阵营拥有一大批高污染且违反国际公约的兵种如辐射工兵、自爆卡车、疯狂伊文等。此外，游戏中的苏联阵营还拥有特殊建筑“复制中心”、特殊兵种尤里的“心灵控制”。“复制中心”可能是在妖魔化社会主义强大的动员能力，“心灵控制”则有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群众的感召污名化为精神控制的嫌疑。除了苏联之外，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成就也很少在欧美电子游戏中得到体现。在设计中国剧情或者加入中国元素时，很多欧美电子游戏厂商所挑选的对象往往会是中国文化或自然物，通常不会对中国的现代文明进行客观描述。因此我们常常会在一些游戏中看到功夫、长城、美食或者大熊猫，但鲜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面貌。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已经显著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可以给予广大人民群众以强烈的振奋和鼓舞，而这些一旦被电子游戏厂商有意回避，就会使很多并不了解中国的玩家仍然保持着中国依然停留在古代文明的刻板印象。

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某些电子游戏俨然成为一种消解阶级意识的政治媒介。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政治对抗中，“阶级斗争”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而形成有组织的阶级斗争力量的前提便在于形成阶级意识。因此，在西方资产阶级的长期统治中，执政者总是不遗余力地在话语中消解阶级概念，以达到瓦解阶级认同、阻止群众形成阶级意识的目的。显然，电子游戏同样成了被选中的规训工具。通过电子游戏对现实世界的映射功能，西方资产阶级不断推销着自己的政治理念，无产阶级所依赖的理论武器却像从未存在过，完全在虚拟世界中消失，或是完全成为愚昧和落后的象征。这样，西方资产阶级就可以潜移默化地达到瓦解阶级认同、阻止群众形成阶级意识的目的，在根本上抑制底层人民的反抗意识和斗争的有组织性，从而固化由少数精英统治的阶级秩序。

（二）电子游戏背后的“奶头乐”战略

电子游戏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只体现在游戏中内容的设置上，电子游戏自身事实上也被西方资本主义当作一种消解阶级力量、推行“奶头乐”战略的重要手段。所谓“奶头乐”战略，是由美国政府智囊布热津斯基在20世纪末的

一次内部会议中提出。^①其意指面对全球化时代日趋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为了消除贫困人口对富人的不满情绪,可以像安抚婴儿一般,给这些被边缘化的人嘴里塞一个“奶头”,即采取低成本、带有麻醉性质的办法,创造大量充满感官刺激的娱乐休闲产品,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和不满情绪,使其沉浸其中,逐渐失去对现实问题的热情与独立思考的能力。电子游戏产业基于其丰富的娱乐性,也成为其中重要的一环。

在欧美公司出品的很多电子游戏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些特定的设置或元素,这些设置或元素非常契合“奶头乐”战略的需要,对于玩家的思考能力与政治行动能力有着重要的影响。第一,很多电子游戏都非常注重“时间”的概念,将游戏中的等级、强弱与玩家所付出的时间挂钩。在这种机制的激励下,很多玩家都会付出大量时间获得更多的游戏经验以令游戏角色成长。然而,当玩家被长期固定在游戏世界中时,对现实世界的感知与思考能力必然下降,用来提升自身生存与发展技能的时间也在不断缩减,又何来动力与能力进行阶级对抗呢?第二,一些电子游戏容易被添加大量的暴力或软色情元素,成为玩家过度宣泄情绪的载体。由于电子游戏天然的竞技性质,部分游戏厂商总会或多或少地在其中添加超出现实的暴力情节,这便为玩家发泄情绪找到了新的入口。一旦玩家在现实世界中遭遇不如意的境况,便开始习惯于在虚拟世界中宣泄不满,而不是在现实世界中寻找解决方案。此外,很多游戏在人物设计时还会突显性别特征,以给予玩家感官刺激。这些低廉的产品会不断麻痹玩家,使其沉沦于短暂的虚拟满足感,失去改变现实世界的热情与行动力。第三,一些网络电子游戏中有着与现实极为不同的集体观念,集体往往以“家族”或“工会”的形式出现,他们接受游戏规则规训,以获得游戏胜利为集体共识。玩家在电子游戏所塑造的集体中获得了归属感,在团队责任的激励下滞留于虚拟的社会关系。当他们被这种虚拟化的集体所拉拢,无疑便同现实世界中真正代表革命力量的先进组织渐行渐远。

在这种“奶头乐”攻势下,底层人民在历史上曾拥有过的斗争至死的革命精神开始被“娱乐至死”所替代。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相对于在现实社会的关怀与对执政者的监督,玩家们更热衷于讨论游戏装备、剧情与技巧,为自己喜欢的电子竞技比赛与游戏战队而狂热。即便出现了一些重大的经济政治事件或是与自身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也容易被宣传误导,或醉心于“玩梗”文化,追求新闻事件的喜剧效果而非其背后的实际意义。有些玩家甚至会为摆脱了现实世界的世俗牵绊而沾沾自喜,却未想到他们已经身处西方资产阶级设置的政治陷阱之中。西方资产阶级逐渐达到了削弱无产阶级力量的目的,通过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电子游戏将很多玩家与现实世界隔绝。即使在西方社会中出现了一些进

^① 参见[德]汉斯-彼得·马丁、[德]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张世鹏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步的政党力量，也很难跨过电子游戏这一天堑对玩家们灌输先进的科学理论与意识，很多玩家只能在长期的麻醉中成为被游戏和媒介操纵意识的“牵线木偶”。

五、妥善应对基于电子游戏的新挑战

对西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运行逻辑的探索不能再仅仅限于现实世界，我们必须拥有虚实结合的新视域。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电子游戏与资本逻辑的结合不但令西方资产阶级拥有了可以拓展自身意志的更加广阔的空间，而且可以以更加便利和隐蔽的方式延伸自己的触角。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电子游戏与其他数字技术、文化媒介一样原本中性，只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所倡导的资本逻辑与资本意志下被赋予了特定的功能与属性。电子游戏作为“第九艺术”，具有促进基础技术研发、传播普及民族优秀文化、凝聚社会价值观念、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作用，对青少年群体也具有知识眼界拓展、手脑协同能力培育、团队意识训练等重要功能。因此，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来说，一方面，要对电子游戏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这种联系保持重视，警惕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电子游戏侵占本国文化产业市场、干扰意识形态领域的行为；另一方面，也要吸取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训，摒弃电子游戏产业发展中的资本逻辑，通过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与价值观念对其进行规制、引导，充分发挥电子游戏的积极作用，不断强化本土相关游戏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通过电子游戏相关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文化强国。基于目前中国电子游戏产业的发展情况，有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提升电子游戏市场的综合治理能力，不断规范和完善外来进口电子游戏的引入运营制度与机制。在全球化的大势下，一刀切式地强化监管禁令并不可取，要以营造寓活力于秩序的游戏市场环境为目标，而这便要以游戏市场综合治理能力的提升为保障。因此，要着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媒体引导、网民监督等多主体参与的社会协同治理格局，不断完善技术、经济、法律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综合治网。针对外来进口游戏特别是来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游戏，要落实好负面清单制度和分级管理机制，规定好哪些领域不可触碰、不能引，坚决杜绝不健康内容和不良文化入侵行为，让能够体现人类社会发展优秀文明成果的真正优质的游戏产品进入国内市场。同时，还要做好电子游戏行业的价值引领工作，以“人民逻辑”替代“资本逻辑”，引导游戏开发商和运营商将企业运营目标放在繁荣文化市场、道德行为养成、综合素养提升、凝聚核心价值观念等内容上，对过分只重视商业利益、违背社会利益的游戏内容进行规范，为电子游戏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第二，做好技术研发与文化融合，不断提升本土游戏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我们需要不断提升本土游戏质量、逐步实现对欧美游戏的主要市场替代，这是捍卫

本土游戏市场、保障本国文化与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之举。而做好本土游戏质量的提升,有两点最为关键:一是积极攻关基础性数字技术。电子游戏产业是一个与计算机、芯片、虚拟现实、移动通信等新兴数字技术紧密联系的产业,要不断促进产业链间的融合发展,同时加强游戏科技的基础理论、基础学科建设,培养更加专业化的技术人才,用更高质量的画质、沉浸感和可操作性留住玩家。二是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优秀游戏传递的精神内核。电子游戏的内容与形式同样重要,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是国产游戏的天然优势。例如近年来的《原神》《王者荣耀》等国产网络游戏作品,以及还未上市就引起国内外玩家广泛关注和讨论的《黑神话:悟空》等国产单机游戏作品,均因其中的中国文化典故、中国大美风景、中式风格建筑、中式服装吸引而备受好评。国产游戏要善于将中国本土的文化优势转变为自身的竞争力,用中国元素、中国文化、中国故事来吸引世界目光。

第三,积极利用各类国际性平台,创新助力国产游戏和优秀文化的海外传播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①在电子游戏领域,从欧美国家占领国际游戏市场的经验来看,除了游戏本身的质量以外,其拥有的新兴媒介霸权也是一个重要的助力因素。因此,国产游戏也应积极利用国际各类跨境平台,推动国产游戏产品及其承载的优秀文化“走出去”。要利用好数字丝绸之路、金砖国家等合作平台,来促进本土游戏产品的推广。同时支持优秀本土游戏企业申报国家出口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积极参加电子游戏国际博览会、交易会,鼓励有条件的城市承办国际性电子竞技比赛,扩大与各国优秀游戏企业间的交流。此外,还要支持更多高质量的国产游戏加入奥运会、亚运会等国际赛事的电竞项目,利用国际舞台提高本土游戏的认可度。越来越多优秀国产游戏的“出海”必将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和文化强国建设产生积极的正向作用,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有效应对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贡献力量。

^①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页。

Research on Video Gam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Capitalism

Liu Haoyan

Abstract: In the era of western digital capitalism, video game cannot be seen as pure entertainment product. Driven by the logic of capital, they have been industrialized and shaped by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country as a new tool for exerting influence on the econo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economic field, the unique production mode of video games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entertainment consumption market have driven the proces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the cultural field, video game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western capitalism to promote cultural hegemony. In the political field, electronic games serve as hidden weapons for western capitalist class rule. Therefore, we must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new challenge by video games under digital capitalism, and provide relevant solution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domestic game market and the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game culture.

Keywords: Video Games; Digital Capitalism; Cultural Hegemony; Cultural Power

[责任编辑: 于少青]

历史虚无主义如何“优雅地” 掩盖资本扩张的罪行

——基于“冲绳审判”的分析

何万成 谢年华*

【摘要】《冲绳札记》作为大江健三郎的现代文学代表作，包含着对历史的思考和对和平的向往。但近年来，日本右翼知识分子不断为资本扩张的罪行开脱，以《冲绳札记》为引，以保卫人权、尊敬死亡和史料无罪作为重点武器向反战人士宣战，究其本质是人性与资本之间的较量。冲绳审判的目的是为了改变民众对待历史的态度，以此来为资本的发展保驾护航。对此，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分析化解。首先，在社会层面上，混淆人民权益和资本权益的实现方式，将人权的保障寄希望于资本的保障之上；其次，在发展层面上，以绝对静止的眼光看待事物，实际上才是真正的亵渎死亡；最后，在历史层面上，颠倒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是主观教条的历史诡辩论。虽然冲绳审判胜诉，但资本在现实中依旧具备强大的权力去肆意修改历史。因此，从胜诉到认识论层面的根本变革，反战人士还有相当漫长的道路要走。

【关键词】《冲绳札记》；人民与资本；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

日本社会舆论对侵略战争的态度，从 1945 年至今发生了很多变化。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后，日本社论中关于历史修正主义思想和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论越来越多。然而，在这样的氛围下，虽然日本国内的反战人士仍然是庞大的群体，并在代表民众发声方面上做了很多努力，但历史修正主义者却有很多方法将这些“声音”压下去，其手段多以“文明”著称。在反战人士与非反战人士的历史较量过程中，较为著名的案例是“冲绳审判”，起因是日本作家并且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大江健三郎，其著作《冲绳札记》对当时日本军国政府的批判。大江

* 何万成，桂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1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谢年华，桂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健三郎是一位坚定的唯物主义反战人士，他在 2005 年被二战时期冲绳战役的相关人士以“损害故人名誉”和“侵害对故人的追慕之情”为罪名起诉。而种种迹象表明，原告方也只是傀儡，其背后有着精密且专业的团队进行支持与操作，这不仅是为了胜诉扭转市民对法西斯战争的态度，促使资本扩张的战争历史在法律层面上得到保护，而且也是为了修改教科书文案，在社会舆论上造势，使得在义务教育层面上修改并掩盖真正的历史。若原告方胜诉，就等于说明以大江健三郎为代表的反战人士的确侵害了所谓的“故人名誉”，那么就变相证明了当时军国主义政府下达的冲绳民众集体自杀的命令无罪，这也同时否定了侵略战争所带来的残酷，故以资本殖民扩张为目的的战争也不再是完全非正义的行为。因此，非反战人士策划这场闹剧般的诉讼，实际上是否认历史的客观性，企图将历史按照资本的逻辑重新书写，究其本质是为资本扩张的罪行进行“洗白”，以便为资本主义的长期稳定统治保驾护航。

一、“不可思议”的开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日本与美国在琉球群岛中的冲绳岛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役，这场战役被称为太平洋战役中规模最大、最血腥、最残酷的战役。历经了 82 天的博弈奋战，日军留下了 10 万多具尸体；美军战死 2.3 万人，7 万人受伤，战后有 7000 多人自杀，2 万多人精神失常。而岛上的民众总共不到 50 万人，但死亡人数却达到了不可思议的 14 万人，成为战争中最大的牺牲群体。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日本军国主义，37.8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无法填满日本军国主义自私的欲望，因此他们选择侵略扩张，企图用这种方法私吞侵占世界的资源。

（一）冲绳战役的内容

在战争年代，美国在印象里一直是作为中立国存在，无论是一战还是二战都是隔岸观火，最后再以正义之名进行利益收割。二战时期日本的野心昭然若揭，并企图用侵略扩张的残忍手段掌控整个东南亚的资源。而远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虽然表现得与世无争，但正如当时美国总统对议员的分析，如果中国战败投降，那么日本必然会将中国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等据为己有，日本的国力必然会上升一个高度并称霸东南亚，不敢想象有了资源与武器的日本会做出什么更疯狂的事情。因此，美国时刻紧盯国际局势，为防患于未然，美国也暗中对日本进行制裁，两国的矛盾也在不断加大加深。直至 1941 年，自大的日军偷袭珍珠港，这无疑是一种公开宣战，也印证了美国政府的猜想，日本独大必然对美国造成威胁，日本与美国的矛盾升级，冲绳岛战役算是美国对珍珠港事件的一次反击。由于冲绳岛独特的地理位置，美军只能先登陆岛屿再逐渐接近日本本土，将占领冲

绳岛作为打开日本南大门的战略措施。而冲绳居民在得知战争即将发生的时候，将日本政府看作唯一的救命稻草，他们认为日本政府一定会拼尽全力保护民众安全，但事实并非如此。日本政府决定放弃冲绳民众，使其充当移动的人形盾牌，并不断灌输一种思想，即美军是禽兽不如、奸淫掳掠的凶残侵略者，被俘虏的日本军民，无论男女老少都会被以极度残忍的手段杀害。一时间，与其被杀害不如选择自杀而玉碎的思想弥漫冲绳岛。日军为了百姓能更迅速地解决自己，甚至将短缺的手榴弹分发给当地居民。虽然自杀行为在二战时期的日本较为普遍，但是此前还未发生过教唆平民自杀的事情。日本之所以如此残忍，是因为冲绳原名是琉球，本就是日本侵占得来的土地。日本统治冲绳半个多世纪，并灌输“皇民化教育”，冲绳居民难免也开始认同这些思想，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美军来袭，日军竟将居民视为可以随意丢掉的棋子。随着美军的逼近，临近败北边缘的日军更加疯狂，不仅抢夺居民的粮食，还怀疑间谍藏于其中，于是便将会说英文的和只说方言的人全部处刑，原因仅是日本军方的文化差异。显而易见，日本从始至终都未曾想过拯救冲绳人民于水火之中，首先利用民众的信任教唆居民自杀，避免被俘虏；其次，在节节败退时，拿起屠刀以“间谍”的名义砍向不肯就死的民众，其本质之恶劣至今仍然是冲绳居民无法散去的阴霾。

（二）《冲绳札记》为引

大江健三郎在 20 世纪 70 年代写了《冲绳札记》一书，里面提到二战末期的冲绳“集体自杀”事件。当时的政府宣称，冲绳民众与日军共同抗击美军，因担心成为累赘而自行选择结束生命。但事实并非如此，集体自杀实际上是人为的、有目的性的活动。整本书是借用冲绳战役的历史来表达战争的无情并不是枪炮的无情，更多是人性的无情。只占日本领土面积 0.6% 的冲绳，却拥有 75% 的驻日美军基地。^① 大江健三郎表示，虽然 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本土在美日同盟的管理下，社会生活各方面蒸蒸日上，但这种和平与发展是建立在将冲绳献祭给美军，牺牲冲绳人民的生活权益与发展上得到的。他希望日本人民反思并铭记，日本的繁荣是建立在历史上对若干周边弱小国家与民族的侵略基础上的。他担心如果日本民众不懂得反思历史，只考虑当下的利益，就会变得越来越自私，表现在整个国家上就是越来越脱离世界。那么，日本在未来仍然是“战争之国”。然而，如此引人深思的文学作品在 2005 年却被冠以“损害名誉”的罪名状告于法庭，两位原告来自冲绳战役士兵的相关人员，他们声称反战人士给他们造成了情感伤害。言外之意，即并没有正面否定反战的意义，但却混淆了反思战争与缅怀个人之间的关系，用对部分个人的缅怀来代替整个战争的意义，从个人心理层面上间接推翻反战的价值。大江健三郎在书中指出，导演这场冲绳惨案的军人，他

^① 参见 [日] 新崎盛晖：《冲绳现代史》，东京岩波书店 2005 年版，第 39 页。

们是悲剧的责任者，这些战争责任者把“集体自杀”描述成一种为国捐躯的美谈，试图欺骗自己，欺骗他人，甚至欺骗历史，但作为人却必须要面对这“庞大的罪恶巨块”。而右翼知识分子正是抓住这种文学性的表达批判大江健三郎，如曾野绫子声称“对于这种历史判断是无法勉力为之的。第一，作为民，无法认定集体自杀是事实，因为我不在现场；第二，作为人，无法以那种确凿的程度来证明他人的心理，因为我不是神”^①。换言之，即抛开战争罪行的事实不谈，以个人主观思想进行诡辩。而这种典型主观唯心的言论却成为原告上庭的陈述书表达，完全曲解了作家呼吁民众面对历史、正视现实的意义，这种反对“黯淡的内省”却被日本政治右翼批判为“自虐的史观”。

（三）冲绳审判的本质

《冲绳札记》作为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作品，在2005年被告发绝不是两名原告刚刚开始对此书进行思考的结果，而是右翼知识分子在背后做了很多安排。原告的律师在后续中也表明，原告最开始对“审判”并不感兴趣，而是其背后“华丽的”律师团即“靖国支援团”积极推动提告，包括许多具有专业素养和社会声望的人员也参与其中。因此，冲绳审判的重点并不在于原告所谓的“名誉”，而是知识分子之间于日本社会、经济发展和哲学思想上的矛盾斗争。首先，审判是主战人士对反战人士发动的一场战争。主战分子从老兵出发，试图利用当代日本人民对历史的模糊和同理心来混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将“毫无人性”的罪名转变为“舍生取义”的名誉，用老兵作为挡箭牌，将历史上的过错偷换概念并改变形式转嫁给反战人士，是不敢承担责任的表现。但这也侧面证明了大江健三郎对日本人民对待历史勿视、勿听、勿言和勿动态度的担忧，即不正视历史、不倾听历史、不传播历史和不反思历史，继续戴着面具，说着谎话活在虚伪与欺骗之下。其次，审判代表着人性与资本之间的一场战争。资本的发展是否要以人民的牺牲为代价？左翼和右翼知识分子的回答都是“不”，但二战之后的日本却是言行不一的。丹治三梦（Miyume Tanji）在《冲绳的神话、抗议与斗争》中写道：“自十九世纪以来，这个群岛上的居民曾以小独立王国琉球的一部分为世人所知，不断成为镇压、支配、剥夺、歧视以及骇人听闻暴行的受害者。他们失去了独立，变得穷困潦倒，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先后被日本和美国殖民。”^②这无疑证明了历史上冲绳人民所经受的战争苦难。大江健三郎指出：“日本无疑属于冲绳，而不是相反的情形。日本只有在冲绳的庇护下才能够展示自身这种虚假的独立性。”^③日本的和平现状是以牺牲冲绳民众为代价的，将冲绳人民的权

① 岩波书店编：《记录·冲绳“集体自杀”审判》，陈言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② Miyume Tanji, *Myth, Protest and Struggle in Okinawa*, London: Routledge, 2006, p. 1.

③ [日]大江健三郎：《冲绳札记》，东京岩波书店1979年版，第33页。

益交予美国以确保日本的资本发展，它在资本与人性中最终选择了前者。审判是为了给这种选择进行开脱，是不敢面对人民的表现。最后，在哲学思辨上，审判是一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战争。即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还是由理念决定的精神，意识与物质何者为第一性的矛盾。

在唯物主义看来，历史的发展是遵循一定的规律，法西斯战争是历史的必然，同样地，反法西斯战争也是必然。资本主义完成推翻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后，享受到了资本所带来的解放与发展，必然会沉迷于资本的“魔力”，因而去压榨、剥削、掠夺资源来保证自身的价值，也必然会给人民带来战争与痛苦。世人对和平与发展的期望达到一定程度引发质变，从而开始在局部范围内对资本进行反抗，以点带线再以线带面，最终实现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并走向共和，这是不容改变的规律，也是不可忽略的事实。而审判的出现是为了修改历史，从而改变人们的三观。反战人士败诉就等同于证明历史可被修改，那么历史发展便不是客观现实的。即可以不尊重客观事实，从而动摇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性，那么则无法明确证明由工人主导的社会优于资本家领导的社会，资本的发展所带给人民对战争的反思便毫无意义，历史给人们带来的各种民族精神和文化底蕴变得虚无。此刻，在人们“空虚”的思想中，资本站稳了脚跟。它使人们相信资本发展才是世界的最优解。故冲绳审判成功的一小步，却代表着哲学思辨转向的一大步。因此大江健三郎等众多唯物主义知识分子坚信，这是一场绝不能输掉的战争。

二、“文明优雅”的手段

右翼知识分子以曾野绫子书中对大江健三郎的批判为论点，即“不可思议的是，以如此美好之心为国捐躯，为什么到了战后被说成是命令之下的强制行为呢？这不是在藐视死亡的纯洁吗？对此不能理解”^①。关于审判的陈述书则称：“大江健三郎如此明确的责难人的罪过，就像具有信念的神给人定罪那样进行裁断的口吻，让人觉得恐怖。”^②以如此“文明”的言语和“优雅”的手段对反战人士出手温柔刀，颠倒历史与现实的维度、混淆自杀与牺牲的定义、打破明理和无理的关系，这不仅是“不单纯”地利用人心，还是“不友善”地利用死亡，更是“不正义”地利用历史。

（一）以大欺“小”：败犬效应占优势

战争带来的残酷仿佛来自侵略国而不是战败国，而日本既是侵略国也是战败

^① 岩波书店编：《记录·冲绳“集体自杀”审判》，陈言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② 岩波书店编：《记录·冲绳“集体自杀”审判》，陈言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

国，但它却一直藏在战败国的庇荫里不敢直视侵略国的身份。因此，右翼知识分子在上诉陈述书中就将老兵塑造成手无缚鸡之力的弱者，将反战人士形容为滥用道德私刑审判的“神”，这是典型的是非颠倒。首先，要明确老兵军人的“弱小”来源于现实，老兵军人的“强大”来源于历史（即老兵背后所代表的军国主义的力量大小）；冲绳人民的“弱小”来源于历史，冲绳人民的“强大”来源于现实（即代表着人民对于反抗战争的意识力量大小）；反战人士的“弱小”来源于现实，反战人士的“强大”来源于历史（即所代表争取人民利益的正义性大小，受困于现实，得益于历史。当代反战人士力量的弱小是由于统治者与右翼分子的阻挠，而反战人士真正强大的力量来源是历史，只有正视历史才能保障人民的权益）；主战人士的“弱小”来源于历史，主战人士的“强大”来源于现实（即强大的主观现实手段和弱小的客观历史背景。历史上所行之事的理亏对比现实中资本强大的权力，法西斯战争中为实现资本扩张而屠杀人民的行为本身就是不正义的。而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治理下，主战人士有强大的资本力量去掩盖扭曲历史的力量）。此时便出现两对矛盾，即军人与民众、主战人士与反战人士。显而易见，前者是战争历史上的矛盾，后者是当代思想上的矛盾。但右翼知识分子巧妙地将两对矛盾的维度互换，将帝国军人和冲绳民众以现实的角度进行对比，认为是人民日益觉醒的强大力量去欺压已故的老兵和其年迈的后人；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曲解反战人士对战败国和侵略国为一体的反思，割裂了主战人士与反战人士的联系，使战败与侵略分离。战败与侵略的刻板印象是“弱小的正义”和“强大的邪恶”，给反战人士对历史反思的正义行为带上“侵略国的自信”这顶高帽，而主战人士不愿提及与承认的历史罪行则藏匿于“战败国的自卑”阴影之下，以一种极其“文明”的方式迷惑历史背景不清晰的民众，进而占领审判的社会优势高地。但对待历史要用历史的维度，对待现实则要用现实的维度，不能被现象所迷惑。显而易见，右翼知识分子以大欺小的优雅手段，究其本质不过是“披着羊皮的狼”。

（二）以死明“志”：敬畏死亡赢人心

二战时日本军国主义对冲绳人民的奴役与高压、二战后美军在冲绳的军事驻扎、冲绳人民民族独立思潮的崛起与被镇压、冷战时期的区域冲突，冲绳一次又一次作为前沿阵地，“冲绳人成了人类历史上遭受虐待最久、且最为深重的民族之一”^①。当代，和平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的主旋律，似乎战争的悲痛已经不复存在，但战争带来的教训却不应该就此消失。为国捐躯的美谈是建立在国家与人民双方有着共同的目标而心照不宣的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做出的最大牺牲，而冲绳人民的“牺牲”不过是别无选择的“自杀”。二战期间，冲绳民众的目标是维持生

^① Miyume Tanji, *Myth, Protest and Struggle in Okinawa*, London: Routledge, 2006, p. 3.

存与和平，而日本政府的目标却是防止民众被俘虏，以此来保护实现资本扩张的法西斯军队力量。冲绳人民的生存空间“被自杀”。冷战时期，冲绳民众的目标是实现发展与进步，而日本政府的目标是同意美军在冲绳岛建立军事基地，以此来换取资本虚假的独立性与先进性。冲绳人民的发展条件“被自杀”。当代社会，冲绳民众的目标是恢复自由与独立，摆脱日本和美国的压迫，而日本政府的目标是掩盖、扭曲和修改历史，将冲绳人民对日本“屈服”的希望建立在下一代。生存空间与发展条件已经实现“被自杀”，而冲绳审判正在试图实现思想前提的“被自杀”。冲绳人民的目标从始至终都是为了实现人的生存、发展和自由，而日本政府却从头到尾没有站在人民的角度思考问题，资本的利益最大化才是其考虑的关键。因此，真正想要将冲绳人民推向深渊的从不是铭记战争悲痛的反战人士，而是选择无视和欺骗历史的资本力量。日本右翼知识分子以“死亡”为切入口，混淆被动自杀与自主牺牲的含义，统称为“死亡的纯洁”。仿佛反战人士一遍遍诉说战争所带来的反思，是妨碍活着的人追思他们的亲人，但反战人士从不回避个别亲人对逝者的怀念，而是要让其死亡变得有价值，反思战争带来的意义才是真正的尊敬。故反战人士并不是在揭露个人的伤痛，而是旨在促使整个日本民族牢记政府不愿公开面对的伤疤。

（三）以史为“证”：史料无罪为重点

以色列原纳粹亲卫队中校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法庭被正式审判并处以绞刑，为历史上所犯下的错误进行忏悔赎罪。但日本那些导致冲绳集体自杀的相关人士，并没有接受审判。因此，日本一些历史修正主义的知识分子就抓住了这个盲点，声称既然这些人没有被正式的法律审判，在历史上并没有书面形式的记录，所以在当代就不能把他们的事迹拉出来进行批判与反思，因为这样就等同于私刑审判，是损害了“平民”的人权，以此来指责大江健三郎书中“强制自杀”的话术是乱说、是不学术、是不严谨、是没有人性的。虽然这些人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不可能出现在法庭上，但这并不代表其留下的历史痕迹也会随之消失。即便没有官方正式的判决书，但仍有许多证据在提醒人民记住历史的经验教训，冲绳民众便是活的证据。修正主义对于历史的争辩，主要强调在主观形式上，将具体文件视为唯一的评判标准证明，以此为出发点向日本民众灌输历史上为实现资本扩张的不正义行为是“无罪的”片面性思想。随着历史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资本扩张的矛盾。因此，虽然在资本的历史诱导下会发生侵略战争，但为了保护“资本”而屠杀民众的行为却是非正义的。战争是国家之间的较量，生在战争年代的人民本就是苦难的，所以绝不能以任何借口将人民作为“泄愤”的工具，无论在何种条件下，保护人民权益都是至关重要的。例如中国反侵略战争时期，中国从不伤害人民并最大限度地安抚民众，对待俘虏也是执行最大程度上的人道主义。对比中日两国对待民权的态度可以推断出，冲绳审判不过是打着

资本发展的逻辑掩盖屠杀人民的罪行，聚焦并限制在某个历史文件形式上，完全忽视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以个人主观思想掩盖历史客观现实。右翼知识分子在审判中虽然拿起“人权”作为武器，但究其本质所强调的历史“人权”并非“人民的权力”，而仅仅代表“资本的权力”。

三、“从容不迫”的回击

马克思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①“从头到脚”不仅指资本的各个方面，也代表着资本从出现到壮大的过程。而每个毛孔的血和肮脏更是源于私有制，由于资本的私有化放大了人贪婪的本性，在欲望的驱动下，冲绳岛战役便是资本为了壮大发展的产物，而冲绳审判则是资本为了稳步前进的结果。资本无论是在各个领域还是发展阶段，都在私有制的蛊惑下不断异化社会、人性和历史。对于非反战人士在冲绳审判中关于社会、人性和历史的出击，以大江健三郎为首的唯物主义反战人士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仍局限在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唯物主义，没有跳出私有制的怪圈，故也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内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斗争。因此，为了真正实现人民的权益，就要真正站在人民的角度，以公有制的格局来规避私有制的弊端，并通过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武装头脑来解决思想问题与现实问题。

（一）突破民族主义的局限性来保障人权

《冲绳札记》揭露了日本战时体制和近代以来皇国化教育的恶果。数年后的本土日本人却以自欺欺人的方式生活着，不断淡化、歪曲历史的记忆，以此忘记对冲绳人犯下的罪行。^②同时，大江健三郎还指出：“事件责任人保住了性命，回到本土，隐藏在我们中间，他们至今尚未对冲绳做出任何补偿。”^③但他们却在当代以“侵害人权”的名义挑起冲绳审判的开端。资本力量则躲在“人权”的背后操纵并安排着一切，但个别的人权并不能代表民众的权益，资本是在保障人权的表象下实现自身的真正价值。综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选举制度，无非是以政党为背景的竞争和选举，每到国内大选时，各种形式的竞选活动陆续上演：电视演讲、广告分发、街头拉票等，他们大肆宣扬自己会为人民作什么贡献，给人民带来怎样的优势。深挖其根本，不过是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为了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以便日后执行为资本利益所做出的任何决定加上人民的保证这层滤镜，这俨然是一场资本与人权斗争的盛宴。冲绳审判中的人权保障，同样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1页。

② 参见吉莉：《从广岛到冲绳——大江健三郎对民族主义的超越》，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③ [日]大江健三郎：《广岛·冲绳札记》，王新新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页。

也是资本为实现改变历史进而实现自身价值而选择的托词。而资本为何总是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换言之,为何冲绳审判中会想到博取人心来打压反战人士?一方面是资本的力量过于强大,客观上使民众无从选择;而另一方面则是人民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观上不自知地进行选择。以资本权力为囚,以狭隘的民族主义为牢,将人民的思想圈禁,隔绝了世界人民与本国人民关于人权的联系,使部分与整体相分离,并在本国范围内不断灌输只有保证资本才能保证人权,才能带来和平,将人们对和平与民主的希望寄托在资本身上,顺理成章地去改写历史,使其成为保护资本扩张罪行和剥削人权的另一道保障。因此,必须突破狭隘的民族主义视野,以不带民族情绪的决心鉴别资本的目的,从世界历史的角度,以广阔的、多元化的视野反思战争的意义,才能最终走向和平,真正实现世界人民权益的保障。

(二) 运用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问题

当一艘名为“忒修斯”的船在航行过程中不断更新旧的零件部分,直至全部的零件都被更新,那这艘船是否还叫作“忒修斯”呢?“忒修斯之船”是一种关于身份更替的悖论,假定某物体的构成要素被置换后,那么它还依旧是原来的物体吗?同样,这种悖论也可应用在社会学领域内。如果将“忒修斯”比作日本对冲绳所犯下的历史罪过,而将“换零件”比作铭记历史的冲绳人民的死亡,那等到所有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都被“更新”,历史罪行是否就被更换掩盖了呢?冲绳审判便是在“更换零件”过程中产生的。由于日本政府忽略客观历史的教育,以至于很多民众对世界历史、日本历史、冲绳历史并没有清晰的脉络认知。大江健三郎将本土日本人对冲绳及冲绳人的态度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最本质的问题就是本土日本人对冲绳问题的漠视及对冲绳人的歧视,有意识地将冲绳印象单纯化。^①日本政府一边对民众进行历史模糊教育,一边等待着异己的知识分子更替,最终打着维护人民利益的旗号对历史进行修改。冲绳审判也只是历史修正主义者为了扫清资本发展轨道上的障碍所作的的第一步,若成功胜诉,便会有更多的“审判”出现,直至将历史私有化,并将其雕刻成为为资本牟利和发展的模样。对此,应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进行思考。首先明确历史具有客观存在的物质性,而物质是运动的,运动变化的基本趋势是发展,发展是在长期动态过程中实现的,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对待事物必须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忒修斯之船”的身份更替悖论就是割裂了运动与静止的对立统一关系,夸大静止否认运动,不承认静止只是运动在一定条件下的稳定状态。冲绳历史问题的形成是长期的,因此对问题的解决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绝不能以静止的态度看待冲绳问题,片面地认为一代人的“历史死亡”便是资本的“当代新生”。冲绳审

^① 参见吉莉:《从广岛到冲绳——大江健三郎对民族主义的超越》,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判正是这种形而上学的当代日本社会价值观的直观形式。

（三）杜绝教条世界观是正视罪行的基础

日本冲绳审判中极端强调把历史书面形式作为证据，这实际上是局限在主观教条的历史诡辩思想，不分析事物的变化发展、不考虑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将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用生搬硬套现成的概念原则来处理历史问题。实践决定认识，再由认识指导实践，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认识运动是不断反复和无限发展的，这是人类认识运动的辩证发展过程，也是人类认识运动的基本规律。但在冲绳审判中，可以看到历史修正主义者的逻辑，即以主观实物凭证作为理论出发点来反向证明与决定客观历史事实，认识成为实践的目的，也成为检验实践的标准，这对于唯物主义而言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唯心主义思想观。审判书只是认识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并不能代表“认识”本身。因为无论历史审判书存在与否，由战争引起的人民向往和平的“认识”都是客观存在的，并不需要主观上的形式证明。因此，对于历史修正主义这场“史料无罪”的争辩是毫无意义的。与其绞尽脑汁地修改历史，不如大大方方地承认罪行。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并突然跪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这一举动不仅惊呆了现场所有人，更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勃兰特曾在回忆录中说：“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语言已失去了表现力。”向死难者下跪，诚恳反省战争罪责，勃兰特的举动充分体现了德国对战争的反省态度。所以，德国与欧洲各国之间的关系很快就得到了缓和，德国因此放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但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策源地的日本，多年来，猖獗的日本右翼分子一直在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比如，他们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在慰安妇等问题上百般狡辩、颠倒黑白，还将侵华战争表述为“目的不明的泥沼战争”。时至今日，闹剧般的冲绳审判意味着日本政府从未真正向冲绳人民的历史迫害进行反思，而日本政府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也代表着其未曾真正对世界上受迫害的民族进行忏悔。以这种实践影响着民众的认识，潜移默化地改变历史态度，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说，是否有书面凭证来说明这些日本侵略军是“英雄”？如若没有，那对反战人士是否属于逻辑不自洽的双标？如若有，是否敢于向民众公开，以此来保障所谓的“人民权益”？

四、“意想不到”的结局

冲绳审判最终以大江健三郎和岩波书店胜诉告终。在2008年至2010年，大阪地方法院、大阪高等法院和日本最高法院都裁定说，《冲绳札记》的记述被认为属于表达自由，不构成对名誉和人权的侵害，胜诉的结局同反战人士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虽然冲绳审判取得胜利，但在场外反战人士却输了一局。日本文部省审定的教科书上对这段历史进行了修改，冲绳审判的现实目的是制造舆论为修

改教科书造势。虽说大江案的胜诉有助于粉碎日本推卸战争责任、走向战争的企图，但可以预见的是，从胜诉到思想层面的质变，反战人士、唯物主义者、人民群众的道路依旧是漫长且艰难的过程。

（一）赢了官司，输在现实

马克思指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① 因此，虽然在思想理论的斗争中，右翼知识分子占据了下风，但在现实社会中依旧可以凭借资本的强大权力去修改教育文案。一直以来，教科书上对此段历史的记载都是：冲绳的“集体自杀”是因为日本军方的命令与强制。而日本的右翼势力是想推翻这种论述的，并且右翼修改教科书团体当时还去旁听了冲绳审判。在2007年的审判过程中，日本文部省宣布了新认定的教科书，在有关冲绳“集体自杀”的章节里，删掉了“命令”“诱导”等措辞，将“强制”这种明确的表达方式改为“参与”这种暧昧的阐述。这种暧昧的说明不仅用于蒙昧日本国人，在面对侵华战争时也同样用于蒙昧华人。即使在中日两国建交之际，谈及侵华战争时日本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日本在战争中给中国添了麻烦。”用极简的“麻烦”二字，大范围地概括侵略、残酷、迫害等含义。若没有清晰的历史背景，这样的说辞丝毫没有表明日本侵略者的身份，也丝毫没有展现出日本作为侵略者的歉意。这立即引发中国的强烈反感与愤慨，在中方强烈要求下，最终改成“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尽管日本人迫于压力修改了说辞，却没有从根本上抛弃既有的立场和观点，即未真正对战争进行反思，未真正对人民表达歉意，只是一味地掩盖真相，一味地为资本扩张的罪行开脱。

（二）胜在当下，败于民心

日本护卫队每次想在冲绳岛升起国旗时，都会遭到冲绳岛居民的激烈反对。昭和天皇遍访全国，唯一没有去的就是冲绳岛。后来的明仁天皇访问冲绳岛，并未受到岛上居民的热情接待，而且在访问进行过半时，一男子携带炸弹欲刺杀他，炸弹在人群中爆炸，炸伤了当时的太子妃。皇室成员险遭暗杀，举国哗然，然而日本政府却不敢轻易处死这名男子。近年来，日本不断执行亲民政策欲修复同冲绳人民的关系，但亲民政策不能抵消民众的仇怨，日本政府只能寄希望于下一代。于是日本政府开始在教科书上动手脚，教科书上的态度含糊不清，教育部门把真实的历史进行删减，留下一段无法看清真相的文字。日本政府修改教科书的决定引起了冲绳民众的极大抗议，冲绳县内所有地方议会都要求撤销认定，同时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市民抗议运动。然而文部省最终仍然修改了教科书，这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

疑是公开选择忽略人民的声音，依旧选择修改历史，以这种掩耳盗铃的方式去蒙昧人民和掩盖罪行，日本政府此举更是将冲绳民众推向自己的对立面。中国拥有独立的主权和雄厚的文化背景，因此有强大的底气对虚无主义者说不。但冲绳人民的独立与发展还掌控在美日两国手里，故大江健三郎指出：“冲绳人必须认识到自身尚未脱离由他人意志决定自身命运的状态。冲绳人只有等到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宣告终结，才能获得解放。”^① 因此，解放冲绳人民的首要前提便是铭记历史，以历史经验教训坚定理想信念，将冲绳的历史遭遇一代代传承下去，此举并非为了散播仇恨而是为了揭露真相、以史为鉴，明确人的主体地位，重新衡量人性与资本的关系。

五、结语

《冲绳札记》中写道：“只要冲绳的现状不变，本土的日本人就无法赎到冲绳和冲绳人的赦免状，也无法进行真正的忏悔。冲绳拒绝的声音，就是对这种假赦免状、对紧缠死绕的忏悔意向做出的清高严正的拒绝。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也不能不意识到自己在写冲绳及冲绳人时屡犯的错误。冲绳琉球处分以后的近、现代史上，本土日本人对冲绳和冲绳人的观察和评论中，确实有大量的、有意无意的、不知羞的歪曲和错误。这是对冲绳的歧视，更是日本人对自己最令人生厌的属性所做的自我宣传。”^② 随着时代变化，自私的日本政府、冷漠的日本本土民众、强大的右翼势力等都在不断对历史真相进行扭曲、掩盖和修改，对历史罪行进行辩解、开脱和洗白。但以大江健三郎为代表的众多反战人士不断告诫日本人民、政府应勇敢地承认历史，反思日本发动战争的罪责，摒弃暧昧、模糊的表达方式，避免战争的再次发生。这无疑给充满不幸的冲绳人民带来了一线曙光。铭记历史、珍惜和平，不要让类似冲绳的悲剧在现代世界发生，也不要让类似冲绳的审判在当代社会出现，将思想从资本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让历史不再虚无。这不仅需要反战人士的努力，更需要全世界人民的集体奋斗。

① [日] 大江健三郎：《冲绳札记》，东京岩波书店 1979 年版，第 123 页。

② [日] 大江健三郎：《广岛·冲绳札记》，王新新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47 页。

How Historical Nihilism “Elegantly” Conceals the Crimes of Capital Expans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Okinawa Trial

He Wancheng Xie Nianhua

Abstract: As a masterpiece of modern literature by Kenzaburo Oe, *Okinawa Notes* contains reflections on history and aspirations for peace.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right-wing intellectuals in Japan have continued to justify the crimes of capital expansion, using “Okinawa Notes” as a guide to take up the defence of human rights, respect for death and historical innocence as key weapons to declare war on anti-war activists. The essence is the battle between humanity and capital. The purpose of the trial is to change the people’s attitude towards history as a way to protect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 This should be analysed and resolved by applying Marxist theory. Firstly, at the social level, it confuses the ways of realising people’s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capital’s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puts the guarantee of human rights on top of the guarantee of capital; secondly, at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it is actually the real blasphemy of death to look at things in absolute stasis; and lastly, at the level of history, it is a subjective and dogmatic history by rever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and practice. Although the Okinawa trial was won, capital still has great power in reality to revise history recklessly. Therefore, the anti-war activists still have quite a long way to go from winning the case to a fundamental change at the epistemological level.

Keywords: *Okinawa Notes*; People and Capital; Historical Development; Marxism

[责任编辑: 闫惠惠]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西方司法伦理的融贯*

——以中西方传统司法伦理的形成为视角

黄千琢**

【摘要】西方传统司法伦理形成于中世纪，经由神意裁判的兴起与终结，客观的神意内化为法官内心之确信。受基督教“末日审判”观念的影响，法官取得了在审判活动中的神圣性地位，最终形成了以法官内心确信之正义为核心的西方传统司法伦理。中国传统司法伦理肇始于上古时期。由于古代中国政教的分离，统治者垄断了神意的解释权，因而司法判官只能作为君主的化身行使司法权，司法程序的功能也仅限于维护既有的作为外化之天理的人伦秩序，最终形成了以维护秩序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司法伦理。当代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司法工作目标。这一论述在法治信仰与道德教化，政治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以及正义价值与秩序价值三个维度上实现了中西方传统司法伦理的融贯，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直观表达。

【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司法伦理；正义；秩序；融贯

司法伦理是指法官以完成公正司法责任为天职，在行使司法审判权力时，将司法行为与后果相连，从而实现裁判过程和裁判结果与社会公平正义价值观契合所必须遵循的价值准则或者职业规范。^①在中西方传统司法伦理的区分问题上，有的学者认为中西方传统司法伦理存在本质的不同^②；也有学者认为中西方传统司法伦理形式上存在区别，但是理念上也存在相通性。^③那么，中西方传统司法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研究”（项目编号：22AZD058）阶段性成果。

** 黄千琢，武汉大学法学院2021级法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学方法论、法制变革与法治改革。

① 参见骆锦勇：《个案裁判与司法伦理》，《人民法院报》2014年6月6日。

② 参见王晓岭：《中西方传统法律文化观念的比较》，《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③ 例如，廖奕教授认为，西方近代“法治国”理想的建构背后存在中国因素——“孔教乌托邦”与“天下乌托邦”观念的影响。参见廖奕：《重建“天下”：法治理念的西方危机与中国未来》，《宁夏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伦理究竟有什么区别？它们的形成过程与形成原因为何？在当代，中西方传统司法伦理是否存在融贯的可能？对此，本文以中西方传统司法伦理的形成过程为视角，分析中西方传统司法伦理各自特点，并结合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阐明习近平法治思想何以融贯、如何融贯中西方司法伦理；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的继承，对西方中心主义范式法学理论的超越，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创新发展。

一、“神意的内化”：西方传统司法伦理的形成

西方传统司法伦理指的是西方各国家在成为现代法治国家前，其司法官吏在司法裁判过程中所遵循的价值准则与职业规范。在这里，“西方”既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西方作为一个在历史文化上具有同质性的社会共同体，可以被界定或理解为受到基督教文化影响的诸国家。^① 法国比较法学者罗伯特·雅各布通过对史料的考证后认为，借助自然现象与某种超自然力量进行司法裁决之原始形态的神意裁判，曾经广泛存在于上古人类社会。伴随着基督教的发展，原始神意裁判逐渐转化为基督教式的神意裁判，后又终结于12、13世纪的“教皇革命”。但是神意裁判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审判神圣性的丧失，神意“内化”于法官的内心确信，实现了与司法裁判的并存。正是这种神意的内化，使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司法裁判蒙上了一层神圣又神秘的色彩，西方传统意义上强调法官独立与自由心证的司法伦理在这一过程中也得以形成。

（一）从加洛林王朝到“教皇革命”：基督教式神意裁判的兴起及其转化

基督教式的神意裁判兴起于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时期。为了谋求统治合法性，国王丕平选择与基督教会合作。世俗权力由此与宗教权力高度绑定，世俗国家的统治者只有在教会认可的情况下才能加冕为王并取得统治合法性。^②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原始形态的神意裁判逐渐转化为基督教式的神意裁判，其表现在审判说理中经常引用《圣经》中的内容，以上帝的名义进行裁判，请求上帝参与到诉讼程序中。因此，这种审判模式也被称为“上帝的审判”^③。基督教式的神意裁判具有以下两方面特征。第一，基督教式的神意裁判并非以某种证据形式而存在于审判过程中，毋宁说裁判本身就是对事实真相的证明。^④ 因为“证据”

① 参见[美]哈罗德·J.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第1卷，贺卫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② 参见李隆国：《加洛林早期史书中的丕平称王》，《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

③ [法]罗伯特·雅各布：《上天·审判——中国与欧洲司法观念历史的初步比较》，李滨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1～32页。

④ 参见[法]罗伯特·雅各布：《上天·审判——中国与欧洲司法观念历史的初步比较》，李滨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5～36页。

本身证明力的有无,还需要法官予以确证。但是在基督教式的神意裁判中,法官无权审查裁判的证明力。因为该种确证是由上帝作出的,上帝才是裁判的主体,法官只不过是维护裁判的秩序而非主持这一过程。^① 第二,国王和王室虽然具有世俗上的最高权力,但是在某些案件中仍然也需要接受基督教式神意裁判。王权本身最终也必须屈从于更高层面的审判,而这个更高层面的审判正是王权正当性的源泉。^② 在这种情形下,宗教权力需要借助世俗权力扩大其影响,世俗权力需要宗教权力为其合法性背书。例如,加洛林王朝第二代国王查理曼在敕令中要求“所有人都毫无例外地相信上帝的审判”,以世俗权力宣告了神意裁判的合法性。总之,基督教式的神意审判过程中,一方面宗教教义相较于世俗权力在证明力上具有更高度度的效力,另一方面法官在裁判过程中的作用有限,神意主要通过自然力量表现。

在基督教式神意裁判的运行过程中,裁判中所使用的各种检验方法时常被人操纵。这些行为在事实上构成对神意的消解,所谓的“神意”是可以被操纵的,如不对传统的神示证据制度与证明方式加以限制与改正,将会导致人们对所谓“神意”的怀疑,甚至可能引发信仰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在1070年前后启动了教会改革,史称“教皇革命”。在格里高利七世及其继任者的推动下,教会通过制定相应的规则重新划定了世俗和精神两个领域的界限。对神意裁判的禁止成为重新界定世俗和神圣之间界限的一个核心内容。一方面,事实真相的证明不再依靠客观外显的自然现象。^③ 另一方面,神意裁判的消退意味着司法制度与法官权力的强化。法官可以凭借其自由心证取舍证据、证明真相。为维持司法审判的神圣性,后神意裁判时代的裁判官需要通过发誓作为神圣性的替代。12世纪及以后,早期依靠神明裁判、共誓涤罪裁判和决斗裁判的证明方式被取代,以法官为中心的程序法准则和实体法准则随之出现。^④ 在这种情形下,法官与神的互动关系逐步划分为两种模式。第一种发源于不列颠岛,由12名左右的陪审团成员进行司法裁判。这些成员通过发誓促使他们的裁判活动具有神圣性。第二种模式发源于欧洲大陆,在这种模式下,职业法官如同神职人员一样,以其全部信仰与理性作为诉讼的主宰力量。^⑤

① 参见[法]罗伯特·雅各布:《上天·审判——中国与欧洲司法观念历史的初步比较》,李滨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1页。

② 参见[法]罗伯特·雅各布:《上天·审判——中国与欧洲司法观念历史的初步比较》,李滨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页。

③ 参见[法]罗伯特·雅各布:《上天·审判——中国与欧洲司法观念历史的初步比较》,李滨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2页。

④ 参见[美]哈罗德·J.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第1卷,贺卫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73页。

⑤ 参见[法]罗伯特·雅各布:《上天·审判——中国与欧洲司法观念历史的初步比较》,李滨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5页。

（二）神圣裁判：作为上帝化身的法官

雅各布教授认为，在西方，国家负有施行审判以实现正义的债务。^①因此，为臣民提供司法救济的途径，不仅是君主的权力，更是君主的义务。君主通过任命法官，组建国王法庭，为其管辖下的臣民提供司法救济的途径。法官的权力表面上来源于世俗王权的授权，实际上，根据西方基督教教义，法官作为裁判者之地位的取得根源上来源于上帝，法官进行审判的活动不过是对上帝“末日审判”之模仿。^②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法官一方面基于其世俗权力的面向代表国王进行审判，另一方面基于其神权授权之面向以上帝的名义进行审判。结合上一部分关于神意裁判之叙述，神意裁判的废止并不意味着审判活动神圣性的消失，只是说上帝不再直接参与到个案之中，而是通过他的代理人——法官秉持正义理念，依据其理性与良心进行裁判。正如《圣经》所言：“你们办事应当谨慎。因为你们判断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判断的时候，他必与你们同在。”^③因此，在西方基督教背景下，法官自认为是上帝的化身。法官通过宣誓表达对上帝的信奉以及对自身公正义务的确认，神意通过此种形式内化为法官内心之确信。基于此种神意的内化，西方法官在司法裁判活动中获得了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典型例证便是西方两大法系国家“法官造法”权力的获得。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官可以通过对法律的续造来填补既有法律体系之中的漏洞，以寻求个案正义；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的判决本身即成为法的重要渊源之一。可以说，西方国家的法官借由这种神意，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越了作为裁判者的应然角色。

（三）小结：以法官内心确信之主观“正义”为核心的司法伦理观念

西方传统司法伦理中的“正义”并不是真正客观意义上的正义，毋宁说是法官内心确信之正义，即主观认知层面的“正义”^④。西方基督教宗教背景为法官坚持其内心之确信提供了宗教文化上的支持。西方近代司法意义上的自由心证原则，即对证据的取舍、评价以及事实的认定，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这意味着法律原则上不预先规定，而是交给法官自由判断。^⑤在西方语境下，法官坚持自己的内心确信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方面，在面对世俗政治权力时坚持良心自由

① 参见[法]罗伯特·雅各布：《上天·审判——中国与欧洲司法观念历史的初步比较》，李滨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页。

② 参见[法]罗伯特·雅各布：《上天·审判——中国与欧洲司法观念历史的初步比较》，李滨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3页。

③ 《圣经·历代志下》第19章第6节。

④ 主观认知上的正义与客观公正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一方面，二者存在对应关系，法官通过内心确信之正义（自由心证）审理案件事实，以期得出客观公正的判决；但是另一方面，二者间也存在紧张关系，一个客观公正的判决在当事人主观认知上可能并非正义。

⑤ 参见吴泽勇：《民事诉讼中自由心证的裁判方法及司法适用》，《法律适用》2020年第19期。

而不是屈从于世俗政权。在处死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与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司法审判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审判两位国王时，并没有用来审判国王的现成法律，最后都是由法官结合正义等法律原则根据内心确信而作出判决；^① 另一方面，法官自己的内心确信也要受到宗教的“审判”。因为只有上帝的审判才是终局性质的，人间的裁判不过是对上帝审判的模仿而已。（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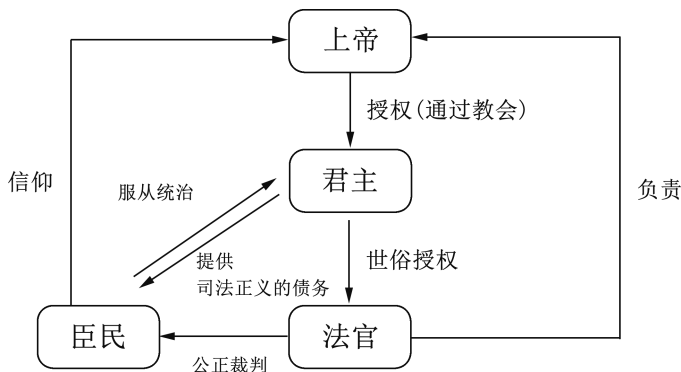


图 1 西方传统司法伦理的运行模式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西方传统司法伦理的积极方面予以转化借鉴，并对消极方面予以批判。具体来说，西方传统司法伦理中强调法治信仰是其积极性要素。“法律要发挥作用，首先全社会要信仰法律。”^② 法治信仰是在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基础上的法治信仰，而不是像西方传统司法伦理中通过基督教信仰将法律与司法神秘化，从而形成司法特权阶层。因此，习近平法治思想通过对西方传统司法伦理的批判性转化，将法治信仰的内涵理解为通过全社会共同参与，增强全社会法治观念，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在全社会树立法律权威。^③ 这种法治信仰根本区别于西方传统司法伦理中法官之内心确信，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全社会对宪法法律权威与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信仰，实现了正义与信仰的“去魅化”，将正义的评判标准交由人民，将信仰的主体扩展于社会，将信仰的对象限定为宪法法律与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二、“外化的天理”：中国传统司法伦理的形成

中国传统司法伦理指的是清末变法修律前中华法系在运作的过程中自身所遵

^① 关于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的审判过程，参见王凯：《英国革命、司法审判与宪制转型：查理一世审判的宪制意义》，《开放时代》2021年第3期。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35页。

^③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90页。

循的价值体系。“天理”在我国传统司法伦理中占据重要地位,“替天行道”就是这种观念的突出反映。直到今天,我们还提倡司法办案要实现“天理、国法、人情”的有机结合。^①“天理”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天理”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司法伦理是如何形成的?通过论述“天理”的“外化”过程,分析中国传统司法伦理的形成及其内容,并与西方传统司法伦理进行比较的研究,显然是必要的。

(一) 从“绝地天通”到“周公制礼”:上古中国政教的分离

前文提到神意裁判在人类社会早期是一种普遍现象,中国古代也不例外。上古时期,巫觋文化是社会主要文化形态。巫和觋是沟通人与神的中介者,原始形态的司法裁判需要通过巫觋沟通请示鬼神后方能进行。^②但是上古社会“诸神众多”,不同部落均有各自信奉的主神,且社会中数量庞大的“巫觋”阶层对原始政治权力的形成产生了阻碍。相传在五帝之一的颛顼时代,在其主导下实现了“绝地天通”。所谓“绝地天通”,字义上是对沟通神界与人界通道的阻绝,实际上是统治者对宗教祭祀权力的垄断。根据学者的观点,“绝地天通”实现了中国古代政教格局的一体重构,自此之后宗教权力从属于政治权力而存在。^③统治者自称“天子”,只有统治者能够沟通天地事务,“上天”相对于“天下”的普通臣民来说,是不可接触的。^④西周时期,通过周公制礼,政治权力进一步“祛魅化”。祭祀逐渐演变成一种固定仪式而不是获取神意的手段,统治者也不再依靠占卜决定国家重大事务。可以说,周公的改制恭敬地解除了上帝和诸神对世间的掌控,把他们送到距离尘世极为遥远的彼岸世界。^⑤在此种社会制度下,相较于“天命”,统治者更加注重人事。天命只不过是人事的被动反馈而不是主动表达。统治者虽然敬拜鬼神,但不让他们干预人间事务,更重视人间的世俗秩序与信用。^⑥“上天”这一概念进一步去人格化,成为一种理念与精神,即“天理”。天理是外化于人而存在的,而且天理作为一种非人格化要素并不会主动介入司法裁判。^⑦例如经典的《窦娥冤》故事,在该故事中,上天并不能显灵阻止冤案的发生,但是上天能够以诸如“六月飞雪”等方式昭示天理。因此,古代中国并

① 参见孟植良:《最高检:检察办案必须天理、国法、人情融为一体》,2021年1月12日, <http://legal.people.com.cn/n1/2021/0112/c42510-31997199.html>。

② 关于巫觋文化,参见王处辉主编:《中国社会思想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43页。

③ 有学者认为,“绝地天通”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教结构的开端。参见陈赞:《绝地天通与中国政教结构的开端》,《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④ 这一传统延续到后来封建社会中,只有君王才能主持祭天大典、封禅大典等仪轨。

⑤ 参见李硕:《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549页。

⑥ 参见李硕:《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563页。

⑦ 正如雅各布教授在书中所说,“上天不是判断正当与否的法官”(第181页),其实笔者认为更恰当的表达应当为“上天并不以法官的形象判断个案的正当与否”。

不会出现诸如欧洲中世纪那种基督教式神意裁判的司法场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上古时期中国传统社会天然的政教分离。

（二）世俗裁判：作为君主化身的判官

从司法权力的来源看，“绝地天通”之后，统治者垄断了与上天沟通的权利，“上天”概念在中国语境下也逐渐演化成为一种非人格化的秩序，即所谓“天理”。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与上天之间的关系被切断了，官员只能与上天保持仪式上的联系，但是官员不能效仿上天，因为只有天子才能“效法天”。^①因此，在中国古代，法官（或者说是司法判官更符合中国语境）无法与上天建立起某种联系，其权力来源只能是世俗的君权。从司法伦理的内容看，不同于西方的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二分，以及将自然世界与社会秩序相分离的二元世界观，中国传统思想认为宇宙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即所谓“天人合一”。社会秩序是自然秩序的一环，自然秩序和自然规律是“天”的体现，而社会秩序即“天理”。“天”是一种威慑的力量，“绝地天通”之后世俗君主垄断了天意解释权，其可代行“天”之罚。基于天命授权的国家强制力，成为保障司法权威的底层力量。“理”即“礼”，古代中国礼法同构，均为伦理纲常与社会秩序的表现形式。作为中国传统司法伦理核心概念的“天理”并不带有强烈的宗教神秘色彩与迷信色彩，其着眼于人事而非神灵，着眼于人伦纲常中的身份实体而非超现实的偶像。从“人”到“理”再到“天”是一体的，从性理到社会人文再到自然秩序是一贯的。^②相较于西方传统司法伦理神秘化、宗教化的特点，中国传统司法伦理是相对世俗的，各级司法官员基于君主的授权，作为君主的化身，为维护“天理”在人间的映射——人伦秩序而行使审判权。在这种人伦秩序下，“每一个人”不是被想象为不同于他的社会或宇宙的一个存在，而是被想象为服从于天道的社会关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③在此种司法伦理观念支配下，古代中国的司法官员不得随意解释由统治者制定的法律，只能严格地遵照适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受到极大限制。^④

（三）小结：以“秩序”为核心的司法伦理观念

在古代中国，国家成文法典的早熟与庞杂系其特色，法律在较早的时期即形

① 参见[法]罗伯特·雅各布：《上天·审判——中国与欧洲司法观念历史的初步比较》，李滨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2～183页。

② 参见黄源盛：《中国法史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3～80页。

③ 参见[美]哈罗德·J.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第1卷，贺卫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75页。

④ 虽然古代也有诸如《唐律疏议》等法律解释著作，但此等解释须经统治者授意方得为之，解释主体亦非司法官员，其并非司法解释，毋宁说是一种“立法解释”。参见管伟：《中国古代法律解释的学理诠释》，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成了体系化的成文法典。中华法系肇始于先秦，形成于秦汉，到隋唐时期逐步成熟。^① 公元前406年，李悝编撰《法经》，确定法典六编体系，后经由秦汉魏晋南北朝历代的法典编纂，至公元651年唐《永徽律》颁布（经解释后颁行的版本又名《唐律疏议》），中国古代成文法典在体例与内容上已经相当完备，后世王朝基本沿用。^② 因此，本部分以《唐律疏议》为例，总结中国传统司法伦理的核心观念。《唐律疏议》开篇即言：

《疏议》曰：夫三才肇位，万象斯分。禀气含灵，人为称首。莫不凭黎元而树司宰，因政教而施刑法。其有情恣庸愚，识沉愆戾，大则乱其区宇，小则睽其品式，不立制度，则未之前闻。故曰：“以刑止刑，以杀止杀”。刑罚不可弛于国，笞捶不得废于家。时遇浇淳，用有众寡。于是结绳启路，盈坎疏源，轻刑明威，大礼崇敬。易曰：“天垂象，圣人则之”。观雷电而制威刑，睹秋霜而有肃杀，惩其未犯而防其未然，平其微纆而存乎博爱，盖圣王不获已而用之。

……

大唐皇帝以上圣凝图，英声嗣武，润春云于品物，缓秋官于黎庶。今之典宪，前圣规模，章程靡失，鸿纤备举，而刑宪之司执行殊异：大理当其死坐，刑部处以流刑；一州断以徒年，一县将为杖罚。不有解释，触涂睽误。皇帝彝宪在怀，纳隍兴軫。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是以降纶言于台铉，挥折简于髦彦，爰造律疏，大明典式。远则皇王妙旨，近则萧、贾遗文，沿波讨源，自枝穷叶，甄表宽大，裁成简久。譬权衡之知轻重，若规矩之得方圆。迈彼三章，同符画一者矣。（《唐律疏议·名例》）

从《唐律疏议》的开篇，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统治者制法定律的最主要目的在于维护秩序（“譬权衡之知轻重，若规矩之得方圆”）。其中，律法所产生的最初原因在于满足复杂的社会生活的需要，调整人们的行为（“其有情恣庸愚，识沉愆戾，大则乱其区宇，小则睽其品式，不立制度，则未之前闻”）。刑罚产生的根据在于对自然现象的模仿（“观雷电而制威刑，睹秋霜而有肃杀”）。刑罚的目的在于报应（“以刑止刑，以杀止杀”）。由此，中国传统司法伦理借由“天理”“天意”等外化的自然现象与自然规律，实则与维护政教人伦秩序为核心，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面向，且世俗权力在中国传统司法伦理秩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此种司法伦理支配之下的法律治理，其优点在于通过语境化、个案性的形而下的体验与某种基于实用理性的形而中的关怀形成的超稳定的社会

① 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编：《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年版，第45页。

② 参见黄源盛：《中国法史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1页。

治理结构。但是，由于缺少明确的形而上的本质要素，不利于法治整体性的发展，在社会结构面临根本转型之时反而会导致既有的秩序框架与治理结构崩溃，近代中华法系的解构即是此证。^①（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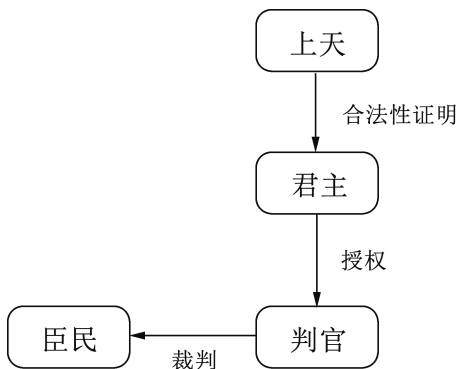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传统司法伦理的运行模式

对于我国古代法制和传统司法伦理，习近平法治思想主张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②在具体转化路径上，一方面强调法律与道德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另一方面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通过道德教化将法律规范转化为人们内心自觉遵行的行为准则。“天理”是传统伦理道德的一种体现，中国传统司法伦理仅强调伦理道德的外显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作用（所谓“外化的天理”），忽视了伦理道德的“内化”及其对普通民众行为的调整作用。“法安天下，德润人心”，习近平法治思想正确处理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即法治外化于行，德治内化于心，由此实现对中国传统司法伦理的创造性转化。

三、实现中西方传统司法伦理的融贯——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融贯”（coherence）作为一个哲学上的术语，被广泛应用于描述政治与法律的实际运行情况。其对命题之间关系的要求高于逻辑一致性对命题之间关系的要求，即不仅要求所指向的命题之间没有逻辑矛盾，还要求命题之间存在相互支

^① 参见廖奕：《法治中国的均衡螺旋——话语、思想与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02页。

持关系,使之成为一个有机体系。^①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理论体系,其不仅是内在融贯的理论体系,更因其博采中外哲学社会科学之智识,汲取人类社会积淀的思想养分,实现了对中西方传统司法伦理的融贯。

(一) 法治信仰与道德教化的融贯

西方传统司法伦理强调信仰,但此种信仰是对基督教教义和法官权威的信仰。习近平法治思想对西方传统司法伦理的信仰理论进行批判性借鉴,结合当代中国语境,提出了法治信仰理念。一方面,“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尊崇法治、敬畏法律,了解法律、掌握法律,遵纪守法、捍卫法治,厉行法治、依法办事,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②。这实际上是对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提出了法治信仰的要求,只有领导干部模范遵守法律,才能带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实现全民守法。这根本区别于西方传统司法伦理关于法治信仰的底层逻辑。西方传统司法伦理强调对基督教义与法官权威的信仰,实则通过信仰这一机制来塑造司法特权。习近平法治思想在肯定法治信仰存在的同时也对其底层逻辑进行了重构,即社会对宪法法律权威的尊崇,仰赖于包括司法工作人员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模范守法。法治信仰的主体扩展到全社会,法治信仰的对象限定为宪法法律与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而不是某种神秘的教义。根据这一逻辑,在法治信仰上,人人平等,并无所谓司法特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③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信仰并非机械的法条主义,在信仰法治的同时同样强调道德的教化作用。增强全民法治观念,需要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有利于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强化公民的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④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体系中,法治信仰与道德教化相辅相成,一体融贯,而道德底蕴则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是,区别于中国传统司法伦理中外化为“天理”的道德观念,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道德更多作用于人的内心。儒家提出“礼治”的主张,是以礼制的形式确定身份等级地位,通过礼在实践上的社会功能,维持传统伦理下社会秩序的稳定,从而将道德外化与制度化。过度强调“天理”等道德的外化,偏重道德伦理对社会秩序的维护

① 参见侯学勇:《融贯性的概念分析:与一致性相比较》,陈金钊、谢晖主编:《法律方法》第9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135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87页。

③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00页。

④ 参见陈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传统法律文化观》,《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

作用,混淆了法律与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并认为法律与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但相对来说,法治对道德更多的是外在的保障作用,可以通过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道德对法治主要是内在的支撑作用,道德要求应当贯彻到法治建设中。但是在作用形式上,道德只能作为司法裁判论证说理的支撑而不能作为司法裁判的根本依据。只有正确处理好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综上所述,习近平法治思想通过对法治信仰与道德教化的重新阐释、对其关系的辩证理解,实现了中西方传统司法伦理的融贯。

(二) 政治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融贯

法律规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司法裁判也是解决社会纠纷的一种特殊机制。司法裁判的作出不仅能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而且能产生一定的社会效果。同时,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因而司法过程中不仅能产生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还能产生相应的政治效果。

首先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方面。根据学者的观点,司法裁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存在三种关系:第一种是“工具论”,将司法裁判的法律效果视为实现社会效果的工具;第二种是“分离论”,通过分离“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而将“社会效果”驱逐出判决的考量;第三种是“统一论”,强调通过司法裁判实现法律规范、案件事实与价值评价的有机统一,从而兼顾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①中国传统司法伦理过于强调客观外化之伦理秩序的重要性,法律被视为维护人伦秩序的手段,因而过于重视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而忽视了司法裁判本身法律效果的实现,是一种“工具论”的立场;西方传统司法伦理过于强调通过司法裁判实现法律上特定的价值追求,却忽视了司法裁判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是一种“分离论”的立场。^②不同于中西方传统司法伦理各自所持的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国司法工作目标的论述是一种“统一论”的立场:一方面,司法机关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通过正确的法律适用实现司法裁判的法律效果;另一方面,在法律效果实现的基础上,司法机关也要注重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通过司法裁判促使公平正义真实可感,实现司法裁判的良好社会效果,达成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融贯。

^① 参见徐肖艺:《论司法裁判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以一审二审法院对“电梯劝阻吸烟案”等的不同判决取向为考察中心》,《江汉学术》2021年第6期。

^② 例如《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关于“一磅肉”的诉请一开始得到了由鲍西娅扮演的法官的支持(虽然最后并未实际执行)。法官此举固然维护了契约自由,但是却忽视了该判决可能产生的潜在的不利社会效果。因为丧失道德基础的契约思想是荒谬的,片面追求此种法律效果的实现将导致异族之间最激烈的对抗和文化歧视。参见冯伟:《莎士比亚与早期现代英国的“法律”建构》,《外国文学》2014年第4期。

其次是政治效果与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关系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主要是从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角度来论述，他强调：“党和法的关系是政治和法治关系的集中反映。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① 西方传统司法伦理表面上强调法官独立，实则是作为贵族的法官阶层借助基督教义同封建领主之间的冲突表现，实际上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是一种政治权力争斗的表征。中国传统司法伦理中，司法判官由皇帝任命，在实际运作中不区分司法审判权力与其他国家权力，旨在体现皇权的统一与权威，也是一种政治效果的体现。在论述司法的政治效果与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关系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最根本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② 这是因为“我们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③。但是，党自身也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党的政策主张必须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因此，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具有一致性，司法的政治效果与法律效果之间具有一致性。又由于人民当家作主的充分实现与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的有序推进有赖于党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为实现长治久安，需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各项工作。由此，司法的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也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综上，习近平法治思想从统一论的立场出发，既强调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也将党各项工作的开展置于法治轨道之上，并通过政策导向促进司法裁判良好社会效果的实现，正确处理了司法过程中政治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通过政治效果的贯彻统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实现，融贯了中西方传统司法伦理。

（三）正义价值与秩序价值的融贯

司法裁判具有终局性的特点。司法程序往往是当事人实现救济的最后手段，如果在这一程序中出现不公正的现象，当事人可能会对整个法律体系失去信心，这将给社会秩序带来新的不安定因素。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司法机关的职能侧重于维护社会稳定。一方面，这是中国古代以“秩序”为核心的司法伦理在当代司法运行中的反映；另一方面，这也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法理学过于强调法律的工具属性，突出法律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功能有关。^④ 但是，过于注重法律的秩序维护功能与法律的工具属性，难免忽视对公平正义的追求。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数次“严打”，使用“运动式”的司法手段打击犯罪，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98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47页。

④ 参见邱水平：《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法理学创新》，《中国法学》2022年第3期。

虽然快速稳定了社会秩序,但是片面强调“从严从快”,许多刑事判决在未对案件事实审慎检视的情况下即行做出,造成了部分冤假错案。伴随着社会秩序更良性运转,“严打”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冤假错案的曝光导致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度降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①,因为司法裁判的公正与否将对社会秩序产生直接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周强说:“一个具体案件对当事人来说,直接关系到权益的实现,万分之一的错案,对当事人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不公平。”当事人的权益如果不能通过合法程序得到维护,其将可能诉诸非法途径,这将给社会秩序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②因此,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要让司法发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显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国司法工作目标的论述,正确认识到了正义价值与秩序价值的辩证关系,指出了司法公正对社会秩序构建的重要作用。

在司法公正内部,还可以区分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西方传统司法伦理中,在形式正义的指导思想下,法官往往不把发现案件事实真相作为裁判基础,仅仅以法庭上当事人及律师的言辞作为内心确认的主要依据。^③因而,西方“司法独立”是一种由司法者在缺乏监督制约的条件下“依据良心”来行使司法权的制度设计,并通过“司法权威”迫使人们接受这样一种带有“愿赌服输”甚至“神明”意味的裁判结果,不可能对司法公正构成有效的制度支撑。^④习近平总书记结合以上两种正义的判断标准,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并结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牢牢把握社会公平正义这一法治价值追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⑤这一论述一方面强调司法机关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诉求,追求司法裁判的形式正义。司法作为守护公平正义的最后屏障,必须以相对客观的标准予以规范。司法机关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审判,其本身就是在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另一方面也强调了司法机关对实质正义目标的追求。司法机关要通过司法裁判实现个案层面的实质正义,而实质正义的评价主体正是人民群众。个案层面的实质正义强调对公平正义的主观感受,而对公平正义的主观感受实际上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41页。

② 例如张扣扣案,其暴力复仇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当年司法裁判不公与司法救济不到位,导致作为被害人家属的张扣扣产生扭曲心理,最终采取极端手段对杀母凶手及其家属进行复仇。参见高明、甘瑛:《复仇与法律——兼评张扣扣案》,《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2期。

③ 参见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课题组:《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中国应用法学》2020年第3期。

④ 参见范明志:《西方“司法独立”为什么在中国走不通》,《求是》2018年第2期。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84页。

就是价值判断问题。^①西方传统司法伦理将这种对实质正义的价值判断权交予法官,而我国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司法正义的最终评判权应当归属于人民。综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国司法工作目标的论述融贯了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价值追求,并且正确地指出了实质正义的评价标准应当由人民群众决定,体现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

四、结论

中西方传统司法伦理的形成均根植于各自的文化与历史,西方传统司法伦理强调通过司法程序实现法官内心确信之正义,中国传统司法伦理侧重于通过司法裁判维护客观伦理秩序。两种司法伦理各有其优势,也有其局限性。西方传统司法伦理赋予法官在司法审判中自由心证的权力,减少了行政权力的干预,保障了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同时,通过强调法治信仰,能够加强司法公正,增强司法权威,减少司法过程中的腐败现象。但是,西方传统司法伦理宗教色彩浓厚,将正义的判断标准交由教义与法官,实际上维护的仍然是以法官为代表的贵族精英利益。中国传统司法伦理强调司法对伦理道德与社会秩序的维护,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但是,中国传统司法伦理缺乏价值性要素的支撑,过于重视秩序的维护而忽视当事人权益的保障。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论述,一方面强调公平正义的重要性,并强调法治信仰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明确了公平正义的判断主体是人民,法治信仰应当是对良法善治的信仰。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判断标准在于人民群众的权益是否得到切实维护,人民群众是否真实可感。习近平法治思想通过“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核心立场,融贯了中西方传统司法伦理对正义与秩序的价值主张,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的基础上,学习借鉴了域外法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因此,当代中国司法伦理的构建需要我国司法机关与司法工作人员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相关论述的要旨,通过成千上万个案的公正裁判,汇聚司法公信、提升司法权威,从而推进我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① 参见刘翀:《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个案正义的主观维度论》,《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The Cohere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into Chinese and Western Judicial Eth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Judicial Ethics

Huang Qianzhuo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Western judicial ethics originated in the Middle Ages, with the rise and fall of divine judgment. The objective divine will was internalized as the judge's inner conviction. Combined with the influence of the Christian concept of "Judgment Day", judges obtained a sacred status in the judicial process, ultimately forming the Western traditional judicial ethics with the judge's inner conviction of justice at its core. Chinese traditional judicial ethics began in ancient times. Due to the separation of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ancient China, rulers monopoliz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divine will. As a result, judicial officials could only exercise judicial power as the embodiment of the monarch. The function of judicial procedures was limited to maintaining the existing human and ethical order externalized as divine principles, ultimately forming Chinese traditional judicial ethics with the core of maintaining order. In contemporary China,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roposed the judicial work goal of "striving to make the people feel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every judicial case". This discourse, in the dimensions of the belief in the rule of law and moral education, the political effects, legal effects, and social effects, and the values of justice and order, realizes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Western and Chinese judicial ethics. It serves as a direct express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Key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Judicial Ethics; Justice; Order; Coherence

[责任编辑: 杨鹏]



动 态

论点摘编

一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特质与价值

陈金龙

文明生成是长期积累的历史过程，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多年的创造与积累才完善其体系、成就其辉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相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明而言的，是处于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的文明，是基于中华民族传统文明而生成的文明，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成中华文明的整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两个结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生成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蕴含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突出特性，又具有新时代的文明特质。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念、实践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样态来看，其特质可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坚持人民至上的文明；第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协调发展的文明；第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创新发展的文明；第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兼收并蓄的文明；第五，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和平发展的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及其特质，具有独特的文明价值，对促进中华文明现代性转型、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塑造国家民族政党现代形象将产生深远影响。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8期）

二 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黄建军

“文明”是人类主体意识觉醒的产物，是人类社会独有的精神标识，是作为“类”的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尺度。“人类文明”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证成，是人类生产方式、思想价值以及制度形态的确证。文明的主体是实践之人和理性之人，在不同的历史视域中，作为历史之主体的人类创造了不同的“文明形态”，这些“文明形态”表征着人的实践活动的普遍性与差异性。在西方思想传统中，人类文明具有多种样态和表达，为文明形态赋予了虚构性、绝对化和抽象性特质。马克思把人类文明形态从“神话”“精神”和“事实”拉回到人类社会历史本身，开创了解释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范式。在唯物史观视域中，人类文明形态在历史规律中实现了“逻辑证成”，在社会形态中实现了“历史生成”。在历史规律和社会形态展开的逻辑中，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是社会主义文明的实践展开。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即新在它的批判性、超越性、前瞻性和生成性，新在它开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动向、人的解放的新途径和人类发展的新前景。在当代中国实践中，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表达。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23 年第 10 期）

三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统筹“两个大局”的世界意蕴

陈远章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重大论断，是对新时代中国发展的系统谋划和全球局势的深刻研判，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深邃的战略眼光、宽广的国际视野和强烈的使命担当。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以奋发有为的精神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于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以“中国之路”因应“世界变局”，为人类

社会通向现代化提供全新路径选择；以“中国之治”应对“西方之乱”，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了最大稳定性和确定性；以“中国之理”回答“世界之问”，为促进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进一步科学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探究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有利于读懂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读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未来。

（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8期）

四 论毛泽东的“结合”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阎树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的一系列原创性贡献中，“两个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无疑是最重要的创新思想之一。从思想渊源看，“两个结合”是在毛泽东提出的“一个结合”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创新创造。研究毛泽东的“结合”思想及其时代价值，对于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思想脉络和原创贡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更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毛泽东的“结合”思想是在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和消除共产国际的误解中提出的，其贡献在于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确立了党的优良学风，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这些重大贡献，使得毛泽东的“结合”思想成为新时代坚持“两个结合”的思想源头，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遵循。

（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9期）

五 马克思“世界历史”命题的拓新与新时代的理论创新

顾海良

马克思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提出的“世界历史”命题，在19世纪70年代

“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中得到重要补充。在 20 世纪俄国和中国这样一些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对“跨越卡夫丁峡谷”可能性和现实性问题作出的实践验证和理论拓新，提升了马克思“世界历史”命题的思想内涵。20、21 世纪之交，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改革失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实践，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对“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作出的突破性回答，对马克思“世界历史”命题作出的创新性探索。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新基点、社会主义“大历史观”新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境界和新发展理念主导性理念等方面，对马克思“世界历史”命题在 21 世纪的发展作出创新性探索。党的十九大以后，马克思“世界历史”命题凸显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课题，习近平总书记从新时代基本特征的鲜明底色、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路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人类共同价值新内涵、人类文明新形态意境等方面，形成了新时代“世界历史”命题的系统化学说。

（摘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 年第 5 期）

六 现代性悖论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超越

项久雨

所谓“现代化”，指的是从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合乎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与潮流，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现代化是属于历史层面的概念范畴。所谓“现代性”，指的是现代社会、现代世界、现代生活的核心特征或根本属性，属于哲学层面的概念范畴。西方率先开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石的现代化探索，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形塑了以理性化为中轴的现代性特征。但与此同时西方的现代性蕴含着深层的悖论，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张关系，导致了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的背反。在反思资本主义带来的现代性悖论的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将价值理性同工具理性、历史理性、理论理性、实践理性有机统一起来，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创造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历史尺度中确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性，以不断发展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为价值理性提供坚实的理论内核，在实践中具体地解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所面临的价值难题，从而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历史性超越。

（摘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 年第 6 期）

七 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的首创性意义

张志强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全面深入地阐述了“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这些重要论述充满理论的深度和学术的厚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中华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机制和内在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然要求进一步与文明或文化更深入地结合。如果说“第一个结合”中的文化或文明还是自在契合的对象，那么“第二个结合”中的文化或文明已经是自觉契合的内容。“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在具有中国形式、中国形态之后，还具有了中国文化生命。“第二个结合”蕴含着一种新的文明观和大历史观，确立了扬弃西方文明的、更加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文明观，确立了能够古今贯通、源流互质的历史认识论。“第二个结合”在“又一次思想解放中”全面树立起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重文化主体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第二个结合”的目标和宗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扬弃西方现代文明形态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将是一种坚持和发展了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现代文明。

（摘自《哲学研究》2023年第8期）

八 论“两个行”的内在逻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大历史观诠释

梁燕晓

“两个行”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新论断和新概括，意指“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两个行”深刻揭示了“能”“好”“行”之间的内在关系，强调的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守正创新，彰显的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自信。“两个行”所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能”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出“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根本原因在于，既遵循了“行”的马克思主

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也创造了“行”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以特殊性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同时在“遵循”与“创造”的守正创新中亦探索出了共产党执政规律。前一个“行”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性，后一个“行”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两者的统一只有在大历史观的视域下方能得到系统解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非“反对《资本论》的革命”或新自由主义道路，而是执行马克思晚年“政治遗嘱”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行”的守正性产物，也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创新性产物。

（摘自《哲学研究》2023 年第 10 期）

九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World: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Yun Gong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by nature a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t is not based on external aggression or on colonization, internal exploitation or oppression. Nor does it blindly copy or imitate the modernization paths of other countries. Rather, it is a new modernization path opened up independently by the CPC through the great practice of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a path based on a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history, culture and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on the objective laws of modernization.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explor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breaks the Western-created mindset that "modernization equals capitalism." While overcoming the inherent problems brought about by Western modernization, problems that include polarization, ecological destruction and the supremacy of capital, China's modernization also refutes the myth that "modernization equals Westernization." It serves as a proof that developing countries can take an independent path to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ir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historical traditions. Through its successful practice, China's modernization has given the lie to the Western-centric concepts of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It has brought deep changes to the world landscape, and is exerting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 of world history.

（摘自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No. 2, 2023）

十 China's Long War on Poverty

Carlos Martinez

In late 2020,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nounced that its goal of eliminating extreme poverty by 2021 (the centen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d been met. At the start of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 in 2014, just under 100 million people were identified as living below the poverty line; seven years later, the number was zero. To eradicate extreme poverty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of 1.4 billion people—which at the time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was one of the poor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characterized by widespread malnutrition, illiteracy, foreign domination, and technological backwardness—is without doubt “the greatest anti-poverty achievement in history,” in the words of UN Secretary General Antonio Guterres (2019).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China's ongoing struggle against poverty. In addition to discussing the recently concluded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 in which the CPC-led government achieved its goal of ending extreme poverty,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anti-poverty measures taken during the various phase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cluding land reform in the liberated areas in the 1930s and 1940s; the period of initial socialist construction from 1949; reform and opening up from 1978; and the more recent measures aimed at building common prosperity. He concludes that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more broadly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has been foundational to the entire Chinese socialist project and constitutes a key theme of each of its stages.

(摘自 *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No. 3, 2023)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征稿启事

本集刊是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专业集刊,旨在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者搭建一个交流、探讨的平台。常设栏目有名家访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化理论研究、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青年论坛、博士论坛等。

本集刊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开展文化研究,坚持政治标准、学术标准,依托经典,关注现实,追踪前沿,扶持青年,推进对话,助力创新。欢迎各方有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志趣者通过邮件向本刊邮箱(mkswhyj@163.com)投稿。

本集刊为半年刊,截稿时间上半年为9月底,下半年为4月底,文章字数在0.8万~1.5万字。本刊全文已加入中国知网等数据库,投稿即视为同意加入。作者著作权使用费和稿酬一次性付清。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审稿费等。投稿文章请遵循以下格式规范

(一) 论文要件及字体字号等

- 1.大标题,三号黑体;副标题,四号楷体,居中。
- 2.作者,小四楷体,居中。
- 3.作者简介(30~50字),以当页脚注方式,注明姓名、单位、职称、职务、研究方向,小五宋体。
- 4.中文摘要(300字以内)和关键词(3~5个),五号楷体,关键词用分号隔开。
- 5.正文,五号宋体,英文和数字使用Times New Roman字体,默认单倍行距。
- 6.英文内容,包括题目、作者姓名、摘要、关键词,置于文末。

(二) 正文层次及字体字号

- 一级标题:一(用小四号标宋)。
二级标题:(一)(用五号黑体)。
三级标题:1.(用五号仿宋)。

(三) 文中引文注释方式

参考文献统一采用当页脚注形式,每页单独排序,序号采用①②③,置于引文结束处的右上角。

1.专著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1页。
陈先达:《哲学与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英]以赛亚·伯林:《卡尔·马克思:生平与环境》,李寅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99页。
Yadullah Shahibzadeh, *Marxism and Left-Wing Politics in Europe and Iran*,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p.35.

2.期刊

- 王韶兴:《现代化国家与强大政党建设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Wolfgang Streeck, "Engel's Second Theory: Technology, Warfare and the Growth of the State", *New Left Review*, Vol.132, 2020, pp.75-88.
Linda Weiss, "Globalization and State Power",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Vol.29, No.1, 2000, pp.1-15.

3.文集

- [英]安东尼·吉登斯:《处于舞台中心的中左翼》,杨雪冬、薛晓源主编:《“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David M. Kotz,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Lessons from the Demise of State Soci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in Robert Pollin(eds.), *Socialism and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Essays in Honor of Howard Sherman*, Cheltenham and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0, pp.300-317.

4.报纸

- 张士海:《自我革命何以成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光明日报》2022年1月21日。
引用中国古典文献,一般在引文后用夹注,如(《论语·学而》)。

(四) 图表编排

- 1.由于采用黑白印刷,电子制作图表时图例不宜用彩色区分。
- 2.遵循“先文后图表”的方式,图表与文字对应,并注明资料来源。
- 3.图表顺序编号,如图1、图2;表1、表2,并注明图表名称;图名统一放在图下中间位置,表名统一放在表上中间位置。

张士海
程恩富◎主编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

二〇二四年第一期 总第十三期

山东大学出版社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中共中央宣传部原部长王忍之题写刊名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集刊简介

本集刊由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属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专业集刊。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中外文化发展现状、中国传统文化、多领域文化问题（比如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外交、军事等领域的文化问题）、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世界文化思潮等。

本集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中外文化理论与实践，积极刊发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坚持学术第一的标准，大力推荐富有新思想、新观点和新方法的关于中外马克思主义相关领域的文化研究成果。

我们将力争把本刊办成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园地，并与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结合起来，注重前沿和热点问题研究，大力扶植青年学者，推出一系列有分量、有深度、能够引起理论反响与学术争鸣的高质量研究成果，积极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建言献策，并不断提升学术质量，扩大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影响力，拓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阵地。

ISBN 978-7-5607-8210-2



定价：78.00元